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雁南飞——黄宗英传



内 容 提 要

黄宗英一直深受观众和读者的喜爱，并被记者追踪不舍。本书便真实、生动地描述了她丰富而又坎坷的人生道路。

她出生在一个飘零的知识分子家庭，十六岁走上话剧舞台，不久又走上银幕，成了一颗耀眼的明星。在半个世纪的艺术生涯中，她创造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同时又写了大量的电影剧本、报告文学、散文……以火样的激情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和读者。

在她的爱情和事业里，充满了难以想象的悲剧情节，她承担着做梦也想不到的而又令人钦佩的“角色”。她不是弱者，但有时却陷入迷茫；她不是强者，但从不向命运低头，一直勇敢、乐观地向前走着、走着……

责任编辑：陈先法

封面摄影：陆震伟

封面设计：

版面设计：陈 平

雁南飞——黄宗英传

姜金城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插页 10 字数 231,000

1996年9月第1版 199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5321 1456-2/I·1146 定价：19.50元

（沪）新登字103号

黄宗英传

青春的恶梦

晚霞，以它橙红色的光辉，映照着层层叠叠的高楼大厦，映照着美丽的街心花园。一朵朵紫红色的郁金香开得正艳，微风中飘着淡淡的花香……

西柏林的傍晚，竟也是这样清丽、迷人，透着大自然赋予它的魅力。

地平线艺术节的活动，安排得极其紧张，黄宗英每天都是在匆忙中度过的。除了开会、游览之外，还要利用一切能利用的时间，同各国的作家、艺术家们交谈。只有晚餐后轻松些，能有一点时间散散步。

此刻，黄宗英漫步在街心花园里，她第一次来到西柏林，但对这个城市并不觉得陌生，仿佛漫步在上海的外滩，又仿佛漫步在深圳蛇口的海滨，甚至还听到了那熟悉的涛声。突然，一群白色的鸽子飞落在她的面前，咕咕叫着，有的点头，有的亮翅。啊，一群多么纯洁、多么可爱的生命啊！黄宗英欣喜地蹲下身，张开了手臂，一只鸽子立刻理解了她的心意，轻捷地飞上了她的手掌。黄宗英捧着这和平的象征，会心地笑了，笑得那样畅快，笑得那样甜蜜。

这时，有两个少女走到黄宗英的面前，用不太流利的汉语对她说：

“您好！我们……是学汉语的，学汉语的。在艺术节的朗诵会上，我们认识了您……您的作品《小木屋》动人，您的朗诵也动人……”

“您是作家，又是演员，现在又当经理？”

黄宗英微笑着点点头。

“您所走过的道路艰难吗？……我们想知道。您的少年时代……青年时代，迷人吗？……”

望着这两个可爱而又天真的少女，黄宗英想用最简练的语言答复她们。于是，便亲切地说：

“我小时候，是个丑丫头，懂吗？长得不好看，嗯，是个丑小鸭。我的青年时代是当演员，演话剧，拍电影，我生活得很苦，苦极了，像吉卜赛人，一点也不迷人。”

两个少女睁大了惊异的眼睛……

夜里，黄宗英又失眠了，她一连吃了两次安眠药，都未能入睡。那两个少女的问话，不知为什么总响在耳边：

“您的少年时代……青年时代，迷人吗？……”

啊，黄宗英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已经很遥远了，几十年来，她没有时间去回忆。就是在那可怕的动乱年代，造反派和工宣队逼她写交代材料的时候，她也回忆不全，因而常常遭到训斥：“你不老实，装糊涂！”

一九八五年七月，我在深圳蛇口采访她的时候，几次请她回忆一下童年，可她总是讲得很简单，似乎童年的生活已经淡忘了。但是有些事情，她又记得那样清楚，清楚得令人惊愕。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三日，不知是不是倒霉的星期五，我来到人间。我是属牛的，必定也是哭着来的。微笑面对人生，当是在“识透愁滋味”之后。

父亲黄曾铭于清末留学日本，是电话局总工程师。

我却没有继承电与工之遗传因子。

母亲陈聪，贤惠慈爱，上过女学。能课儿以“孟子曰”、“臣密言”、“Father”、“Mather”……幼年，启蒙于北京西城京师第一蒙养园。我长得丑，淘气还淘斜了眼。后经名医孔伯华大夫治疗：日贴薄薄牛肉片于眼角

鬓边一侧。小学毕业时，眼珠渐渐正过来了，现在已闹不清哪只眼睛曾斜过。我将此情告诉过记者们，彼等皆不忍揭我之丑……

黄宗英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两个弟弟。他们从小感情就好，一直亲亲热热的。她九岁时，父亲不幸患伤寒病故了，于是，家境陡落，全靠两个姐姐工作扶持家庭。经济拮据，母亲只好卖掉心爱的首饰。黄宗英特别心疼病弱的母亲，尽管还是小孩子，却很懂事，常常帮助母亲洗菜、拣煤渣、糊袜、补袜子。还能站到小板凳上，握着大勺炒菜。

黄宗英说，她的父亲是新旧时代交替中的一个很有特点的人物。是的，这位年轻的知识分子留学东瀛，效法西洋，欣赏古风……他的善良和质朴，也展现了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的美德。

记得五岁那年，有一天爸爸正带领我们在院子里爬树，这时上小学一年级的哥哥，从门外带来一位小同学，此人就是孙道临，当时他的名字叫“以亮”。孙以亮身穿长袍马褂，少年老成，看着爬在树上的我们，连连点头，操着大人的口气说：“小孩子不淘气不聪明！”那个逗劲，惹得爸爸放声大笑。

爸爸从北京去青岛赴任，带去一位做饭的王师傅。

有时候，我们拿爸爸当马骑着转圈圈，王师傅光着膀子坐在客厅沙发上，摇着蒲扇瞧乐子。后来，王师傅不幸暴病，急送医院，不治身亡。爸爸说：“王师傅为我们家做了几年饭，和我们人格上是平等的。他是一位烹饪‘工程师’，为我家操劳客死异乡，当厚葬以谢。”我们全家沉痛地迎来了王师傅的家属。出殡那天，爸爸披麻打幡，我们全家身穿孝服，送往墓地。

爸爸像堂·吉诃德似的，一生以自由、平等、博爱、个性解放等反对封建，但他反对的只是座大风车。我很怀疑堂·吉诃德式的遗传因子，依然作用于他的子孙。

黄宗英很爱两个哥哥。大哥黄宗江，是著名的演员和剧作家。二哥黄宗淮是历史学家，也写过一个剧本《李大钊》。在十年动乱中，他被迫害致残，辗转病榻，含冤而亡。两个哥哥读书的时候就喜欢演戏。有一次，天津南开中学的南开剧团，演出易卜生的话剧《国民公敌》，黄宗江男扮女装，饰夫人。黄宗淮穿着短裤，饰夫人的儿子。为了给饰夫人的大哥买到一双大号的高跟鞋，黄宗英陪着大哥走遍了闹市小白楼。每逢南开剧团公演，黄宗英总是穿上大姐为她缝制的带荷叶边、扎着大蝴蝶结的小裙子去看戏。

我小的时候不爱演戏，也不懂戏，只是疼哥哥。他们感兴趣的事，我就顺着他们的劲儿，由着他们的意儿，只要他们高兴，我就心满意足了……

黄宗英也爱两个弟弟。大弟黄宗洛，现在是著名的话剧演员。小弟黄宗汉，是精明强干的企业家。

黄宗英小时候没起名儿，一家人都叫她小妹。黄宗洛进幼儿园的时候，老师问他：

“你在家和谁玩？”

“和姐姐玩。”

“你姐姐叫什么名儿？”

“小妹。”

天啊，又是姐姐，又是小妹……老师听得糊里糊涂，还以为黄宗洛有点白痴呢。

小时候，我常和弟弟在一块儿做美梦，我们希望贫穷，希望有一天家里

破产，或者家里不要我们了，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去卖报，去做工，去流浪；就可以一块儿成爱迪生或别的哪个伟人（那时候，我们大概只知道爱迪生……）。后来，有幸我们都和贫穷结了解之缘，美梦能以实现。

小弟在一封信中说：“自幸能与贫穷为友，使我得益匪浅，他年若能小有出息，都是贫穷所赐。”

我很骄傲有这样一个好弟弟，只是舍不得让他受苦……

一九三七年夏天，黄宗英高小毕业了，她很有自信地报考了天津有名的中学——南开中学。考试那天，天特别热，又没有风，梧桐树的叶子动也不动。考试用的“马粪纸”的垫板，都被汗湿透了。她没有昏场，也没有碰到特难的题。考卷答得很快，还有时间复查。监考的老师在她身旁站了很久，凭感觉，她觉得监考老师是满意的。回家以后，黄宗英天天数着指头盼发榜，连玩的心思都没有了。二姐送给她一本橘黄色的硬面日记本，她舍不得用，白天晚上都珍惜地放在枕头边，想进了南开中学后用它写日记。

发榜的日子终于到了。十二岁的黄宗英为了表示自己是大人了，便穿上妈妈做的新衣服，独自一个人往南开中学走去。她心里乐滋滋的，直想唱歌，可在马路上怎么唱呢？她看着过往的行人，觉得每个人都在看她，并知道她心里高兴，连树上的小鸟都唱着、跳着向她祝福。她轻轻地咬着小嘴唇，一阵风似地向前疾走。

啊，等待她的是什么呢？是录取的喜讯吗？不，不是。是一场灾难，是一场民族的灾难……

我走啊，走啊，走到离中原公司大楼不远时，忽然街上秩序大乱。行人纷纷往店铺里躲去，我也跟进了店铺。不记得是哪片店，只记得店外有廊檐，透过店堂的大玻璃窗，人们屏息地眼看着日寇的坦克开过来，开过来，把烈日晒软了的柏油马路碾得一楞一楞的。坦克车头上插着日本太阳旗，车盖上坐着荷枪实弹、神气活现的日本兵。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祖国母亲的胸膛——天津沦陷了。

第二天，我跟着大人在胡同口听他们打听战事消息。枪声依稀，忽的，一颗流弹打在了大姐旗袍前襟下摆当中，滑下地来，我们愣了一会儿，捡起那颗发烫的子弹。母亲听得人声喧嚷，在窗口错乱地喊着我们的名字，以后再也不许我们出家门了。从来热热闹闹、书声琅琅的家，骤然严肃沉闷起来。记不得是过了多久，我们走上二楼屋顶围着木栏杆的平台，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敌机在城市上空盘旋，俯冲下去，脖子一昂，扔下一枚枚炸弹。大姐惊呼：“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学校！”南开大学被炸了，起火了，浓烟在升腾……

多少年过去了，我至今不知道我曾否考取过南开中学？但我常常会想起到南开中学去看榜，想起日寇疯狂的坦克，想起枪声、轰炸声和逃难的人群，以及在硝烟、火光中大人们焦急愤懑的脸……

灾难，对幼小的黄宗英来说，是一次严重的摧残，在她天真无邪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可事物是那样复杂，由于这场突来的灾难，使得一个天真的女孩子早熟了。尽管黄宗英当时还不能（也不可能）全面了解国家危亡的命运和奋起抗日的洪流，但她已经懂得为国家、为民族担忧了。

她常常念着大哥的一个同学——大扁桃哥。他叫娄平，是地下党，冀东游击队的负责人。当时黄宗英记不住他的名字，看他的头和脸都长得扁，就亲昵地喊他大扁桃哥。有一次，大扁桃哥在她家住了十几天，很少外出，即

便是出去，也大都是在晚上。为了防止万一，黄宗英还为他选择了一条安全脱身的路——跨过阳台，从邻居瑞蚨祥绸布店老板的七姨太家中出去。自从那次大扁桃哥离开她家以后，直到五十年代末他们才在天津重逢。

也许由于黄宗英懂事早，又聪明，又能干，人缘儿也好，十五岁上，就常有人家来提亲。当时家境清寒，面临着失学的威胁，提亲者总是一口气地说出许多好条件。例如：供读书，供留洋，供赡养母亲和弟弟……如此好心，反使这个知识分子家庭感到羞辱和痛苦。仿佛冬日雪后的早晨，呼啸的风卷起地上的雪花，迎面吹来，寒冷浸透了肌肤，心头的积雪也越来越厚了。于是，黄宗英变得沉默，不再那么爱笑了。她比以前更爱看书、更爱沉思了。

啊，黄宗英，你在想什么呢？

我虽然喜欢童话《灰姑娘》，却怀疑灰姑娘嫁给王子以后会不会真的幸福……

一九四一年的春天，是冰雪迟迟不融化的春天。院子里的迎春花在光秃的细枝上，星星点点地开了几朵，很快就被冰冷的风吹蔫了。尽管严寒封锁着大地，抗日烽火却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熊熊地燃烧。

由于家里经济拮据，再也交不起学费了，十六岁的黄宗英只好追随大哥黄宗江，去上海滩演话剧，自立谋生，并帮助两个弟弟继续求学。临走那天，母亲看着瘦弱的女儿收拾着简单的行装，格外难受。女儿从小就爱读书，可如今偏偏失学了，还要离家远走，到戏台上去寻找生路，等待她的是什么呢？她毕竟还是孩子啊！母亲伤心地流着泪，黄宗英故意装着没事儿似地安慰母亲：“娘，您放心吧，我跟着大哥有什么可怕的，有了钱，我会回来看您的……”话还没说完，她急忙转过身去，因为她怕母亲看到自己的眼泪。

当她坐在南去的列车上，望着窗外辽阔的大地由棕黄变得翠绿时，也不再默默地吞泪了。她想着大哥，想着还不知什么滋味的舞台生活，心里涌出了一股暖暖的泉水，汨汨地流着，流着……

我没有去做哪个有钱人家的少奶奶，而是跟着大哥去做一个自我奋斗的穷艺人，至今犹堪自慰。

黄宗英追随大哥黄宗江，进了上海职业剧团。先是在剧团管道具、在幕边为演员提台词。后当 Understudy——即在乐队席看戏，熟记每个女演员的台词和动作。在剧团里，除了大哥之外，别的演员她都不熟，只有后台服装间里那个百事通、见人就露出独立门牙的周妈对她亲热，给了她许多安慰和勇气。

有一天，剧团正在演出曹禺的名剧《蜕变》。女演员梅邨结婚，导演黄佐临叫黄宗英代她上场。演那个得宠复又失宠的姨太太，既泼辣又会撒野，是个没几句台词的配角。黄宗英从来没排过戏，更没上过台，几句台词虽然记熟了，怎么说？怎么演？黄宗英并不知道。好在她一点也不害怕，穿上不甚合身的旗袍，含上一根象牙长烟袋，就在幕边候场了。可是她在幕边只顾瞪着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看戏，竟忘了什么时候上场。突然，不知被谁推了一把，说：“小妹，该上场了。”她就糊里糊涂被推到了舞台上。

一上台，她完全惊愕了。只觉得脚灯奇亮，刺得眼睛什么也看不见。由于紧张，舞台上的演员讲什么，她一句也听不清。反正别人不张嘴了，她就赶紧尖着嗓子说一句台词，就这样瞎演了一遍，被台上的演员轰下了台。到了后台才发现手上的长烟袋还没点过火，可她在台上还装模做样地抽了好几口呢。演完戏，黄宗英倒有点担心了，不知自己在台上演得怎么样。卸装的

时候，导演黄佐临走到她的身边，她吓得连头也不敢抬，心扑通扑通直跳。当她胆怯地抬起头的时候，黄佐临毫无表情地对她说：“明天还是你上。”

从此以后，黄宗英就被认可当了演员。

就在黄宗英被推上舞台的那天晚上，电影厂的老板正巧在台下看戏，他觉得北京新来的这个小妞儿不错，扮相好，胆子也大，嗓子又脆又亮。第二天，便约十六岁的黄宗英签了一个拍电影的合同。

不久，黄宗英又参加了《鸳鸯剑》、《甜姐儿》的演出。她饰演的甜姐儿，是个娇生惯养、傲气十足的富家小姐。由于她演得真实、生动，又富有艺术魅力，一下子竟征服了上海观众。

有的女孩子给她写信，有的男青年给她寄照片，有的戏迷看完戏，还守在后台门口，等着看卸了装的“甜姐儿”。后来，她又在曹禺的话剧《家》中扮演鸣凤，一时名声大噪。

在旧社会，当演员是很苦的，特别是在进步的剧团里演戏就更苦了。如果戏不卖座，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只好靠好心的房东舍一顿炒饭或阳春面。有时卖座好，发了薪水，黄宗英也舍不得多吃碗馄饨，还要把钱攒着，寄给母亲，供两个弟弟读书用。她住的房子，往往是“道具仓库”，有时睡在《日出》中陈白露的席梦思床上，有时睡在《夜店》中流浪汉的床板上，当然，她也睡过重话剧中女王那闪闪发光的大金床。有时却什么床也没有，只好睡在阴冷、潮湿的地板上……

记得有一次，我演完日场“甜姐儿”下来，脱去阔小姐的华丽服装，坐在台上大幕边的琴凳上，一边背那我这辈子记不熟一篇的钢琴五线谱，一边啃干面包。突然，我被一群女学生包围了，她们要我签名。她们是从哪儿溜进来的？也许是散了场躲在乐池里的吧。第二天，还是两场戏之间，该吃饭的时候，一个圆圆脸、长着两个小酒窝、梳着小辫子的姑娘，提着一只搪瓷多展饭罐来了。小姑娘，叫蓁蓁，就是昨天来找我签名的姑娘中的一个吧，她羞涩地说：“阿奶、阿爸叫我送饭给你。”说着，她打开了饭罐，呵，热腾腾的腌笃鲜汤，油亮亮的新米饭，麻线扎着的百页包肉，碧青的油菜。

蓁蓁说：“阿奶、阿爸说，你今后到我家来吃饭吧，就在戏院对面的弄堂里，化着装也可以跑过去。”从此以后，蓁蓁天天在两场之间拽我到她家吃饭。阿奶说：“只不过添双筷。”阿奶总是把粉蒸肉、火腿干丝塞到我碗里，常心疼地念叨：“怪不得这么瘦，年轻轻的不能正经吃饭怎么行呢，要做病格。唉，也是别人家的娇囡，依姆妈不晓得……”阿奶眼圈红了。

如今，算起来，阿奶早已过百岁了。这一家善良可亲的人家在天之涯、地之角的哪一方呢？或许已经到了和我不能通邮的地方了吧？

剧团里有个能干的小伙子，叫异方。他会演戏，会作曲，还会指挥乐队。这个有才气的大近视眼长得并不漂亮，却稳重、潇洒，讨人喜欢。每场演出异方都要在乐池里指挥演奏，每场演出黄宗英都要在乐池里看戏，记女演员的台词和动作。有时她看异方的指挥动作会看得出神，有时异方会给她一个亲切的、兄长似的微笑。日子一长，他们的目光常常碰在一起，可是每当目光碰在一起时，又都会飞速地闪开。于是，剧团里几个消息灵通的人士在传：异方和小妹谈恋爱了。本来是没有影子的事儿，这样一传，反而使两颗年轻的心更接近了，而且比过去自然和大胆。

纯洁、真挚的爱，像江南三月的春风，不仅能吹遍辽阔坦荡的胸怀，也能吹进冰雪封锁的心灵，当然，它更容易闯入少女心中那片神秘的土地。异

方和黄宗英真的相爱了，爱得像盛开的杜鹃花那样热烈和美好，使许多人都羡慕。

有一天，异方在后台突然昏倒了，他面色苍白得吓人，黄宗英又急又怕，全身都在发抖。异方被送进了医院，大家都以为他是太累了，休息一两天就会好的，可是经医生检查确诊是心脏病，而且比较严重，一时难以治好。这使剧团的同事很吃惊，又不敢把真实的情况告诉黄宗英，因为黄宗英是剧团里大家都疼爱的小妹妹。

异方住了几天医院，病情稳定后便出院了。医生嘱咐不能参加工作，他决定回北京的家中休养。他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剧团，告别了黄宗英。

异方离开上海以后，黄宗英总是心神不安地想着他，那一封封充满了深情、充满了思念，也充满了希望的信，像童话里的大雁，带着少女那颗纯真的心，不断地飞往北京。

开始异方都能及时回信，后来回信越来越少了，尽管信中并没有写到病情恶化的事儿，可黄宗英已预感到异方的病没有好。焦急，忧虑，担心，思念……黄宗英陷入一种感情极其复杂的痛苦中。

异方在家休养、治疗了两个多月，病情不见好转。母亲十分着急，常常背着儿子偷偷地流泪。母亲四方求医，不怕花钱，她多么希望儿子的病一天天好起来！可她的希望被浓重的云雾吞没着，吞没着。听说“冲喜”有时能治好重病，这位可爱而又可怜的母亲，便寄希望以“冲喜”来挽救儿子。于是，刚满十八岁的黄宗英，便匆忙地赶到了北京。

婚事是在异方的舅舅家操办的。结婚那天很热闹，也很排场，许多远远近近的亲友都来了。异方已病得不能起床，拜天地时，是由他妈妈代替儿子拜的。异方睡在一间客房里，黄宗英睡在他舅母的房中。异方的奶奶，是个很精明、很细心的老太太，她几乎不大离开孙子的病床，默默监督着黄宗英，怕他们同房。为了让异方静心养病，婆婆不准黄宗英多去看丈夫。黄宗英心里很急，又不敢违背长辈的旨意。白天，有时只能给异方喂点饭或喂点药，而且还要装做非常平静的样子，不敢多说话。心中的许多甘苦，许多话，只能埋着，深深地埋着。有时黄宗英却用炽热、深情的目光和淡淡的微笑，给病中的异方一些安慰和勇气。异方是个有才华的艺术家，他理解人，更理解自己的妻子。不用多说什么，只要看看她那忧虑的眼神，就可以看到笼罩在她心头的阴影，那是多么沉重、多么浓密的阴影啊！

婚后第十天的凌晨，我突然听到异方的房中传来繁乱的祈祷声（异方家是信基督教的）。我心里怕极了，手脚直发抖。慌慌张张跑进异方的房间，只见他苍白的脸上透着青灰色，痛苦地蹙着眉头，四肢不停地在抽搐。我哭喊着扑过去：“快送医院，快送医院啊……”

异方住进了医院，经过医生的抢救，病情平稳了点。

我和他妹妹留在医院看护他。除了喂饭、喂水和喂药，我就坐在他的病床边织毛线手套，来消磨这难熬的、痛苦的时光。我的惆怅，就像手中的毛线那么绵长……

已是深秋了，枣树和槐树上的叶子都落光了。干枯的树枝，在蓝天的衬托下，更显得孤寂和清冷。一阵突来的风，卷起了墙角的几片落叶，有一片竟飘到了病房的窗台上……

这几天，黄宗英是数着分秒过日子的。异方的母亲和弟弟好几天都没有露面，他们在忙些什么呢？黄宗英有些疑惑。

今天是黄宗英婚后的第十八天，异方格外地烦躁，问他哪里不舒服，他也讲不清楚，只是不耐烦地辗转呻吟。到了晚上，异方才平静了，他睁开眼睛望着黄宗英，昏暗的目光竟然变得明亮了，使人感到温暖和甜蜜。他抖开被头，伸出两只手，紧紧握着黄宗英的右手说：

“小妹，我对不起你。原谅我……我对不起你！”

黄宗英使劲咬着自己的嘴唇，把脸颊贴在他的手上，不停地抽动着肩膀。大颗大颗的泪滴，沿着他俩握在一起的手在流，在流。异方的妹妹却难过得哭出了声音。

异方闭上眼睛睡着了。他的呼吸特别均匀，而且越来越长。望着他平静、沉睡的样子，我怕极了，一直盯着他的胸脯。病房里很静，很静，静得使人不安，空气好像都凝固了。我感到恐慌和紧张。突然，我发现异方停止了呼吸，便大声哭喊着叫他。异方的妹妹很快喊来了医生，可是打针、做人工呼吸，都没有用了。

当医院的人抬着异方的遗体去太平间时，我已经没有眼泪了。我跟着他们走啊，走啊，只感到路是那么长，那么长。一阵寒风吹来，我浑身发抖，下意识地拉了拉衣领。这时，我怕异方冷，想给他多穿件衣裳……

第二天一早，异方的母亲和弟弟都来了，而且带来了寿衣和棺材。黄宗英这才意识到，前几天他们就去准备后事了，只是瞒着她呀！

异方的丧事办得很隆重，摆了不少酒宴。出殡那天，长长的送葬队伍，足有半里长。异方的遗体，葬在香山的公主坟。坟头上常常放着青翠的松枝，橙红的枫叶和迟开的野菊花，那是黄宗英在山野里采来的。

黄宗英跟着异方的母亲，住在香山一个很漂亮的别墅里。这儿清静，优美，空气又好，他们想在这儿多住些日子，希望黄宗英的心情尽快地好起来。

黎明，黄宗英常常听到孤女、孤孀在哭泣，那声音是极其凄惨的，会使你的心不停地颤抖。当她推窗一看，只见山谷中烧纸钱的火光一闪，一闪，看着那火光，黄宗英的心就一阵阵隐痛，抹着脸颊上的泪水。

黄昏，黄宗英常常到林中散步，踏着落叶，她喜欢在泉边徘徊。她会想起跟父亲逛公园的情景，会想起母亲唱的摇篮曲，会想起儿时怎样背着书包上学……

有时，山下的庙里，传来钟声和鼓声，在山里久久地回荡着，那声音是阴沉的，甚至有些可怕，给她送来了无尽的孤寂和惆怅。

当落霞映照着窗口，黄宗英望着天边会陷入沉思。她觉得远处是天幕，霞光仿佛是舞台的灯光在照耀，每当这时，她就产生一种艺术创造的渴望和欢乐。什么孤独，什么苦闷，都会无影无踪了。

有一天，她从林中散步回来，一只金黄的小鸟跌落在她的脚下。黄宗英一看，小鸟的翅膀上有一片血迹，她心疼地把它捧回家，每天都给它的伤口擦红药水，希望它尽快地重新飞上蓝天。

我觉得人生如戏，可我演的是一出什么戏呢？

我每天睡得很晚，却起得很早。天刚亮，我就披着斗篷上山了。坐在山坡的石头上看书、读英文，有时还藏了银角在石缝中或枯草里，想过几天再来找。有的找得到，有的就找不到了，就像我遗忘的往事。

我常常想念妈妈和弟弟，更想念上海的大哥和剧团里的同事。他们都在忙些什么呢？为什么不多给我写点信来呢？我多么希望每天都收到他们的信啊！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十八年了，第一次感到孤独的可怕和恐怖……

啊，黄宗英，十八岁的黄宗英……

啊，新寡，结婚十八天的新寡……

黄宗英不相信这是真实的遭遇，这是一场梦，而且是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恶梦啊！

有人说，舞台上的爱情比生活中的爱情要美好得多。因为在舞台上，爱情只是喜剧和悲剧的素材，而在人生中，爱情却常常招来不幸。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啊，爱情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对待一个十八岁的少女呢？她那纯洁的心灵，怎么能承受这样无情的创伤啊！

异方的母亲是基督教徒，她希望我献身宗教。山下教堂里的牧师也常来找我，劝我到教堂里去。

可是，我想回到舞台上，我想演戏……

清冷的阳光，映照着山野。淙淙的泉水不知流在哪片灌木丛中，那声音听起来使人感到悲伤和痛心。黄宗英沿着弯弯曲曲的石径向山下走去，今天，她要到教堂里去看看，也许那儿真会给她驱散心中的惆怅，还给她少女的天真和欢乐。

突然，她听到什么在哀鸣，抬头一看，原来是一只孤雁从上空飞过。啊，大雁早就飞到南方去了，为什么偏偏将这只孤雁遗落在秋风萧萧的北方呢？

黄宗英不敢再看一眼那只孤雁了，她轻轻地叹了口气，默默地向山下走去。

深秋的香山，显得更加空旷，更加荒凉，仿佛还透着原始的寂寞和阴森。黄宗英瘦弱的身影，像那只孤雁一样，被一片片山林和残留的点点红叶淹没了，淹没了……

从舞台到银幕

杏花开了。开得那样美，那样多，满山满谷，仿佛落下了一片朝霞。清凉的山风，饱含着杏花的芳香，吸一口，都有些醉人。淡淡的晨雾，从树林里，从泉水边，轻轻地涌出。霎时，整个山野变成了一幅秀丽的画卷，并且带着浓浓的童话色彩。

黄宗英采了一束杏花，正向异方的墓地走去。一群花翅膀的小鸟，飞在她的身边，它们一步不离地伴着她，好像怕她孤独和悲伤。

穿过了一片杉林，山坡上竟飞来了大朵大朵的白云，不一会儿，眼前就出现了一片茫茫的云海，黄宗英完全怔住了，不知该往哪儿走。

突然，她发现云中有一个影子，时隐时现地向她走来。啊！那不是异方吗？黄宗英惊喜地大叫着，扑到了他的面前。异方微笑着接过了那束杏花，张开有力的臂膀，紧紧拥抱着黄宗英。

黄宗英有许多话要说，可一句也说不出来，只是在不停地抽泣。

异方亲切地抚着她的头发说：“别哭了，你看，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异方，别离开我，别离开我……”

“小妹，我不会离开你的，就是走到天涯海角，我也不会离开你的！……”

这时，一阵狂风吹来，卷走了飞涌着的云涛云浪，一眨眼，云海不见了，异方也不见了。

黄宗英在狂风中大叫：“异方！异方！……”

茫茫山野，昏昏暗暗，没有异方的回声，也没有异方的影子。

黄宗英扑在脚下的那束杏花上，失声地痛哭着……

我哭醒了，原来做了一个梦。

我抽掉了泪水湿透的枕巾，再也睡不着了。自从异方病逝之后，我第一次做这样的梦，也怕做这样的梦。

窗外，寒风在呼啸，雪花在飘零，冬夜为什么这样长、这样冷啊？

香山上的杏花，什么时候才能开呀？开吧，快点开吧，我要采一束最早开放的杏花，放在他的墓前……

雪后的早晨，黄宗英穿着一件浅灰色的呢大衣，围着洁白的羊毛围巾，向山下的教堂走去。她已经在教堂的育婴堂里工作了。每天护理着那些瘦骨嶙峋的婴儿，给他们喂水、喂饭（唉，那是什么饭呀？是用霉米煮的稀粥，或是有着酸味的面糊糊）。有时还要给他们换尿布、洗衣服。黄宗英总是那样耐心、细心地做着这一切，而且显得那样坦然和平静。好心的牧师很高兴，他以为黄宗英已经开始信奉至高无上的上帝了。其实，黄宗英怎么会信奉上帝呢？她到教堂里来工作，只不过想分散一下愁苦，安慰一下那颗寂寞的心。

有一天，她一进育婴堂，看见几个婴儿被老鼠咬伤了鼻子和耳朵。那血糊糊的小脸把她吓坏了，她感到头晕、恶心，房屋剧烈地旋转……

她昏倒了。等她醒来时，一位年老的修女在守护着她。

“黄小姐，您好吗？”

“……”黄宗英不知怎样回答，只好冷漠地摇了摇头，可她那双明亮的眼睛里，却闪着泪花。

我病了两天，第三天又去育婴堂工作了。不知为什么，我非常惦念那些可怜的婴儿，生怕他们再被老鼠咬伤。其实，我夜里也不在那儿，担心也是没用的。

夜晚，香山静极了，可我常常失眠。睡不着的时候，我干脆起来点上蜡烛写剧本，不到十天工夫，我就写好了一个话剧《寒窗走笔》，寄给了我们的剧团。我知道，我的剧本是不会排演的，可剧团的同事看到它，一定是很高兴的，他们会更加思念远方的小妹。

不久，剧团里派岱云（地下党员）和林宝玲来接黄宗英回上海。见到剧团的人，她格外高兴，那孤独，那忧伤，那苦苦的思念，一下子都烟消云散了。

黄宗英欣喜地领着他们逛香山，尽管山山岭岭到处还是白茫茫的积雪，可冬日的森林也透着一派倔强的生机。在无意中，黄宗英突然发现林宝玲总是对她含情脉脉的，这使她很紧张，也很不安。因为林宝玲的眼睛里有一种令人畏惧的光……

我要走了，异方的母亲和牧师再三劝我留下来，我没有同意。

我要回剧团去！我要演戏！我要离开香山——这个恶梦的梦境！

当我真的要走的时候，心里又有些留恋了。我住过的别墅，我工作过的教堂，我散步的树林，我坐过的石头，特别是我不敢多看、也不敢多想的那片墓地……都变得那样亲切、那样诱人了。

我跟着岱云和林宝玲下山了。

异方的母亲和牧师，把我们送得很远、很远。我一边走一边回头，当我再也看不见他们的身影时，竟难过地流泪了。

火车在冰雪覆盖的大地上疾驰，我没有心思看书，也没有心思看景，只希望火车开得快些，再快些。

火车开到徐州的时候，因大雪封路走不了啦。雪地里到处都是急得团团转的旅客，谩骂声、叹息声、孩子的哭声和刺耳的吵闹声混成了一片。

林宝玲亮出了一张特务证件，领我们通过了日本鬼子的岗哨，住进了一个离车站不远的日本旅馆里。旅馆里很暖和，地板上的“榻榻米”软软的，很舒服，可是我翻来覆去睡不着。一闭眼，就是白皑皑的雪、乱糟糟的人群，还有林宝玲那张特务证件……

啊，林宝玲为什么有那张证件？他是特务吗？太可怕了！我不敢想了，实在不敢再想了。

黄宗英回到剧团以后，得到了大家亲切的关怀和爱护。先是把她安排在剧团负责人李伯龙家里住，李伯龙一家待黄宗英极好。每天下夜戏回来，都要强迫她喝两瓶鲜牛奶。有时把她灌得发脾气：“一瓶，一瓶就够了，我又不是牛！人家还睡不睡觉？！”

后来，黄宗英觉得住在剧团负责人家里，和伙伴们不平等，扭着要走。李伯龙只好依她，让她与柯姐（地下党员）住在一起。不久，柯姐身份暴露，骤然离开了上海，她只好住进宏宏哥哥让给她的亭子间里。

在旧上海，一个年轻的女演员，居住、吃饭都是难事，剧团里多少人为她烦心、伤脑筋。

有天深夜，林宝玲来敲黄宗英的门。他喝得醉醺醺的，瞪着两只红眼睛，可怕极了。

黄宗英壮着胆子打开一条门缝说：“太晚了，你别进来。”

“我……我有事找你。”说着就要挤进门去。这时，小杨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宝玲，你要干什么？”

“我有事……你管不着。”

“太晚了，你该睡觉了。有事明天再说。”

“我要送给小妹……几样东西……”说着他把几本书和一个带金链条的镯子递给了黄宗英。

黄宗英只好接过来，吓得手直发抖。

“好，东西送完了，你该走啦！”小杨连推带拉地将林宝玲赶走了。

脚步声渐渐远去了，黄宗英却不安地坐在床上不敢入睡。

我常常生活在恐惧中。这种恐惧是很难用文字表达的。

我演戏最红的时候，也是我最恐惧的时候。我每天都收到求爱信、照片，莫名其妙的请帖也不断，有时还有人送鲜花。晚上一下戏，门口有许多大亨、少爷的汽车在等我，我怕极了。

对《甜姐儿》之类的无聊剧本，我不想再演了，我想回天津去读书，可这读书的愿望是多么难实现啊！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了！苦难的中国人民从血泊和废墟中英勇地站立起来，准备用双手重新建设自己的国家。可是欢庆胜利的歌声还没唱完，蒋介石便发动了大规模的內战。于是，辽阔的中华大地，又升腾起内战的炮火和硝烟。

在上海，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白色恐怖。文艺界常有进步的戏和电影被禁演，有的人会突然失踪，有的人会遭到暗害。剧团里的地下党员朱修勤悄悄告别了黄宗英，要去投奔新四军。

那是一个初春的夜晚。一弯新月，映照着刚刚爆出叶芽的柳丝，在近郊的一条河岸上，黄宗英和朱修勤并肩走着。绿油油的油菜地里，一串串花蕾刚刚透黄，从迎面吹来的微风中，已经闻到油菜花淡淡的清香了。

朱修勤挽着黄宗英的手，深情地说：“小妹，今天我约你来，是向你告别……”

“啊，你要走啦？”

“是的，我明天一早就走了。”

“您上哪儿去？”

“我要去的地方很远、很远，那儿的生活和这儿完全不一样，那儿是另一个天地……”

“您还回来吗？”

“当然要回来。不过，什么时候能回来就说不定了。也许很快就会回来，也许要很长时间。”

“那您给我留个地址吧，想您的时候，我就给您写信……”

说着，黄宗英忍不住哭了起来。

朱修勤像哄小妹妹似地替她擦着眼泪说：“好小妹，别哭了。我真想给你留个地址，可我没有地址，我去的地方，是无法通信的。”

“那您到底是上哪儿去啊？”

“原谅我，小妹，我不能告诉你。可你以后会知道的，真的，会知道的。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会常常想念你的，祝福你的！”

夜，已经很深了。她俩踏着月光走下了河堤。朱修勤没有回家，半路上她们分手了。

黄宗英站在一棵苦楝树下，目送着朱修勤远去。很久很久了，黄宗英还在挥手，尽管已经看不见朱修勤的身影了，还朝着她走去的方向默默地凝望。

黄宗英擦了擦眼里的泪花，自信地在想：“修勤姐一定会回来的，等她回来时，我还在这儿接她……”

都说春天是爱情的季节，是孕育新生命的时刻，真的是这样的吗？

在春天，有生命力的种子，总要发芽、伸枝、展叶的，不管压上怎样的石头！有生命的枝丫，你在这边折断它，它也会在那边爆出一片新绿。

不知为什么，我想结婚了。是怕孤独？是怕惆怅？

是怕那些莫名其妙的来信？是怕下戏后等在剧场门口的那些大亨、少爷的小汽车？……是，也不是，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我看到南北剧社的社长程述尧人好，也诚实，便嫁给他了。那是一九四六年的春天……

英国十七世纪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说：“当人心最软弱的时候，爱情最容易入侵，那就是当人春风得意、忘乎所以和处境窘困、孤独凄凉的时候，虽然后者未必能得到爱情。人在这样的時候，最急于跳入爱情的火焰中……”

难道黄宗英的心，正是处在最软弱的时候吗？在爱情上，她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创伤，至今还没有痊愈，这次结婚，她会幸福吗？

江南的杜鹃花又开了，开得那样美，那样深情，使人总为它担心，就怕它再遇上暴风雨！

我们结婚后，述尧对我挺好。不久，我就离开了上海，住在北京他的家中。

这个家是个封建的大家庭，礼节很重。就连吃饭都不准儿媳妇坐着，还要给每个人盛饭。我哪儿干过这种事儿，也没受过这种约束。但是，刚进这个家门，心里再不高兴也只好忍着。

白天，我看看书，读读英语，也不便多出去找朋友玩，日子一长，我便感到十分苦闷。这种苦闷，最先被述尧发觉了，他体贴地问我：“小妹，你怎么了？有什么不高兴吗？”

我摇摇头。

“是不舒服了吗？”

我还是摇摇头。

“到底怎么啦？”

我轻轻叹了口气，用微笑安慰不安的述尧：“别问我了，没什么，真的没什么。”

“不，你骗不了我，我看得出，你有心事。”

“……”我觉得眼圈湿润了，把头紧紧靠在了述尧的胸前……

程述尧对黄宗英更加关心了，他希望她高兴起来，可又不知道怎样才能使她高兴。程述尧见黄宗英吃饭很少，每天下班回家都要带些吃的给她。不是大栅栏的烤鸭，就是前门的烧鸡；不是五香牛肉，就是狗不理包子……黄宗英非常感动，也理解程述尧的一片深情和心意。然而，她需要的并不是这些吃的东西，也不是夫妻之间粗俗的生活上的爱恋。

黄宗英到底需要什么呢？

她需要学习，需要事业上对她的理解和支持；她热爱舞台上的生活，她要演戏！她要痛痛快快地演戏！

我知道述尧很爱我，我也不是不爱述尧，否则，我不会同他结婚。也许由于我们的性格、爱好、知识与追求方面的差异，我们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

在我们之间，好像有一层雾，朦朦胧胧地阻隔着我们，我想冲破这层雾，却办不到，而且它越来越浓了。

述尧每天下午五点多钟下班，每当挂钟当当地敲响五下的时候，我心里就不安和紧张，因为述尧回来时，我不知道该和他讲什么……

夫妻之间感情的变化，哪怕是最微小的，也会很快地感觉到。黄宗英的苦闷，程述尧是发觉了，但他不完全理解她的苦闷。所以他只想在生活上格外关心她，希望她能快乐起来。

后来，程述尧发现他的关心和体贴，并没有消除黄宗英的苦闷，反而增加了她精神上的压力。他也感到有一层雾，朦朦胧胧地阻隔着他们，这使程述尧十分茫然和不安。

啊，爱情总是那么神秘，那么莫测，它是不能一厢情愿的。像一块透明的水晶，不能有一粒沙子，不能有一滴水珠，更不能有一丝裂痕。

程述尧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黄宗英是个事业心极强的人，有自己的追求和理想。作为丈夫，他为有这样的妻子而高兴，甚至感到自豪。可是程述尧没想到，他们之间的距离，是缩短不了的……

我也发觉了述尧的茫然和不安，可我无法给他安慰，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述尧能真正的理解我……

黄宗英渴望回到舞台上，她觉得自己离开舞台太久了。她常常想起演过的那些戏，想起那些熟悉的台词，甚至还会想起在舞台上忘了台词时所出的洋相。不论是欢乐还是痛苦，不论是幸福还是惆怅……对黄宗英来说，演戏总是那样诱人。

这些天，约黄宗英演戏的人特多，这个剧团要演《万世师表》，那个剧团要演《大地回春》，黄宗英心里虽高兴，却都没有答应。因为程述尧的父亲不准她演戏。在这个封建的家庭里，公公的话谁敢违背呢？！

为此，黄宗英陷入了极端的痛苦中，她觉得自己像一只悲哀的小鸟，被人家捆住了翅膀。

程述尧理解黄宗英的痛苦，他悄悄请来了五舅，为黄宗英向父亲说情。这个冷峻的家长，威严地沉默着，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于是，程述尧的五舅和黄宗英一起下跪了。

看着跪在地上的一老一小，程述尧的父亲总算开恩了，答应让黄宗英演戏，但要他们夫妻从这个家中搬出去。

我像被缚的小鸟，挣脱了绳索，飞上了辽阔的天空。

啊，天那么高，那么蓝，都是属于我的吗？！

近来老好像有什么新的东西在我心里酝酿，我想把它们说出来或写出来，好让我自己知道我到底得到了些什么，可是不行，我的能力还不够分析我所感受的这一切。

回到舞台上以后，我的心情好多了，仿佛是一片枯黄的原野，渐渐地返青了。

一九四六年冬天，我在北京拍摄了第一部电影《追》（编导沈浮）。该片描写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民族资本家的破产和一个国民党下级军官对进步和光明的追求。我饰演女主角——叶文秀，她是个文静善良的大小姐，谢添是我影片中的情侣。

又是大雁南飞的秋天了。

雄伟的长城，像一条巨龙蜿蜒在崇山峻岭间。那一簇簇野菊，那一片片

红叶，显得清新而又明丽，仿佛是为了衬托长城的气势和豪情才生长的。

黄宗英登上高高的烽火台，心胸顿时感到无比的开阔，茫茫的群山，浩浩的天宇，都挽不住那条飞腾的巨龙。望着遥远的天边，她又想起了投奔新四军的修勤姐，想起了那天夜晚在河边的告别……

风在呼啸，她隐隐听到一种声音传来，像雷声，又像鼓声；不，也许是人们传说的解放战争的炮声吧？

她沉浸在神秘的渴望中。

今天，黄宗英是来向长城告别的，她就要南下去上海了，参加上海戏剧学院筹款义演。

这告别，是愉快的，不仅没留下惆怅，反而增加了信心和力量。

当黄宗英走下烽火台的时候，不知从哪儿飞来了一对紫红色的大蝴蝶，总围绕在她的身旁。

啊，这蝴蝶也在为她送行吗？

在上海戏剧学院筹款义演中，我演出的节目是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剧本是我自己改编的，服装也是我自己做的。我还记得，那是一件淡灰色的长裙，破得丝丝缕缕的，可破得很美。那条蓝色的小围裙，镶着宽宽的花边，虽然很旧，却显得素雅、别致……

寒冷的北风，打着唿哨……

黑暗的夜幕中，大片的雪花在落，在落……

这是除夕的夜晚，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从远处走来。她赤着一双小脚，穿着一件淡灰色的破长裙，围裙里兜着许多火柴，手里还拿着一束火柴。纷纷扬扬的雪花，落在她金色的长发上，落满了她那瘦小的肩头。

“卖火柴！卖火柴！……”

她不停地叫着，谁也没有向她买过一根。由于寒冷和饥饿，她哆嗦着向前走……

黄宗英一出场，就把观众吸引住了。她那瘦弱的形体，她那忧郁而又充满渴望的目光，她那清脆的、微微颤抖的声音……都使观众感到寒冷和饥饿，感到那个风雪之夜的可怕。

一根火柴燃起来了，又一根火柴燃起来了……

当卖火柴的小女孩在火柴的光亮中，含着微笑被冻死的时候，寒风卷着漫天的雪花在狂舞……

这时，台下静极了，不少人默默地擦着眼泪。

大幕降下了，立刻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我没想到《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演出会这样成功，这使我很不安。有一次演出刚结束，我在后台卸装，突然，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来到我的面前，她长得很美，一双小手捧着个蛋糕对我说：“小姐姐，你吃吧，你不要再去卖火柴了！”

我忍不住哭了，紧紧抱着这个天真的小女孩，哭了很久，很久。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中电”（中国电影制片厂）二厂的导演陈鲤庭，正在筹划拍摄电影《幸福狂想曲》。男主角由赵丹担任，女主角正在寻找。

有一天，赵丹和陈鲤庭到朋友家中玩，看到写字台的玻璃板下有一张少女的照片，这姑娘并不特别美，却有一对非常明亮的大眼睛，闪烁着天真无邪的光辉，展示着美丽善良的心灵。

“这是谁？”

“这是‘甜姐儿’，北京的一个小姑娘。”

“她现在在哪儿？”

“在上海，正在参加义演。”

“这双眼睛太好了，就是我们要找的眼睛！”

于是，他们当天晚上就去看了黄宗英的演出，第二天又去看了她拍的电影《追》，决定请她担任影片《幸福狂想曲》的女主角。

《幸福狂想曲》是一出上海小市民的悲喜剧。影片通过破产农民王金富、城市贫民吴志海和年轻的寡妇张月华的遭遇，揭露了战后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和腐朽。

黄宗英扮演那个被流氓玩弄和欺压、善良耿直的寡妇张月华。这是黄宗英拍的第二部电影，这部影片上映后，受到观众和舆论界的好评。

在《幸福狂想曲》的拍摄过程中，赵丹就悄悄地爱上了黄宗英，可是黄宗英一点也不知道。赵丹是著名的电影明星，是有自己表演风格的艺术家，黄宗英十分崇敬他。她曾一次又一次地看过电影《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她喜爱这两部影片，更佩服赵丹的表演才华。这次与赵丹合作拍戏，热情、坦率的赵丹给了她不少关心和帮助，有时赵丹用明亮、深情的目光望着她，她觉得那是兄长的目光，温暖而又亲切，从来没想到她被赵丹爱上了。

《幸福狂想曲》拍摄结束了。在黄宗英要回北京的前夕，赵丹约黄宗英到家中吃饭。

黄宗英十分高兴地去了。

那是一顿很丰盛的晚餐。赵丹的母亲很会做菜，又是鱼，又是虾，又是牛肉又是鸡……满满的一大桌。

那时，赵青只有十一二岁，赵矛才六七岁，可以看出赵丹失去了妻子，带着两个孩子生活，是很不容易的，尽管家中有母亲照料着，可母亲毕竟是母亲啊！

吃完饭，赵丹一会儿让我吃苹果，一会儿又让我吃橘子，我几次要走，他都挽留我多玩一会儿。

后来，我微微有一种感觉，赵丹可能有什么事要说，可赵丹仍在谈电影艺术，谈演员修养，谈现实主义表演方法，并没有其他的话题。

天晚了，我不能不走了。赵丹沉默着，好像还有些不安和激动。

我笑着说：“再见了，欢迎您到北京来玩！”

赵丹点了点头。

我刚站起来要走，赵丹突然对我说：

“宗英，我有句话要告诉你。”

“什么话？”

他大胆而又深情地说：“我认为你应该是我的妻子！”

啊！我简直惊呆了。

望着赵丹那双真诚、期望的眼睛，我的心在怦怦地跳，跳得那样激烈，跳得那样甜蜜，我想说什么，可什么也说不出。

沉默，不平静的沉默……

奔腾的大海，怎么能没有呼啸的涛声呢？心灵的呼唤，怎么能没有纯真的回响呢？

于是，我果断地说：“好，我回北京办离婚手续！”

啊，追求光明的共同理想和攀登艺术高峰的共同志向，把黄宗英和赵丹

联结在一起了。他们的相爱是浪漫的，但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一支“狂想曲”变成了现实，艺术家的生活和爱情，真的这样充满了传奇色彩！

大雪纷飞，列车北去。

白皑皑的大地，更显得辽阔和冷峻。一个个城市，一个个村镇，匆匆而过，在漫天的风雪中，它们变得那么迷茫，那么单调，令人感到茫然。

黄宗英坐在列车上，心事重重。她在想：回到北京，怎么和程述尧说呢？提出离婚，他会同意吗？如果他不同意，又怎么办呢？

黄宗英在痛苦地沉思，她已预感到回到北京后，生活上会有一场更大的暴风雪……

望着风雪茫茫的大地，黄宗英看到一个人向她走来，他走得那样急，那样吃力，礼帽上和大衣上都落满了雪花，就连眉毛上也挂满了细小的冰碴。

啊，那是程述尧，是程述尧……

他总是喜欢那样微笑着亲切地看人，这么大的风雪，他怎么会知道我要回来呢？

述尧啊，我知道你对我好，也深深地爱我，可是我不能不离开你。请求你谅解我吧！不要问我为什么，我说不清楚，也不可能说清楚，让我们分手吧，愉快地分手吧……

一声汽笛，打断了黄宗英的凝想，列车仍在颠簸中前行，不远就是黄河大桥了。

雪，下得更大了。迷迷茫茫的大地，并不显得灰暗，反而令人感到洁白和清醒。

雪花，在车窗外纷纷扬扬地落着，也在黄宗英的心中纷纷扬扬地落着……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这是一个令人惆怅的冬季，阴沉沉的天空很少露出阳光，风总是那么寒冷，那么严酷地掠过大地，满眼是白茫茫的积雪，满眼是白茫茫的愁云。在黄宗英的心上，这个冬季格外漫长，仿佛整个生活、整个宇宙都在这个季节里结冰了。

黄宗英从上海回到北京后，便向程述尧提出离婚，这是程述尧没有想到的。他们结婚近两年了，程述尧一直深深地爱着黄宗英。无论是她演戏还是拍电影，无论是她在北京还是在上海，无论他们分别几天还是几个月，程述尧总是像新婚时那样想着她，盼着她早日回家。没想到，做梦也没想到啊！这是为什么？这怎么可能呢？程述尧完全茫然了，好像落进了十里迷雾，沉在深深的痛苦中。

有时，他伤心地问道：“宗英，你一定要离开我吗？难道我们真的没有在一起生活的基础吗？你知道，我是多么地爱你……别离开我，别离开我好吗？……”

“述尧，别问我了，求求你别问我了……”黄宗英也难过地低下了头，大颗大颗的泪珠滚落在面颊上。“述尧，我知道，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是你想过吗？我们的志趣，我们的追求有这样大的差异，勉强生活在一起，会有真正的幸福吗？……我常常感到不安，因为我没有当好你的妻子，你应该有一个比我更好的妻子。让我们分手吧，愉快地分手吧！”

有时，他又气急败坏地大发雷霆：“离婚，离婚……我是不会同意的！我们能够很好地生活在一起，为什么不能呢？不许你再提离婚，不许！……”

黄宗英默默地听着，一句话也不说，是啊，她能说什么呢？不管程述尧怎样发火，她都能忍耐着，因为她理解他，理解他的心情和痛苦。

一天晚上，程述尧没有回家，这可把黄宗英急坏了，等到深夜，也没听到他的脚步声。她急忙穿上大衣，迎着呼呼的北风，到街上去寻找。天都快亮了，也没看到述尧的影子，黄宗英只好拖着疲惫的脚步不安地向家中走去。冬天的黎明可真寒冷啊，她觉得身上的血都要冻结了，两肩在微微地发抖……

漫长的冬天过去了，春天带着绿色的生机又来到了人间。早晨，我推开窗户，就看到一对可爱的小燕子向我飞来，它们飞得那么轻捷，那么快乐，还喃喃地说着什么。它们在说什么呢？我当然听不懂，但是却能意会。我心里的积雪开始融化了，融化了。

不久，我又回到了上海，每天忙着排戏、演戏，生活上的烦恼虽然还干扰着我，可我也没有时间多去想它。程述尧不同意离婚，赵丹又深深地爱着我，而且爱得那样真诚，那样炽热，我该怎么办呢？有人说，爱情是不见火焰的烈火，爱情是充满烦恼的喜悦，爱情是饱含甜蜜的痛苦……可是对我来说，爱情却是向往的大海、事业的希望，我必须拿出勇气，付出代价。

后来，述尧有事来到上海，我们尊敬的兄长金山也特地赶到了上海，经他耐心调解，述尧终于同意离婚了。我们没有去法院，只是在金山的主持下，双方在协议上签了字，便默默地分手了。

当我成了赵丹妻子的时候，并没有举行盛大的结婚仪式，也没有登报宣布什么“情投意合”，我们觉得那些俗气的东西，只能给无聊小报增加新闻。

述尧的母亲，是一位善良、可亲的老人，我和赵丹结婚后，她还送来了金项链、金戒指和漂亮的皮大衣。我知道，老人喜欢我，仍在爱着我。这些

礼物和这颗母亲的心，我一直珍藏着，珍藏着……

当春风吹绿江南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开始反攻的消息不断地传来，于是，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上海的统治。有公开的封锁线，也有秘密的封锁线，然而，无论是什么封锁线，都封锁不住人民向往解放区的心！解放区的歌曲，像一只只展翅的小鸟，飞进了人们的心灵。

山那边哟好地方，
一片稻田黄又黄……

黄宗英最爱唱这支歌，每当唱起这支歌，她就想念曾在剧团里工作的地下党员岱云大姐和朱修勤大姐。如今，她们在“山那边”干什么呢？是在点着汽灯的舞台上演戏，还是在炮火纷飞的前线战斗？“山那边”具体是什么样？黄宗英是不知道的，也不可能知道。但是，她清楚地意识到“山那边”是自由、解放的象征，是光明、幸福的象征。

啊，“山那边”的阳光，虽然远离千里、万里，却已洒满了黄宗英的心田。

地下党直接领导的昆仑影业公司成立了，黄宗英和赵丹一起，欣喜地进了这家公司。

昆仑影业公司的老板是任宗德、夏云瑚和蔡叔厚。有许多著名的电影艺术家如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陈白尘、陈鲤庭、沈浮、郑君里、徐韬、王为一等，都在这里工作。

在昆仑影业公司筹备拍摄欧阳予倩编剧的《关不住的春光》时，导演徐韬和王为一请赵丹、黄宗英担任该片的主角。

后来，王人美看了这个剧本，很想演这部电影的女主角，这使两位导演为难了。

看到王为一那副为难的样子，我一时也不知怎么办才好，我希望听听赵丹的意见。可赵丹用信任、期待的目光看着我，什么也不说。

这时，我突然变得冷静了，便微笑着对阿王说：“别为难，这有什么呢，王人美是影坛前辈，应该给我们多留下点戏。既然她有兴趣演，就请她演吧。她有经验，会比我演得好……”

“可是你已经花了不少心血，做了不少准备了。”

“这没什么，演戏总要讲戏德，天下的戏多得很，何必去争戏呢。”我这么安慰阿王，实际上也在安慰自己，希望的事业刚刚开始，我知道自己所肩负的使命！

《幸福狂想曲》上映以后，黄宗英以自然、纯熟的演技和年轻、漂亮的形象，赢得了许多观众的赞美。赵丹和黄宗英在这部影片中初次合作，就获得了成功，是很不容易的。分析其成功的因素有多方面，但是他们在这次艺术实践中，情投意合，配合默契，却是很重要的因素。有家报纸说，他们在影片中的热恋场面，简直不是在演戏，而是真情流露……

在银幕上初露才华的黄宗英，很快引起了许多导演的瞩目和关心。她除了演出话剧之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又拍摄了影片《鸡鸣早看天》、《街头巷尾》、《丽人行》。在《丽人行》里，她第一次同上官云珠合作，黄宗英演一个以教师为公开身份的革命女性，上官云珠演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水银灯下的日日夜夜，使她真正认识了上官云珠，而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岁月如流，几十年过去了，上官云珠已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被迫害含冤而死，黄宗英一直深深地怀念她！

《丽人行》里有一场戏的情节是：她遭到流氓欺凌后，我去看望她，她哭了。站好了拍摄位置，摄影机还没有开动，她就忍不住地哭了。戏演完了，导演喊停以后，她还是哭，而且越哭越伤心。我不安地说：

“上官，别哭啦，油彩都哭掉了，下边还有你的镜头哪。”

她仍捂着脸号啕大哭，抬不起头来，全身都在不停地颤抖。导演见她哭得那么伤心，只好先换拍别的镜头。等她补好了妆，还是抽泣不止。我想一定是戏里的情景触到了她自己的伤心事。这是可以理解的，旧社会，哪个演员没有留下过这样那样的心灵创伤……

《丽人行》的编剧是田汉。影片通过李新群、金妹、梁若英三个不同女性，在抗战时期所经历的不同遭遇和所走的不同道路，反映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人民的苦难和希望，反抗和斗争。其中有勇敢坚强的战士，有正直而又逆来顺受的女工，有一度堕落后又清醒悔悟的少妇，也有卖国偷生的汉奸。

赵丹与黄宗英，在影片中分别扮演革命者章玉良与李新群。在讨论剧本、分析人物时，田汉说：李新群这个角色，是以上海“孤岛”时期从事地下斗争的共产党员茅丽英为模特儿的。黄宗英不认识茅丽英，也不可能去体验地下工作者的生活，但是几年前在剧团里，地下党员岱云大姐和朱修勤大姐，曾经关心过她、帮助过她。从她们的身上，黄宗英找到了李新群的影子，看到了李新群的精神。

有一天晚上，黄宗英和赵丹从电影厂回家，马路上行人很少，路灯昏昏暗暗地在风中抖闪。天上没有月亮，只有几颗稀疏的星发着微弱的光芒，显得那么冷漠，那么遥远。他们一边走，一边激动地谈论着。此刻，他们的心中正燃烧着熊熊的烈火，他们仍被影片中革命者的精神鼓舞着，他们仍沉浸在艺术创作的兴奋中。他们决心要在银幕上塑造好这两个革命者的形象，给苦难中的人民展示斗争的信心和希望。

从影片中的革命者，黄宗英又想到了现实生活。她总是那样思路敏捷，喜欢在自由、浪漫的想象中驰骋。

“阿丹，你看我们公司里有没有地下党？”

“我怎么知道呢……”赵丹笑着答道。

“说真的，我感到有。”黄宗英十分严肃地说，“只是我还说不准哪些是地下党员。”

“既然你说有，也许是有……”

没等赵丹的话说完，黄宗英便急切地问：“阿丹，快告诉我，你是地下党员吗？”

赵丹沉默了，很久没有回答。

黄宗英不敢再问了。静静的马路上，只有他们的脚步声在响。过了一会儿，赵丹昂起了头，坚定地说：“做地下党员，我还不够格。不过，总有一天我是要参加共产党的！”

“阿丹，我也这么想……”

黄宗英和赵丹并肩向前走去，在这茫茫夜色里，他们的身影那么挺拔，他们的脚步那么自信，仿佛在他们面前，黎明的曙光就要升起来了。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有时读书读得入迷，吃饭、睡觉都会忘记。世界这么大，需要学的东西那么多，在学习上我像一个在沙漠里跋涉的旅人，渴望喝到知识的泉水。

我没有机会、也没有条件进大学，但我一直向往能在大学里读书。因此，在演戏、拍电影之余，我便到辅仁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旁听。后来，我还去旁听过西洋画欣赏，所以无论是在国内或是在国外，每当看到西洋画，我都感到亲切，似乎都见过。

我也喜欢音乐，民族音乐、交响音乐我都爱听。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等音乐家的作品，曾给了我许多美好的感情和美好的向往。那些乐曲陶冶了我的心灵，也陶冶了我的艺术青春。可是后来，我不敢听交响乐了，因为我怕看到乐队指挥；一看到指挥，我就想起异方的身影，想起我在北京香山时的孤寂生活。于是，我的心就会下沉，沉进那个痛苦而又可怕的深渊……

自从我来到阿丹的身边，那些恶梦我几乎都忘记了。

舞台、摄影棚占去了我大部分的时间，家里还有两个孩子（赵矛和赵青）要我照顾。社会上都知道我是一个电影明星，其实我还是一个妻子，一个年轻的母亲！

夜，已经很深了。

赵丹还没有回来，在灯下看书的黄宗英有些不安了。近来社会上有许多进步人士，会突然莫名其妙地失踪，有的被特务暗杀了，有的被秘密关进了监狱。赵丹会不会……黄宗英的心紧张地跳动着，不敢再想下去了。她有些焦急，有些埋怨，又有些害怕，总盼着那熟悉的脚步声从门外传来。

盼啊，盼啊，时间过得那么慢，马蹄表咔咔地走着，一秒、一秒的时间，几乎是黄宗英数过来的。也许由于紧张，她感到有些疲劳，可是没有一点睡意。顺手拿起雨果的《九三年》翻了几页，竟一行也看不进去。

啊，脚步声，是赵丹的脚步声……

黄宗英急忙去开门。乐呵呵的赵丹跨进门坎，便愣住了。他说不清黄宗英脸上的表情多么复杂，只见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含着泪花，直瞪瞪地看着他。

“怎么啦？这么晚还不睡？”

“我……我……”

“出什么事啦？”

“没有。”

“那你……”

“我等你等得有些着急啦，这几天老是想到有人失踪的事儿，越想越害怕。”黄宗英忧虑地说。

“没事，没事！新疆的监狱我都坐过了，而且坐了五年多，没什么可怕的！”说完赵丹便开朗地笑了起来。

“看你……”黄宗英看到赵丹那无所谓的样子，也笑了，只是笑得有些苦味。她倒了一杯水，递给赵丹，“阿丹，别总那么大大咧咧的，有些事不能不放在心上，前几天老是跟着我们的那两个人，我总觉得不是好人。不行，咱们就搬搬家吧。”

“搬家？往哪儿搬？”赵丹苦笑着说，“如果叫他们盯上了，你搬到哪儿也逃不出他们的魔掌。”

黄宗英沉默了。

是啊，赵丹说得有道理，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中统特务、军统特务到处都有，谁要是被他们盯上了，就很难逃掉。担心、忧虑，都是没有用的，

作为有名的艺术家，又不能不工作，每天躲躲藏藏的生活，像什么样子呢？有些事不去多想它，也就算了。该干的就干，该演的就演，而且要干好、演好，其他也顾不了，一切都听天由命吧！

看到我不再说什么了，阿丹才想起来告诉我，晚上他在霞飞路的一家跳舞厅里见到了周璇。

多少年不见她了，怪想的。听说周璇和严华随着中华剧艺社去菲律宾了，什么时候又回到上海了呢？想到这儿，我急切地问：

“她现在怎么样？还那么天真、活泼吗？”

阿丹长长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说：“不，周璇变了，变得我都不敢认啦。她瘦了，也显得老了，眼角有不少鱼尾纹。尽管她化了浓妆，仍然掩饰不了她的忧伤。”

“她怎么啦？为什么变得这样……”

“我也没想到。十年前，演《马路天使》时，还撅着屁股蹲在布景后边玩弹子的小丫头，那个在银幕上天真活泼的小红，竟变成了一个沉闷、失望、充满伤感的人。”

“你应该好好安慰安慰她。”我同情、关心地说，“不然，她多么痛苦啊！”

“她为老板们卖命，老板们还用卑劣的手段摧残她，唉，再加上生病、流产、生活上的不幸……可怎么安慰啊！她说，她自杀过，只是没有死……”

“她的遭遇太惨了！这不是生活中的《丽人行》吗？”我心里一阵难过，两眼湿润了。

“如果周璇当年跟我们一起去救亡演出队就好了，她年轻，又有天才！”阿丹惋惜地说着，显得有些激动。“可是现在……唉，心灵的创伤，是很难医治的啊！”

是啊，人世间为什么有这么多悲剧啊？！

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周璇和《马路天使》中的小红，总在我的眼前闪现。

天涯呀，海角，
觅呀觅知音啊……

多么甜美的歌声，多么纯真的少女啊！在这艰难的人生道路上，在这风风雨雨的生活里，你怀着满腔热情希望觅到知音，可是你没有觅到，没有觅到啊！

人生呀，谁不，
惜呀惜青春啊……

多么质朴的感慨，多么动人的心声啊！青春应该是美丽的；可是你的青春，像风雨中的落红，像破碎的幽梦，想起来就令人惋惜。但是，你还年轻，还有复活青春的生机！不要沉沦下去，应该振作起来……

一九四八年的冬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在解放战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主力部队已经基本被歼灭，蒋家王朝已摇摇欲坠，面临覆灭的前夕。暂时还在反动派统治下的上海，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官场腐败，经济萧条，物价暴涨，民不聊生。反动当局疯狂镇压民主运动，迫害进步人士；然而，苦难中的人民并没有屈服，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工人罢工，商业罢市，民主运动风起云涌。人民在黑暗中诅咒反动派早日完蛋，人民在斗争中期待解放的黎

明早日来临。

在这样的时刻，黄宗英和赵丹更忙了，有时要参加一些进步团体的集会，有时要参加以救济难民为名为解放区筹募医药费用的义卖活动，有时还要到处奔走营救入狱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有天晚上，赵丹在法国公园参加“小教联”的集会回来，一进门便兴奋地对黄宗英说：“真痛快！我今天在朗诵郭沫若的诗之前，把那些狗东西狠狠地骂了一顿，我说人民的力量是打不散的，黑暗过去就是黎明……结果特务们要抓我，可是‘小教联’的人一拥而上，把特务们冲散了，很快就把我送出了公园。”

“多危险呀，以后可要多加小心！”黄宗英十分担心地说。

“反动派的日子不长了，再疯狂，也疯狂不了几天啦，他们的末日到了！”赵丹显得更加激动了，他那明亮的目光充满着坚定和自信。

黄宗英也被赵丹的激情感染了，她以一个艺术家的敏锐，向赵丹提出：“阿丹，应该拍一部电影，把上海黎明前的黑暗都反映出来，这是反动派的罪恶史，是死亡前的挣扎，我们有责任完成这项工作，用我们的行动迎接上海的解放！”

“想得好！想得好！我明天就去找陈白尘、沈浮他们商量。”赵丹高兴得几乎要叫起来了。

阿丹和陈白尘、沈浮、徐韬、王林谷等人商量以后，决定集体讨论构思一个剧本，由陈白尘执笔。

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为了预防万一，不便于公开进行。于是，我们就约好时间，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假装去公司老板任宗德家中打麻将，实际上是去讨论剧本。

有时邻居问：“打扮得这么漂亮，上哪儿去啊？”

我们总是微笑着回答：“老板叫我们打牌去。”

“祝你们运气好，赢了可别忘了给我们买糖啊……”

阿丹总是滑稽地挤一下眼说：“一定买！”

在麻将桌上，我们一会儿擦牌，一会儿洗牌，可是一把牌也没打。大家都在专心地讨论剧本，这个剧本就是陈白尘执笔的《乌鸦与麻雀》。

“阿丹，后边有人跟着我们，怎么办？”黄宗英悄悄地对赵丹说。

赵丹沉着地继续向前走着，没有回答。

前边不远就是任宗德的家了，还进去不进去呢？黄宗英有些着急了。赵丹微笑着挽起黄宗英的手臂，低声地说：“我们到霞飞路去。”

穿过几条马路，他们走进了霞飞路的一家咖啡厅，喝了杯咖啡，吃了点蛋糕，出来后又逛了几家商店，还给女儿赵青买了个洋娃娃。

黄宗英走在人行道上，机警地弯下腰系了一下并没有松开的鞋带。她是想看一看身后还有没有盯梢的，可是人行道上那么多人，一瞬间是很难看清的，她有些失望地看了看赵丹。赵丹仿佛什么也没意识到，随随便便说了声：“该回家了，孩子们还在等我们哪。”

黄宗英扬了扬好看的眉毛，会心地笑了。

当他们走到家门口的时候，远处还有两个鬼头鬼脑的家伙在张望。赵丹看了一眼，鄙视地想：“随你们便吧，狗东西！”

黄宗英咬着嘴唇，又有些紧张了……

一连几天没有见到上官云珠了，她在干什么呢？会不会出什么事啦？也

许是病了……病了也该有个电话来呀！我怀着不安的心情去看望她。

我一进门，见到一个国民党的空军军官在她那儿坐着，这个人很年轻，也很英俊。看到我来，似乎有些不大自然，寒暄了几句，他就起身告辞了。尽管这位年轻人很老练，也很有风度、很有礼貌，但我还是明显地感觉到，他是匆匆避开我的。

我问上官云珠这几天在干什么？她说没干什么，只是家里来了几个亲友，托她办点事。她既然这样说了，我也不便再问下去，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一路上，我的心中总是凝着一朵疑云……

过了几天，在剧场后台的化妆镜前，上官云珠为我描眉毛、润眼圈。她先是和大伙一起，你一言我一语笑话我总是把眉毛勾得一高一低，眼睛画得一大一小。在化妆间的笑闹声、催场声中，我仰着脸，闭着眼，任她摆布。忽听她悄悄地对我说：“那个人，你看到过的……‘到家’

了。”

“哪个人？”

“那个空军军官……”

我一下子把眼睛睁圆了，我们脸对脸相视久久，几乎彼此能听到心跳和呼吸，我们抑制不住热烈的向往：“到家了”，就是到了“山那边哟好地方……”——解放区啊！

当然，我也明白了，前天上上官云珠是参与计谋和协助这一国民党空军军官，驾机起义的事了。

“上官，真没想到，你这么能干！”我轻轻地说着，将脸亲昵地贴在她的胸前。

上官云珠抚着我的头发，没有说话，可我听到她的心音跳得更激烈、更有力了……

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乌鸦与麻雀》的剧本完成了，执笔者陈白尘累得够呛。开拍前，要审查电影剧本，陈白尘、沈浮、徐韬、赵丹他们很清楚，这个剧本送审肯定是通不过的，弄不好还要惹来麻烦。于是，他们就弄了个“删节本”，删去了一些主要情节和关键的对话，送给了国民党的电影审查机关。真正拍摄用的剧本，由导演郑君里掌握着，藏在摄影棚顶破麻袋包着的稻草里。

这部影片的故事，发生在一九四八年的残冬。上海的一幢弄堂房子里，住着一些各式各样的人物，有反动派国防部的小官僚，有贩卖美国货的摊贩，有中学教员、家庭主妇，也有报馆的老校对……通过一系列带有戏剧性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无情地揭示了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区一片黑暗、末日来临的景象。反映了苦难中的人民，觉醒、反抗，渴望解放的心情。

赵丹在影片中饰摊贩肖老板，吴茵饰肖太太，孙道临饰中学教员华洁之，魏鹤龄饰报馆老校对孔有文，李天济饰小官僚侯义伯。导演原来决定黄宗英饰华洁之的妻子，上官云珠饰侯义伯的姘妇余小瑛。可是，有一天上官云珠心事重重地对黄宗英说：“宗英，我再也不想演交际花、交际草了，实在是……”

黄宗英忙问：“那为什么？”

上官云珠没有回答，只见她那对妩媚的大眼睛突然黯淡了，轻轻地摇了摇头。

黄宗英立刻明白了，她完全理解上官云珠的心情，仿佛看到了笼罩在上

上官云珠心头的阴影。她便说：“咱俩反串好了。你演华太太，我演小官僚的姘妇余小瑛。明天就和导演说……”

和导演郑君里商量之后，我与上官云珠换了角色。

我记得阿丹说过，本色演员易做，性格演员难当，想开拓戏路，就该演各种各样的人物。演员嘛，演正角、反角都是艺术创作，换换型，有什么关系？即便是失败了，也可以总结教训。不过，事情还没做，角色还没演，为什么先要想到失败呢？应该很有信心地想到成功！

也许，想到了失败，就会更有毅力地去争取成功。雨果说过：艺术的大道上荆棘丛生，这也是件好事，常人都望而却步，只有意志坚强的人例外。

在这荆棘丛生的艺术大道上，勇敢地走着，该是多么让人激动的向往啊！马路上抓人的囚车又在尖叫了。

躲在路边的行人叹息着，心情慌乱地目送急驰而过的囚车。

天空浓云密布，北风中飘着零零落落的雪花。粮店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却不见老板开门。饥饿的魔鬼，开始闯进上海的千家万户。

黄宗英想去买点口粮，看到这种景象，只好拿着空米袋沮丧地回家了。

赵丹一见，有些着急了：“没买到？”

黄宗英摇了摇头，将米袋扔到了凳子上。

“不要紧，不要紧。”赵丹自慰地说，“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了，不会太久了！”

是的，随着解放区传来的胜利消息，春风又一次吹绿了江南。油菜花吐蕾了，小麦孕穗了，蒲公英开花了……

可是吹嘘要固守上海的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上海黑暗统治。已经开拍的电影《乌鸦与麻雀》，很快就接到了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一道禁令，说这部片子“鼓动风潮，扰乱治安，破坏政府威信，违反戡乱法令”，强行勒令停拍。并将已拍好的部分底片没收，送“非常时期委员会”和“特刑庭”审查。但是，摄制组的人员，并没有被吓倒，反而斗志更加旺盛。他们表面上停拍，甚至让赵丹回到伪中国电影制片厂又去拍《武训传》，来麻痹敌人。实际上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晚上在摄影棚里继续拍摄。后来，敌人监视得很紧，白色恐怖越来越浓重，实在拍不下去了，索性利用这个时机，对剧本作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准备一旦解放就重新开拍，以这部影片作为迎接解放的献礼。

啊，多么艰难的斗争！

多么可贵的艺术家！

多么令人敬佩的艺术家的精神和情怀啊！

《乌鸦与麻雀》停拍以后，我的心情一直很沉重，白天吃饭不香，夜里也常失眠。阿丹安慰我说：“别着急，咱们做好一切准备，只要一解放，立刻就开拍。”有时他还悄悄地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看到阿丹那种永远快乐、永远乐观的样子，我心中的乌云也渐渐地散了。

傍晚，迎着美丽的晚霞，我到近郊的一条小河边散步，空气清新而又湿润。突然，一股浓浓的花香随风传来，原来前面不远处有一大丛野玫瑰。碧绿的枝叶间，开着许多白色的花朵，那么纯洁，那么明丽，为春天增添了浓浓的情思和魅力。

走着，走着，我才意识到这不是我和朱修勤大姐告别的吗？

啊，修勤姐，快回来吧！我们是在这儿告别的，我还希望能在这儿迎接

你归来！

天边的晚霞更绚丽了，好像是一片鲜红的杜鹃花在盛开着，它吐露着对春天的热爱，也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啊，弯弯曲曲的小河，苍苍翠翠的竹林，金黄色的油菜花，深红色的紫云英……一切都那么美，那么动人，一种从未有过的美好感情，像小河里的浪花在我胸中奔腾。就要垮台的反动当局，真是腐败透顶了，竟丧心病狂地要女演员组织慰劳大队，到南京去慰劳国民党空军，这是明摆着要押演员去充当营妓。黄宗英收到了特务们送来的“请帖”，又气，又急，怎样才能躲过这场临头大祸呢？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去求一位医生朋友帮助……

好心的医生朋友，不忍心地给我打了一针，我便发烧了，而且高烧持续不退，我迷迷糊糊地被送进了医院。在病房里，我并没有感到很大的痛苦，只是昏昏沉沉地老想睡觉。有时醒来望一眼窗外的树影，也会突发一阵心悸。

大祸终于躲过去了，可我不敢马上出院，仍在病房里“病”着。许多亲友来看我，安慰我不要着急，把病彻底治好。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关心，然而，我生的是什么病？怎么会生病的？他们却一无所知。

深夜里，我又一次醒来，病房里黑糊糊的，病房外也是黑糊糊的。我感到一阵阵孤寂和恐怖，黎明前的黑暗是可怕的。

望着窗外，我焦急地在盼望着，盼望那淡青色的黎明快点到来……

初春的日子

轰隆隆，轰隆隆……

轰隆隆，轰隆隆……

一声比一声响，一阵比一阵激烈。这响声，像在天边奔驰，又像在田野上激荡。它那样具有威力，那样势不可挡，震撼着黄浦江，震撼着大上海，震撼着江南辽阔的大地，也震撼着黑夜中盼望黎明的心……

这是春雷吗？

是的，这是响彻中国大地的春雷，这是震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春雷——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声！

在解放区人民的支援下，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乘胜追歼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日夜奋战，迅速解放了南京、无锡、苏州……如今又在上海郊区激战。妄图死守上海的敌人，不管怎样顽抗，他们的末日毕竟到了。

听了一夜的炮声，黄宗英和赵丹又激动又兴奋，天刚蒙蒙亮，他们就拥在窗前，辨别着炮响的方向。

“阿丹，你听，是不是在松江？”

“不，没那么远……”

“也许在七宝？”

“不，不是……”

“那在哪儿啊？”

“对，好像是七宝方向。”赵丹侧耳倾听着，显得很有把握的样子。

“七宝……”黄宗英又半信半疑地说，“没那么近吧？”

“反正也不远了！”赵丹自信地笑了。

黄宗英一边听着隆隆的炮声，一边在想：国民党反动派就要完蛋了，上海人民所盼望的解放时刻，就要来了！

炮声，再猛烈些吧！

美丽的朝霞，就要在炮声中升起了……

我没有上过战场，不知在枪林弹雨下是什么滋味。

那时，我听着激烈的炮声，一点也不怕，只感到喜悦和兴奋。望着绯红的天边，我在遐想，那一定是解放军的炮火映红的！于是，情不自禁地哼起了那支刚刚学会的歌：

解放区的天，

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了！

早晨，枪声刚刚停息，马路上的硝烟还未散尽，解放军的队伍不断地在行进，只见风尘仆仆的战士，背着背包扛着枪，急速地走着。街上的行人很少，有时可见到一些人民保安队员和工厂的护厂队员，有时走过运送伤员的担架队。远处，还在响着激烈的炮声，听说吴淞口的残敌仍在继续顽抗。有几个解放军的女战士，在路边的墙上写标语：

“热烈庆祝上海解放！”

“毛主席万岁！”

“朱总司令万岁！”

赵丹和黄宗英正急急地走着，他们要去昆仑影业公司的摄影棚排练节目，欢庆解放。望着眼前的景象，他们仿佛也成了一名战士，正斗志昂扬地奔赴前沿阵地。

迎面驶来一辆卡车，车上有许多化了妆的男女文工团员，他们都那样年轻、英俊，军帽上的八一帽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们高声唱着一支歌，那歌声是那样深情、奔放，拨动着人们的心弦：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共产党他一心为人民，
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
他指出了人民解放的道路，
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

黄宗英和赵丹听着他们的歌声，激动地站在路边向他们挥手致意，车上有个女文工团员忙解下挎包上的白毛巾，频频挥动。

卡车远去了，远去了，歌声还在回荡，那挥动的白毛巾还看得清清楚楚，像一朵白云那样亮眼。

天亮了，解放了。

在地下党领导的抗敌演剧宣传九队吕复和刘厚生等同志的预先组织下，我们上海文艺界千百名经历过漫漫长夜的演员、艺人，在解放军进入上海的第二天就分乘几十辆敞篷卡车，一路高歌，奔赴工厂、港口、公园、街头为群众演出：欢迎人民解放军，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法令，控诉蒋介石政权的滔天罪恶。

我们演出了粗粗改编过的《放下你的鞭子》。阿丹饰父亲，上官云珠饰姐姐，我饰妹妹，一家人流浪街头卖艺。姐姐唱罢凤阳花鼓，妹妹演武艺，因饥饿摔倒，父亲鞭打着小女儿，姐姐扑在妹妹身上……这时，解放军战士过来了，制止了扬着鞭子打女儿的父亲，扶起了泪流满面的一对姐妹……

上官和我曾同台多年，在经济萧条的旧上海滩，为了维持住剧团，我们曾像循环放映电影似地，一天演三四场戏。演戏是要动感情的，但如果场场都倾肺腑倒衷肠，我们恐怕早就死在台上了。可是此一番啊，插着红旗的卡车载着我们跑遍上海；为欢腾的群众，我们一天演出四场、五场、六场、七场……我们忘了是在演戏，剧中人就像我们自己，上官俯身搀起我，姐妹双双的热泪悲伤地、欢快地流在解放了的国土、自由的大地上！……

早晨，太阳还没有升起来，马路上有点薄雾，房屋、商店、树木……都像被一层轻纱罩着。黄宗英他们乘着卡车，要去港口演出。

路过南京东路时，他们看到人行道上有解放军在露营。一个个战士抱着枪，睡得那么香甜，那么坦然，有几个哨兵背着枪，在露营区来回巡视。

望着这些战士，黄宗英在想：他们是刚刚从战场上撤下来？还是在这儿待命准备奔赴前线？天还有点凉，夜里风又大，怎么能睡在人行道上呢？随便叫开哪一家的门，老百姓都会热情地接待呀……

那时的黄宗英，还不能理解人民军队的严明纪律，也不能理解人民战士热爱人民的一颗心，她只感到这些战士质朴、可爱、可敬，为了不打扰老百姓，宁愿沐着夜风晨露宿在人行道上。这样的军队，怎能不受到人民的爱戴呢？！

这时，黄宗英希望卡车的马达响得轻一点，再轻一点，千万不要惊醒露

宿在人行道上的战士。而且还在心里埋怨，卡车不该走南京路……

晚上回到家里，她在日记中特别记下了南京路上解放军露营的情景和自己的心情。她深情地写道：

那些战士，仿佛不是睡在高楼下的人行道上，而是睡在祖国母亲的怀抱中……

几十年以后，我在回忆解放初期的生活感受时，曾这样写着：结束了，真的结束了！旧社会的苦难，是也包括啊，包括艺人的心酸。盼来了，真的盼来了！新社会的阳光，是也照耀啊，照耀在艺人的残损过的心田。我们站起来了，在隆隆的祝捷的建国的礼炮声中，在毛主席的洪亮的宣告声中，我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全中国人民一起，站起来了！我们迈出了新的步伐，跟着红旗，跟着党！

上海解放几个月了，郑君里、沈浮、赵丹等人，正在积极筹划《乌鸦与麻雀》继续拍摄的事。被敌人抄去的已拍好的底片要找回来，资金要尽快筹划，机器设备要修整……有许多问题急待解决，可一时又解决不了，这使他们非常着急。

有一天，黄宗英给赵丹出主意，说：“阿丹，别发愁，实在有困难，就去找陈毅市长吧！”

赵丹为难地摇了摇头：“我也不认识陈毅市长，去找他……”

“那有什么，该找就找，又不是为私事儿。”

“话虽这么说，可是上海解放不久，陈毅市长一定很忙，我们为一部电影去找他，合适吗？”赵丹犹豫着。

“怎么不合适？”黄宗英反问道，接着又爽快地说：“你们不去找，我去找！”

赵丹点着头笑了。

看到赵丹笑了，黄宗英的心情也不那么沉重了。她默默地对自己说：“应该尽快地去找陈毅市长，我相信，他会关心新中国的电影事业的。”……

桂花飘香的时候，停拍了五个多月的《乌鸦与麻雀》，终于又开始拍摄了。整个摄制组的人员，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了艺术创造。

在工作中，黄宗英深深感受到解放后一个演员的自由和欢乐，天是明朗的，生活是明朗的，事业的前程也是明朗的。为了尽快地拍完这部影片，他们夜以继日地在摄影棚或外景地工作着，再苦，再累，心里却像灌满了蜜糖，总是甜甜的。

《乌鸦与麻雀》中，有这样一场戏：赵丹饰的肖老板在家中盘算轧金子，顶房子，大做黄金梦的情景。可是在摄影棚里，赵丹总进不了戏。

导演郑君里要赵丹在房子里设计一点典型的动作，自我陶醉地做黄金梦，赵丹试了试，似乎感到有点出戏了，可是还不自然，显得一般化。于是，他建议导演停拍。

回到家里，赵丹仍然沉默着，心不在焉地扒了两口饭，就坐在躺椅上了。

黄宗英知道他在苦思那场戏，什么也不说，脚步轻轻地给赵丹端来一杯茶。

天气有些闷热，再加上创造角色的苦恼，赵丹的心里像坠着铅块沉重得很。突然，他倒了一杯老酒，躺在躺椅上喝起来了。老酒一下肚，解放前弄堂里那个“保甲长”的音容笑貌立刻出现在眼前，赵丹进入了角色的自我境界。他高兴地喊道：“宗英，找到了，找到那场戏了……”

黄宗英也为他高兴：“找到了就好，该睡觉了吧？”

为了这场戏，赵丹用了不少心血，他一步步向“保甲长”的内心深处走去，走去……就这样，赵丹折腾了一个晚上，黄宗英陪了他一个晚上。

第二天，到了摄影棚，这场戏还是赵丹躺在躺椅上，一口接一口地喝着老酒才拍成功的。

赵丹说：“看来，这场戏不宜宣泄情感，而应该积蓄角色的情感，达到自我境界，这样才能深入到人物的精神生活中去。”

黄宗英笑着说：“幸好你一个晚上就找到了这场戏，不然，你苦恼，我也跟着你遭罪。弄不好，三天三夜都吃不好，睡不好……”

《乌鸦与麻雀》顺利地拍完了。一九五一年一月，在全国各大城市公映，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

一九五五年这部影片参加了解放后在首都举行的优秀影片的评选并获奖。主要创作人员都获得了一枚铸有工农兵形象浮雕的银质奖章——二等奖。

我们第一次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奖章，欣慰感奋之至。没想到，这件事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注意，他在为大会做报告时，出乎我们意外的说道：“为什么《乌鸦与麻雀》不能获得一等奖呢？为什么不看到国统区的电影工作者是在什么条件下工作的呢？国统区的电影工作者们，在反动派白色恐怖的高压下，拍摄出了揭露蒋家王朝末日的影片，我们认为应该是应该授予一等奖的。”……

周总理说到这里，全场热烈鼓掌，我含着泪花把手都拍红了。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我们的党，对我们的劳动给予如此的尊重，欣慰喜悦的泪水怎能不激动地流淌呢。我们的银质奖章被大会收回了，重新授予光彩熠熠的金质奖章。

后来，毛主席接见电影工作者时，曾亲切地问我们：“听说，本来不肯给你们一等奖啊？”我们正不知怎样回答，周总理说：“我打了个抱不平，向政治局打了个报告。”

毛主席笑着说：“这个抱不平打得好！应该打！”

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党和领袖的关心和称赞，感到无比的温暖、激动，心里充满了阳光。如今，我们演员，是革命集体中的一员，是共同战斗、呼吸与共的浩浩荡荡的党的文艺队伍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在党和人民热切关怀下，焕发着艺术的青春。

静静的春夜。

黄宗英在灯下看书，桌子上那盆仙客来开出了一朵紫红色的花，艳丽极了。

赵丹喜欢这盆仙客来，赞美着说：“这花开得多美呀！仙客来，仙客来，也许要来贵客了……”

黄宗英甜甜地笑着说：“这么晚了，谁来呀？”黄宗英话音还没落，竟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

年轻的保姆雪珍孃孃忙去开门，进来的是一位穿着军装的女战士。

“小妹，不认识我啦？”女战士摘下了军帽，亲热地叫着黄宗英。

黄宗英仔细一看，啊，这不是修勤姐吗？

“修勤姐！修勤姐！……”她激动地扑了过去，“修勤姐，您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不早来看我……”

朱修勤紧紧握着黄宗英的手说：“小妹，我这不是来了吗？”

黄宗英回身向赵丹介绍说：“阿丹，这就是我常常想念的修勤姐！”

“欢迎，欢迎。刚才我还说要来贵客哪！”赵丹说着忙去拿糖果和苹果。

朱修勤和黄宗英亲亲热热地坐在沙发上。

“修勤姐，您变了，变得……”

“变得老了，是不是？”

“不，您变得年轻了，我都不敢认了。修勤姐，您还记得我们告别时的那个小河边吗？”

“当然记得。”朱修勤爽朗地答道，“有时我做梦还梦到那儿，咱们俩手挽着手在河边走着……”她一边说，一边眯起了眼睛，沉浸在往昔的回忆中。

“修勤姐，我真想您！有一次我到河边去，还幻想着要在那儿等您回来哪。可是，您走了以后一点音讯都没有……”黄宗英说着，说着，眼泪叭达叭达地掉下来了。

“小妹！真还像个孩子……”朱修勤忙用手帕给黄宗英擦眼泪，可自己的眼泪也抑制不住了。

过了一会儿，两人的心情平静了些，她们吃着赵丹削了皮的苹果，谈起了别后的生活。

夜深了，黄宗英要留朱修勤住下，可是朱修勤不肯住，黄宗英只好恋恋不舍地送她。穿过一条马路，又穿过一条马路，一直送得很远、很远……

我看了修勤姐他们演出的歌剧《白毛女》，这是一部十分感人的歌剧，我为剧中的喜儿流了不少眼泪，有痛苦的眼泪，也有幸福的眼泪……

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解放区的歌剧，它是那样真实地、生动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又那样质朴、动情，富有强大的艺术魅力。在舞台上，每个演员都演得那么认真，那么自然，那么全身心地投入，使人物形象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我深深感到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是我学习的榜样，我渴望在银幕上和舞台上，为解放了的人民创造出新的艺术形象……

火车轰轰轰轰向前行，
全国各地的和平代表聚集在北京，
你来自辽远的南部的广东，
我来自东部海口的上海，
他来自西北高高的山岗上……

这是黄宗英当年参加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时，写的一首诗《和平列车向前行》开头的诗句。

一九五五年十月底，她作为世界和平大会的代表，来到首都北京。

啊，北京！在黄宗英的生活里，北京给她留下了什么呢？天真的童年，母亲的愁苦，青春的恶梦……当然，也有第一次上银幕的欣喜和不安。

啊，北京！在黄宗英的眼睛里，它完全变了！变得熟悉而又陌生，变得古老而又年轻，变得亲切而又庄严……

天，那么高，那么蓝，一缕云絮都没有。一群鸽子，从她头顶上飞过，飞得那样自由，那样轻盈，渐渐地飞向遥远的天边。黄宗英望着飞翔的鸽群，却想起了炮火纷飞的朝鲜战场，想起了与朝鲜人民并肩战斗的志愿军战士，想起了在上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演出，想起了在灯下给志愿军战士写信和做慰问袋的情景。

秋天的北京，菊花怒放，枫叶艳红，空气清新而又凉爽，可是黄宗英却闻到了鸭绿江边硝烟的气息……

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是郭沫若同志。他率领着代表团于一九五一年十月三十一日离开北京，乘火车去莫斯科，然后，和苏联、朝鲜代表团一起，由莫斯科去波兰华沙。

十一月十二日晨，我们中国代表团和苏联、朝鲜代表团一起，自莫斯科出发去华沙。到了苏波边境的Brest站，波兰的专车过境迎接，扎着松枝，贴着用各国文字写成的和平标语。火车到了波兰境内的第一个车站，便停了下来。我们都下车去了，车站上挂着波、苏、中、朝四国领袖的肖像，西蒙诺夫、马寅初和朝鲜的朴正爱同志都发表了演说。那个地方，大概全城的居民都来了，老人、小孩，最热情的就是那些青年男女，一直唱歌，喊口号，和我们招手。

快开车时，我看他们忙着写小纸条从车窗扔给我们，我们也不懂纸上写的什么。车开后，找人翻译，原来都是“爱你们，爱中国！”、“爱你们，爱中国！”，就这样沿路受着人民热烈的欢迎，不管车停不停，每一个车站都有人等着我们。有时候车在走着，我们偶然向车外张望，铁路旁的工人和行路者，以至路旁小屋里的孩子们，都跟我们招手。一站又一站，我们的车厢就渐渐变成了个大花房了。

到华沙站已经是晚上，下着小雨，水银灯照耀着，好像天上洒下小珠子一样。多少的红旗，多少的白鸽，一面很大的旗帜上用中文写着“英勇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万岁！”。波兰和平大会分会负责人，以热烈的演说欢迎我们。苏联代表诗人苏尔科夫上去致答词，每一句都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在和平大会期间，有一天黄宗英遵照大会的决定，乘飞机去波兰的重工业城市——克城访问，他们一行七个人，在一个工厂参加集会，宾主共同表达了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心愿。会后演出了许多歌舞和杂技，当台上出现一群穿着白衣服的孩子，用稚嫩的童声唱着赞颂和平的歌，翩翩起舞的时候，黄宗英被这群天真的孩子感动了，她觉得台上不是一群孩子，是一群小天使，是一群和平鸽。他们热爱和平的心，是不可战胜的，他们比侵略者的枪炮更有力量！

演出结束前，会议主持人宣布由中国电影演员黄宗英小姐致谢词。

他们以最热烈的鼓掌欢迎我，我微笑着走上台讲了话。事先没有发言稿，所以没有人能为我翻译。我热情地说着，他们就热情地听着连一个字也听不懂的话。于是我们大家都笑了，是的，热爱和平的心愿是不需要翻译的，反对战争的决心是不需要翻译的，为全世界和平事业而斗争的誓言是不需要翻译的！在他们的掌声中，最后我用刚学会的波兰话喊出了：“谢谢！和平万岁！和平万岁！”……

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的召开，是全世界人民面对帝国主义的一次伟大的斗争。黄宗英能参加这次大会，深深地感到光荣和自豪，她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年轻的战士，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参加了一次伟大的战役。她觉得自己仿佛是一只从北京起飞的鸽子，在异国的土地上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喜爱和欢迎。

和平大会胜利闭幕后，黄宗英从华沙回到了莫斯科。可是她的心，还沉浸在八十多个国家，两千多位代表们中间，还沉浸在爱好和平人民崇高的愿望和纯洁的感情中。在莫斯科参观访问了十天之后，她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路过贝加尔湖时，黄宗英还想看看那蓝莹莹的、平静的湖水，可是湖面已被皑皑白雪覆盖了，它那样辽阔，那样耀眼，让人产生许多回忆和遐想。她想起童年时父亲带领她和两个弟弟打雪仗的情景，想起上海的雪夜在马路上拍外景的情景，想起过春节时赵丹带着儿子和女儿在雪地里放鞭炮的情景……

这些回忆，像电影镜头似的一闪过去了，眼前还是茫茫雪野，茫茫旅途。突然，她仿佛看到远方的地平线上腾起了滚滚硝烟，那硝烟漫卷的地方，就是朝鲜的土地吗？于是，她又想起了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想起了战火中的朝鲜人民……

想到这些，她情不自禁地唱起了那支战歌：

雄赳赳，
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
卫祖国，
就是保家乡……

在国外的那些日子里，我时刻被一种感情激动着，这种感情的内涵是那样丰富，它像大海那样深沉，它像群山那样庄重，它像母亲的泪那样纯净，它像孩子的笑那样甜蜜。

我爱这种感情，我要获得这种感情！

朋友们，我相信人类纯洁和崇高的品质是可以培养的。过去多年来狭窄散漫的生活，蒙蔽了我的眼和心，看不到也不知道人间有这样的感情，我希望我将能通过我的艺术作品，去表现这种至高无上的感情——国际主义的爱。我相信，我会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为争取和平的火热斗争中找到它！我愿在抗美援朝的运动中，将我的生命与朝鲜青年的生命连在一起。当朝鲜人民胜利的第一天，如果我能和这个国家的一个女孩子拥抱，我会哭起来。做一个演员是我的终生事业，演剧艺术就是要传达人间至高至美的感情，我的一生将为此而努力奋斗。坐了九天九夜的火车，黄宗英回到了北京。

啊，祖国！多么晴朗的天空，多么温暖的阳光，多么清新的空气！

啊，祖国！多么亲切的土地，多么熟悉的笑语，多么沸腾的生活！

黄宗英累了，实在是累了。一到北京饭店，她连饭都不想吃，只想睡觉。多少日子没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睡觉了，她应该幸福地、甜甜地睡一觉啊！

一天下午，代表团正在开会总结工作，秘书组一位同志通知黄宗英说：

“有一位领导同志要见你。”

“好。是在我屋里还是在……”

“车来接您了，快穿上大衣去吧！”

“那我把人家送给我的礼物也带上。”在国外参观访问的时候，整个代表团除了团长郭沫若之外，就属黄宗英的礼物多。

汽车在马路上飞快地行驶着，她没有心思看车窗外的街景，也不知汽车往什么方向开去，只是在心里默默地猜测：领导同志，领导同志……哪位领导同志呢？我不认识领导同志啊，他怎么会知道我呢？

黄宗英有些激动，激动中又有些不安，她本想问一问来接她的人，是哪位领导同志要见她？可是又觉得不妥当，话到嘴边只好吞了回去。

汽车开进一个有哨兵站岗的大门，穿过一条长长的路，在一幢古老的房

子门前停下了。黄宗英下了车，被送进了一间宽大的客厅里。

客厅的陈设很简单，沙发、茶几、小橱柜……似乎没有别的东西了。紫红色的地毯虽然有些旧了，但是很清洁，没有一点污痕。茶几上的花瓶里，插着一枝盛开的腊梅花。

“黄宗英同志，您先休息一下。”接她的人很热情地说，并递给她一杯茶水。

“谢谢！”黄宗英微笑着答道。

当接她的人走出去以后，静静的客厅里只有黄宗英一个人了。阳光透过玻璃窗，像瀑布一样洒在地毯上，温暖的客厅显得更加明亮。黄宗英坐在沙发上，望着那枝腊梅花感到十分亲切、舒畅。此刻，她一点也不觉得陌生，眼前的一切都那么熟悉，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她拢了拢乌黑发亮的头发，靠在沙发上想养养神，那双美丽的大眼睛轻轻地闭着，不一会儿，她竟睡着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朦朦胧胧，竟忘了我在什么地方。

只见面前站着两个人亲切地向我微笑。他们是谁呢？我仔细地辨认着，天啊！我见过他……不，应该说我见过他的照片，是周恩来总理！我立刻站了起来，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周总理笑着说：“你太累了，是该好好地睡一觉。”

“总理，我……我真想不到是您叫我来，刚才，我还以为是在做梦呢。真的，现在……我觉得您好像是从画片上走下来的……”

周总理听着，爽朗地笑了起来。

“宗英同志，这是邓颖超同志，我的老伴儿。”

“就叫我邓大姐吧。”邓颖超同志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我们没见过面，可我看过你演的电影。”

“你今年多大了？”周总理亲切地问我。

“二十五啦。”“你还这么年轻。”周总理十分高兴，“多么值得羡慕的年龄啊！”

“不，总理，我已经老了。”

“二十五岁，怎么能说老了呢？”

我心头一热，眼里立刻含满了泪水：“在旧社会，一个女演员到了二十五岁，就老了……”

“现在解放了，二十五岁正是你发挥艺术才华、在事业上走向成熟的年龄。”周总理说着在沙发上坐下来，邓大姐拉我坐到了总理的身边。

“昨天，我请来了你们代表团里年纪最大的代表张澜先生来聊天，今天，请年纪最小的代表——你来聊聊。谈谈你们一路见闻，随随便便讲点故事。想说什么说什么。”

啊，像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演员，竟能得到周总理的关心，成为他和邓大姐的客人，这是我做梦也不会想到的。坐在周总理的身边，我想把心底的话儿都说出来，可是我零零乱乱地不知说了些什么。我感到心里暖洋洋的，好像有一条溶着阳光的泉水在奔流。尽管窗外冬日的寒风还在呼啸，可春天已来到我的心中！

啊，这个春天，是给我的艺术生命带来蓬勃生机的春天啊！……

霉雨季节

初春的早晨。

黄宗英在阳台上浇花，那盆盛开的白杜鹃十分招人喜爱。雪白的花朵，质朴、纯洁，吐露着一种原始的素雅的美。清水洒在花瓣上，立刻有许多闪着阳光的玉珠在滚动，在坠落，仿佛有一片春的情思在白杜鹃的花朵上微笑。

突然，有一朵白杜鹃花凋落了，这使她有些惋惜和心疼。春天刚刚来到人间，这朵花为什么这样早地凋落呢？啊，白杜鹃，美丽的白杜鹃……

啊，白杜鹃，令人沉思的白杜鹃……

黄宗英的心潮在奔腾，一簇簇感情的浪花，拍击着记忆的堤岸，她想起了周璇，想起了周璇的歌……

周璇变了，变得使我吃惊。

她显得憔悴，显得疲惫，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变得暗淡、冷漠。怀孕的身体那么笨拙，呼吸都显得有些困难。

我关心地问她：“璇子，你身体还好吧？”

“还好。”她苦笑着答道。

“我觉得你好像很疲劳，精神也不好，要注意多休息，有些事，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多去想它了。”

周璇长长地叹了口气，沉默了一会儿，含着泪花说：“我的命真苦！真苦啊！我没有想到他拼命追我，竟是在欺骗我，玩弄我的感情……唉，我真傻，我为什么会这么傻呢？……”

“璇子，你应该从痛苦和沮丧中解脱出来，总这样怎么行呢？”

“我知道你的话是对的，可是……这没出生的孩子，是没有爸爸，没有一个完整、幸福的家的……”周璇说着，泪珠一颗颗流在面颊上。

阿丹赶忙安慰她说：“璇子，你现在回到了上海，上海就有你的家。我们和其他朋友都是你的亲人，都会关心你！孩子出生以后会在新社会幸福地成长的！”

我也擦着泪说：“你放心，有我们大家和你在一起，什么也别愁，什么也别担心！”

周璇慢慢抬起了头，呆呆地望着窗外，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她好像在思索什么，又好像在盼望什么，半天也没说一句话。

啊，她在盼望什么呢？

是那盆盛开的白杜鹃花？还是像阳光一样灿烂的生活的希望？

黄宗英深深地同情周璇。一个年轻的、有才华的女演员，遭到这样的厄运，实在是令人惋惜。对于周璇来说，生活对她太冷酷了，由此而产生的悲怆和失望，黄宗英是理解的。

想到周璇，黄宗英更感到自己是幸福的。当然，她在过去的岁月里也有过厄运，也有过心灵的创伤……可是，她在厄运中磨练了意志和毅力；走过了那段痛苦、迷茫的道路，赢得了生活的欢乐。

是的，幸运并非没有许多的恐惧与烦恼；厄运也并非没有许多的安慰与希望。也许，生活的欢乐，就是在那些痛苦和悲伤中孕育的！

一九五一年一月，电影《武训传》在全国各大城市上映了，这是赵丹主演的又一部影片，从解放前一直拍到解放后。这部影片当时是为了抵制国民党反动派要拍摄反共影片而在地下党领导下开始筹划拍摄的。因此，黄宗英

和赵丹一样，对它有着特殊的感情。

《武训传》上映后，在全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北京、天津、上海的许多报纸和刊物，连续发表文章，热情地给予推荐、评介和赞扬。国内文化界、艺术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纷纷撰文，以喜悦的心情祝贺这部影片的成功，称赞赵丹在银幕上所创造的武训形象。赵丹作为一个演员，作为一个艺术家，看到自己的艺术创造得到了这样的赞扬和鼓励，是十分激动的。他想起在解放前白色恐怖下拍摄《武训传》的情景，心潮便久久不能平静；他想起解放后满腔热忱修改《武训传》的情景，胸中就有一种豪情在汹涌。于是，他在《大众电影》上发表了连载文章《我怎样演“武训”》。

黄宗英没有预料到，昆仑影业公司继《乌鸦与麻雀》后的《武训传》竟这样受欢迎，四个多月里，报刊上有几十篇评介文章，赵丹也收到了几百封观众来信。黄宗英感到十分欣喜，这欣喜不仅是因为她在《武训传》中演了一位女教师，更多的是为赵丹饰演的武训得到了观众的喜爱。在解放了的土地上，一个从旧社会走进新社会的演员，能获得人民的欢迎，是多么幸福啊！当她帮助赵丹拆着那些观众来信的时候，常常被这些热情的、陌生的朋友所感动，那似乎不是一封封信，而是一颗颗真诚而又充满了爱的心里发出的心声。

在新社会里生活是多么幸福啊！

在人民的关怀和热爱中生活是多么欢乐啊！

黄宗英和赵丹决心要做一对新中国的好儿女，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做新社会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战士！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前程辉煌，他们愿为这样的事业贡献自己所有的才华和力量！

雨，淅淅沥沥地下着，下着……

几天见不到阳光，心头似乎也积满了阴云，江南的霉雨季节到了。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对电影《武训传》进行了批判。这是黄宗英没有想到的，赵丹没有想到的，《武训传》的编导孙瑜没有想到的，那些喜爱《武训传》的人们也没有想到的。

风云突变，变得那样迅猛，变得那样惊心，变得那样可怕。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从边防前线到内地城市，从文艺单位到大专院校……立刻掀起了批判《武训传》的浪潮。《武训传》和“武训”一时成了全国声讨的对象，仿佛不是一部影片，不是一个历史上办义学的普通农民，而是可怕的魔鬼、瘟疫，危害新社会的幽灵。

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 武训传的讨论》，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啊，多么惊心动魄的抨击，多么令人胆寒的结论，黄宗英和赵丹读了社

论，完全惊愕了。仿佛是在晴朗的天空下，突然遭到了暴风雨的袭击，变得蒙头转向了。

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浪潮越来越高，声势越来越大。在这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赞扬过电影《武训传》、歌颂过武训的人，都感到不安和自危，好像灾难就要临头。一些报刊纷纷公开检讨，一些知名人士也撰文进行检讨。郭沫若、田汉是文化艺术界的前辈，是深受人民爱戴的作家，在这场猛烈的批判运动中，也不得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自我检讨。当然，编导这部影片的孙瑜的处境更是可想而知了。《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立刻在全国掀起了这场汹涌的批判浪涛，在这铺天盖地的浪涛下，刚刚跨进新中国的孙瑜是无论如何也承受不了的。为了编导这部影片，他先后花了六年的心血，从解放前拍到解放后，万万没想到是这样一个结果和遭遇。

啊，社会舆论和政治压力实在太大了，孙瑜被迫写了检讨，只得承认：《武训传》犯了极大的思想和艺术上的错误。无论编导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实践都证明了《武训传》对观众起了模糊革命思想的反作用，是一部于人民有害的电影。……

孙瑜虽然这样检讨了，可这部于人民有害的电影，究竟犯了什么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极大错误，孙瑜没有说清楚，他也无法说清楚。这种检讨，对一位艺术家来说是极大的痛苦，也是极大的悲哀。

黄宗英看了孙瑜的检讨，十分茫然。她好像走进了大雾迷蒙的山野，一切都变得那么模糊，那么莫测，那么不可理解，她的心情越来越沉重，她那甜甜的微笑已经从脸上消失了。

我们是演员，是迷恋艺术事业的演员。刚刚从旧社会踏入新社会，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的政治风浪，思想上毫无准备，精神上也无法承受了。

电影《武训传》真是“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吗？我不理解，也理解不了。可是《人民日报》的社论是这样写的，那是党的报纸，传达党的声音的啊！

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场席卷大地又席卷心灵的批判还要持续多久呢？最后的结局是怎样的呢？我不敢想，实在不敢想了。

自从批判《武训传》以来，阿丹沉默了，饭吃得很少，夜里常常做恶梦，人瘦了，也老了许多。有时他会坐在那儿拿着报纸上的批判文章出神；有时他会在屋里走来走去，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有时却又含着眼泪俯在书桌上写着什么……我理解他，我理解他啊！可怜阿丹已被这场批判弄得恍恍惚惚了。

我想找些话安慰他，可哪有这样许多安慰的话啊！看到阿丹这个样子，我十分难过，可又不敢流露出来，克制，尽量的克制，有时我像演戏那样，故意装得非常平静，好像一切批判都是无所谓的。然而，装出的平静毕竟是装出的，现实生活严峻得那么怕人，可不是演戏啊！我每天翻阅报纸，细心地读着每一篇批判《武训传》的文章，也读那些赞扬过《武训传》的人所做的自我检讨，也许我读得太多了，越读越糊涂，越读思想越混乱，我实在是没有认识到《武训传》像他们说的那样反动。一部电影，竟会惹出这样一场灾难，一部电影，竟会惹出这样可怕现实！

啊，《武训传》，武训的扮演者赵丹……

我已经预感到在这场批判的风暴中，阿丹是难逃正像黄宗英预感的那样，六月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赵丹与武训》，其中有一段这

样写着：

赵丹同志是全国知名的电影演员，但是他在表演艺术上，还有严重的思想混乱。这在他扮演武训这个角色中充分表现出来了。

文章还说：

武训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奴才，而赵丹同志用自己的“技术”，却把他装饰成了“被污辱的劳动人民”

一个演员，总是要按照剧本的要求，塑造人物形象，演员的表演艺术越高超，他塑造的人物越生动、越感人。但是，一个演员，怎么可能离开剧本，黑白颠倒地把一个“奴才”表演成“被污辱的劳动人民”呢？在表演艺术上还有严重的思想混乱，这种“思想混乱”指的是什么呢？和演员的角色创造有什么关系呢？……

赵丹糊涂了，思维也混乱了，他想静静地思考思考，可是一抬头，看到远方有一个人向他走来，步履那样蹒跚，衣服那样破旧，在残阳的斜照下，他几乎要倒下去了……

啊，那是谁呀？

赵丹仔细一看，吃了一惊，是武训，是武训！

等赵丹冷静下来，武训又无影无踪了。邻居阳台上的那盆石榴花开得正红，红得有些灼人。

赵丹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赵丹与武训》，想从中得到一些启示，以便清理自己的思绪。当他看到文章中写道：希望赵丹同志深刻地总结这个沉痛的经验教训，检查在演出《武训传》中的错误思想……时，他陷入了极大的痛苦，这种说不出道不明的痛苦，像一头无形的野兽咬噬着滴血的心脏，比在新疆盛世才的监狱里还难过，他叹着气，大颗大颗的眼泪在滚落。

黄宗英看到赵丹这样难过，不知怎样安慰他才好，她走到赵丹身边故意问道：

“阿丹，怎么啦？你……你别……”

“没什么……没什么，我心里有些难过。”说着他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阿丹，看得远一点，想得远一点，心里就亮堂了。你是艺术家，应该有宽广的胸襟。”黄宗英给赵丹倒了一杯茶，接着说，“我知道，这压力实在太大了，看来，是要叫你做检查了……”

“做检查，检查什么？”赵丹大声地反问着，脸涨得通红，眼里迸着火星，“我不会讲假话，从来也不会……”

“阿丹，你冷静些！”

“我冷静，冷静……可我怎么冷静下来呀！”赵丹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坐在沙发上不再响了。

黄宗英急忙转身，偷偷地擦着泪水。

电影《武训传》在全国停映以后，批判的浪潮并没有减弱，反而更加迅猛。赵丹有许多问题想不通，有许多话想说不敢说，只有沉默，沉默……

也许这种沉默，是最可贵、最能被人理解的；也许这种沉默，是最痛苦、最能使人伤心的！

有一天，黄宗英匆匆忙忙从昆仑影业公司赶回家来，一进门就对赵丹说：

“阿丹，你知道《人民日报》上的社论是谁写的吗？”

“谁写的？”

“是毛主席写的。”

“你说什么？”

“那社论，是毛主席写的！”

黄宗英说得似乎很平静，但每一个字都重重地落在了赵丹的心上。

赵丹先是有些惊愕，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他没有想到这场大规模批判《武训传》的运动，竟是毛主席发动的。随之他仍感到迷茫、感到困惑，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一部电影？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这部电影的编导和演员？

“阿丹，听说中央成立了《武训传》调查组，要进行全面的调查。”黄宗英有些担心地说。

“调查吧，调查吧！”赵丹反而不在乎地说，“问题调查清楚了，就不会这样批判了。”

“……”黄宗英望着赵丹，不知说什么才好。

过了一会儿，赵丹却自言自语地说：“毛主席批判了《武训传》，我们总是要听毛主席的。毛主席说它是反动宣传，我们只能按毛主席的观点去理解……看来，我非要检讨不可了，检讨……检讨……”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了。天边不时传来一阵阵雷声，这雷声像要炸碎什么，又像要唤醒什么……

那场暴风雨终于过去了，可是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一个阴沉、烦闷的雨季。

多少年了，每当回忆起那段困惑、苦恼的日子，仍感到有冷雨浇在心头。

后来，阿丹去朝鲜前线了。他在炮火纷飞的阵地上，在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战士中间，体验生活、接受教育。也许，这次前线之行，是为了让他进一步认识饰演武训的错误。然而，阿丹到了战场上，那些苦恼，那些惆怅，那些委屈，立刻都被炮火和硝烟湮没了。

木芙蓉又开花了，那粉红的、洁白的花朵微笑着告诉我，秋天来了。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汪南的稻子黄了，塞北的高粱红了，该收获了，一切都该收获了。

可我的收获是什么呢？……

黄宗英是上海剧影协会福利部副部长，又兼任协会托儿所的所长。她一直关心着周璇的生活、工作和健康状况。周璇生了孩子以后，心情好多了。在朋友们的关怀下，她不感到孤独，也不感到空虚，时时刻刻都像生活在亲人的身边。

当周璇参加影片《和平鸽》拍摄时，黄宗英为她默默地高兴。希望周璇能通过这部影片的拍摄，振作起精神，和朋友们一起，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贡献力量，将自己的艺术才华，献给解放了的人民。

可是，谁也没想到周璇在摄影棚里，突然发了精神病。幻觉、幻听，使她失去了理智，恍恍惚惚，哭笑无常，又坠入了那个可怕、痛苦的深渊。

一天早上，周璇的保姆慌慌张张来找黄宗英，一进门，便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黄同志，快……周同志要把儿子……扔、扔到楼下去，我……我把孩子藏起来……藏也藏不住……”说着便低声地哭了起来，拉着衣襟擦眼泪。

“阿姨，别着急，我马上去。”黄宗英说完，立即套了件毛衣，下楼去了。

到了周璇家，周璇正在床上大哭。

她看到黄宗英来了，一把抓住黄宗英的手，瞪着直愣愣的眼睛叫嚷：

“我的心是热的……我的血是纯的，真的是纯的！我被欺骗了，被欺骗了……我的血是纯的……”

黄宗英把她扶到床上，亲切地说：“我知道，璇子，你的血是纯的，我们大家都知道！”

听了黄宗英的话，周璇抹了抹脸上的眼泪笑了，笑得那么天真，仿佛是个孩子：“你们大家都知道就行了，我的血是纯的……”

过了一会儿，周璇安静了。

黄宗英微笑着对她说：“璇子，我和你商量个事儿，你在养病，没有精力管孩子，把周民送托儿所吧，早晚我和阿丹带着……”

“不，我管得了，我没有病！我没有病！”

“你要听话，不然，孩子受苦，你的病也养不好。”

“你不能抱走我的儿子……”周璇又呜呜地哭了起来，哭得十分伤心。

“璇子，你听我说，等你的病好了，我就把周民送回来……”

“不，反正你不能抱走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周璇又哭了。“求求你，宗英，求求你……”说着她紧紧搂住黄宗英的脖子。

我连哄带骗，总算把病中的周璇说通了，她同意我把周民带走，还知道帮着我给孩子找衣服。我下楼以后，她还站在阳台上招手，金色的阳光照耀着她，像一座伫立的雕像。

啊，年轻母亲的雕像……

周民每天去托儿所，晚上回到家中，给我们增添了不少乐趣。那时，赵青在北京舞蹈学校学习，赵矛在学校住宿，家里比较冷清。有了周民，我们的话多了，笑声也多了。

每当我看到阿丹抱起周民又说又笑的时候，总想起周璇，想起她那深情、甜美的歌声：

天涯呀海角，
觅呀觅知音哪……

啊，觅知音，觅知音，璇子觅到的是什么呢？

落叶开始飘零了，一片一片的黄叶仿佛在风中叹息，对于落叶，不少诗人都写过带些伤感的诗句，可是我从伤感中看到了它的美，那种美也许会使人们更加惋惜，更加痛心，但我深深地爱着，爱着。

璇子啊，你的病快点好起来吧！当你出院的时候，我和阿丹会抱着孩子，带着鲜花去接你……

黄宗英很喜欢孩子，每当她去剧影协会托儿所时，都要亲亲这个孩子，抱抱那个孩子。望着一个个天真、可爱的孩子，她会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母亲的微笑，想起那支熟悉的永远也唱不完的摇篮曲……

像所有结婚后的女性一样，黄宗英渴望做母亲，渴望有自己的孩子。可是与赵丹结婚三年多了，仍没有孩子。她的母亲也有些着急，常常在唠叨：“该生个孩子了，生个孩子……家里热热闹闹地该多好！”黄宗英听了母亲的话，只是甜甜地笑笑，什么也不说。赵丹却不一样，他急忙冲到老人面前笑眯眯地说：“妈妈，别着急，孩子很快就会有的……”

“妈妈，你别听他的。”黄宗英说完瞪了赵丹一眼，赵丹像个孩子似地做个鬼脸，逃开了。

也许真的让赵丹说中了，一九五三年春天，桃花盛开的时候，黄宗英突然食欲不好了，有时还恶心，喜欢吃些杏脯和酸梅……医生告诉她有“喜”

了。

要做母亲了，母亲是最慈祥、最伟大的……黄宗英又高兴又激动，觉得一切都变了，阳光特别温暖，春风特别和煦，花儿也开得特别美丽！

度过了夏天，又度过了秋天，黄宗英盼着孩子出生的日子。啊，这个日子为什么那样迷人又那样遥远啊？！黄宗英在心里默默地数着。

赵丹在心里默默地盼着。

霜染鬓发的母亲在默默地等待着。

这个日子终于到了！

十二月二十七日，黄宗英的女儿诞生了。这是一个晴朗的冬日，蓝莹莹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影，窗外那树梅花开得正旺，它仿佛是为了迎接这个小生命才吐露芬芳的。

阿丹特别喜欢女儿。这个刚刚出生的女儿，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欢乐和幸福。他想给女儿起个名字，冥思苦想了好几天也没有起出来。真没想到，为女儿起个名儿也这么难，比演戏还难。望着阿丹拧着眉头的样子，我禁不住悄悄地笑了。

一天早晨，他高兴地告诉我：“宗英，我给女儿的名字起好了。”

“起好了？”我惊喜地问。

“是的，就叫橘吧，橘子的橘！”

啊，赵橘！我明白了，阿丹喜欢屈原的《橘颂》，他是希望我们的女儿像橘那样“纷纍宜修，姁而不丑兮”。

望着女儿，我也背诵起了屈原的诗句：

后皇嘉树，

橘徕服兮。

受命不迁，

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

更壹志兮。

黄宗英在产假里本应好好休息，可是她闲不住，总想干点什么。经过几天的思考，决定写一个电影剧本。她想征求一下赵丹的意见：

“阿丹，我实在憋得难受，想写个电影剧本……”

“什么？写电影剧本？”赵丹感到有些突然，产假里怎么能写作呢？他笑着劝说道：“宗英，你现在的任务是休息，休息不好会生病的。写电影剧本我支持，那是以后的事。”

“不，我都想好了。我想写一个托儿所的青年保育员的故事。”

赵丹看到妻子又开始任性了，他不想再多说什么，只是用抚爱的目光望着黄宗英。也许这目光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黄宗英只好慢慢地低下了头。

黄宗英从小就是这样，她想干的事儿，谁也拦不住。虽然有时想干的事儿不一定都成功，可她从来不后悔。几天以后，她便动笔写剧本了。十年前，在香山那段孤寂的日子里，她曾写过一个话剧剧本，那个剧本是无法上演的，当时黄宗英刚刚失去了亲人，痛苦和悲伤像恶魔一样咬噬着她那颗少女的心……如今，在产假里竟写起电影剧本来了，她感慨万分，心潮犹如黄浦江的浪涛在汹涌。

一天深夜，黄宗英正坐在灯下挥笔，睡在床上的赵丹突然恐怖地叫喊起

来，这喊声极其可怕，把黄宗英吓了一跳，她急忙走过去使劲地摇着赵丹：

“阿丹！阿丹！……”

赵丹慢慢睁开了眼睛，额上沁出的冷汗在灯光下闪亮，他望着黄宗英发呆，似乎仍在分辨着什么。

“阿丹，是不是又做恶梦了？”黄宗英轻声地问。

赵丹擦了擦额上的冷汗，长长地叹了口气说：“我又梦到盛世才的监狱了！看到那个独眼龙狱警把一个难友击昏后，吊在绞架上……还看到他凶狠地拿着钉子，往难友脑袋里钉……”

“别说了，怪可怕的。阿丹，别想这些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儿啦！那场恶梦该忘掉了！”

“是的，是过去的事儿啦，可它又在我的梦中重现了。唉，清清楚楚，清清楚楚啊……你说该忘掉了，可是忘不掉啊，忘不掉！”赵丹的眼里闪着泪光，脸上的表情特别冷漠。看来，他内心十分激动，仍沉思在监狱的黑暗与恐怖中。

“阿丹，快睡吧，明天你还要到沈浮家去研究《李时珍》的剧本呐！”黄宗英拍着赵丹的肩头，温柔地笑了。

我在五十六天的产假里，写完了电影剧本《在祖国需要的岗位上》。后来，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改名为《平凡的事业》，影片中的女主角，是由王蓓扮演的。

这部影片放映以后，观众反应并不强烈，但是我喜欢它，因为它也是我初生的“女儿”……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的女儿赵橘已经有了女儿了，可我在产假里写剧本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

岁月匆匆流逝，有许多事情已经遗忘了，可那些永远活在记忆中的，是多么令人珍惜啊！

黄宗英写完电影剧本《在祖国需要的岗位上》之后，又主演了影片《为孩子们祝福》。她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人民教师的形象，得到了观众的喜爱。

后来，她参加了中央电影创作讲习班，在学习中她非常努力，并且结识了许多有才华的同学。如今，每当见到李准和白桦，他们都会想起同学时的许多事情，谈笑中，不知不觉地就回到了那个时代，人也变得年轻了。

黄宗英从中央电影创作讲习班回到上海后，又参加了影片《家》的拍摄。这是根据巴金的名作《家》改编的电影，黄宗英在影片中扮演梅表姐。

为了准确地银幕上塑造好梅表姐的艺术形象，让角色的一言一行都能体现那个时代的特殊风貌，她不仅仔细地阅读巴金的原著，还读了叶圣陶的《倪焕之》、李劫人的《死水微澜》、郭沫若的自传《少年时代》等，她要从这些作品中，找到梅表姐的灵魂，把这个悲剧人物的爱和恨，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每当回忆演梅表姐的时候，黄宗英总是爽朗地说：“我喜欢梅表姐，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演好梅表姐！”其实，梅表姐在影片中，并不是最主要的角色，那么是什么在吸引她呢？

这个角色吸引我的是她勇敢从容赴死的精神，她以自己凄凉的眼睛，以默默无言，以死向旧社会、旧制度提出控诉。这种控诉是深刻的、有力的，也是令人难忘的……

看过影片《家》的人，谁能忘记梅表姐呢？特别是看到梅表姐逃难在大街上与曾经相爱的大表哥觉新巧遇时，谁能为黄宗英高超、细腻的演技叫

绝呢？没有一句台词，不用一声唉叹，她只用凄凉的目光默默地望着大表哥，微微痉挛的面颊霎时掠过一丝苦笑，那苦笑似乎还带着一点甜蜜的回忆，只一闪就在冷漠中消失了……梅表姐复杂的心境、复杂的感情，竟被黄宗英在几秒无言的镜头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了。难怪当年黄宗英在街上被观众认出的时候，总是听到在说：“看，梅表姐！”，“梅表姐比电影里还美，没有一点苦相！”如今，黄宗英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了，可是还有许多老观众喊她“梅表姐”。

有一次在谈起梅表姐的银幕形象时，我突然想起了影片中那片美丽的梅林，便问黄宗英：“影片中的梅林是在哪里拍的？”

“在无锡。”她说。

“那梅花开得多漂亮呀！那么多的梅花，一眼望不到边！把人物难以表达的感情都衬托出来了。”

“可是，我们拍外景的时候根本没有梅花，那一树树梅花，都是美工的杰作，多么不容易啊……”黄宗英赞叹着，沉浸在回忆中。

啊，梅花，盛开的梅花！

拨开梅花的枝头，梅表姐走来了，她还是那么沉默着，不说话，也不露一丝笑意……

啊，梅花，盛开的梅花！

拨开梅花的枝头，黄宗英走来了，她还是那么微笑着，不显老，永远那么朝气蓬勃……

下乡

在一次报告文学创作座谈会上，记者问黄宗英：“您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专业作家的？”

黄宗英笑了笑，不知怎样回答。她想了一下，闪动着明亮的目光说：“我只能这么说，从一九五八年上山下乡，我的演员生活渐渐‘淡出’，作家生活渐渐‘淡入’。”

是的，黄宗英的作家生活，是从那时候渐渐“淡入”的。当她第一次到了浙江的山乡，分辨不出稻粒和麦粒，不认识马兰和苦菜……但她如醉如痴地投入了大跃进的热潮，三天修条路，七天开条河，两个月搬座山。春寒霜夜里，她和乡亲们一起护秧；台风咆哮中，她和乡亲们抢收早谷；秋色宜人时，又和乡亲们一起把已经灌浆的晚稻拔出来，往一块田里拼命地挤了又挤，放“高产卫星”……这一切她都斗志昂扬地干了，对的和错的她都意气风发地卖力干。那一时期，她写了大量歌颂大跃进的作品。几十年后的今天，那些作品已落满了历史的尘埃，也许被人们遗忘了。但是，那是黄宗英进入作家生活的脚印，对她来说，是真实的、难忘的、不该掩饰的脚印。

黄宗英常说：“作家，应该在生活的深水里，在激流中。”

她的作品，无论是几万字的长文，还是几百字的小品，几乎都是在生活的深水里或激流中写出的。

民主革命时期，她从学生走向社会，成为艺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从演员走向农村，当了作家；就是从浅水走向了深水，从小溪走进了激流。

一九六三年的春天，枣树爆芽、杏花开放的时节，黄宗英深入生活，来到了河北省宝坻县大中庄公社。因为这个公社有两面全国知名的红旗——司家庄的邢燕子队和小于庄的铁姑娘队。

黄宗英先到了司家庄，和邢燕子住在一起，跟燕子队的姑娘们一起干活。在春播的竞赛中，燕子队得了第一名。黄宗英也第一次享受到了农村姑娘们胜利的喜悦和自豪。她怎么能忘记呢？姑娘们教她选种、撒种，姑娘们教她牵牛、扶犁；姑娘们教她挖野菜、唱民歌，姑娘们教她纳鞋底、做衣裳……迎着黎明的晨光下地，披着夕阳的余辉归家。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她教姑娘们学文化，讲她们爱听的故事……正因为黄宗英在燕子队生活得亲亲热热，可把铁姑娘队急红眼了。想拖不能拖，想抢不能抢，却又盼着黄宗英早点到她们队来。有时见了面，又不好意思开口，过后，又后悔为什么不了一声……

黄宗英在邢燕子那儿住了一个多月，又想到小于庄铁姑娘队去了。她去找铁姑娘的时候，竟受到了一次“复仇”的欢迎……

公社开会休息时，我在篮球架下，找到了铁姑娘张秀敏。她正和女伴儿坐在一起抢蜜枣吃。我跟秀敏说，要到她们村去住几天。

秀敏一对大眼水珠似地朝我一闪，把一颗蜜枣往我嘴里一塞，又用眼尖把她的队员们顺溜一扫，扁起小嘴点点头：“嗯，来，来。我们熬一大锅开水等着你。”

“干吗？”我奇怪地问道，“我可没那么大的肚子。”

秀敏哼了一声，说：“美得你，你一进村我们就拿小刀给你宰了，下锅燉了……”

我大笑起来：“好劲！不远千里的，我哪阵把你们铁姑娘队给得罪了。”

“你自己心里明白。”秀敏说着一吐枣核，把我往地下一推：“来啊，姑娘们，胳肢她！”说时迟，那时快，秀敏、玛瑙、珍儿一起动手，庆云想拉架也拉不开，我一下子就陷入了重围。

“哎呀……讲点风……格呀……”我笑得失了音，“燕子暖——快来呀……出人命啦！……”

“你叫，我们还胳肢！”

“你为什么不早到我们队来？”

“你还敢端谁家碗，向着谁吗？”

“别闹了，大姐受不了啦！”

“她告饶了！”……

我笑得喘不过气来，嘴里的蜜枣囫囵吞了。

“看，把大姐都噎住了！快住手……”

于是，欢迎仪式结束了。我从地上爬起来，用手拢着蓬乱的头发，秀敏和玛瑙赶忙为我拍打身上的尘土。我狠狠地瞪着她们说：“我算认得你们啦，铁姑娘！”

她们哧哧地笑了。

秀敏又往我嘴里塞了一颗蜜枣：“大姐，别再囫囵吞了。噎死了不偿命！”……

初夏。雨后的早晨。

黄宗英踏着湿漉漉的土路，来到了小于庄。十九户人家的小村，像洗过脸的小姑娘，又鲜活，又干净。空气里弥漫着宜人的清香，是什么花香呢？是杏花？是桃花？不，是槐花……

走村串庄的卖油郎把梆子敲得“倍儿”脆，左近又传来“鸡子儿换豆腐”的叫卖声。卖蛤子肉的也骑着带挎桶的自行车来了。小孩儿们，点着一脸胭脂点儿，扎着冲天辫满街串。姑娘们、媳妇们、老奶奶们，都把一嘟噜一嘟噜的槐花簪在鬓角边、发髻上、辫梢头压香。

驴叫、马嘶、牛吼，大牲畜出棚了……

老队长叼着烟袋，扛着锄头，带着人们奔向绿茫茫的麦海……

铁姑娘们的笑声，还在村头回荡……

黄宗英怎么也想不出，这就是解放前年年闹水灾，春种秋不收的村子。更想不出，这就是大水漂天，断绝过人烟的鬼地。

解放后，政府修了潮白河，垫高蓟运河大堤，建起宽江扬水站。小于庄，这个有名的“花子营”，才开始有了收成。逃荒的人们陆陆续续回到家园。可是房子没了上盖，炕头长了小树，到处是荒草野坡，一到晚上鬼火比灯火还多。小于庄仍然那么贫困，被一根穷绳牢牢地扎着。在那穷得挺不直腰的日子里，党像亲娘一样，没有种子给种子，没有粮给粮，天冷送来寒衣，荒季拨来救济款……

于是，小于庄的人们，含着热泪记下了党的恩情，记下了摆脱乞讨的新生活。

如今，生活大变了！那贫穷的日子，像逝去的恶梦一样，再也不会出现了！

想到这里，黄宗英眼前又浮现了铁姑娘队的四员猛将——秀敏、庆云、玛瑙、珍儿……是她们在公社化的第二年，成立了“挖穷根突击队”，白天拉犁种地，早晚抡着大镐开荒。到了秋天，新开出的五十六亩荒地，没有辜

负铁姑娘们的血汗，献出了够全庄人吃四个月的口粮。这一年，她们去大洼割了三万多斤草，给队里买来一头毛驴，一只船……

就这样，小于庄变穷村为富队的奇迹，震动了宝坻县，震动了河北省，震动了全国。“挖穷根突击队”被光荣命名为“铁姑娘队”。十七岁的秀敏，第一次穿上了表里三新的青棉衣，去参加省的农业先进会议……我总也忘不了铁姑娘秀敏睡在炕上，给我讲的她们开荒种地的那些事儿。有时听得我发笑，有时听得我心酸，有时激动得我忍不住淌泪……

几个小姑娘抡着大镐，在茫茫荒滩上开荒，多么不容易啊！那样的日子，是不能用单纯的艰苦或顽强来形容的，啊，有一组电影镜头总在我心头放映——大清早，刮起了大黄风，沙土照脸上直打。荒草被风吹得呜呜呼叫，天昏地暗。

滩里看不见啥人，只有来往的大车偶尔从远远的堤上赶过。整个大地被沉沉灰云压着，显得那么荒凉，那么孤寂。

小玛瑙的左眼让沙子迷了，就坐下来揉眼。她眯缝着一只右眼，看着脚下开出来的小片生荒，还有那望不到头的大片野草，而身边连自己在内，只有四个小土人儿，身子让风吹得摇摇晃晃。霎时，她那只右眼也不肯好了，眼泪刷刷地流下来，鼻子一抽嗒一抽嗒。

庆云回头问：“怎么啦？”

小玛瑙委屈地说：“人家都说不行，咱生说行，你看这……”

秀敏赶忙四边望望，对玛瑙说：“又哭，你就会哭。哭也别在外头哭，让人家瞧见，更该数落个没完了。挺住了，咱们就是得让不行的事儿行通了。”

小玛瑙怯怯地：“我才不想哭呢，就是……鼻子它自己发酸……呜……嗯……”

珍儿也早蹲在一边抹泪呢。

秀敏又急了：“咋啦，咋啦，今儿个都咋啦？”

“我就哭半会儿……”珍儿用衣襟把脸蒙起来，“……

有草挡着……谁也瞧不见，呜呜……我累得慌……”

庆云走过来，在她俩身边坐下，撕了块破袄襟子，给妹妹们手上再缠一层，说：“累得慌，你们就都歇歇吧，啊。”她磕磕鞋坷垃里的沙土，扛起镐，往前走。

秀敏迎着黄风站在那儿，她咬住干裂的嘴唇，鼻子也发酸了，心里想：“咱们没有坡退，咱们不能再一世穷下去。穷根子，你个小兔崽子！”闺女早先要过饭，爱说粗话，眼下到节骨眼时，还是管不住口。她用坚毅的目光，扫了一下大片的荒野，咬牙揪去满手连片大泡的腐皮，攥住带血的镐把，就咔咔地刨起来了……

啊，茫茫四野，只见几个小黑影儿在修理地球。天，不能安。地，不能安。荒滩，再也不能不醒醒。

狂暴的黄风还在刮着，人间奇迹却在这片贫穷的土地上出现了……

小于庄村子小，一迈步就到头了。这里所有的人家都姓张，串门不用担心走错了路。那天，黄宗英进村一后晌，就挨门逐户地混熟了。出身贫苦的庄稼户，实实在在，嘴对着心直来直去。黄宗英朴朴实实，没有一点名人架子，村里不拿她当外人，她也跟住娘家一样随便，不管到哪家，都是亲亲热热的。

有一天，秀敏买来一辆新自行车。歇晌时，要推到村前场上去练。

黄宗英说：“秀敏，我扶着你练。”

秀敏推着车忙说：“姐，您别管我。我自己练，您歇着吧，下午还要耨麦哪。”

“我扶着你练好，免得摔了……”

“嘿，没见过骑车的后尾还跟个赶脚的。”

秀敏的话刚说完，她娘又接上去了：“她姐，你别管，让她去。这闺女从小就是这犟脾气，再说，没见学车摔死过人！”

这娘俩一个禀性，黄宗英憋不住笑了。

下午耨麦休息时，铁姑娘们习惯地往锄把上一坐，又开始说笑或唱歌了。秀敏有些吃力地坐下来，还直咧嘴。

黄宗英关切地问：“怎么？摔疼了？”

她蹙蹙鼻子：“哼，能让两轱辘把人治了？”

黄宗英心疼地又说：“伤在哪儿？让我瞧瞧……”

秀敏不吭声，摘来一片苇叶，卷了个笛儿，冲着黄宗英的耳朵猛吹。

黄宗英头一歪，戳着她的脑门骂道：“死丫头，真会疯……”

夜里，脱衣上炕时，黄宗英听到秀敏“嘶拉”了两声。她敏感地瞅了瞅秀敏，秀敏笑着朝她做怪样。

“姐，你那小百宝箱呢？”

“干吗？”黄宗英装做不懂似地反问，“要针？要线？配扣子？找发卡？……”

“不是，都不是。”

“该不是想吃我的安眠药片吧？”

“我一辈子也用不着那金贵玩意，睡觉还花钱买！”

“那你到底要什么？”

“你甭管我。”

黄宗英知道秀敏想要小匣子里的碘酒、红药水。便把小匣子递给她，蒙起头假装睡大觉。当黄宗英又听到秀敏“嘶拉”了几声，却忍不住笑了，掀开被头说：“我那药水可焊不住铁，你明个儿得找铜匠去。”秀敏杵了黄宗英一拳头：“姐，不许你告诉我妈！”“我偏告！”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秀敏没着儿了，把头顶在黄宗英的怀里撒娇。

第二天，窗户纸才发白，秀敏早捡回了一筐粪，又从园子里刨了一篮水萝卜回来，让我陪着她给司家庄的邢燕子送去。我前天从燕子那儿来，无意中透露燕子正闹嗓子，秀敏听了就上了心。

“咱俩骑车子去。”

我一听，愣了，难道她真的会骑车了？我担心地说：“八里地哪，能行？”

秀敏却说：“上了车，几里还不是一样。”

我们骑上自行车，一前一后上了蓟运河大堤。秀敏在我前边直嚷嚷：“姐，躲我远点儿！”只见她歪来扭去的，骑着车子往前闯，越看越叫人害怕。

远处，河水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波光，近处，一片片芦苇长得又绿又壮，在风中轻轻地摇曳。一群野鸟，被我们惊起了，扑啦啦着翅膀飞向了远方……

黄宗英就这样，和铁姑娘们一起生活着。有时她打开本子记点什么，玛瑙便好奇地问：“姐，你写啥？”黄宗英笑笑：“没写啥。有些事儿我要记

记，免得忘了……”

珍儿说：“姐，你是要写我们的事儿吗？可别把我写进去，要写就写秀敏、庆云和玛瑙……”

“别瞎说，就你爱多嘴！”庆云不安地把话接了过去，“姐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啊，多么可爱，多么淳朴的铁姑娘呀！

住了两个多月，黄宗英恋恋不舍地回上海了。她走的那天，铁姑娘们可没少掉泪。

第二年春节前，黄宗英又来小于庄“串亲戚”。是运电线杆子的大车顺路把她捎来的。一路上飘着小雪花，望不到边的平原白茫茫一片，显得更加辽阔，更加壮丽。

黄宗英跨进秀敏家的家门时，只见当院里上着木架子，院角冷锅里躺着一口正在刮毛的大肥猪。

嫂子迎着黄宗英说：“早起秀敏还念叨你，一念叨，你就来了。”

大娘用掸子抽打她身上的雪，心疼地说：“这雪天，一定冻坏了。咋不挑个好天来呢！”

“我不冷。”黄宗英又问：“秀敏呢？”

大娘说：“在玛瑙家做针线活哪。”

“大娘，登您闺女相片的那张报纸您见了没有？她头发剪短了，像个人了！”

听我一说，大娘摇了摇头：“我不瞧那个。别人夸，外头夸，那是树旗儿。扎花绣朵也得替个样儿，万事总有个打头儿的。姐当面可别夸她，家里不兴夸……”

晚上，大娘和秀敏先睡了。

灯下，我铺开稿纸，端详着秀敏的睡脸。是谁给了她钢铁般顽强的意志和信念？我怎样才能准确地勾画出她的形象？我该怎样记下和她相处的一切感受和启示？

我试着写啊，写啊，不仅忘了时间，竟也忘了自己是坐在炕头上。

忽听得秀敏叫我：“姐！”

我吓了一跳：“怎么你还没睡着？”

她睁着两只黑亮的大眼睛，问我：“你那安眼药我能吃吗？”

我笑了：“怎么啦？你不是说一辈子也用不着吗？想啥啦？”

秀敏靠在方枕头上，用裸露的胳膊支着头说：“闹不清。这心里老一出地过戏，自己跟自己说话儿。”她从枕头底下把一份伙伴们拟好的“战表”递给我。那上边写着小于庄青年今年秋天要达到司家庄邢燕子队的科学成果和提出的协作项目……

我把灯吹了，在她身边睡下。她心里过她的戏，我心里过我的戏。谁也不跟谁说话了。

啊，冬夜真静……

从春天到春天，黄宗英写完了报告文学《小丫扛大旗》。作品一发表，就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不少下乡的青年，还喜欢背诵这篇作品的结尾哪：

在这座小村，这间小屋，这个小窗前，一个中国农村姑娘在测天量地，她看到了整个的世界。胜利属于永远革命的青年！……

有人说，《特别的姑娘》和《小丫扛大旗》是我的成名作。我真的有成

名作吗？不知道……

但我始终记得我在宝坻县生活的日日夜夜。几十年过去了，那一切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仿佛就是不久的事儿，一闭眼，就看到邢燕子、侯隽和铁姑娘们……

黄宗英第一次见到侯隽，是一九六三年麦收的时候。当时，她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邢燕子和铁姑娘队的姐妹们，回到了宝坻县城，打算住两天就回上海了。在闲谈中，听县委老杨说，这里还有个姑娘，名叫侯隽，是北京来的知识青年，乡亲们都说她“特别”。这“特别”的姑娘，立刻引起了黄宗英极大的兴趣，她决定不走了，要去看看这个下乡的姑娘。

太阳，从远远的地平线上升起来了。平原上的麦子成熟了，灿烂的阳光，照耀着金色的麦田，像照耀着一片金涛翻腾的大海。

黄宗英一早来到了史各庄公社窦家桥生产大队。一进村，就打听侯隽住在哪儿？一位整理场院的大叔，望着远处麦浪滚滚的地头说：“这会儿侯隽哪能在家呢，不定在哪块地里干活哪！”

这时，一群孩子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问：

“你是侯隽的同学吗？”

“你也要到我们队上来种地吗？”

“你的铺盖哪？”……

有个大眼睛的小姑娘，扎着两根朝天辫，歪着小头说：“我知道侯隽的家，我带你去……”于是，黄宗英就被这群孩子拥走了。那个大眼睛的小姑娘一点也不怯生，她指了指有棵槐树的地方：“就在那儿，你看见了吗？”

黄宗英笑着说：“看见了。”

这个小姑娘干干净净，很可爱，不知什么地方有点像赵青小时候，是眼睛？是小嘴？……

黄宗英摸着她的朝天辫问：“你几岁啦？”

“七岁。”

“上学了吗？”

“侯隽姨说，我明年上学……”

这时，另一个小姑娘，在路边采了一把野花，拉了拉黄宗英的衣角，有点害羞地问：“你要吗？……侯隽姨喜欢这花……”

黄宗英忙接过野花：“谢谢你。”

小姑娘红着脸说：“有得是……”撒腿跑到前边去了。孩子们咯咯地笑着……

孩子们把我带到一座低矮的小屋前，门上搭着锁，我正犹豫，那个大眼睛的小姑娘，踮起脚，轻轻把锁一摘，推开门说：“进去吧，这门从来不锁。”

我跨进门去。这是一座用秫秸夹的小泥房，顶棚破处露出秫秸秆秆，窗户纸透风的地方，用旧席片子挡着。小屋里锅灶土炕，柴堆水缸，墙上挂着留种的玉米，墙角靠着一两件农具，又用碎砖头搭了个摆瓶瓶罐罐的案子。乍看是个庄稼人住的屋，又过分简陋了些。只是那炕角上的歌谱、口琴、塑料茶杯、插筷子的布袋……显示出屋子的主人不像是个土生土长的种田人。

有几个挤进屋来的大娘、大婶在问我：

“你是来接侯隽的吧？”

“这闺女能吃苦，该调到大地方当干部啦……”

我不知如何回答。想解释，又觉得没必要，便随嘴问：“您不愿意侯隽

在这儿吗？”

大娘说：“咋不愿意？这样的闺女可哪儿找！从北京跑到我们这儿来，没一个亲门近支的，有个伴儿也颠儿啦。成天下地，汗珠子掉地摔八瓣，一冬尽吃白薯干子，说是要把好粮食留在农忙吃……唉，眼下再苦的庄稼人过的也比她强，这算哪门子事啊！”

这时，外边响起了一个清朗、柔和的声音：“我不走，我哪儿也不去。”

我看见孩子们牵着一个姑娘的衣角走过来了。这姑娘，看上去性格温和稳重。她脸色红红的，剪短发，戴着顶旧草帽，身子不高不矮，虽然不壮，倒也结结实实。她身上穿一件褪了色的“北京蓝”的上衣，裤子膝盖上补着补丁，一双青布鞋，没穿袜子。

这姑娘就是侯隽，她惊奇地睁大了眼睛，打量着我，好像我真要立刻把她带走似的。没有说一句话，可她那复杂的目光，却说了许多、许多……

侯隽下乡一年多了，她由一个高中毕业的学生，变成了一个什么农活儿都会干的农民。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她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泪？乡亲们心里知道。当她唯一的下乡伙伴，那个“小机灵”走了以后，侯隽感到十分孤独、寂寞，简直像掉了魂儿似的。晚上她自己睡在黑乎乎的草屋里，抽抽搭搭地掉眼泪，也不知是想家，还是想“小机灵”。也不知是委屈，还是伤心……

好心的乡亲们真心实意地疼她，爱她，有的大娘抹着泪说：“好闺女，别难受了，你也回北京吧。在我们这个‘破’地方，是图了什么呢？怎么了局呢？”

侯隽咬着嘴唇，眼圈又红了。窦桥的姑娘们帮着把侯隽的铺盖一卷……

可是侯隽没有回北京，而是搬到了新结识的女伴儿的暖屋热炕头上了。

侯隽天天和乡亲们在一起，在风风雨雨的田野里来来去去，一步步，一锄锄地把意志和麦种一起深深地种下，相信它一定会发芽、抽穗、收获……

黄宗英了解到侯隽的这些事迹以后，更喜欢这个普普通通的姑娘了。老支书说她特别有志气，大娘大婶们说她特别能吃苦，年轻的伙伴说她特别有理想……黄宗英觉得除了这些特别以外，侯隽还特别有我们时代青年的性格和抱负！

黄宗英在一篇日记里，是这样写到侯隽的……

当她树立了全心全意献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的时候起，到她独立地驾起一只小船，驶向生活的汪洋大海，她划呀，划呀，不管那波涛汹汹，涌浪回旋，也不管那黑夜的风暴，她甚至弄不清是哪只海鸟为她带路，哪座灯标为她避礁，哪里传来的歌声为她鼓劲，她只是不停地奋力向前划。筋骨酸痛还是划，胆战心惊还是划……

当云雾渐渐散去，她发现方向是对的，对的！曙光是在前面，太阳又红又大又暖和，时代的长风巨浪推送着她的小船，她划出了好远，好远，比她自己想象得要远得多，海阔天高，乘风万里，正好扬帆！

一切经历过的困难和斗争，都化为胜利的喜悦了。

所有胜利的喜悦，又都凝成战胜新的困难的决心和气概她划呀，划呀，永远不停地划……

烈日当头，打麦场上拖拉机吼叫着，牵住八个大碌碡在场上转圈，腾起了一股又一股土雾麸烟，满场是金子的海，金子的山。

黄宗英在麦垛下，揩了揩额上的汗，放下叉杆，望着场上的乡亲们，忽然产生了一种惜别的惆怅。啊，明天就要走了，这麦田、这村子、这枣树、这菜园、这里的乡亲们……多么叫人难忘啊！什么时候还能再来呢？再来时这里会变的怎样呢？

侯隽哪里去了？这个特别的姑娘，在打麦场上一点也不特别，一眨眼便看不见她了。在这里，劳动的热情和丰收的喜悦，已融成一片雄壮、和谐而又欢乐的和声。

侯隽在人群中，在麦浪中。

啊，麦浪汹涌，麦浪汹涌……

在这汹涌的麦浪中，黄宗英的构思形成了，不久她就写出了报告文学《特别的姑娘》。这是一篇朴实、热情，充满了希望和深情的作品，它散发着浓浓的乡土味，也散发着麦子的芳香……

七九河开，八九雁来。

大雁每年春天都到窦桥来，可是黄宗英离开窦桥的乡亲后，没有再来。每年麦收的时候，侯隽和姑娘们都要念叨黄宗英，她在哪儿呢？在干什么呢？写文章？拍电影？……为什么不来了？她说要来的，还说要和赵丹一块儿来哪……唉，真是想死人啦！

六十年代初，我写《特别的姑娘》，只不过想支持一下侯隽这个有志气的姑娘，我才和小伙伴搬进了她的小土屋。那时，她下乡才一年多，说不上有什么“丰功伟绩”，我只不过为她坚韧的毅力、自找苦吃的精神所感动，想和她做几天伴而已，没想到做出一篇文章。

一九七四年春天，我随着北归的雁群，重返宝坻县的时候，得知我在《特别的姑娘》中，写的“小机灵”——那个离开侯隽嫁到邻县的女伴，暗暗流泪，说：“人家都有落实政策的盼头，我这个‘落后青年’的帽谁给我摘啊！”听说此情，我赶忙骑着车、推着车、扛着车，奔了几十里路，去向“小机灵”道歉。

唉，当年写她时，我并没有认为她是个“落后青年”，怎么会……，是啊，生活是复杂的，生活中有些事儿也是难预料的，也许，我写她时笔尖偏了一点……

“小机灵”，可爱的“小机灵”，原谅我吧，那时我的笔和我的人一样，都还不成熟……

春天的大平原，显得更加辽阔。温暖的风甜滋滋的，带着梨花的清香，吹拂着绿茫茫的麦海。

我真想在这儿多住些日子，和乡亲们生活在一起，许多苦恼和伤心的事儿都忘了。如果我能拿起笔，重新写写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许会比十几年前写得更深刻些，因为我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共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暴风雨……

可是，我现在不能写，人是“解放”了，可我的笔还没有“解放”，它还被关在“牛棚”里哪！

动乱的日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在中国的历史上，浸着血和泪，疯狂、残忍、恐怖竟成了天使的翅膀，开始编织长达十年的恶梦……

质朴、善良的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翻天覆地的风暴来了，来了……

当这场灾难降临的时候，黄宗英像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并没有意识到灾难的降临，因为她太纯洁、太天真了，这也是一个悲剧，可怜而又可怕的悲剧！

那时，她正在上海机床厂体验生活，想为这家厂的镜面磨床唱一支颂歌。

有家报社的记者找到她，想请她谈谈对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看法。

黄宗英为难了，她看过这篇文章，并没有仔细研究过，因为她以为这是一篇学术讨论性文章，根本想不到是有政治背景的。

她有些尴尬地对记者说：“真对不起，我没研究过历史，清官、赃官，我也搞不清楚。究竟谁好？”她眼睛一亮，耸了耸肩，“我没研究，不知道……再说，我也没写过历史题材的作品……”

记者还以为她故意装糊涂，推脱没研究哪，只好败兴而归。

没几天，黄宗英回到上海作家协会了。几个红卫兵的头头叫她参加游行队伍，上街游行，并严肃地对她说：

“黄宗英，你可以参加红卫兵了。”说着便拿出一只红袖章，“把它戴上！”

望着红袖章，黄宗英迟迟不敢接，她觉得那不仅是风靡社会的标志，也是革命、战斗和光荣的象征。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戴着它检阅几十万红卫兵。而我这个从旧社会来的演员，与“四条汉子”又有关系，怎么能当红卫兵呢？现在应该说清楚，要有自知之明。于是，她冷静地对他们说：“全国都在批判‘四条汉子’我和夏衍、阳翰笙、田汉都有关系，他们是修正主义的，我也跑不了。既然和‘四条汉子’有关系，就不能参加红卫兵。”听了黄宗英这番话，那个红卫兵头头把红袖章收起来了。打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叫她参加红卫兵了。

随着整个社会的动乱，黄宗英渐渐发现人们都用一种异常的目光看她了，那目光是冷淡？是戒备？是怀疑？是同情？是……？啊，实在是复杂，复杂得说不清，道不明。

寒冷的冬天到了，光秃的树枝在呼啸的北风中颤栗，大地结冰了，太阳也变得遥远，失去了往昔的温暖。

《人民日报》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传达了党中央的号令，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立刻掀起了“横扫”的狂飚。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一大批艺术家、科学家、作家、教授……变成了“牛鬼蛇神”，成了群众专政的对象，被批斗，被游街。赵丹一夜间从电影艺术家变成了可恶的“混世魔王”，黄宗英还能逃得了吗？

有一天，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造反派开着一辆卡车，到作家协会来押黄宗英，可是黄宗英不见了。办公室、会议厅，都没有她的影子，她到哪里去了呢？

我能到哪里去呢……

是芦芒同志匆匆忙忙，慌慌张张地把我藏到作家协会宿舍的小楼上去。当时，我并不十分害怕，听到外边吵吵嚷嚷，向芦芒同志要人，我想出去，又怕连累了芦芒，只好不安地藏下去了。结果，来押我的人把芦芒同志骂了一顿，开着卡车走了。

第二天，我主动去了电影厂，一进大门，全是我大字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黄宗英必须低头认罪”、“黄宗英必须老实交代”……大标语到处都是。经过造反派严厉的训话后，我被关进了“牛棚”。和我关在一个“牛棚”里的还有上官云珠和王丹凤……

从此，我常常被拉去批斗或陪斗，低着头，弯着腰，把我斗得昏头昏脑，两腿不住地打颤。有一次在一个大型批斗会上，给“牛鬼蛇神”挂牌子；给白杨挂的是“叛徒特务”，给赵丹挂的是“混世魔王”……当给我挂牌子的时候，造反派也不知写什么好了，他们瞪着眼睛问我：

“黄宗英，你是什么东西？”

“我……我……”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东西，他们批判我是“中国的丘赫拉依”、“用黑笔诬蔑社会主义”、参加“骂皇帝的队伍”……

“别装蒜，你是什么东西，你自己最清楚。”

我突然想起修正主义黑线来了，便说：“我是修正主义黑线分子。”

“什么？修正主义黑线分子？你倒轻松！你是反革命文艺黑线的黑干将，自己写上！”

于是，我提笔给自己写了牌子，在惊天动地的口号声中，挂到了脖子上。

从那天起，我总算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了……黄宗英和赵丹都是“牛鬼蛇神”，他们的家理所当然地要被抄。早晨是上海的红卫兵来抄，下午是北京的红卫兵来抄，第二天又是电影厂的造反派来抄……抄了多少次，谁也记不清了。反正谁都可以来抄，什么时候都可以来抄。最恐怖的是深更半夜，红卫兵突然翻墙进来，翻箱倒柜，又骂又砸，连保姆和孩子的枕头都要翻遍，那时阿佐、阿劲还小，吓得蹒跚在雪珍孀孀的怀里，睁着恐慌、不安的眼睛，不停地发抖。多年珍藏的照片、书画、信件、手稿……洗劫一空。就这样，还不放心，林彪的亲信还接受了特殊使命，进行了一次毁灭性的抄家，连一个旧信封、一块碎纸片都不留。

在批斗会上，除了接受批斗以外，还要听一些人的控诉；艺术上受过赵丹熏陶的，挺身而出，大骂赵丹怎样用“封资修”

的东西毒害他。生活上受过黄宗英帮助的，突然划清界线，痛斥黄宗英怎样用糖衣炮弹腐蚀他……白天斗，晚上斗，厂内斗，厂外斗，黄宗英的腰都直不起来了，两条腿肿得一按一个坑。

寒冷的日子，天也黑得特别早。黄宗英从牛棚里回来了，可赵丹还没有回来。一家人等他吃饭，等了很久，很久，也没见他回来。黄宗英不安地望着窗外，窗外夜色正浓，连颗星星都看不见。只有凛冽的北风在呼啸，白杨树的枯枝在颤抖。

等啊，等啊，焦急地等啊……

等啊，等啊，忧虑地等啊……

终于把赵丹等回来了，只见他面色苍白，摇摇晃晃地走上楼来。黄宗英急忙把他扶进屋里，他瘫软地倒在了床上。灯光下，黄宗英发现他嘴角有血迹，假牙也掉了，忙问道：“阿丹，怎么啦？”

赵丹闭着眼睛，微微摇了摇头，嘴角在抽搐。过了一会儿，他无力地说：

“他们要打死我……他们要打死我……医生说……我脑震荡了……我头疼，头疼啊……唉哟，我的头像要炸裂了……”说着，一串眼泪从紧闭的眼睛里流了出来。

黄宗英吞着泪水哽咽着说：“阿丹……别说了，你应该安静……好好休息。你这样……我心里……难过……”

赵丹不再说什么了，他紧紧咬着牙，拧着眉头，脸色更加苍白了。他浑身不停地在颤抖，颤抖。

“阿丹，你冷吗？还是……”

赵丹没有回答，黄宗英又给他盖了一条棉被。

在床上昏睡了两天，赵丹的头不那么疼了，可是一下床仍感到眩晕。早上黄宗英进“牛棚”以前，总要嘱咐他好好休息，不要忘了吃药；晚上从“牛棚”回来，总要给他量量体温，问他想吃点什么……

有天早晨，起北风了，天特别冷。路边的积水结着冰，寒风吹在身上，感到透心的凉。黄宗英在“牛棚”里为夜班工人絮棉大衣。猛然，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看牛”的老工人小胖。他操着浓重的苏北口音说：“黄宗英，你也不要心急，赵丹去吃‘人民食堂’啦，你跟小把戏……”

“人民食堂？”黄宗英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后边又闯进来两个造反派：“黄宗英出来！”

黄宗英放下手里的棉花，抖了抖身上的棉絮，默默走出了“牛棚”。她以为又要提审或批斗。

“黄宗英，你回家去！”造反派一前一后押着她。

黄宗英心里一惊，大白天回家，比提审、批斗吓人。家里出什么事啦？又抄家了？小孩子又被当“狗崽子”揍了？阿丹出事了？……不，他还在床上起不来哪……

黄宗英惶惶不安地走进了家门，家里意外的静，白发苍苍的老保姆探了个头，就被申斥回去了。

“黄宗英，你放明白点！赵丹罪恶滔天，我们对他已经采取了进一步的革命措施啦！公检法把他铐走啦！现在你给他收拾铺盖！”

一刹那，黄宗英的脑子断电了。她没有想到灾难会这样突然临头。既然是这样，一切就听天由命吧！黄宗英旋又变得异常冷静，冷静得使她自己也感到奇怪。

黄宗英迅速找出绳子、被单、棉被、毛裤、毛袜……一切能御寒的衣物，她把这些衣物一层层一件件摊在地板上。两个造反派，一个墙角站一个，叉着腰，催促着。

黄宗英跪在地板上，麻利、有劲地捆紧了行李卷，连大气也不喘。仿佛她多年奔波，上山下乡，就为的“演”好这场送夫进监牢的“戏”。

当她收拾阿丹床头的药片、药水时，两个造反派已经拖着行李卷，瞪瞪地下楼了……

黄宗英心里明白，看来阿丹短时间是不会回来了。阿丹啊，阿丹！她担心阿丹又要吃苦了。

这一夜，我几乎没有睡，眼前总浮现着阿丹的影子。

窗外的寒风在嘶叫，那声音不仅凄凉，而且恐怖，使我想到了地狱和魔鬼……

阿丹，你被抓到哪里去了呢？

不管你在哪里，都应该想办法给家里捎个信儿啊！

噢，也许看管得很严，无法捎信儿，也不许捎信儿，那就没办法了。记住这一天吧，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

阿丹，你是个乐观的人，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应该坚强，只要坚强，就能战胜一切，包括死亡……

第二天，我想在电影厂打听一下阿丹的下落，可是在“牛棚”里能向谁打听呢？

王丹凤悄悄地问我：“宗英，你怎么了？脸色那么难看。”

我低声地告诉她：“阿丹昨天上午被抓走了。”

“抓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

王丹凤十分惊讶，还强装平静地安慰我说：“宗英，别着急。我想不会怎么样……”

我长长叹了口气，竭力忍着要流出的眼泪。……

赵丹被抓走后，一直没有音信。黄宗英在焦急、忧虑和孤寂中等待着……

赵丹在哪里呢？

他难道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失踪了吗？即便是坐牢、判刑，甚至判死刑，也该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啊，赵丹，可怜的赵丹！

那天赵丹被抓走以后，一上汽车就给他蒙上了眼睛，耳边的风声在响，汽车飞快地狂奔……

要到哪里去呢？为什么要蒙眼睛？难道要处死我吗？……赵丹恐惧不安地在想。当汽车停下来以后，他被推进了一间狭窄的地牢。解开蒙眼布一看，潮湿、阴暗的墙壁，昏暗、清冷的电灯，一堆散发着霉味的稻草……

啊，从那天起，赵丹就被关在这座分不清白天，也分不清黑夜的地牢里，像一具活着的尸体，与这个世界隔绝了。这是什么地方？赵丹不知道，黄宗英更无法知道。

随着所谓的革命高潮的掀起，对“牛鬼蛇神”的全面专政更严厉了。黄宗英每天在“牛棚”里写交代，写旁证，认识自己的“罪恶”，随时都可被拉出去受审或批斗。这不仅是对人的污辱，也是对人的的一种残酷的折磨，当然，这种折磨是具有创造性的，只有在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才能产生。

这样的生活是痛苦的，这样的生活是可悲的，可是黄宗英渐渐地适应了，而且觉得自己是对人民犯下了“罪”，尽管这个“罪”像远山的云雾那样迷蒙，那样疑惑……

黄宗英和上官云珠、王丹凤、白穆同关在一间“牛棚”里，有一天造反派叫他们学习林彪伙同江青搞的那个臭名昭著的“文艺座谈会纪要”。

白穆悄悄地说：“你们瞧，这第十条重新组织文艺队伍里没咱们的份儿。”

王丹凤又看了一遍，一声也不响，倒吸了一口冷气：“真格，没提到旧社会过来的文艺工作者。”

黄宗英不相信，拼命翻着自己的学习摘记，说：“不会的，不会的，四卷里头，毛主席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艺人，历来有政策……”

“书生！”白穆把黄宗英的话打断了。

王丹凤闪着一双含泪的大眼睛，望望白穆，又望望黄宗英，难过地说：“如果我们真是妨碍了社会主义，批斗我，打倒我，也是情愿的。”说完，她又继续踏起缝纫机缝补。

看着王丹凤熟练地踏着缝纫机，黄宗英想：也许这就是她今后所能希求的“出路”了。我呢？我的出路呢？黄宗英不愿再想下去了……

上官云珠被带出去很久了，为什么还没有回来呢？王丹凤有些担心地说：“宗英，上官不会出什么事吧？”

“我想不会……”黄宗英尽管这样说，可是心里也不踏实。现在的命运都掌握在造反派的手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什么事都难预料。

“牛棚”里沉默了，沉默得有些怕人。

窗外，高音喇叭的吼叫压过了单调的缝纫机声，我们谁也不说话，却都在为上官担心。

又过了很久很久，上官回来了，她低着头，坐在凳子上，一动也不动。夕阳费力地穿透糊得厚厚的、抹着横七竖八墨痕的窗上的纸层，映照在上官的身上。我突然发现她混身在颤抖，冻得发紫的嘴角边有一丝血迹。是又剧咳过吗？是病了？还是冷？难道……

我小声问她：“上官，怎么啦？为什么去了这么长的时间？”

上官云珠不答话，好像没听见我说什么。王丹凤急忙给她倒了一杯热开水，她不喝，连看也不看。

我又着急地问：“你怎么啦？为什么不说话？”

上官云珠还是不答话。

我当时不知道她又遭毒打了，只当是勒令她不许和任何人讲话，只当是病重夺去了她说话的能力，便安慰她说：

“上官，你别怕！快下班了，没人来，你就可以回家了。你哪儿不舒服，告诉我们，你说话啊！”

“……”她，似乎根本没听见。她，又像在恍惚中苦思。只见她那惨白呆滞的脸上，半点表情也没有，像一座石膏像；只有一滴冷泪，从她那冰雪般的面颊上，冷冷地流落下来……

离开“牛棚”回家的时候，我发现上官仍然恍恍惚惚的，瘦弱的身體在寒风中飘摇，随时都可能倒下去。唉，连走路都走不稳的病人，还要这样折磨她……

上官这个样子，还能走回家吗？

这时，牛犇正走过我的身边，我便悄悄地对他说：“牛犇，你快送送上官吧，远远跟着她，一定要看着她进家门”。

牛犇点了点头，放慢了脚步跟上去了。

第二天凌晨，上官跳楼了，悲惨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因为她交代不出是战略特务的材料，也不愿再次遭毒打……

后来，听说上官死的时候，仍穿着那件她喜欢的绿色的薄花呢衣服，围着一条洁白的丝围巾……

粉碎“四人帮”以后，黄宗英曾写过一篇文章《星》，悼念被迫害而死的上官云珠。这篇文章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社会上曾争先恐后地传阅。

黄宗英为什么要写《星》呢？

我实在没想到建国二十八年后，我会哭肿了眼睛去写《星》，用我的笔去悼念屈死的亡友上官云珠。写这篇文章，是在全国电影界揭批“四人帮”大会期间，我听说平反昭雪的名单里没有上官云珠的名字。我越想越伤心，越想越生气。她该死吗？！难道来自旧社会的演员，无论经过怎样的努力，做出怎样的贡献，被残害致死也不得清白吗？

我立即提笔边擦泪边写，一口气，一天一夜写成。我和上官云珠同一年走向舞台，我写的是亲眼所见，切身所感，几十年酸甜苦辣、冷暖饥饱，扎心撕肺的痛苦，将泯灭而复燃的期望一起涌来……

我真希望今后再也不写、永远不写这种伤透了心、蘸着血和泪的文章。岁月在动乱中流逝。

冬天过去，迎来的是春天里的冬天……

干部、知识分子下“干校”走“五七道路”，青年学生“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解放军带着“红宝书”走出军营“支左”，“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再加上鞭炮声中的“最新指示”、紧急下达的“一号通令”……像狂飚，像暴风雪席卷辽阔的大地。

黄宗英一家的生活更困难了，扣发了赵丹和黄宗英的工资，靠那一点点“生活费”怎样维持最低的生活呢？赵橘、赵佐、赵劲、周民、周伟，五个孩子正在长身体，青菜、萝卜、咸菜、豆腐……怎能满足他们的营养需要？老保姆雪珍孃孃只好买点便宜的小杂鱼或青螺蛳当荤菜，给全家改善生活。可就是这样，钱也不够用。好心的孃孃只好拿出自己的积蓄来补贴，维持这个可怜的家庭。

黄宗英的女儿赵橘中学毕业了，这个“牛鬼蛇神”的子女聪明、懂事，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里，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于是她报名去黑龙江“插队落户”了。

女儿要走了，黄宗英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她故意装出很平静的样子，忙着为橘子准备行装。北方的冬天是很冷的，想给女儿做件新棉衣又没有钱，只好补补缝缝翻了件旧的，棉衣虽旧，母亲的爱总是温暖的。

灯下，望着熟睡的女儿，黄宗英心疼地吧嗒吧嗒掉眼泪；女儿长这么大，从没离开过家，现在就要孤零零地去黑龙江了，她能受得了吗？……

赵橘也怕妈妈难过，她不敢多和妈妈讲话，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在妈妈面前流泪。离家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她理解妈妈的“平静”，也理解弟弟们的“沉默”，更理解孃孃的眼泪……多少次深夜里她蒙着头，咬着衣角吞着自己的苦泪，让颤抖的心和颤抖的灵魂坚强起来，可是她毕竟是个孩子，从没离开过妈妈的孩子啊！

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听到传闻，说赵丹死了，甚至还有人看见把赵丹抬进了广慈医院的太平间……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赵丹失踪了几年，活不见人，死不见鬼，难道真像传闻的那样……唉，不可不信，也不可轻信。黄宗英看到孩子们在哭，心不停地颤栗。经过两天的苦思，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她叫赵橘到电影厂找工宣队，要求去黑龙江之前见爸爸一面，协助组织“政策攻心”。

经过多次请求，总算答应了赵橘探监。这说明赵丹还活着，只要人在，黄宗英的心里就踏实些了。

盼啊，盼啊，终于盼来了探监的日子。

赵橘被带到一个偏僻、阴森的地方，在一间破旧的房子里等着见爸爸。

突然，她听到门外有纷乱的脚步声。当两个解放军战士押着赵丹进屋的时候，女儿已经不认识爸爸了。只见一个瘦弱、干瘪的老头，弯着背站在面前，苍白透黄的脸上长满了胡子，深陷的眼窝里目光迟钝，失去了一切反应……

“橘子！我的橘子！……”

“爸爸！爸爸！……”橘子终于认出了赵丹，失声地喊着，可是她不敢多往前走一步，怕被人赶出去。

“你妈妈好吗？”

“好。”

“哥哥、弟弟们好吗？”

“好。”

“嬢嬢好吗？”

“好。”

赵橘使劲咬着嘴唇，怕哭出声来。

赵丹沉默了，他知道女儿只能回答好、好、好……不这样回答又怎样回答呢？

赵橘定了定心，说：“爸爸，我要去黑龙江插队落户了，今天来看看你……你要知道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要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问题……瑞芳阿姨、千里伯伯都回家了，你也要争取早日回家……我们都盼着……你……”尽管是背着这些早就准备好的话，背到这里赵橘感到胸口闷塞，脑子空白，再也说不下去了。

时间到了，两个战士要押着赵丹走了，赵橘张着颤抖的嘴吐不出一个字，只感到浑身发冷，身上的血似乎凝固了。

这时，赵丹颤微微地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小包东西，递给了赵橘：“橘子……你要去黑龙江了，爸爸没有什么好东西送给你，这是几块糖……买牙膏当零钱找回来的……你，你拿去……”

赵橘看着那几块潮解、溶化的糖块，流着泪说：“这糖……你留着吧，你比我……更需要……”赵丹被押走了。赵橘捧着爸爸留下的那包糖，失声地痛哭着……

阿橘回来了。

我见她眼睛哭得红红的，便问：“看到爸爸啦？”

她点点头。

“爸爸好吗？”

阿橘扑到我的怀里呜呜地哭起来了。我的心也让她哭乱了：“爸爸怎么啦？快说啊……”

“爸爸还好……就是老了许多，我都认不出来了。这是他送给我的糖……”阿橘说着拿出了几块糖。

望着这几块已经溶解的糖，我的心都要碎了。听说在牢里每月只发三元钱……这几块糖是能够维持生命的呀！我的眼泪再也抑制不住了。孩子们看到我和阿橘在哭，他们也哭起来了。哭吧，在家里哭吧，也许这是我们唯一的自由。

天黑下来了，窗外的风在呼啸，我感到心里很冷，冷得有些发抖。

阿丹，知道你还活着，我是多么高兴啊！再难，再苦，你都应该咬着牙坚持，当然，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我相信你会坚持的！

阿丹，阿丹啊！我如果能见你一面该多好啊，可是，这是不可能的……

孩子们一个跟一个“插队落户”了。

周民到江西去了，周伟到内蒙古去了，赵橘到黑龙江去了。家里只剩下了年纪还小的赵佐和赵劲。

黄宗英仍在“牛棚”里挨批、挨斗。有一次在批斗“牛鬼蛇神”的大会上，造反派勒令黄宗英指挥“牛鬼蛇神”唱“牛鬼蛇神歌”。

一大排“牛鬼蛇神”紧张地看着黄宗英，黄宗英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她不愿意指挥大家唱这种歌，可又不敢违抗勒令，怎么办呢？

“黄宗英，快指挥！”

“黄宗英，听见没有？你聋啦？”一声声威逼和斥责震得头嗡嗡直响。

黄宗英想不出别的办法了，只好领着大家唱。

一群“牛鬼蛇神”在黄宗英的指挥下，调不成调，声不成声地唱了起来：

我们是牛鬼蛇神，

我们是牛鬼蛇神……

这哪里是歌声，这是嘶叫，这是哭喊，这是污辱，这是摧残……

黄宗英受不了啦，她发疯似地大哭起来，“牛鬼蛇神”不唱了。造反派也呆了，他们气势汹汹地把黄宗英臭骂了一顿。批斗大会还没开始，就闹了这样一场哭笑不得的闹剧，“牛鬼蛇神”也不知如何收场。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拿出当演员的本事，放声地哭起来了。这一哭，还真哭出了预期的效果，虽然挨了一顿臭骂，毕竟不再唱那个“牛鬼蛇神歌”了。

我想，我的伙伴们知道我在演戏，他们内心里一定是感激我的……

如今，那个歌我已经忘了，有机会，我真想重新学会它。再唱它的时候，我一定还会哭，不过，那绝不是演戏了……

后来，黄宗英被送到干校监督劳动去了。她种过大田，也种过蔬菜，还当过炊事员。不管干什么，她样样都行，而且还干得挺出色。插秧她从不掉队，割稻她最先割到地头。别人挑八十斤稻，她能挑一百斤，别人挑稻时能换肩，她也能换肩。尽管还是“专政对象”，可是人们都佩服她。渐渐地冷眼少了，少了，可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不会解冻的。

田埂上的蒲公英开花了，那金黄色的小花笑盈盈的，告诉人们春天又来到了人间。

大自然是善良的，它不懂阶级斗争，也不搞全面专政，对黄宗英这样的“牛鬼蛇神”，它同样给予温暖，给予爱。

望着一朵朵蒲公英花，黄宗英又想起了阿丹，他在牢房里是看不见这金黄色的小花的。如果这田埂上的花能开在他的梦里，阿丹也一定会感受到春天的温暖和生机。

可是，这蒲公英花还没开在赵丹的梦里，春天就过去了。赵丹仍在牢房里写着永远也写不完的交代，他还不知道“四人帮”中的王洪文曾在上海的一次专案会议上下过密令：赵丹可以杀，如果不宜公开枪毙的话，就在关押中把他慢慢搞死……

看来，等待赵丹的只有死亡了！

春天过去了，第二个春天又来了，满眼都是大自然的绿色。可是黄宗英的心中仍然积着冰雪，染不上一点春色。

赵丹仍没有消息，难道他死了吗？黄宗英不敢再想下去了。是啊，徐韬跳钱塘江了，顾而已悬梁自尽了，郑君里死在牢里……阿丹能熬过来吗？

黄宗英最了解赵丹，她确信如果没有人下毒手，赵丹是不会死的，无论遇到什么迫害和折磨，他都能坚强地活下去。因为一个艺术家是永远热爱生活，不愿离开自己的事业的。

由于周总理的关怀，黄宗英突然被“解放”了，成了一名脱胎换骨的“革命群众”，接着又为她“落实政策”。在“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日子里，这是一个很大的喜讯。黄宗英感到塞在胸口的浓云消散了，心中的冰雪也开始融化了。

暮春的早晨，邻居家的一树樱花在淡淡的阳光下，开始凋落，一片又一片的花瓣像残雪，落得让人有些说不出的悲凉。

黄宗英家的院子里，走进来一个步履迟钝的老人，瘦弱的肩上扛着一小卷行李，他踏着斑驳的树影，一步一步地走着，显得那样疲惫，那样衰竭，仿佛走了很长很长的路，是从另一个世界走来的……

这个可怜的老人，一上楼梯被阿劲发现了。仔细一看，阿劲惊喜地叫着扑了上去：“爸爸！爸爸！”

赵丹丢下行李，紧紧拉着儿子的手问：“你……你是阿佐吧？”

“我是阿劲！阿劲！”

赵丹的嘴唇在颤抖，却说不出一个字来，大颗的泪珠流在苍老、失去血色的面颊上。

黄宗英听到阿劲的喊声，急忙奔出来，把赵丹扶进了屋里。赵丹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没有一点表情，目光暗淡而阴郁，直愣愣地望着黄宗英。

“阿丹，阿丹……”黄宗英轻轻地叫着，不断用手帕擦着泪水。“你回家了，回家了……别用这种眼神看我们，阿丹，你听见了吗？”

赵丹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慢慢低下了头，像一座没有知觉、没有反应的雕像。

阿丹在被单独监禁了五年多之后，从冤狱中回来了，他能活着回来，就是不幸中的大幸。五年，是多么漫长，多么难熬的日子啊！

当他坐在他常坐的沙发上，显得那样不自然，也许这沙发他已经感到陌生了。是啊，沙发早已旧了，破了，蒙着碎布拼的布垫。在阴暗潮湿的地牢里，他根本不可能想到自己家里的沙发。

我常常看见他笔直地坐着，眼睛发愣，喘着大气，说话还下意识地起立，声音倒不小。我知道，这是狱中的生活把他折磨成的习惯。唉，一个快乐、活泼的艺术家，竟变成了这样，我怎么能不惋惜和心酸呢？！

孩子们见爸爸这个样子，都躲在后楼小屋里哭，说：“爸爸完了，不可能再演戏了。”

半夜里，我被他的自言自语、自问自答惊醒了，我不敢打岔，不敢开灯，以为他在梦呓。等他安静下来时，我问他：“阿丹！阿丹！你睡着了吗？”

“没有，我没睡。”

“那……，你想说话，就把我或孩子们叫醒说吧，别自己跟自己说话，怪怕人的……”

阿丹轻轻叹了口气答道：“习惯了，习惯了……我担心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就不能再演戏了。”

唉，还演戏？！什么时候他都想着演戏，演戏！

……又一夜，我问他：“你是怎么活过来的？”

“我想戏，没人打扰我时我就想戏。齐白石的电影剧本，在我脑子里已分好镜头了。山坡下，奔泉、溪流、牛群，小白石……当然，还想着演鲁迅、李白，还有阿Q、黄三省，《日出》里的黄三省……”

“不许你再演监狱里的戏！”我打断他，“不许！”

“好，不演了，不演了！其实，我知道，‘他们’不会让我再露面了，我现在并没有自由。”

“阿丹，别说了，我知道……”

回到家的第三天，阿丹的模样、肌体才松弛了，像是坐在自己家里了。他入狱时孩子还小，如今孩子们窜得比爸爸还高。阿丹看着孩子们的大脚大鞋，笑啊，笑啊……

铁窗、单独监禁，种种威吓和残酷的折磨，都夺不去他活泼泼的生命力。他提笔画了一幅千峰万壑锁不住的瀑布清泉，题诗：活泼泼地出山来。

啊，任凭千难万阻，还是出来了，出来了！

一九七五年的春天，黄宗英离开了干校，来到上海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工作。分配她的任务是阅读群众来稿。她工作得很认真，常常带着一大摞稿件回家加班。从前她是一个爱说爱笑的人，如今她变了，变得很少讲话，只有她微笑的时候，还和从前一样，能使人想起她活泼、开朗的性格。

一天晚上，江西的一个作者胡春潮，找到了黄宗英的家里，十年不见了，黄宗英都不敢认他了。

胡春潮高兴地说：“黄大姐，咱们的电影要上演了，叫《决裂》，不知为什么轰得那么厉害……”

“那是你们写得好。”黄宗英说。“如果要知道是我写的初稿，就该是毒草了。”

“为什么？为什么黄大姐写的就是毒草？”胡春潮疑惑地睁大了眼睛。

黄宗英平静地答道：“为什么？……别问了，我也说不清楚。”

是的，黄宗英是说不清楚。她只记得一九六五年五月来到南昌市，和胡春潮、周杰一起写反映劳动大学生活的电影剧本。后来，天热了，她转移到庐山上写。住在山上的一幢别墅里，她只知道下山吃饭的路，没有心思去领略这个著名的风景区。当初稿写完的时候，突然接到长途电话，叫她立刻回上海，参加青年艺术家代表团，去抗美援朝前线……

这个电影剧本，她已经遗忘了，真没想到竟又拍成了电影。

啊，《决裂》，是怎样的一个决裂呢？黄宗英在心里画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粉碎“四人帮”以后，江西曾派人找我外调，问这个电影剧本是谁写的？

我说：“《决裂》是我写的初稿，后来变化也不大，有什么问题，是我的责任。”

他们要我写书面材料，我就写了。以后再也没来找我，我不知道胡春潮和周杰是不是为这个电影吃了苦头，可我一直想着这件事，如果他们真的吃了苦头，我是很内疚的……

黄宗英来到出版社不久，工宣队就叫她去江苏省宿迁县体验生活。去多久？工宣队没有说明，让她做长期准备。还告诉她，为了体验生活方便，到县里以后要叫她代职……

黄宗英匆匆忙忙准备了一点行装，工宣队便派了两名队员，将她送到了宿迁。

当她踏上宿迁的土地，望着一眼看不到边的田野，感到十分亲切。虽然没有绿茫茫的青纱帐，也没有吐着红穗的高粱，黄宗英却想起了河北宝坻县的田野，想起了和邢燕子、侯隽在一起生活的情景……

黄宗英没有想到，她在宿迁县报到以后，扛着行李去住处的时候，两个

工宣队员对县委的干部说：“黄宗英是文艺黑线上的人物，这次送她下来，是进行劳动改造的，希望对她要严格……”

“刚才你们不是说来体验生活的吗？怎么又……”县委的干部有些懵了。

啊，黄宗英又一次被愚弄了……

伤逝

一九七六年十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了，长达十年的动乱结束了。人民又一次得到解放，辽阔的中华大地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

黄宗英从宿迁赶回上海，欢庆党的胜利，欢庆人民的胜利！马路上，到处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人们举着小彩旗，高呼着口号，形成了一条条欢乐的大江。

黄宗英回到家里，却见赵丹闷闷不乐地坐在沙发上，她感到十分惊异：“阿丹，你怎么啦？”

“……”

“阿丹，你……”

赵丹抬起了头，目光里燃烧着怒火：“他们不准我参加游行队伍。”

“为什么？”黄宗英不解地问。

“为什么？……他们说我应该明白，可我偏偏不明白，不明白！”赵丹气得直喘粗气。

“阿丹，你要冷静些。”黄宗英含着泪安慰着他。“这样生气，对身体没好处。庆祝胜利，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

可赵丹怎么能冷静呢？十年来，他挨批斗、坐牢、监督劳动，受尽了种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终于盼来了这个狂喜的日子。可是他拿着小彩旗要参加游行队伍时，却被赶了出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难道深受“四人帮”迫害的赵丹，没有欢庆胜利的权利吗？难道深受“四人帮”摧残的赵丹，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对象”吗？

不久，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揭批江青一伙的大字报中，揭开了这个谜。有一张大字报说：赵丹和江青有私情，他们一同去新疆，赵青就是江青所生……

啊，真卑鄙！真无耻！造谣造得这样离奇，荒唐得不能再荒唐了！赵丹又气又好笑，他对黄宗英说：“旧的冤案还没平反，新的冤案又加给我了！这些人要干什么呢？难道一定要把我阿丹置于死地吗？”

“你结识江青的时候，她正和唐纳热恋；叶露茜生赵青的时候，当年报上有报道；江青去延安的时候，你还没去新疆呐……让他们造谣去好了。”黄宗英虽这样说着，可也气得心里直发慌。

谣言总是谣言，事实总是事实。随着“清查”运动的深入，赵丹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平反。党籍恢复了，工资补发了，他又做为一个自由的人，一个共产党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迎来了浩劫之后迟来的春天。

春节到了，这是阿丹平反后的第一个春节。

我和阿丹应邀参加了对台湾同胞的电视演播，阿丹在屏幕上扮演了鲁迅，他亲切、和蔼地来到了电影演员中间，操着绍兴话说：“我怎么跑到电影界来了呢？大概是因为我写了《阮玲玉之死》吧……”

我和王丹凤演出了诗朗诵《台湾姐妹》，表达了一对姐妹的隔海思念、骨肉之情和渴望祖国早日统一的愿望……

春天来临了！

文艺的春天也来临了！

作为一个电影艺术家，赵丹再也闲不住了，他想导演《八一风暴》，又想演《闻一多》、《残雪》……可是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未能实现。

后来，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大河奔流》，特约赵丹扮演周恩来总理。

于是，黄宗英陪着赵丹来到了北京。

《大河奔流》中，有关周总理的戏不多，可赵丹为了在银幕上创造好周总理的形象，花了不少心血。样片拍出来时，不仅形似，而且神似。摄制组的演职员都说赵丹演绝了。可是，影片正式开拍时，又不让赵丹扮演周总理了。赵丹简直气得要发疯了。他满腔怒火质问有关的负责人：“你们请我来演周总理，为什么又不让演了？”回答的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让人啼笑皆非。

后来，好心的同志把真实原因悄悄告诉了黄宗英，她气得浑身发抖，泪水在眼眶里直滚……

回到住处，我仍在生气。

可在阿丹面前，我又不愿意表露出来。为了叫阿丹知道不让他演周总理的真正原因，我反复考虑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告诉他。

“阿丹，我知道不让你演周总理的原因啦。”我异常平静地说。

“你怎么知道的？”阿丹有些惊愕，“快告诉我……”

“那你不要生气。”

“好，不生气。”

“阿丹，因为又有人提出你和江青的关系，说赵丹演总理合适吗？……”我停了一下接着说，“真没想到，现在还有人提出这样荒唐的问题……”

阿丹气愤地骂道：“简直是混蛋！”

“这种无中生有的谣言，竟然有这样大的威力，其实，在旧社会演员之间即使……”

“什么‘即使’，根本没有这个‘即使’！”阿丹怒不可遏地打断了我的话，大声地咆哮着，“这是污蔑！这是污蔑！”

我发现阿丹气得脸色变青了，便安慰他说：“阿丹，冷静点，你不是答应不生气吗？……”

阿丹沉默了，在痛苦的沉默中，他流泪了……

黄宗英陪着赵丹回到了上海。愤怒与痛苦仍折磨着他们。赵丹从三十年代开始演戏、演电影，从来没遭到过回戏的情况。现在，由于一个毫无边际的谣言，竟把赵丹的戏回了。这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比在牢房里受刑更使人感到痛苦和忧伤。

看着赵丹吃不下，睡不好，人明显地瘦了，黄宗英心里很难过。她决定立刻动笔为赵丹写个电影剧本——《闻一多》。如果这个剧本能拍摄，赵丹心灵的创伤也许会能减轻些。

正在赵丹极其苦恼的时候，画家富华来了，他高兴地对赵丹说：“阿丹，咱们到柳州画画去吧，柳州市委书记黄云同志特别邀请你去。那儿气候好，景色好，一定能画不少画。去吧……”

黄宗英一听，也很高兴，说：“去吧，阿丹！我陪你一道去。”

赵丹看看富华，又看看黄宗英，点着头说：“去吧，咱们去吧！”

于是，黄宗英陪着赵丹到了柳州。

我们在柳州受到了热情的款待。

已经是岁末了，这儿满眼还是翠绿，犹如江南的春天。那一棵棵老榕树、那一片片芭蕉林，向人们展示着蓬勃的生机。

我们在柳州住了四十多天，阿丹竟作了两百多幅字画。他高兴地说：“我在柳州获得了第二次艺术青春！”

如今，在柳州都乐风景区的岩右上，刻下的阿丹的那四个大字——“天下都乐”，就是他在怡宾楼写下的。

在柳州，我写完了电影剧本《闻一多》，阿丹的好友、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导演王为一，准备拍摄，并决定请阿丹主演。没想到这部影片因某种原因也下马了。

啊，一个电影艺术家，想演个戏怎么这样难呀！一次次渴望，竟都成了泡影、成了失望。

遗憾，多么痛心地遗憾啊！

黄宗英和赵丹回到上海的时候，柳枝刚刚泛青，风吹在身上仍然很冷，但春天毕竟来了，再冷也冷不了几天了。梅花开得正好，杜鹃已经吐蕾了。

赵丹整天在家里看书、画画。为了自慰，他激奋地画了一幅雨中的白芍。只见那盛开的花朵，舒展着洁白的花瓣，像在憧憬，又像在沉思。风雨袭来，它是那样的迷茫，又是那样的倔强，仍吐露着自己的芬芳。然而，那花瓣上却有不少雨珠在闪亮。不，也许是泪珠……

赵丹在这幅画上题了一首诗：

一生多蹉跎，
老来复坎坷，
不羨大富贵，
泼墨写白芍。

黄宗英最能理解赵丹的心情，她看着这幅画和画上的题诗，心里一阵难受，眼里立刻涌满了泪水。

当杜鹃开花的时候，日本电影演员栗原小卷访问中国，并要到上海来看望赵丹和黄宗英。为了热情、亲切地迎接栗原小卷，黄宗英忙着给她做中国式的缎子棉袄，赵丹忙着给她画画。

赵丹画了一枝开得正艳的桃花，有四只燕子在花枝间飞翔，象征着春天的美好，友谊的珍贵……画完了，他挂在墙上，眯起眼睛看了又看，突然他觉得画面太挤，燕子画多了，于是决定重画。

正在他重画这幅画的时候，我闯进了他们家中。看到两幅画我有些惊异：“两幅画怎么几乎一样啊？”

赵丹笑而不答。

黄宗英忙说：“那张燕子画多了，他又重画。”

我一看，可不是，四只燕子变成两只了，便说：“阿丹，两只燕子的好看。这是送给谁的？”

“准备送给栗原小卷。”赵丹答道。

“阿丹，你早就答应给小姜一幅画，就把那张有四只燕子的送给他吧……”黄宗英递给我一杯水。

“我不要，那是阿丹画坏的。我要阿丹给我画水仙花，就画你桌子上的那盆水仙花。”我固执地说。

“你先把这张画拿去。”赵丹说着挥起笔在画上写上了我的名字。“以后再给你画水仙。”

“说话算数？”我故意调皮地问。

“当然算数！”赵丹会心地笑了。

阿丹没有给小姜画水仙，他不是失约，而是来不及画了，匆匆地离去……去年春节吃年夜饭的时候，我书桌上的那盆水仙花开得正旺，满屋子都

是它的清香。

我对小姜说：“你看，这不是阿丹送给你的画吗！”

桃花开了。

梨花也开了。

又一个明媚的春天，来到了美丽的江南。

一九八一年四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第二文学编辑室邀请了十几位作家去南汇县果园公社参观。黄宗英和赵丹也应邀参加了这次活动。

他们来到果园，漫步在桃花丛中，梨花树下，显得十分高兴，人也变得年轻了。赵丹在小本子上画了许多素描，有桃花，也有梨花，还有欢跃在枝头的小鸟……

中午吃饭的时候，黄宗英从挎包里拿出了一瓶中国红葡萄酒，赵丹不知从哪里掏出了两只很小的蓝花酒盅，请大家喝酒。

下午，要回上海的时候，赵丹和黄宗英对这片一眼望不到边的花海非常留恋，像贪玩的孩子久久不愿离开。

赵丹说：“桃子熟了的时候，还应该再来。”

黄宗英说：“最好能在这儿多住些日子，好好写写果园。”

“去年秋天，我在这儿住了两个月，正是收梨的时候，日夜都在忙，可有意思啦。”我边说边指着河对岸的一片梨林，让黄宗英看。“如果在那儿给阿丹盖间房子，让他静心地写字、画画该多好啊！”

赵丹笑了，笑得那样开心：“如果这儿真有我的房子，我一定来……不过，我还是想演几部戏，因为我是演员！”

黄宗英笑着把话接了过来：“那就等退休了再来吧，不管什么时候来，我都愿意奉陪。”

说得大家都笑了。

临上车的时候，果园的友人采了一大枝桃花，送给了黄宗英。

黄宗英很喜爱这枝花，可是又有点心疼：“这么多花，能长不少桃子哪，可是……”

“没什么，您是远道来的客人，我们要请还请不到哪，送枝花表示一下我们的心意！”果园的友人真挚地说，“欢迎你们再来。桃子熟了的时候来吧，我们的水蜜桃还出口哪，梨也有名气。”……

从果园回来不久，阿丹常常感到胃痛。我催他去医院看看，他总是无所谓地说：“没事儿，没事儿……”后来去医院看了，吃了些药，并没有明显好转。

这时，我有些担心，阿丹年纪大了，前几年在牢里又受了那么多的摧残，万一生了重病……于是，我跑到华东医院和医生商量，决定叫阿丹住院检查。

阿丹住院以后，胃里没查出病来，可是他上腹部的疼痛加剧了，食欲越来越差，脸色也显得苍白。可阿丹还像没事儿一样，每天不是修改书稿，就是画画、写字。医生叫他多休息，他也不听。我急得要发脾气，他却像孩子似的瞪着眼睛朝我笑。

医生查病房时，告诉阿丹，准备进一步给他做全面检查，问他还有什么要求？

阿丹望着医生，诚恳地说：“我是个演员，可是将近十五年没上银幕了。近年来，想拍的电影也不能如愿。唉，我阿丹命苦啊！我别无他求，只希望给我快点检查，没什么大病我就早点出院，再去拍几部电影……”

我看到阿丹眼里闪着晶亮晶亮的泪光，心里一阵酸楚，不敢再听他说下去了。

是的，阿丹命苦，阿丹命苦啊！……正在赵丹住院期间，中、日两国的电影艺术家，要合拍一部故事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影片里的中国棋王况易山，拟请赵丹饰演，况易山的妻子，拟请黄宗英饰演。当赵丹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汪洋同志的邀请电报时，特别高兴，他激动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医生，并要求尽快出院，去黄山修改剧本。医生微笑着对赵丹说：“你现在还不能出院，需要在这里……”

赵丹一听急了：“为什么不能出院？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拍片机会，我不能错过。”

“阿丹，你不能出院，真的，不能出院！”医生亲切而又严肃地说，“希望你能听我们的话……”

医生的态度这样坚决，这是赵丹没想到的，他好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我不能出院，是不是生癌了？……如果能手术赶紧给我手术，如果不能手术，我立刻就出院，能拍完这部片子也好……”

“你不要想得那么多，你的病还要进一步检查。能出院，一定让你早点出院。我们还等着要看你新拍的电影哪！”医生笑着安慰他。

其实，经过住院检查和专家会诊，赵丹的病已明确诊断，他患的是胰腺癌，而且已是晚期。

当医生将这一切告诉黄宗英时，黄宗英显得异常镇静，她轻轻咬着嘴唇，眼里含着泪水，一句话也没说。是的，这样的结果她曾不止一次地想到过，今天医生告诉她了，这是意外的，也是意料之中的。阿丹的命太苦了，实在是太苦了，连癌症这个恶魔也不肯放过他。

黄宗英擦了擦眼泪，对医生说：“请不要把诊断告诉阿丹，他实在可怜……”

“那你的情绪要稳定，否则……”

“我知道，我知道！”黄宗英爽快地说着，心里在想：我又要在生活里演戏了，只是这个“角色”太难演了。阿丹，在你的病房里演戏，我是缺乏信心的，但我又不能不演，生活对我们为什么这样残酷啊？……

赵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剧烈的疼痛日夜折磨着他，脸色更加苍黄，身体更加消瘦，目光也变得黯淡、迟钝，他几乎不能下床了。

华东医院决定送赵丹去北京医院治疗。据说，那儿有“正电子加速器”的治疗，对晚期的癌肿有一定的疗效。

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装，我和赵佐决定陪阿丹去北京。那天天气特别热，一点风都没有，呼吸着热乎乎的空气，像要窒息一样。阿丹微微张着嘴，吃力地喘息着，额上沁出了一颗颗汗珠。他显得很衰弱，轻轻地闭起了眼睛。

上飞机的时候，是阿佐抱着他登上舷梯的，在儿子的怀里，阿丹变得那么瘦小，那么干瘪，我都不敢相信阿丹竟病成了这样。望着他们父子俩，我的心都碎了。

在北京医院，阿丹得到了最好的治疗和护理，并请了许多知名的专家来会诊，期望能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可是期望毕竟是期望啊，阿丹的病情并没有好转。

一位中医说，吃荠菜可以辅助治疗，我立即给上海的小姜写信，叫他尽快地去郊区买荠菜籽寄来。我想，只要能治阿丹的病，不论多么困难，也要

想办法让芥菜长出来……

阿丹渐渐不能进食了，每天靠静脉滴注葡萄糖维持生命。这样下去怎么办呢？医生们也急得不得了，他们经过慎重的研究，决定给阿丹手术，争取最后的希望。可是在手术台上，他们看到阿丹的整个胰腺都被癌细胞侵占了，肝脏也有了转移病变。太晚了，已经无法手术了。医生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将阿丹送回了病房。

我坐在病床边，守护着昏昏沉沉的阿丹，心里有些恐慌，也有些茫然。虽然正是炎热的夏天，我却感到浑身发冷，仿佛走进了冰天雪地的冬日。

夜深了，病房里特别寂静。暗淡的灯光下，那一束束鲜花也显得十分忧伤和清冷。阿丹吃力地睁开了眼睛，用极其微弱的声音问我：“手术怎么样？”

“很好，你就放心吧！”我说得很平静，但心中一阵阵发慌，慌得头都有些晕了。

阿丹听了我的回答，又疲倦地闭上了眼睛。

这时，我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了……

赵丹已经昏迷了。

死神日夜在他的病床边徘徊，随时都可能夺走赵丹的生命。

一批批亲朋好友来看望他。

一批批新闻界人士来看望他。

一批批老观众和青年朋友来看望他。

国家领导人来看望他。

国际友人来看望他。

病房里摆满了鲜花，空气里弥漫着花香，赵丹在这缤纷的花丛中，安详地睡着……

突然，赵丹醒来了，黯淡的目光也变得明亮了。他望着黄宗英低声地说：“我们夫妻……是和好的，家庭……是快乐、幸福的。宗英，人活着或死了……都不要给别人增添忧愁。我不喜欢哀乐，我喜欢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我喜欢……鲜花……”

黄宗英默默地点着头，擦着泪水。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日凌晨两点四十分，赵丹告别了亲人，告别了朋友，告别了给他欢乐也给他痛苦的生活，向另一个世界飞去……

台灯洒着淡黄色的光线，映照着满屋盛开的鲜花，贝多芬的《英雄》第三交响乐在轻轻地荡漾……

孩子们在低声地哭泣。黄宗英吞着泪水说：“阿丹去见周总理和老朋友们了……阿丹去拍夜戏了……”

美丽的花朵低下了头，默默地致哀！

新华社向全世界报道：

中国著名电影演员赵丹，今天凌晨二时四十分因癌症逝世。……

英国伦敦主办“中国电影周”的友人，送给阿丹的花篮里的花，仍开得那么鲜艳，每朵花都含着深情送阿丹上路……苏格兰好友白霞女士，流着泪写完了特写《赵丹欢聚去了》……

日本老朋友高峰秀子，从东京带来的名贵糕点，还没有来得及起封，阿丹就匆匆离去了……

一个演员毕生塑造角色，而时代也塑造了他自己。阿丹是在知心的观众热烈的掌声和更殷切的期待中，落下生命之幕的。

几十年来，我伴着他，作为普通人，我们也有许多忧愁，经历过种种酷暑严霜。但是，作为艺术家，他自称是颇有奇福的。他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与民众一起，溶一生之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爱憎好恶于艺术之中。

阿丹曾说：“一个艺术家，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给人们以真，以美，以幸福。”他的遗言“愿天下都乐”正是他崇高的、纯洁的乐观主义精神的体现。

我希望朋友们在怀念他的时候，能接受他的美好的祝愿！

十月十四日，赵丹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火化。

没有哀乐，赵丹喜欢的贝多芬《英雄》第三交响乐《葬礼曲》响起来了，它像大海的涛声在激荡……

黄宗英两眼含着泪水，沉静地肃立在赵丹的遗体旁，她手持一朵红玫瑰花，送赵丹远行。

赵青、赵矛、赵橘、赵佐、赵劲，还有义子周民、周伟，轮流把手中的鲜花覆盖在父亲的遗体上。

赵橘还带来一个儿童玩具——会打鼓的小熊猫，送给了睡在鲜花丛中的爸爸，祝他永远快乐。

赵丹生前曾说过，不希望人们前来向他的遗体告别，但是八宝山火葬场的几十名工人自动来了，他们穿着工作服，戴着小黄花，流着泪，向这位人民艺术家告别。

《英雄》第三交响乐，在秋日的蓝天回响……

所有的鲜花，都洒满了泪珠……

十月二十七日下午，北京文艺界一千三百多人，在首都剧场隆重悼念人民艺术家赵丹。

文化部、中国文联主办的这个悼念会，是由周扬主持的，夏衍作了长篇讲话，介绍了赵丹的生平、艺术成就和他走过的坎坷道路。

夏衍怀着深情，痛心地说：“赵丹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追求真理，追求光明。他和人民心心相印，一生探索艺术的真谛。半个世纪以来，从舞台到银幕，成功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形象，使他闻名中外，成为我们引为骄傲的光彩夺目的巨星，在我国电影艺术发展道路上立下了不朽的丰碑。”……

在这个隆重、庄严的悼念会上，黄宗英激动地走向台前致词。她站在赵丹的巨幅彩色画像前，倾吐着自己的心声。这心声是饱含着深沉的爱的，这心声是溶合着晶莹的泪的，这心声也凝结着不尽的哀思……

人民了解阿丹！

朋友喜欢阿丹！

阿丹属于大家，属于银幕，属于舞台，属于画笔，属于稿纸，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属于大自然，属于未来。

此时此刻，由我来说阿丹是怎样一个人，或表示一下感谢，都是不恰当的。你们——阿丹的良师诤友爱徒，天涯海角知音，会进一步告诉我，帮助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去更好地纪念他！

赵丹离开我们了……

不，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活在人民对他的热爱中！

黄宗英说：不要为阿丹坎坷的一生叹息，坎坷是命运里最珍贵的。它能使一个艺术家走向成熟。不要为阿丹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没有留下新的

影片遗憾，遗憾是艺术中最富有魅力的。快乐的阿丹竟然留下了如此深沉的遗憾，不是更令我们怀念吗？！

赵丹病逝的第二天，我国著名的老作家巴金在《随想录》中写道：

昨天傍晚在家看电视节目，听见广播员报告新闻：本日凌晨赵丹逝世……

一个多月来不少的朋友对我谈起赵丹的事情。大家都关心他的病，眼看着一位大艺术家一步一步走向死亡，却不能把他拉住，也不能帮助他多给人民留下一点东西。一位朋友说，赵丹问医生，可不可以让他拍好一部片子后死去。这些年他多么想拍一两部片子！但是癌症不留给他时间了。我想得到，快要闭上眼睛的时候，他多痛苦。

然而赵丹毕竟是赵丹，他并没有默默地死去。在他逝世前两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在“病床上”写的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最后有这样一句话：“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他讲得多么坦率，多么简单明了。这正是我所认识的赵丹，只有他才会讲这样的话：我就要离开人世，不怕任何的迫害了。因此他把多年来“管住自己不说”积压在心上的意见倾吐了出来。

……赵丹同志不会回到我们中间来了。我很想念他。

……

黄宗英读了巴老的这篇文章，很是感动，她不知怎样表达内心的感谢。如果赵丹在另一个世界也能读到这篇文章，他一定会欣慰地笑着向巴老致敬……

赵丹逝世后，黄宗英每天都收到许多国内外的来信和来电，有的是关心她，慰问她；有的是请她去做客，怕她在家中过度地悲伤。

黄宗英读着这些来信、来电，常常感动得热泪盈眶，失去了一个亲人，却有更多的亲人关怀。在她最悲伤的时候，能得到这样深沉、这样纯真、这样炽热的爱，是多么幸福啊！

黄宗英没有沉沦在孤寂和悲哀中，她振作起精神，整理好行装，先要去杭州修改报告文学《他们三个》，然后再去山东采访，因为她要作为中国科学家、科学记者代表团成员去美国访问。

无论她走到哪里，都带着一件过去没有的东西——一间带童话色彩的小小的瓷房子，红红的屋顶，白白的墙壁，一只小白兔调皮地从窗口伸出头来张望，它好像要说什么悄悄话，而且永远也说不完……

黄宗英把赵丹的一张照片，嵌在这间小瓷房子的门上，快乐的阿丹总是朝她微笑。

黄宗英不是喜欢那间小小的瓷房子，而是喜欢那只小白兔，因为赵丹是属兔的，他是一只长着刚直的骨、快乐的筋的兔子，他是一只天真可爱的、纯洁可亲的兔子。

啊，黄宗英，在你孤寂的时候，那只小白兔都和你说些什么呢？它也会唱赵丹在电影《十字街头》里唱的那支歌吗？“哪里格哪，哪里格哪”……

啊，黄宗英，在你欢乐的时候，或是烦恼的时候，那只小白兔又和你说些什么呢？还是说“一个艺术家，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给人们以真，以美，以幸福”吗？……

啊，黄宗英，在你过生日的时候，那只小白兔会送给你美丽的玫瑰花吗？它也能挥笔给你画两只又红又大的寿桃吗？……

啊，黄宗英，在你忧伤的时候，那只小白兔会拿着手帕给你擦泪吗？它

会弹着吉他让那欢快的旋律带着你走进冰雪消融的春野吗？.....

在生活的激流中

在动乱的岁月里，黄宗英被“无产阶级全面专政”了，她的笔也被“专政”了。只允许她写“交代”，写“检查”，写“旁证”……

像夜空中的一颗星星，突然被暴风雪卷走了，卷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谁也不知道。她还能出现吗？她的文章还能出现吗？谁也说不清楚。

啊，茫茫风雪，铺天盖地……

啊，冰封千里，寒流猖獗……

但是，冬天毕竟会过去，春天毕竟要来临。当冰雪融化的时候，清凌凌的小溪就会唱着一支迎春的歌，从山里欢欢乐乐地流出来。

人们说，冬天夺走的一切，春天都会还回来（当然也有还不回来的，那是令人痛心的，令人遗憾的……）。粉碎“四人帮”以后，黄宗英和她的文章又出现了，《星》、《沧桑之间》、《天上人间》、《美丽的眼睛》、《教师进行曲》……一篇又一篇，像迎着春风开放的杜鹃花，那么清新，那么鲜艳，那么迷人！

三月，小河边的杞柳开始爆芽了，桃花已经悄悄地在吐蕾。黄宗英来到周恩来总理的故乡——淮安。站在淮河边，她想起老人们讲的故事，周总理小时候，常常沿着这条河堤，跑到乳母家去……

登上镇淮楼，望着掠过飞檐的小鸟，她会觉得是周总理童年放飞的风筝……

当晨空碧透，彩云飘逸，她突然想起周总理出访归来，乘专机飞过淮安上空时，深情地凝望故乡山水的情景……

于是，黄宗英在淮安写了散文《天上人间》，记述了人民对周总理的爱戴，表达了无限的哀思！

去年一月，周总理逝世了！当淮安人民收听到“遵照周恩来同志生前的遗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时，人们日日夜夜守望长空，看到飞机过境，目光就跟着机翼翱翔。他们坚信，周总理的骨灰会撒到诞生他的土地上。

老人们告诉我，看到了一片金光灼灼……

姑娘们告诉我，冬日里一阵春风吹起了衣角……

战士们告诉我，听到了《国际歌》从天而降……

孩子们含着泪水，捧起了泥土说，周爷爷回到我们这里来了……

啊，我仰望天空，透过碧蓝碧蓝的天色和碧蓝碧蓝的思绪，看到敬爱的周总理，正含笑俯视人间……

榴花似火，开得那么炽热，那么耀眼，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小花园里，好像落下了一片红云。

这么好看的榴花，黄宗英却没有心思欣赏，这几天她正陪着外宾，参观瑞金医院的烧伤科。

在医院里，她见到了一个被严重烧伤的女病人杨光明。小杨的烧伤面积为百分之一百，三度烧伤竟达百分之九十四。如此严重的烧伤，在国内外都没有抢救成功的前例。

然而，现在有了！

瑞金医院烧伤科的医生们，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奇迹，小杨在阎王爷那里“做客”五天五夜，翩翩返回了人间。

回到家里，黄宗英的思潮仍在汹涌：是什么力量使小杨活了？是什么力量使她还能活下去呢？……

赵佐翻着黄宗英从医院带回来的资料，好奇地问：“妈妈，她现在什么样子？可怕吗？”

“我只看见她有一对美丽的眼睛！”黄宗英回答了儿子的问话，心里在想：烈火可以把一个人烧成什么样？任谁都可以描述和猜想。但是，从有生命力的事物中去发现美，是作家的职责。

于是，外宾离开上海后，黄宗英继续到瑞金医院采访，她要把创造奇迹的人——瑞金医院的医生们，和协助医生们创造奇迹的护士、厨师、工人……介绍给读者。

一九七八年二月，除夕的晚上，黄宗英是在医院里同杨光明和值班医生一起辞岁迎春的。

窗外，呼啸着寒冷的北风，病房里却要求温度如夏，小杨只盖着一条小小的被单，电风扇在轻轻地摇拂。她告诉黄宗英，说：“您不知道，当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烧伤的脸时，我都不愿意再睁开眼睛了……唉，当时我真想死……”小杨的眼睛湿润了，她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如果没有这些高明的医生，没有先进的医疗技术，早就没有我了。三天植一次皮，大小手术动了二十多次……我都不敢想是怎么过来的。”

黄宗英关切地问：“手术时是什么感觉？”

“忘掉了，我也不去回忆了……”小杨微微扬起了头，眼睛一亮，漾着深情：“我只记得医生、护士、阿姨……瘦下去了，为了我瘦下去了。”

黄宗英默默点着头，在心里说：小杨啊，你的记忆储存很别致，取舍也鲜明。

突然，鞭炮响了。

鞭炮声中，人们欢乐地迎来了新的春天。黄宗英发现小杨的一双眼睛里，正闪烁着对美好明天的向往。

在回家的路上，黄宗英迎着寒风，踏着将要消散的夜色，已想好了文章的题目——《美丽的眼睛》。

不久，《美丽的眼睛》发表了，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在许许多多的来信中，有人问黄宗英，是怎样构思这篇文章的？

为什么只取杨光明眼睛的特写？

那天在医院的花园里散步，浓绿的树叶在她头上轻轻拂动，鲜丽的花朵在她身旁悄悄微笑。

我突然发现她用美丽的眼睛，环视着世界，明亮的眸子在阳光下一闪一闪，跳动着欣悦、多情、顽皮、凝重、智慧的生命的光焰。

眼为心之窗。从杨光明的眼睛，我看到了她美丽的心灵；从救活杨光明这一件事，我看到了祖国的心灵。看到了祖国整体中亿万细胞的决定簇——伟大的人民！

这一双美丽的眼睛，只能出现在中国。

这一双美丽的眼睛，充满了生命的光辉。

这一双美丽的眼睛，永远美丽……

大雁南飞了。

崇山峻岭中，枫叶红了。远远望去，浓绿、淡绿、金黄、杏黄的山色里，掩映着一片片艳红。一丛丛野菊花，在崖畔，在谷底无忧无虑地开着。山溪

变得更加清澈，它唱出的歌已经换了秋天的旋律。

黄宗英的报告文学《大雁情》脱稿了。这篇作品她从春天写到秋天，可以说是一个难产的“婴儿”。她写的是一位女植物学家秦官属的故事，她写的是该怎样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

一九七八年的春天，黄宗英应邀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会议期间，有一天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科学家们，一起游览长城。

当她登上八达岭，望着莽莽苍苍的群山，葱葱郁郁的树林，浓浓淡淡的桃花……多少往事又涌上了心头。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然而，岁月的流水却冲不淡她的记忆。几十年前，她就是在这儿告别了北方，回到上海的舞台上去的……

姑娘们的笑声，打断了黄宗英的沉思，她移开视线，看见城堞边站着一个姑娘，凝神眺望着向南飞去的大雁。

黄宗英好奇地走过去问道：“姑娘，你在想什么？”话音刚落，她察觉出了错儿，站在她面前的不是一个姑娘，而是一个两鬓已经斑白的中年妇女。

黄宗英有些不好意思了，可那位中年妇女并没有一点责怪。透过近视眼镜她打量着黄宗英，淡淡地一笑：“我看见大雁，就想起了大雁塔下的植物园。”

“你是——？”

“我是种野药的。”……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秦官属时出的洋相。

人们啊，往往如此，有时在一起工作几十年，却依然形同陌路；有时才碰头，就好像几辈子之前已经相知了。

这个种野药的人，引起了我的兴趣。为什么？说不清。大概是因为她那直率泼辣的性格，也可能是因为她那泰然自若的神情，也许是因为她太平凡、太普通——普通得就像我在农村里常碰到的那种半土半洋的助产士，才放下喂猪的勺把，洗洗手又操起消毒的刀钳。我觉得，她是一位生活在群众中的、朴朴实实的科学工作者。我想：

她也许正是若干天来我在五千名科学家代表里，寻了千百回的描写对象。我正应该从普通人中，找一找这一代科学工作者的缩影……

黄宗英决定采访秦官属。可是大会的活动安排得很紧，几乎找不出整块儿的时间。黄宗英问秦官属什么时候有空儿？约好了谈谈。她只是笑笑，闪着沉静的目光不回答。

这是怎么回事呢？

黄宗英不解，又不便问下去，心中却飘起了一朵疑云。

夜里，黄宗英回到旅社，看到书桌的台灯下压着一张纸条，写有几行娟秀的字迹：

记者同志：

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请求你们千万别写我。

我的处境很为难，望能谅解。

秦官属×月×日

望着这张纸条，黄宗英愣住了。这不像一般的谦虚，也不像客气的推辞，难道有什么特殊情况？

望着这张纸条，黄宗英又想起秦官属在长城上看大雁，想植物园的神情。难道她有什么“隐私”，不愿告诉别人？“我的处境很为难”这个处境是什

么呢？

黄宗英思考着，猜测着，有些困惑了。

她的心海开始涨潮了……

横看麦子竖看麻。

要了解科学家，最好在他的试验室里或场圃里。

我决定到西安植物园跑一趟。

几个月之后，黄宗英来到了西安植物园。

在她的想象里，植物园应该是树木蓊郁，一片翠绿，望不到边的林涛和花海。可是眼前的植物园，却是枯草败叶，林木杂乱，一片荒芜……

她开始调查、采访了。找了书记，也找了普通的工作人员，他们对秦官属的印象并不好。有的说秦官属脱离群众，有的说秦官属成名成家思想严重，有的说秦官属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

黄宗英心寒了，没想到冒冒失失地找了这么一个采访对象。可是她又想，秦官属所工作的洛南县药材公司，为什么那样颂扬、推荐这个不怎么好的人呢？难道他们选错了代表？……

黄宗英突然意识到，问题已经超出了写报告文学的范畴了。不管怎么样，她决定再去洛南山区。

黄宗英驱车驰过莽莽苍苍的秦岭。

高原上，阳光格外明丽，天空特别蓝。麦子收了，柿子坐果了，一丛丛野蔷薇花散发着淡淡的清香。越往山里走，越感到林木多，随时都可看到黄连木、五角枫、云杉、漆树……

在洛南山区的采访，黄宗英得到的印象绝然不同。从药材公司的负责人到每个技术员，从山区的农妇到天真的孩子，都说秦官属好。有的说，我们这种药的穷山区日子能好起来，全靠秦同志。有的说，秦师傅离儿别女，扔着老伴儿，把心扑在俺这苦山圪垯里了。有的说，我们没去过的山，她去了，我们吃不了的苦她吃了。有时揣上个椽子面窝头一清早就上山，太阳不落坡不回来……

一天傍晚，黄宗英又看到几个孩子跟着秦官属转转，亲亲热热地说说那。她拖住一个梳着羊角辫的小女孩问：“上学了吗？”

“没有。秦姨说我明年就好上学了。”小女孩有点羞涩地答道。

“你长大干什么？”

“像秦姨那样嘛！……”她说完，小头一歪跑了。黄宗英久久望着追赶秦官属的小女孩，心头一热，眼睛湿润了。

我到洛南的那天，秦官属为了接待我，天不亮就起身，从海拔两千多米的黑嶂村赶了八十里路，回到药材公司。

看到她风尘仆仆的样子，我很感动。她很少主动和我讲话，我问什么，她也是回答得很简单。但是，从她的目光里，我感到了她的热情和亲切。不知为什么，和她在一起，我会想起十多年前在河北宝坻县农村生活的情景。

到这山区来采访，秦官属每天都陪着我，可是有时候我总感觉到她有意躲着我，于是我常常借故请教药物知识靠近她。一路上，她如数家珍般指点我认黄柏、忍冬、威灵仙、五味子……

她告诉我，到没有人家的山上去种药，喝不上水，吃干粮时，就摘一把五味子解渴，这就酸甜苦辣咸全有了。

一次，她从岩缝里拔出一棵草问我：“认识吗？”

我看着这棵不起眼的草，长着长长的棒槌般的根，花骨朵还没开，从花托透出的花色看，将要绽出淡紫色的花。我开玩笑地胡猜：“一定是‘勿忘我’……”

秦官属微笑着说：“它不会去拉住上帝的衣角，祈求上帝给它取名。它的名字可能是古代山里一位读书人给取的吧！学名远志，俗名小草。这小草生命力极强，能在岩缝中扎根。它的根部入药，名曰‘醒心杖’，能益智强志，也就是西药说的，对健全脑神经有作用。”她轻轻叹了口气，神情显得庄严起来，“这小草，漫山崖长着，用不着我去育种。可这几年，它成了我的‘好朋友’……”

这庄严，我能意会。这“好朋友”我能理解：大多数知识分子——祖国浩浩荡荡的脑力劳动大军啊！他们像漫山遍野的小草，分布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是狂风暴雨、冰雹严霜、刀砍火烧，哪里有土地，哪里有人民，他们就在哪里深深扎根。

我不找话碴儿，秦官属又沉默了。用什么办法能打开她半掩的心扉呢？

难道她敏感到别人已向我说出过什么吗？

难道她担心和我谈多了，会惹出更多的麻烦吗？

山区的夜雨，哗哗啦啦地敲打着土屋的格子窗。掠山的风，送来一阵阵时高时低的林涛声。跳动的烛影下，黄宗英和秦官属坐在床上，回忆着被林彪、“四人帮”扰乱黑暗年月。她们谈到“牛棚”，谈到“批斗会”，谈到“下乡改造”，谈到“人心所向”，谈到丙辰清明……渐渐地，秦官属的心扉打开了，打开两颗心，紧紧贴在一起了。

两个知识分子的脉搏，合着一个激越的节律跳动了。

秦官属说着、说着流泪了……

黄宗英说着、说着也流泪了……

夜雨还在下着，林涛还在响着。土屋里恬适地起伏着药场青年女工们轻轻的鼾声。

蜡烛快烧尽了，它也淋漓酣畅地流着泪……

黄宗英要离开洛南村时，秦官属很留恋，心里一直不是个味。唉，近五十的人了，她还这样……

不知什么时候，她准备了一大包远志，递给了黄宗英：“黄大姐，把这点远志带着吧，也许对你的偏头痛有用处，如果吃了好，来封信，我再给你采……”秦官属竟咬着嘴唇，眼泪汪汪了。

“官属，我们还会见面的！”黄宗英像年轻时那样甜甜地笑了，“你的远志，我就带走了……”

“黄大姐，你回去以后，还是别写我吧。像我这样的人，有什么可写的？而且有许多矛盾，一时也难解决……”

“写不写？怎么写？那是我的事，你就别管了。有些问题，我回西安后，还要向省科委的领导汇报。”黄宗英有些激动，目光透出刚毅和坚定。“无论怎么样，我相信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定会落实，而且应该尽早地落实。”

黄宗英紧紧握了握秦官属的手，上车了。

汽车沿着山村的土路，颠颠簸簸地出山了。车后腾起了一股黄色的烟尘，翻卷着，翻卷着，久久不愿消散。

秦官属站在山坡上，用手遮着眼睛，一直在张望。车影渐渐地消失了，那烟尘也看不见了，重重叠叠的远山，漫起了一片乳白色的云雾。

在西安植物园我又采访了几天，并和一些同志谈起对秦官属该怎样落实政策？

对方觉得我提出的问题很奇怪：“她还有什么落实政策的问题？都去北京开过会了嘛！又没给她立专案，也没定什么性，档案里也没塞什么材料。再说，她……”

啊，多么令人深思的逻辑啊！品着这些话，我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我不是胆小的人，也不是勇敢的人。我只不过是想用笔向社会说话。看来，我应该动笔了，应该尽快地动笔，写写这棵普普通通而又不普普通通的小草。

植物界没有两片叶脉相同的叶子，可是人界，却有许多命运相同的人啊！……

当黄宗英写完这篇报告文学的时候，又是大雁南飞的季节了。

她要把稿子寄给《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周明同志时，又觉得文章的结尾不满意，还没有写尽自己的情。

于是，她打电话到出版社找我和魏心宏，让我们到她家去，帮她想想办法。我们商讨了很久，左一个点子，右一个点子，想了不少，可都不怎么样。最后，我们主张还是从大雁上做文章，最好能做个梦，写出来会更有味，也方便。就这样，黄宗英的笔下，立刻出现了《大雁情》那个深沉、隽永，又富有诗意的结尾——

……我嘀咕来，嘀咕去，仿佛进入了梦乡。我梦见：

大雁飞过我的窗前，盘旋，盘旋。大雁们围在我的书桌前，站成一个半圆，在观看、在议论我写下的草稿。只听得头雁用宽厚的男低音说：“呃，——这种情况很熟悉嘛，很熟悉。我们从北方飞到南方，从南方飞到北方，常常碰到，常常碰到。”

大雁们马上用各种声部参加讨论：“快——研究研究。”“快——研究研究。”

大雁们把我写好的草稿一张一张地衔走了，衔走了。大雁们排成了人字形，飞远了，飞远了……

《大雁情》发表后，读者反应极其强烈，报刊上出现了许多评论文章和推荐文章。认为《大雁情》不仅道出了知识分子的心声，还提出了该怎样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它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一篇报告文学的作用。能唤起人们思考许多问题，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

后来，《大雁情》获全国第一届优秀报告文学奖。读者的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

当然，在这些来信中，不全是赞扬的，还有责问的、抗议的，也有在内耗的漩涡里呼救的……

《大雁情》发表后，竟有人告我。这是奇怪的事，可也在意料之中。当然，我提笔写《大雁情》是考虑又考虑，不然，一篇文章不会从春天写到秋天。我的原意只不过要谴责那造成同志对立的根源，并无栽害某个个人而没根据地把秦官属同志棒上天的心意。别人怎么理解，怎么想，那是别人的事。要告状，谁也阻挡不了，那是公民的权利。

四面八方都在考我，考我怎么写出《大雁情》的？我不知怎样回答。我觉得一个作家的一部作品的因果，是很难说得明白的。我想说，一九五八年我不下乡，一九七八年就写不出《大雁情》。但假如我说，一九五八年下乡

我怎么怎么有所改造，也难出口。

作家往往是和他的人民一起付出代价的，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向生活、向历史交出我们的青春、精力、欢喜、痛苦、眼泪和希望。

有时，我也相当困惑，当我走访许多科学研究机构时，那里选一位代表、一个先进分子，竟比搞科研工作本身还要难。我遇到多少知识分子，“砸”后余生，壮志犹砺，全不顾累累伤痕，依然执著地走向理想、未来……

如果没有这些感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就是有人把《大雁情》中的女主人公秦官属的事情，用扩音喇叭对着我耳朵说，就是我和秦官属住在一个房间里，我也不会想到写她。她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作为，经历也并不离奇曲折。只因为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理想，使我和自己描写的对象有了缘分。

作家从自己切身感受出发，走向自己熟悉的或陌生的生活领域，从水泉里舀一勺新鲜的水……

踏遍大江南北，结缘四字八方，我不过想给人民舀一勺清凉的活水。至于能不能舀到这一勺活水，我不知道，可我要尽一切努力去舀……

昨天降温，气象预报有雪，今天凌晨果真下起大雪来了。漫天乱飞的雪片，又大又白，把整个天地搅得一片迷蒙。这样的风雪天，黄宗英却要去看鄂西山区，她要追踪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藻类专家黎尚豪同志，了解晚稻的新肥源固氮蓝藻研究的进展情况，也想看看黎老和他的实验室的同志们怎样调查野生蓝藻。

漫布在辽阔的大地上，有极丰富的却极不被注意的野生固氮蓝藻资源，在等待、在召唤人们去发掘、去运用。

固氮蓝藻，把专家迷住了。

固氮蓝藻，把黄宗英也迷住了。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黄宗英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刚合眼天就亮了。东湖畔一片银白，气温陡降。黎老是否还远行呢？

电话接通时，黎老一行五人已冒雪浴风向山区进发不畏艰险，永远向着未来。我，一个勘测思想资源的作家，能不追随这样的人的足迹吗？

于是，黄宗英乘火车到了宜昌，向地区科委借了一辆北京吉普，迎着风雪上路了。

白皑皑的大地，白皑皑的群山，只有远处积雪覆盖不了的松林，还透着一些斑斑驳驳的墨绿。吉普车在风雪中飞驰，前面的路和山野溶成了一片，看一眼，都令人眩目，产生迷路的错觉。

啊，茫茫的风雪路多么漫长！

啊，黎老他们在哪里寻找固氮蓝藻的新品种呢？

黄宗英紧追紧赶，总算在玉泉山麓找到了黎老。黎老吃惊地问她：“这么大的风雪，你来干什么？”

黄宗英微微一笑，反问道：“这么大的风雪，你来干什么？”

“我们……”

“你们能来，我就不能来吗？”黄宗英开朗地笑了。黎老他们也会心地笑了。

下山途中，见溪水、石桥，黎老喊停车。他们去溪水缓流或凝固处，在冰下、在岩缝中采集藻类标本。我没下去，那个坡度够我爬的了。而水生所的同志仿佛生命被注入了水生生物的基因，到了溪边，他们都变得活龙活现。

我以前一想到科学家，往往只想到明亮的实验室、清洁的白罩衣、书籍、论文……如今，看到黎老在采集标本时，那样不避艰辛，不顾安危，凿岩破冰，攀上跃下，我不禁对自己那种幼稚的想法哑然失笑。

当我们再上路的时候，路越来越险了。司机队长也颇有性格，开起车来，显得大大咧咧不在乎，只要听到他轻轻吹起悠扬的口哨，我就知道脚下准是断崖绝壁了。我们的车在盘山道上转了几个弯，却不见黎老的车子跟上来，薄雾霭霭袭来，我们有些担心了。

云湿山动，天低雪坠。重重雾里闯大垭，车子猛地像进入了原子爆炸的气浪里。好不容易避过风口，停下车来，用石块顶住轮胎。我们等着，等着。

说不清过了多久。仿佛手表也紧张得不动了……

突然，喇叭声从天外传来，啊，人间最悠扬的音乐！黎老的车追上来了，他笑眯眯地下得车来说：“咱们长了见识了。很好，很好！”

原来，黎老的车在半道上滑轮了；幸亏向内滑，如果向外滑，黎教授一行已经“魂断蓝藻”了。可是黎老仿佛在奇险中颇得奇趣，说得那样轻松。望着他，我不禁陷入了沉思……

就这样，黄宗英跟着藻类专家黎尚豪，在冰天雪地里生活了十几天。她回到武汉的时候，黎老和水生生物研究所的同志们还在湖南省石门县哪。

虽然离开了这位专家，可他在风雪中攀山越岭寻找蓝藻的情景，却常常出现在黄宗英的眼前。

有时，黄宗英在想：

他像谁呢？不，谁像他呢？

蓝藻！

对！蓝藻就是黎老，黎老就是蓝藻！

蓝藻没有华丽的外观，也没有诱人的香气，但是他们在最贫瘠的土地上工作着，默默地工作着。蓝藻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参加固氮工作的。他们用生命换来了氮，连同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其他的有生之伦。

啊，黄宗英深深地喜爱蓝藻！黄宗英深深地崇敬蓝藻！她觉得自己的血液中，也有了蓝藻给予的生命因子！

在黄宗英的心田里，小小的固氮蓝藻已铺开了一片生机勃勃的蓝绿！

没几天，这“蓝绿”便又在她的稿纸上漫开了……

我不仅写他，而且写他们；不仅写蓝藻，而且写蓝藻们。因为我所想的已不仅是黎老，而是黎老们，是一切农业科学家和农业科技工作者。

啊，正像丝丝蓝藻一样，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哪里没有他们的足迹！

黄宗英很快就将报告文学《固氮蓝藻》献给了读者，让读者也来认识、理解蓝藻和蓝藻们。她希望蓝藻也能在读者的心中长出一片蓝绿，那是多么美丽、多么迷人的色彩啊！那是多么无私、多么高尚的象征啊！

写完《固氮蓝藻》之后，黄宗英又写了报告文学《越过太平间》、《橘》等。

死神统治着的太平间，是不容易越过的。征服癌症的医学专家所经历的欢乐和痛苦，黄宗英也经历过了……

橘子是甜的，而柑橘专家的生活却不像橘子那样甜。在黄宗英的笔下所迸射出的希望之光，是为柑橘专家的命运而产生的，却又不仅是为一个柑橘专家的命运。几度橘叶绿，几度橘花白，几度橘果红。她希望吃到橘子的时

候，或想起橘子的时候，不再有苦涩的记忆……

作家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在生活的激流中，经受着火与冰的淬炼。和人民一起，切身感受到社会的暖与冷、欢乐与痛苦、幸福与苦难、光明与黑暗、美与丑……才可能换来色浓墨饱的一支笔。

我用这支笔，蘸着生命的泉水写作！

作为一个作家，应该永远全神贯注地、热情地、谨慎地注视自己所服务的人民、祖国、党，还有整个世界。

这几年，我先后出版了《星》、《橘》、《小木屋》、《黄宗英报告文学选》、《半山半水半书窗》等书。我写得怎么样？我自己也没数，因为我有时清醒，有时迷惑……但我不涂抹、不掩饰自己的脚步。我希望我写的这些，很快地被冷淡、忘却、扔掉。祖国将用自己的脚步写出崭新的篇章，我和我的笔将永远追逐向前的脚步。

啊，小木屋……

在峻峭的雪峰的映衬下，苍茫的原始森林更显得古老、阴森和荒漠。一棵棵云杉直插蓝天，仿佛它们的枝叶只能在辽阔的天空才能吐翠，也许只有那些倒木和古藤才能记得它们几百年的树龄。灌木丛中叮咚的泉鸣，密林深处野兽的吼叫，更增添了这绿色王国的神秘与恐怖。

就在这片原始森林里，突然出现了一座小木屋，白色的云雾在它的窗下轻盈地飘逸，像远方飞来的哈达；美丽的格桑花，像五月的朝霞那样鲜艳，一直开到它的门前……

啊，小木屋……

啊，高山森林生态研究站……

黄宗英又做小木屋的梦了。自从一九七九年秋天，黄宗英认识了研究高山森林生态的专家徐凤翔后，常常做这样的梦。其实，这迷人的梦并不是为她自己做的，而是为徐凤翔副教授做的。为了使这个梦境能变为现实，黄宗英曾两次进藏，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充满了艰辛，充满了欢乐，也闪烁着晶莹的泪珠，令人深思……

一九八二年九月初，中国作家协会派出一个作家访问团去西藏，由黄宗英担任领队。可是，当时黄宗英正在日本东京，参加中日合拍的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的首映式。出国前已定了去西藏的日程，她在东京总担心误了行期。当日本首相刚刚接见完中国代表团的电影艺术家，黄宗英就匆匆忙忙飞回北京了。

到了北京，作家访问团的同志已经去了西安。于是，她又匆匆忙忙地飞到了西安。她出国所带的两箱衣服，只好请友人顺便送到上海家中。

在西安，进藏的同志都要进行体格检查，凡是患有严重心脏病和高血压的人，是不准进藏的。全团八个人唯独黄宗英在体检时，发现心脏左束枝传导阻滞（其实黄宗英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病况，故意装做不知道的样子，乐呵呵地表示没有任何感觉，想蒙混过关）。医生有些不放心，她却眨了眨眼睛，调皮地说：“我皮实，没事儿。”就这样，在医生的叮嘱中，体检的关勉强通过了。

黄宗英显得格外高兴，仿佛从五十七岁一下子又回到了少女时代，她的目光，她的笑声，是那样天真，那样清澈，恨不得立刻插上一双翅膀，飞向早已向往的西藏。

西藏啊，西藏！

你究竟是古老还是年轻？是滞留于落后还是迅速在前进？是富裕，还是贫穷？许多中国人把你传得荒凉又可怕，许多外国人都觉得你神秘，争着抢着来看望你。

啊，都有根据，也都有道理。迷人的西藏，我国八分之一国土面积的神土啊，你怀里揣着九九八十个连环的谜语。

九月，是金盏花和野罌粟花盛开的季节，也是西藏收获青稞的日子。天，湛蓝湛蓝，蓝得令人奇怪，似乎那不是真的天空，而是舞台上的天幕，打上了浪漫的蓝光，一群群耸立的雪峰，好像被童话里的王子驱赶着，拥到人们的眼前……

黄宗英一下飞机就被这迷人的景色陶醉了。当她接过藏族少女献上的哈达时，激动地将哈达紧紧贴在胸前，仿佛觉得雅鲁藏布江的波涛，带着藏族

同胞的深情，一下子涌进了心中。

作家访问团住在布达拉宫下的自治区第一招待所，盛情的主人劝告他们好好休息，最好睡它三天觉再活动。可是第二天就有两个同志出现了高山反应，不想吃，也不想喝，还呕吐不止。

黄宗英天天头痛头昏，闹不清是高山反应还是神经性偏头痛发作，她也没放在心上。当她去山南地区参观藏王墓时，突然脸色发青，不停地呕吐，立刻被送进了一个陆军医院。第二天，作家访问团要去参观藏胞自己建成的沃卡电站时，她硬撑着从病床上爬起来，坚持要同去，并埋怨自己：哪儿不能生病，干嘛跑到西藏来生病……

在访问藏北的羌塘草原时，有一天他们在牧民的帐篷里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作家周明在一篇文章里是这样记述的：

这是一顿极为丰盛的具有草原风味的午餐。盛情的主人先是招待我们喝青稞酒、酥油茶，吃“退”（一种用红茶、奶渣和黄油合成的食物），而后送上了刚刚宰割、烤制的全羊肉——这是用来招待远方来的贵客的。说实在的，我们之中好几位还不习惯吃。可是黄宗英不但样样都尝，而且吃得很香。就连那有点半生不熟的羊肉，她也抓起一个肘子就啃。

望着她吃得这般香，这般自然，好客的主人十分高兴。席间，藏族牧民竟兴奋得边弹奏边唱起了豪放优美的民歌。几位藏族姑娘也随着歌声翩翩起舞了……

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黄宗英带领作家访问团欣喜地奔走。从青稞飘香的雅鲁藏布江畔，到风雪呼啸的拉根山口，从辽阔无垠的羌塘草原，到碧波浩淼的天池——纳木措，从拉萨的布达拉宫，到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到处都留下了她的脚印、她的笑声，当然，也留下了她激动时洒下的泪水。

谁能忘记呢？在牧民的帐篷里，当六弦琴奏起了豪放优美的乐曲，仿佛雅鲁藏布江的涛声回荡在绿茫茫的草原，黄宗英和牧民们一起跳，一起唱，那么欢乐，那么尽兴。这时，她变得年轻了，变得天真了，在她的血液里，立刻涌进了藏族人民给予的爱！牧民们爱戴她，不仅因为她是名演员、名作家，更可贵的是她的那颗心能和牧民们的心亲亲热热地贴在一起，牧民们亲昵地叫她宗英卓玛。啊，宗英卓玛，藏族人民心中美丽、善良的仙女！

告诉我，宗英卓玛！你千里迢迢，不辞辛苦，来到世界屋脊——西藏高原，究竟是要寻求什么呢？

千岩万壑在造山运动中，刹那在这里“定格”不动了。

如果你走进寺庙，历史也仿佛“定格”不动了。经幡、圣水、酥油灯，五体投地一次又一次地长拜，呢呢喃喃一遍又一遍地诵经……既然我不是研究宗教的，那么，让外国旅游者去惊叹并拍摄这宗教自由吧。我要在西藏寻访科学的“未来佛”的“圣殿”；寻访智慧转世的“玉女仙童”；寻访创造新天地的“五百罗汉”；寻访能破神土之谜的“千尊金佛”！

我曾先后“朝拜”过日喀则农牧研究所、沃卡电站、羊八井地热站、太阳能研究所、藏医院、地质局等等大“庙”小“庙”；会见过许许多多“金刚”、“罗汉”、“真神”。如果我长着三头六臂千只手，我愿一一为他们塑像披金。愿他们一一显灵显圣显神通，变西藏为福地。

作家访问团在西藏的访问日程结束了。

那天，阳光特别好，把布达拉宫映照得更加雄伟，更加耀眼，黄宗英怀着留恋的心情和大家摄影留念。一个月的时光匆匆忙忙地过去了，可她将自

己的爱在这有限的的时间里，全部献给了这片广袤的土地。她爱这里的生活，爱这里的人，爱这里的林卡，爱这里的格桑花，甚至爱牧民帐篷里含着烟草、白酒和羊膻味的空气。

她多想沿着雅鲁藏布江，再去亲亲羌塘草原；她多想穿过拉根山口的风雪，再去看看迷人的纳木措；她多想在生活的激流里，再去追踪那些为四化建设做贡献的人们……可是，此刻她只能望着布达拉宫默默地向这片土地告别。

啊，拉萨——神往的地方，再见了！

黄宗英独自来到招待所的花圃里，花圃里已经没有花了，只见一簇簇花籽，在枯黄的枝头随风摇曳。她轻轻地采着花籽，轻轻地采着别情，希望明年春天，在她的阳台上以及她朋友的花园里，都能开出西藏的金盏花和白山菊，开出她那深沉的、美好的情思……

该辞行的单位都辞行了，该告别的朋友也告别了，十月四日早晨就要飞离西藏了。拉萨的飞机票非常难买，如果没有有关方面的照顾，一时是走不了的。据说已经在预售三个月以后的飞机票了。

就在临行的前夜，大家忙着整理行装的时候，黄宗英却要退飞机票。

“什么？退机票？”

黄宗英微笑着，那似乎是一种存心惹人生气的微笑：

“嗯，退机票！”

“为什么？”

“想到大森林里住住小帐篷。我遇到了几位搞林业的专家，我要跟他们去……”

不管怎么劝说，黄宗英一句也听不进，坚决不走了，并给北京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挂了长途电话。

原来，黄宗英在晚饭后散步的时候，意外地在招待所的南楼找到了南京林学院的研究生生态学的副教授徐凤翔同志，她像单飞的季候鸟，又要飞往西藏的原始森林了。黄宗英是三年前在成都的一个学术交流会议上认识徐凤翔的，那时，徐凤翔所提出的，要在西藏的原始森林里建立高山生态研究站——科学研究的小木屋的愿望，就深深迷住了黄宗英。尽管生态学对黄宗英来说是陌生的，甚至连它是基础科学还是应用科学？都搞不清楚。但是，黄宗英能理解一个对自己的事业执著追求的科学家。她知道科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一个科学家，往往就意味着一个宝贵的课题，而这个课题就连着这个科学家的生命！因此，在嘉陵江畔，她们是有约在先的。

“我希望……有一天到西藏去看望你，看望你多美多美的林子，更希望看到你渴望的小木屋！”

“……”徐凤翔笑了笑，她的目光比话语还复杂。

“我想，咱们会在西藏的森林里再见。”黄宗英爽快地伸出了右手……

如今，奇迹般地相逢了，两个人格外的亲热。几位外国朋友都被她们感动了。

“她也是电影明星吗？”

“不，她不是……不过，她应该成为我国银幕上的角色，而且应该是主角。”

“噢——，那她是什么人物？”

黄宗英想告诉外国朋友，她是一位研究高山森林生态的学者，可是黄宗

英所学的英语单词不够用了，只好灵机一动，幽默地说：“她是森林的情人，疯狂地迷恋着森林！”

就这样，为了徐凤翔的小木屋，黄宗英像中了护林神的魔，决定跟着徐凤翔去原始森林了。

……高原已经开始落雪了，原始森林是什么样呢？

真的那么美？真的那么危险？真的那么……对我来说是向往，也是谜。

只要徐凤翔能去，我就能去，反正我豁出去了。这叫有权的帮权场，有人的帮人场，为了小木屋的梦，我奉陪了……

当作家访问团的同志离开拉萨之后，黄宗英跟着徐凤翔来到了西藏东南的波密县岗乡的原始森林里。

十月五日，我在上海收到黄宗英一封航空信，并让我转告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当时她的编制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她暂不回上海了，决定跟随林业专家徐凤翔去原始森林，大约一个半月才能回来……

另一张小信纸上写着：

此行都说相当艰险，但不必和领导及家人多说，免得牵挂。留一纸存你处，防万一。

啊！我吓了一跳，心里慌慌的，急忙翻看另一张小信纸，只见上面笔划清楚地写着——

上海文艺出版社党委：

此行多艰险，万一发生意外，作为共产党员，是无憾的。一个党员作家，首先要有热情把自己献给美好的、有希望的、有利于人民和祖国的事业。

作为母亲和妻子，有几件家务事，请求组织照顾，并协助安排：

……

黄宗英匆匆含笑留言

一九八二.十.三拉萨

真没想到，这竟是一封写着遗嘱的信。读着，读着，我的视线被泪水模糊了。为了遵守黄宗英的嘱托，我怕同事们看出我的激动，便悄悄地擦着泪水。他们关心地问：“是老黄的来信吗？她什么时候回来？”

我故意轻松地答道：“暂时不回来了，她跟着一个林业专家去原始森林了。她总是那么野……”

事情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当时她没有发生“万一”的情况，因此这封信一直在我办公桌的抽屉里保存着。可是从这封信，可以看出作为作家，她那时为了采访和深入生活，为了徐凤翔那个小木屋的梦，她是做了何等的准备啊！她对生活、对事业的爱，是多么纯真啊！

在波密的原始森林里，支起了三顶帐篷。

四个藏族人，五个汉族人，开始进行森林生态研究。古老的原始森林有了他们的脚印和歌声，有了他们的炊烟和烛光，也有了时代的脉搏和憧憬。

黄宗英当了炊事员，她头上扎了一条毛巾，在用倒木和树枝搭起的小棚子里，乐呵呵地忙碌着。有时擀面条，有时烤饼，有时还煮一锅咸稀饭……

傍晚，徐凤翔他们从森林深处归来时，燃起一堆篝火，吃着热乎乎的晚饭，谁都夸她的手艺高明。当然，有时候没蔬菜了，只好开几个罐头，拿出藏族民工带来的酥油茶、酸奶子、糌粑……这倒更有特别的风味和情趣。

有时，黄宗英也跟着徐凤翔去森林里作业，她学会了使用测高仪和风向风速仪，也还敢握着油锯伐木。更愿意抢着站在大树前，为林学家们当摄影

时的比例标杆。一米六十九的身高，像耶稣那样张着手臂站成十字，望着苍茫的林海，她总喜欢高呼：

“啊，天父啊，愿人都尊你名为圣，愿人间的梦能实现。阿门！”

每当她这样呼喊时，都要引起大家一阵爽朗的笑声。

有一天，为了给大家改善生活，黄宗英背着一个七彩的布包采蘑菇去了。采来的蘑菇照例都要经过专家的检查才能食用。炖猪肉，蘑菇汤，多么丰盛的晚餐啊！

谁也没想到，当晚饭后点上蜡烛，在帐篷里伏在树盘上数年轮的时候，同志们一个接一个地发病了，又是吐，又是泻。病情最重的是小李子，迷迷糊糊的，连脉搏都摸不到了。

“是蘑菇中毒了！”

“可能是。怎么办呢？”

黄宗英也感到全身无力，四肢麻木了，她挺着精神在出主意：“咱们喝肥皂水吧。我这儿还有维生素 C……我有治冠心病的药，还有治窒息的药……”

负责保护这批专家的解放军副连长白玛说：“咱们鸣枪吧！鸣枪呼救！”……

黄宗英病倒了，昏昏沉沉地在睡。西藏寺庙里，那些描绘十八层地狱的壁画，在她眼前活动起来了。她被判处砍掉两手的刑罚，理由是她生前写东西太没规矩……蘑菇中毒后，我们的脸庞都小了一号，走路晃晃悠悠的，无法外出作业，不愿休息也得休息了。好在大家都活过来了，看来阎王也不敢收这批不怕死的人。傍晚，去部队取盐的解放军通讯员小尼玛回来了。“尼玛！”（尼玛，藏语：太阳）

“小尼玛！”……

我们八个人欢呼着奔了过去，仿佛隔世见到了亲人。只在此时此刻，我们才忽然意识到，我们险些永别了尼玛——太阳！

“小尼玛，你昨天不在太可惜了。”

“你们跳舞啦？”因为我们说过，拿下第十棵树要举行舞会。

“不，比跳舞还乐。”

“喝酒啦？”

“不，尼玛，你将终身遗憾。”

“你想想，世界上四十多亿人口，吃蘑菇中毒的百分比是多少？”

“……”

“你再算一算，世界上吃了毒蘑菇而又没有死的，占多少百分比？”

尼玛悟过来了，一下子跳将起来，大声喊：“什么？你们中毒啦？怪不得都瘦了！”尼玛那一对有着藏族特点的又深又大的眼睛，立刻涌出了泪：

“徐老师！黄老师！……我背你们下山去医院！”

“小尼玛，我们不要紧啦！”我心疼尼玛了。

“真的不要紧了吗？……”尼玛擦着眼角的泪。

“小尼玛，如果你回来，看见我们都死了，你怎么办？”

“那我也死！”尼玛斩钉截铁地说。

“不对。”徐凤翔说，“尼玛，你应该下山去报信。”

“我绝对不会想到去报信，全队都死了，我一个人怎么能活着？”

“你怎么死？”

“用枪把自己打死，和你们一起死！”尼玛说着，眼泪啪哒啪哒地掉下来。

徐凤翔的大眼睛里，也啪哒啪哒地在掉泪，我的眼圈也红了。此时此刻，真觉得活着是多么好：因为人间有着可爱的尼玛——太阳！

为了帮助徐凤翔呼吁和申请一座小木屋，黄宗英提前下山了。她住在部队的营房里，写了好几天的“请求书”，却不知往哪儿寄。徐凤翔的单项研究课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批准的，她年年来西藏，年年请求建立小木屋，可是三年了，小木屋还是一个梦。

森林生态研究站的建立，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科学与文明，的水平。而我国的森林生态研究站还寥寥可数。要建立这样一个科学的小庙，为什么这样难啊？在我们这个不平常的年代里，科学家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生物进化的发展，提出了时代的命题，人们为什么还认识不到它的重要和必需呢？

啊，科学家的请求，像秋天的树叶，飘落在厚厚的地被物上，黄宗英这个非科学家的请求，命运又是怎样的呢？……

为了小木屋，黄宗英的心脏和徐凤翔的心脏紧紧贴在一起了。有谁能测出：一个科学家的愿望和一个作家的愿望融在一起的时候，能释放出多少震撼心灵的热能？而我清楚地知道这热能不管威力大小，都浓缩着对祖国深深的爱！

经过一番思考，黄宗英的思绪像雪线一样清楚了，她默默地将“请求书”一张一张地撕了，撕了。

她毅然地决定，立刻在稿纸上为徐凤翔建立一座小木屋，建立一座勇敢、意志、智慧的圣殿！

西藏高原的十一月，到处都是浓浓的冬意。一场场纷飞的大雪，把世界屋脊打扮得更加洁白、壮丽。雪后的早晨，天特别蓝，层层叠叠的雪山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那么晶莹，那么神秘，仿佛每个山谷中都盛开着雪莲，生长着迷人的童话。

在波密岗乡的那片原始森林里，每棵云杉都顶着一片白皑皑的雪花，它们那样雄伟、那样有气势地屹立着，向这个世界展示着生命的倔强和无所畏惧的气概。

那三顶帐篷没有踪影了，那欢乐的笑语消失了，唯有黄宗英做饭的那个小木棚还立在那儿。不过，留在森林深处的还有一个极其珍贵的东西，那就是她们的梦，关于小木屋的梦……

此刻，黄宗英和徐凤翔坐在解放牌卡车的驾驶室里，她们要沿着风雪弥漫的川藏公路行驶一千八百三十八公里，才能到达成都。入冬以后，这是一条极其危险的路程，为了考察沿途森林的生态和采取标本，徐凤翔不听波密驻军领导的劝告，固执地要走这条远而险的老公路线，黄宗英是个忠实的协从，高兴地奉陪。

一天又一天……

卡车穿过大玛拉山、雀儿山、二郎山……

她们有时沉默着，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有时却说说笑笑，忘记了旅途的颠簸和疲劳。

徐凤翔说：“宗英，我不该让你和我一起走这条路，出了事，我可怎么承担得起？”

黄宗英说：“我出事，你也出事了，谁也用不着承担。”

老司机说：“唉，我驮着总共一百二十岁的两位知识分子，这回是大大地超载了！”……

夜色渐渐地浓了。群山的轮廓已经看不清了，只有几颗淡淡的小星，在远方闪烁着。寒风，在车窗外任性地呼啸，不时还能听到一两声野兽的嚎叫，使人感到有些恐怖和孤独……

悬崖深壑之夜，是这般静，这般静。连会车也极少。

车灯的光射出去，我们往往会发现：远远的，一个，两个，三五成群的小黑点。迎面一步一长跪、五体投地、叩着头走来。车近了，黑影站住。车过了，从反光镜中看到黑影又跪下了。有时，有一群黑影缩在岩边睡着。那是虔诚的朝佛者。他们就这样地向拉萨——神往的地方走去。

走两个月、三个月、半年。如果有人因冻饿、疾病死在路上，会被欣慰地认为是被神接去了。初进藏时，我第一次见到此情景，曾震慑地呆住了，并悄悄地落过眼泪……

“我不如他们虔诚……”徐凤翔喃喃地说，她的眼睛凝视前方，眸子里蕴蓄着内在的坚定。

我懂，我承认：“……远远不如……”

我们——一个一个，一群一群，一批一批知识的苦力，智慧的信徒，科学与文化的“朝佛者”啊，我们也是一步一长跪地在险路上走着。恁是怎样的遭遇，我们甘心情愿，情愿甘心。

一九八三年除夕之夜，在爆竹声声，焰火灿灿的时刻，黄宗英铺开稿纸，开始修改报告文学《小木屋》。黎明时，她已从头至尾改了一遍。放下笔，她轻轻地吐了一口长气，感到欣喜和轻松。窗外，高大的雪松郁郁葱葱，在晨光的辉映下，仿佛是树林神来到了面前。那一树腊梅花开得那样明丽，那样喜气洋洋，好像在告诉人们：又是一年新春，一切都应该更加美好……

榴花似火的五月，报告文学《小木屋》在《文汇月刊》发表了。这篇作品立刻在读者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人民文学》很快便全文转载了。后来，《小木屋》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不久，黄宗英产生了一个想法，打算将《小木屋》拍成电视报告文学片，献给广大观众。这个想法得到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支持。于是，她又给电影局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这样写着：

强迫你们当我的《小木屋》的第一批读者，此文发表在《文汇月刊》五月号，但我要在五月份以前，为呼吁落实一个电影摄影或电视摄制组，入藏拍摄西藏的森林！

当你们收到此件时，我已到了北京，领奖是虚，呼吁未来是实！

我祈祷我的《小木屋》能感动你们：有权的帮权场！

当然，并不是按我的文章拍，我还有写记录片解说词的履历——党的培育也。

此刻，是什么风、什么雨？我不管；想干成一桩事，只好什么都不管！

谨致

顺心如意！

宗英

一九八三.三.十八

五月，春天的脚步迟迟跨进了西藏高原。积雪开始融化了，叮咚的泉水胆怯地开始了歌唱，无边的原始森林，更加苍茫了，格桑花沿着牧人的脚印，

越开越多。

黄宗英带着摄制组在波密岗乡的原始森林里，又和徐凤翔相会了。像一年前一样，她们俩又住进了一座帐篷。迎接她的还有白玛、尼玛……

这部电视报告文学片，要充分反映森林生态研究专家徐凤翔的工作和愿望，要真实地表达她对事业的忠诚和热爱，让她那颗火热的心，袒露给祖国和人民。因此，徐凤翔是这部片子的主角，而黄宗英是采编兼演员。

电视片中有一组徐凤翔和黄宗英在帐篷里夜谈的镜头，十分真实，十分动情。

深夜，在原始森林里，风在呼啸，雨在横飞，帐篷里两颗心——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了！那赤诚、深情的肺腑之言，怎能不催人泪下呢？！这组感人的镜头，竟是摄制组冒着夜雨偷拍和抢拍的。

是啊，徐凤翔名不见经传，说不上有什么丰功伟绩，但是她立志献身于祖国高山森林生态的研究。几年来，她六进西藏，到处苦求，希望在藏东南建一座可开展研究工作的小木屋。七年了，七年是漫长的，人生能有几个七年呢？小木屋仍然是个美丽的梦……

而这个对祖国、对人民有好处的梦，为什么迟迟不能变为现实呢？

黄宗英在一篇作品中感叹地写道：

云杉，是针叶乔木，冬不落叶。它悄悄地生长在山峰的阴坡，靠自然飞籽而成林，是栋梁之材。

云杉，没有艳丽的花蕾，也没有娇姿异香，正像我国历朝历代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他们的一生，索取极薄，积蕴丰厚，以其挺拔的身躯，坚实的品格，屹立于祖国科学与文明的圣坛，滋润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

他们传统地夙有忧国忧民、振兴中华之志。为了在科学文化上有所建树，为了对人类有所贡献，为了不白白地为人一世，心甘情愿做阴坡上的云杉，心甘情愿献出自己的躯干和心灵，而不愿成为无所作为的自然倒木，或被滥砍滥伐，甚至遭邪火毁林遍山野！

徐凤翔，只不过是大大小小云杉林中的一株云杉……

在一个美丽、晴朗的早晨，绯红的朝霞涌满了森林。树林神的怀抱里，出现了一座小木屋……

那是童话吗？那是梦境吗？

不，那是驻军的战士，为摄制组搭起的小木屋，也是为徐凤翔搭起的小木屋！

这座小木屋，和梦中的小木屋多么相似啊！尖尖的屋顶，浅浅的走廊，那门，那窗，那翘立的小烟囱，以及那簇拥着小木屋的山桃花和野杏花……多么迷人啊！

徐凤翔远远地望着小木屋，不敢靠近，因为她怕走近时小木屋会消失。尽管这小木屋不是真正的高山森林生态研究站，可徐凤翔觉得它是，真真切切地是啊……

于是，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返身跑回帐篷，扑在自己的床上激动地痛哭起来。这时，黄宗英也在她身边抹着泪，哭得那样委屈，却又是那样畅快。

啊，这是欣喜的泪？还是伤心的泪？这是希望的泪？还是失望的泪？……

这是科学家和文学家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中，感情极其复杂的泪，

如果这泪能凝成水晶，我相信透过它，一定能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和苦衷。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工作，电视报告文学片《小木屋》拍摄完成了。徐凤翔带领摄制组的同志们来到了达卡湖畔。

蓝莹莹的湖水，绿油油的草地，远方逶迤着峻峭的群山，近处映衬着美丽的树林……

黄宗英和徐凤翔骑在精壮的军马上，沿着湖边缓缓而行。此刻，她们的心情和这高原的湖光山色一样明丽。突然，徐凤翔发现黄宗英在马上叠了一只纸船：

“呵，多美的小纸船啊！”

黄宗英笑着说：“这是我们的希望号！”

在一片盛开着格桑花的湖边，她们跳下了马背，黄宗英在小纸船上写了八个字——一息尚存，不落征帆！

徐凤翔一看，泪水立刻涌出了眼眶。啊，这是她在墨脱林区得了重病，脱险后写在日记本上的话。这是勇敢的生命在赶走死神后，骄傲的呐喊！

她们把小纸船放进了湖中。碧波粼粼的湖水，理解了人们的心意，它轻轻地托着小纸船，托着一个林业专家的希望和追求，向远方驶去……

远方啊远方，远方有希望的彼岸吗？黄宗英望着湖水浩渺的天边陷入了沉思。

当黄宗英要再次告别森林的时候，她突然得了病，胸部和腰间剧烈的疼痛，三四个晚上只好咬着牙坐在床上，不能躺下睡觉，也不敢大声呻吟。据说是患了带状疱疹。大家见她病得这样痛苦，决定让她提前下山。

那天清早，徐凤翔和白玛把黄宗英连拖带抬地扶到了马背上，她还强颜欢笑地说：“这病真怪！疼得不能哭可以，反正有好多年不想哭了，可是疼得不能笑，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痛苦……”

通讯员小尼玛斜背着枪，为黄宗英牵着马上路了。同志们恋恋不舍地送到山脚下，黄宗英骑在马上疼得不能回身，可是徐凤翔还在那棵高高的云杉下频频挥手。

啊，再见了！再见了！

什么时候再相逢啊？！……

中央电视台拟定九月二十七日播放电视报告文学片《小木屋》。在看试片时，许多同志说它像信手拈来的散文，像兴之所至的写意画，当然，也有的同志说它像一首诗，深沉而又隽永，让人们的心潮久久不能平静。

此刻，黄宗英是怎么想的呢？

思想力度是艺术魅力的内核，此片毕竟尖锐地触及了现实。这是由现实所提供的素材本身决定的。对于这部片子能不能播放？老实说，我是捏着把汗的，但是我们没有动摇过，因为我们所表现的，是国情现状中的真实的一部分（任何一部艺术作品，都难以对国情做全面的表现）。我们摄制组置生死于度外，难道只为了拍摄西藏美丽的风光？又岂仅只为了一个徐凤翔？为了一座小木屋？……

人们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黄宗英可算是有智慧、有远见、又有胆识的工程师。

一九八三年二月，她在稿纸上为徐凤翔搭了一座小木屋。

一九八四年十月，她又在荧屏上为徐凤翔搭了一座小木屋。而且这座《小

木屋》在第二十八届纽约国际电影、电视节上，获电视纪录片铜牌奖。

可是，这毕竟不是真正的小木屋啊。又过去三年了，高山森林生态研究站还没有建起来。在社会主义建设开始腾飞的今天，这座科学的小木屋为什么这样难建啊？难道它还只能是一个林业专家的梦吗？不管她醒着、睡着，只要活着，她就迷恋这个梦啊！她祈求着，她等待着，有一天这个梦不再是梦……

喜马拉雅山的雪峰在天边矗立着……

雅鲁藏布江的波涛在莽野奔腾着……

波密的原始森林又迎来一个迟到的春天……

传说中的树林神和护林神，又驾着白云来到了人间……

一个个，一群群的朝佛者，仍在风雪的路上一步一长跪地叩着头……

今夜，徐凤翔还要做小木屋的梦。今夜，黄宗英也要做小木屋的梦。啊，小木屋……

都乐公司

蔚蓝的天空，无边无际，显得那样辽阔，那样神秘，当你把目光投向远方的远方，立刻会产生许多遐想。几朵蓬松的白云迎面飞来，轻轻地从机翼下滑过，在阳光的映照下，它像晶莹的雪那样美，那样迷人……

今天是一九八五年七月三十日，黄宗英乘坐 3524 航班机由上海飞往广州。

此刻，她左手托着面颊，靠在舷窗上，显得有些疲惫。也许是由于消瘦了，她好像老了许多，不过，她的目光还是那样明亮，那样热情，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一个多月前，黄宗英离开了深圳特区蛇口工业区，离开了她的都乐文化娱乐公司，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参加在西柏林举行的地平线国际艺术节。

结束了在联邦德国的访问后，她又应许多法国朋友的邀请，第二次访问了巴黎。回国后，她没有心思在北京休息，也没有心思在上海仔细地检查一下身体，匆匆忙忙去医院要了点治胆结石和治胃病的药，就登上了这班飞机。因为她十分惦念她的都乐公司。作为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她清楚地知道：一个多月不在，有许多工作，许多矛盾，正等待她解决。

黄宗英没有兴趣欣赏舷窗外的蓝天、白云，也没有心情回忆西柏林盛开的郁金香和巴黎的凯旋门、埃菲尔铁塔……她只想快点飞到广州，快点回蛇口工业区。

蛇口，是深圳的一片小小的海湾。由于它的工业以惊人的速度飞快地发展，已有一百多种产品打进了国际市场，初步形成了外向型的经济结构，引起了国内外的瞩目。黄宗英的都乐文化娱乐公司，就像这个工业区里的一朵扶桑花，迎着海风默默地开放了。

都乐文化娱乐公司，是蛇口工业区和香港天下有限公司的合资企业。深圳市政府于一九八四年八月七日批准开业的。黄宗英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公司，爱着这个陌生而又有诱惑力的岗位。她在一篇文章的题记中这样写道：

都说我是属云的。闯天涯，游海角，连个永久通讯处也没个准儿。

只是，云也有脚。此刻，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广东省深圳特区南端一个小小的半岛，把我拴住了。

云是接受地上的水气蒸腾而成。至于它将化为春雨？冬雪？霪霖？还是雾散云消？云，自己又怎能做得了主？走着瞧吧。

做为一个作家和一个电影艺术家，黄宗英是很清醒的，面对数不清的来访者、采访记者，以及从全国各地飞来的约稿信、约稿电报，她感到为难了。因为黄宗英已经意识到，作家飞笔驰翔的小白帆，暂时离她远去了。她说：我已踏上群帆满升、八面来风的商船。我是一名新水手……

是的，踏上商船的新水手是很不容易的，首先要过“晕船关”，否则她怎么能乘着商船远航呢？黄宗英为什么要心甘情愿地当这名新水手呢？社会上许多人不理解，因而产生了许多猜测。可是猜测毕竟是猜测啊，黄宗英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七日，她给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我是有着四十四年艺龄的知识分子，如我不干企业，可能是全国数得上的富有的知识分子，干上企业，我却是全国最穷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了。我携

笔从商的目的，在以身试政，借特区一角，创造一个“有志者伸其志，有才者展其才”的小小气候，来证明我国艺术家、科学家的智慧是有经济价值的。

如今，我在创业之始，起步艰难，望扶植我迎八面来风，只要在企业上站住了脚，我将十倍、百倍地报效国家，为党争光……

都说作家和艺术家是天真的，黄宗英在生活中常常会充分地表达这种天真。她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可是她的性格，她的活跃的思路以及对文学艺术事业的热恋和追求，仍像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她想干的事，就一定要干到底，而且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她也不会回头。

黄宗英是一九八三年十月来到蛇口的。那时，她是作为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员，来蛇口作考察的。当考察结束后，她竟然决定不回北京了，也不回上海了，要留在蛇口工业区工作。

她的决定是那么突然，那么令人感到意外，政策研究室的领导和同志们都惊愕了。其实，对这样一个决定，后来她回忆起来也感到惊愕，因为由于她的天真和勇敢，有许多具体问题还没有仔细考虑。留在蛇口工业区干什么？能干什么？她还相当朦胧。

不久，应劳动服务公司之聘，她义务担任宝耀公司副经理。宝耀公司是生产包装纸箱的企业，在这个公司里，她开始学习有关企业方面的知识，初步尝到了当经理的繁忙和苦衷。后来，由于蛇口工业区的信息反馈，又使她逐渐想尝试以企业方式办文化事业。她深深感到长期以来，我们的“大锅饭”淤积艺术人才、桎梏艺术青春，限制艺术繁荣。另外，她清楚地看到经济起飞的特区，虽然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密集，而文化艺术事业却还是一片沙漠。于是，这种形势像一股雄风，把她推向了另一个舞台。

正在这时，一位法国华侨朋友很欣赏黄宗英的志愿，决意出资，以借贷方式支持她创业。于是黄宗英便先后在香港筹建天下公司，在蛇口筹建都乐公司。

一九八四年三月，黄宗英开始筹建都乐文化娱乐有限公司，很快便草签了意向书。可是，深圳市政府还没有批准开业，工商管理总局还没有发给营业执照时，她公司的影视部竟开始联系业务，签定了一部影片合同。要在合同上盖章时，她才意识到公司的章还不合法。这时，黄宗英着急了，连忙给蛇口工业区的领导写信，在信笺的左上角写着：S·O·S！！十万火急；信笺的右上角画了三根鸡毛，而且是斜飞的鸡毛。看来，这是一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鸡毛信了。

××同志：

董事长啊，董事长！

感谢你屡屡热情关怀，尤其是经济论证，将对我未来的小小公司，给以最大的保障和维护。使我真的不会跳楼，跳到地产公司的水门汀地上。（跳海不行，我会游泳）我无论如何不相信以企业方式办文化，以商养文这条路走不通。

已抬起的脚，不能往后倒，只能往前闯。这里十万火急的是：

我已效蛇口效率，接受一批合同，而我公司尚未注册。摄制组即应开机，演出部要接团……一切行动我公司都得与别的厂、团签合同，而我公司的章尚不合法，不能使用，用了也不能以之办各种所需手续……

董事长，你得出面给我担保，万一注册不成，我公司现有活动是合法的。你若不能做出书面的担保，我就不能履行已签合同，那么，本公司没起步，

即将因违法而流产。

我明日赴京，请无论如何给我一个书面担保。

黄宗英稽首

黄宗英的这封信是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写的，而到八月七日，深圳市政府批准她的公司开业，九月五日发给了营业执照。

当黄宗英回到蛇口时，她已在北京完成了电视报告文学片《小木屋》的制作。都乐文化娱乐公司将假座蛇口的游乐船——海上世界举行晚会，对外宣告成立，并同时漂亮的碧涛中心剧场试办三场演出。

作为董事长兼总经理的黄宗英，正式“当朝理政”了。

都乐公司的办公室还设在活动的小铁皮房里，小铁皮房临时搭在太子路边的小树林里。他们十几个人没有条件办食堂，也没有地方搭伙，常常靠吃方便面充饥。一天两天可以过，日子一长，看见方便面就腻，甚至一想到方便面的小纸包就恶心。这种创业的生活，也算得上艰苦和浪漫了。

如今，都乐公司的办公室设在碧涛中心大厦的三楼上，房间虽不大，却整洁、明亮，有空调设备。小巧的办公桌，紫红的电话机，草绿色的腓纶沙发，给人一种现代化企业的气息。坐在这样的办公室里，黄宗英却没有忘记那几间小铁皮房，也没有忘记那一片青青的小树林。每当朋友们来蛇口时，她都要带着他们去小树林里转转，回顾那些不能忘却的生活情景。

黄宗英回到蛇口的时候，荔园的荔枝早已采收过了，她本来想吃点荔园的鲜荔枝，却没有吃到，只见几棵龙眼树上还挂着一串串土黄色的龙眼。她感叹地在心中念叨着：“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就是一年……”

是的，一年就这样匆匆忙忙地过去了。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黄宗英和她的都乐文化娱乐公司究竟干了些什么呢？他们拍摄了电视片《3215》（原名《蛇口人》），该片是由蒋小松导演的，它通过一个中国姑娘——程琳和一个日本企业家的旅游，生动地介绍了蛇口的建设和发展。另一部电视片《大漠风情》，是由国务院林业部委托摄制的，导演是翁路明。它描写的是大西北靠近毛乌苏沙漠的人民和风沙进行顽强斗争的故事。《朝霞与晚霞的对话》，是广州暨南大学委托拍摄的，这部报告文学片的导演是黄宗英的小儿子——赵劲。黄宗英不仅是该片的策划，她还走上屏幕，以访问者的身份，自然而又巧妙地介绍了这家在海外华侨中颇有影响的大学。艺术性纪录片《深圳风情录》（原名《深圳之谜》）是由薛靖导演的。这部影片以它清新、真实的艺术风格，反映了深圳特区的建设风貌和多采的生活。由滕文骥编导的歌舞片《大明星》，想以它特有的艺术魅力，给人们留下美好的记忆。影片《无情的情人》，是由都乐公司和香港南方影业公司、珠江电影制片厂，三家共同投资拍摄的。导演是晨逢，刘晓庆担任监制并主演这部影片。它讲的是一个农奴主的女儿和她的农奴相爱终又相恨的故事。受国务院旅游局委托摄制的风光短片《桂林》也已摄制完成。公司自己筹拍的电视系列片《中国一绝》，已经开始试拍。此外，还有一部电影和一部电视报告文学片在筹备拍摄……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三日，香港《文汇报》刊载的文章说：

“有人说，都乐的能量差不多已等于内地一家中型电影制片厂，虽然都乐只有十来个人。此说其实并不夸张。”……

尽管都乐公司有了这样一些业绩，但它却没有电影、电视片的发行权，这对黄宗英来说是十分苦恼的。为此，她给有关的领导同志写过信，向有关

的部门写过申请报告，不止一次地去北京奔波、求援，可是仍然得不到解决。有时她伤心地说：“唉，没有发行权，只好给自己出嫁的‘女儿’临时找个‘爸爸’了。而且还要把好不容易赚来的钱，眼睁睁地分给人家……”至于这些影片、电视片的艺术质量如何？黄宗英相信，观众是会做出公正的评论的。

都乐公司的都乐书屋，设在碧涛中心大厦的一间临街的铺面房里，它的生意并不十分兴隆，却是蛇口专营图书的书店，对于知识分子密集的工业区来说，仿佛是一块文化艺术的绿洲，具有特殊的魅力。

都乐公司的录音、录像部设在碧涛中心大厦的四楼。黄宗英用几十万元美金的贷款，进口了先进的设备，又从北京、上海、武汉等地聘来了技术人员。黄宗英在录音、录像部的投资上是大胆的，也是相当有魄力的。因为她确信这个部门投产以后，会为公司创造财富的。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日，日本著名的电影评论家水上靖先生到蛇口参观。他在中国影协老陈和深圳电视台台长祝希娟的陪同下，来到都乐文化娱乐公司时，特别有兴趣地参观了录音、录像设备，并观看了技术人员的操作，听了录音效果。参观结束后，满头银发的水上靖先生，带着亲切的微笑向工作人员告别。

当时，黄宗英也被这位电影评论家的真情感动了，她诚挚地对水上靖先生说：“我的公司还是个新生儿……”“不，它已经长大了，而且很有希望！”水上靖先生热情地鼓励道。

黄宗英在都乐书屋买了一本精装的《赵丹书画集》，赠送给水上靖先生。并请他将华国璋的摄影画《猴子观海》，转送给日本著名的导演松山善三和享有盛名的电影演员高峰秀子夫妇。

黄宗英这次从联邦德国和法国访问归来，没想到都乐公司竟出了一系列让她伤脑筋的事：蛇口公安局赶走了都乐公司没有办理暂住手续的五名临时工；影片《深圳之谜》（改名《深圳风情录》）送审，在北京、在深圳都没有批准发行；都乐公司成立后，没有按时交管理税，被税务局罚款几千元；公司的面包车压死了人，肇事者和司机都被拘留了；有人给工业区党委写信，反映都乐公司缺少严格的企业管理，经济帐目混乱……

面对这些问题，黄宗英怎么能不着急呢？

这是她携笔从商以来，受到的一次沉重的打击。此时此刻，她显得非常镇静，镇静得像一位突围的指挥员。她的敏感，她的洞察力以及她从少女时代就形成的坚毅性格，竟然使她特别清醒、特别冷静。这种清醒和冷静是何等重要啊！也许这就是她有可能冲出“重围”的起点。

我有时糊涂，非常糊涂。可现在我心里清楚得很，像明镜儿似的清楚。我不相信我管理不好企业，只要我学，什么都能学会。我始终这样自信……

也许是当过演员的关系，我随时都知道别人怎样看我，而我也知道该怎样做……

是的，在这样一个困难的处境中，黄宗英的镇静和清醒，是令人敬佩的。她彻夜不眠，在灯下给蛇口工业区党委写信，阐明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决心立即改变公司的混乱状况，集中精力将生产搞上去。紧接着她在公司召开了生产会议，把要抓的事作了明确分工。没几天都乐公司就开始呈现出一片浓浓的生产气氛。

望着黄宗英有些疲惫的面容，我突然想起她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办企

业有风险。风险是企业舞台上魅人的追光，我和公司的伙伴喜欢在风险的追光照射下，乐而舞之。”

但是，这种“乐而舞之”，是多么不容易啊！舞台毕竟是舞台，办企业毕竟是办企业，在“企业舞台”上可不是任何人都能起舞的。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五日深夜，黄宗英在上海家中，曾给蛇口工业区的领导写过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

在北京、在上海，关于都乐公司的传闻之乡，令我惊奇、生气。有人幸灾乐祸，有人拉我易地为良，有人劝我退下阵来，我一笑置之，反倒觉得“奇趣妙在奇险”了。

我草草回顾，在蛇口工业区党委的支持下，都乐公司的工作还是成绩为主的，我们的以商养文、以文养文的宗旨没有错。至于我们把精力扑在文上，疏忽了企业管理，有些事不合手续，有些事有失误，我看也只是“小伤风”、“重感冒”之类。是可以纠正的，可以恢复健康的。

我愿干干净净、辛辛苦苦撞死在可能突不破的文化改革上，而决不愿、也决不会走歪门邪道去发财。

这次出国前，上海华东医院就要留我住院检查，我知道“渐进性消瘦”引起医生的“？”是什么意思，即使“？”的答案是不吉利的，我也无所谓。老实说，我才不管它三七二十一的是什么毛病哩！……

黄宗英有时是很清醒的，清醒得令人吃惊和敬佩，有时却是糊涂的，糊涂得教人哭笑不得。特别是她一坐到书桌前提笔写作时，许多事情在她面前都会变成天书，她也就变得更糊涂了。

两年前，她有个银行存款单找不到了，只好到银行去挂失。银行的工作人员问她：“你把存款单放在哪里啦？”她摇摇头说：“不知道，知道放在哪里就不来挂失了。”几个月以后，她生病躺在床上，随手翻阅一本书时，发现那个存款单夹在书里当书签了。

一九八四年六月，黄宗英第二次进藏，拍摄电视报告文学片《小木屋》时，《文汇月刊》愿给她出路费，并希望她为刊物写一篇新的报告文学。可是黄宗英从西藏回来后，就去蛇口忙都乐公司的事了。等她想起要向《文汇月刊》报帐时，却一张车票、一张单据也找不到了。

我让她好好想一想，究竟把单据放在哪儿啦？她认真地想了半天，对我说：“我好像记得放在一个信封里，这信封在哪儿？在北京，在上海，在蛇口……实在不知道在哪儿。”只好交给我四百元钱，让我去《文汇月刊》找梅朵同志结帐。

黄宗英的好朋友美籍华裔朱先生，介绍美国一家巨商的代理人，到蛇口来找黄宗英，他要买六万只集装箱。黄宗英得知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厂一年的产量也达不到六万只，就道歉送客了。

事后，好多人笑她这个书呆子办傻事。六万只集装箱的出口，有利于国家，有利于蛇口，也有利于都乐公司。这一笔可观的佣金，可供都乐公司“以商养文”养一阵子。可惜失去了这样一个赚钱的机会。可黄宗英耸耸肩扬着手说：“唉，我怎么懂得集装箱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要买那么多集装箱，哈哈……”

春天，林学家、园艺专家秦官属来找黄宗英，她近年来在秦岭、巴山搞细胞培养、无土培植的科研取得了成就。这次来蛇口就是要和黄宗英商量，希望都乐公司投点资，西安方面也投点资，在蛇口搞个园艺公司。

黄宗英说：“投资问题不大，可土地、房屋我没有，你要找蛇口工业区有关方面一一落实。”

那几天黄宗英正忙着全国第五届金鸡奖评奖的事，一时脱不开身，只能让秦官属自己去跑了。

两天后，秦官属交给黄宗英一叠手稿，说：“蛇口工业区的领导热情支持，你签字吧！”

“我签字？”黄宗英问。

“对，签吧。”

黄宗英匆匆翻看了这一大叠文稿，说不清是学术论文，还是可行性研究；也说不清是意向书，还是协议。反正两个人都认认真真地在末页上签了字。真是一对可爱的、天真的马大哈姐妹。

过了两个月，秦官属竟派人带着种子、花苗到蛇口来了。这时黄宗英才“醒”过来：天啊！地在哪儿？房子在哪儿？花苗来了，算不算园艺公司成立？可园艺公司还没有申报注册呀！……

只好紧急求援，把那些花苗栽到蛇口的山坡上，至于这些花苗活了多少？长得怎么样？是否开过花？黄宗英不知道，秦官属也不知道。

黄宗英干的这些糊涂事，已经成了她的趣闻。每当别人问起时，她从来不回避，自己也觉得可笑。

有时办点糊涂事，人家还肯原谅，如果日子长了，糊涂事办多了，我自己也不能原谅了……

“五光十色的传闻，跟了我大半辈子。这对女演员来说毫不希奇……”黄宗英的话是有道理的，几十年来，在她的生活中，总是有那么多传闻跟踪着她。有时使她吃惊，有时使她生气，有时使她烦恼，有时却又使她哭笑不得。自从她到蛇口后，有传闻说黄宗英发了大财，于是，有人写信要她投资几千万人民币，也有人要她引进外资一亿美元，对这样的要求她只好笑笑。还有传闻说黄宗英赔了钱，她的都乐公司就要破产了，于是，有人说：“是啊，她哪会做生意，这不是演戏，更不是写文章。”也有人说：“她在上海当她的作家多好，有好日子不过，是个神经病！”……

听到有关“破产”传闻，国内的亲友为她担心，国外的亲友也为她担心，都纷纷表示关怀和慰问，有的打长途电话来询问，有的还急忙跑到蛇口来看望她。这使黄宗英感到欣慰，她觉得她不是孤独的。

一年来，都乐公司没有发大财，黄宗英更没有发大财。她还是每月拿她的内地工资，加上在特区工作应领的生活补助费。她是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却没有拿过职务工资。她说，等公司赚了钱，真富起来的时候，再拿总经理的工资。

眼下都乐公司没有赚钱，也没有破产，所有的员工都在尽心尽力地工作，希望公司能冲出困境，一天天地兴旺起来。

黄宗英对都乐公司仍充满了信心！

赔赚乃商家常事，何足挂齿。只要我公司不宣告破产，就不能给我下“赔了”的定论。我就还不是“败军之将，不敢言勇”……

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这个小小的公司，已经让我国百余名影视工作者多得到一次艺术实践的机会，艺术青春也就多闪光一次——我们大大的赚了！而且无论都乐公司将来经济效益高低损益如何，在此项——培植、保护、发挥、伸延艺术青春的帐目上，是注定了永远也不会出现赤字的！

黄宗英开始动手修改影片《深圳风情录》了。

一连几天她都是从黄昏工作到凌晨，过度的疲劳促使她的胃病和胆石症又发作了。疾病的痛苦迫使她卧床休息，可她的心还在《深圳风情录》的一组组镜头中。

经过几天治疗，黄宗英的病情好转了，她立刻又投入了《深圳风情录》的修改工作。她办公室的灯光，总是从夜里一直亮到黎明。

正在这时，她的女儿赵橘从美国回来探亲了。女儿离开妈妈五年多了，漫长的日子，漫长的思念，有多少次她们母女只能在梦中相逢。

八月十七日赵橘来到蛇口，来到妈妈的身边，可是妈妈没有时间陪她玩，也没有时间畅谈别情。黄宗英白天忙，夜里也忙，当早晨回到宿舍时，女儿不敢和她多说话，只希望她能多睡一会儿。

“妈妈，累了吧？”

“不累。就是头有点疼……”

“吃点东西，睡吧。”

“脑子还在兴奋……”

黄宗英吃了安眠药，躺在床上睡着了。这时赵橘脱了鞋，悄悄睡在母亲身边，像小时候那样，尽情享受母爱的温暖。

第二天，在北京餐厅吃早餐时，赵橘望着妈妈心疼地说：“妈妈太疲劳了，您显得老多了……”

黄宗英朝女儿笑了笑，转身对我说：“我现在并不觉得老。也许有一天我会突然老了，也许突然一个小时后就老了。……”

赵橘在蛇口住了两天就飞回上海了。

三天后，黄宗英也离开了蛇口，她带着修改后的影片《深圳风情录》和电视报告文学片《朝霞与晚霞的对话》，飞往北京送审了。

此刻，不知为什么，我又想起春天的一个黄昏，踏着涛声，我们在蛇口海滨花园听黄宗英背诵她的诗的情景：

几番踌躇，
几多担心，
我来到众说纷坛的蛇口半岛，
猜不着等待我的是什么。
怎敢轻易以心相许，
岂能草率以笔相与，
像初恋的少女，
晓色朦胧中，赴约来会陌生的情人。

啊，黄宗英，这不是你一年来在蛇口，在都乐公司的写照吗？你的心是火热的，你的爱是纯真的，你永不衰老的青春是美丽的。但愿你所会的陌生的情人，不是无情的情人……

祝你成功！祝你成功！

白鸽，在蓝天飞翔

五月，是江南处处如画的季节。

一片片油菜花，一片片紫云英，一片片吐穗的麦子……像色彩缤纷的云朵，簇拥着一条条闪光的河水、一座座映着波影的水乡。风车在轻盈地转，白帆在欢乐地飞驰，杜鹃在任性地开放……

在这美丽的季节，黄宗英要随中国科学作家记者代表团去美国访问。这是她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次出国。

黄宗英没有去过美国，美国对她来说是陌生的，可也是熟悉的；小时候她最喜欢唱一支美国民歌——《可爱的家庭》，上小学时，又从冰心的《寄小读者》一书中，看到了美国慰冰湖粼粼的湖水。以后，她又读过杰克·伦敦、海明威、斯坦倍克、爱尔兰考特、奥尼尔等作家的作品，还看过许多美国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影片。但是，后来对美国的了解却越来越少了，特别是对当代美国文化科学的情况所知甚微。直到中美建交以后，才重新开始接触这片隔阂了很久的领域。

在美国访问期间，他们一行九人，得到了热情、友好的接待。

当一位美国朋友问黄宗英：“您为什么这次能到美国来访问？”

黄宗英微笑着答道：“作为当代作家；我尊重当代科学；可我也信当代科学尚难于解释的‘缘分’。地球上有一百多个国家，四十几亿人口，为什么此时此刻我偏偏来到美国？我认为是有缘！我们常说，有缘万里来相会！”

黄宗英说完开朗地笑了。

美国朋友们也笑了，并激动地鼓起了掌。

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在华盛顿，使我惊讶的是美国许多学者和朋友，对中国文学，从屈原、李白、杜甫，到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吴组湘、艾青……直到许多青年作家的作品，竟那样熟悉，并作过不少研究。

啊，中美两国的科学家、艺术家，恰似传递希望和友谊的白鸽。在晴朗的天空，在暴风骤雨中，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鸽子不会迷失方向，信息也从未中断……艺术家贵在坦率，科学家贵在求实。

各国人民间的友谊是永恒的，科学家和艺术家所追求的是真、善、美，是人类共同幸福，他们的命运是休戚与共的。大海固然有领海、公海之分，但水水相连并不受制约，像我们的心一样……

晨光，轻柔地将淡蓝色的窗帘映亮了，静静的早晨显得更加清新、美好。

黄宗英醒来了，透过窗上的晨光她猜测着：今天的天空仍然会是一片蔚蓝……

昨晚在美国朋友家中做客，回到旅馆夜已经很深了，当她洗完澡，一上床便疲倦地睡了。真没想到，今天早晨竟醒得这样早。

桌子上有一个墨绿色的大花瓶，花瓶里有一束鲜红的玫瑰花，散发着浓郁的清香。黄宗英望着这束玫瑰花，突然想起了参加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八十寿辰庆祝宴会的情景。

那个难忘的寿辰庆祝宴会，是周恩来总理一九五六年上海为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举行的。席间，周总理幽默地祝贺她的四十公岁生日，愉快、庄严地代表中国人民感谢她对中美友谊和人类进步做出的贡献。

黄宗英记得年已八旬而风度依然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答词中有这样一段话，大意是：如果在座的朋友是二十岁，他们还有六十年的时光为

人民友谊和人类幸福去工作；如果四十岁，还有四十年；如果六十岁，还有二十年……

想到这里，黄宗英有些激动，仿佛那个宴会不是在二十多年以前，而是就在昨天……

啊，岁月的流水，总是这样匆匆地流逝，几十年竟这样飞快地过去了。真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啊！

黄宗英在想：中国的女艺术家如今没有隐瞒年龄的必要，我生于一九二五年，如果我能在人世间度过八十年华，那么，我还有不太短的时间，为中美友谊干点杂活，也许，我就是为此而到美国来的……

黄宗英望着那束玫瑰花感到十分亲切，她觉得每朵花都在对她微笑，甚至还听到它们在唱着一支美丽、深情的歌，那歌的旋律是友谊、友谊、友谊！

在美国访问的行程中，不知怎的，我常常想起居里夫人，倒并非因为欲涉足原子物理科学，更不敢以她自拟，是她，使我想起了：为了科学和人类的未来，她曾来到美国，得到过美国人民热诚相助的一克镭。我们此行，是带着友谊之心而来。我相信，我们也会得到美国人民心中的一克“镭”！

拉罗舍尔，是法国一个著名的城市。

它面临碧波滚滚的大西洋，像一颗珍珠，镶嵌在蓝色的比斯开湾。每年盛夏旅游旺季，都在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举行国际现代艺术节，向来自世界各地和法国各地的人们，介绍世界闻名的音乐、舞蹈和电影艺术家。

一九八一年第九届国际现代艺术节电影活动中，除介绍其他国家的几位导演外，将重点介绍中国电影演员赵丹，选映了赵丹一生各个时期拍摄的代表作品：《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乌鸦与麻雀》、《李时珍》、《海魂》、《林则徐》、《聂耳》、《烈火中永生》等八部影片。

黄宗英应邀参加这届国际现代艺术节，与她同行的还有中国电影史专家程季华先生。

由于黄宗英参加这届艺术节，艺术节上还要放映她在五十年代主演的影片《家》。

我与程季华同志于六月二十六日离开首都北京，飞往法国巴黎，然后又去拉罗舍尔。

在短短半个月不到的时间里，亲身体会到国际友人对中国影片和赵丹的赞赏。我们这个“双星座”代表团，在大西洋彼岸，受到特殊的重视；民间诚挚欢迎，官方礼仪有加。在海滨面对着壮丽古堡的“母子型”影院里，有五个放映厅，每天五个场次，同时间各放五部影片，自由购票前来的观众任择所好。

放映中国影片的放映厅内，上座之踊跃，出乎我们的意外。这些影片，只个别对口型口译了，大多只是打字幕，有的还是临时口译。

我起先想：高鼻子总还是会更喜欢看高鼻子的影片，因为生活接近些。没料到这些并非组织而来的观众，屏息静静地观看我国的影片，时而涌起会心赞叹的笑浪，而且竟常常鼓起掌来。

在拉罗舍尔，短短的几天内，黄宗英和程季华先生接受电台、电视台、报社记者的访问达九次之多。

举行记者招待会的那天，大厅中摆的座位不够坐了，椅子后面站了几层人。主人不得不请求坐着的记者们把椅子往前拉，好容纳后边陆续进来的人群，包括拉罗舍尔热心的市民群众。

夏日的古城，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阳光下，海水格外碧蓝，鸥鸟格外多。街心花园里，郁金香和玫瑰开得那么美，那么迷人……

当窗外奏起了音乐，和黄宗英他们的招待会“唱对台”时，听众还是止步瞩目，很有兴趣地听黄宗英介绍中国电影艺术家赵丹，并敏感地应和着阵阵笑声。

啊，人们多么想了解中国！多么热爱中国演员！

在法国的各国评论界人士说：“这是中国电影之再发现。”“通过这些电影，我们更了解中国了。”“中国电影有它独具的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特色。”“中国电影给了我们许多我们没有的东西。”……

此刻，黄宗英又记起周恩来总理生前说过的话：“别小看一部电影，有时比我们做多少工作的效果还强……”

此刻，黄宗英又想告慰九天的阿丹：“你主演的影片，不仅为促进各国的文化交流，增强人民友好起了良好的作用，而且还为国争光，为国际银坛增色了！”

当黄宗英在热烈的掌声中，接受一束束美丽的鲜花时，她含着激动的泪水，频频点头，向到会的各国朋友们致意。

啊，这美丽的鲜花，散发着友谊的芬芳，开在黄宗英的胸前，不，确切地说，这鲜花已经神奇地开在黄宗英的心上了，而且永远不会褪色，永远不会凋谢！

我不是仅仅作为赵丹的未亡人出国的，也不仅仅是他的终身艺术莫逆。赵丹是祖国的儿子，党的战士，他的艺术成就属于人民。真正的艺术家，永远把艺术生命看得比自然生命重要。

世界并不大，知音何其多！赵丹的艺术青春是长存的。人去艺在，艺人之幸啊！

我，既然带着中国艺术家的自豪和欢喜，应邀对外国朋友一而再地介绍了赵丹，我也愿意用同样的基调，将谈了又谈的话儿，略略告我同胞。

拉罗舍尔的晨光是可爱的，它像上海的晨光一样可爱。又一个美好的早晨降临了，我仿佛隐隐听到了大海的潮声，不，也许是我的心声……

第九届国际现代艺术节闭幕之后，黄宗英从拉罗舍尔回到了巴黎。

巴黎，是一座迷人的现代化城市。从地图上看，它像一片美丽的枫叶。现代化的建筑物一片片高耸入云，好多故宫和古寺院还在其中峙立着。塞纳河静静地、美美地从这个壮丽的城市中间流过……

黄宗英第一次来到巴黎，但对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巴黎圣母院、罗浮宫、凡尔赛宫、蒙玛特尔高地……却是熟悉的。因为在电影、电视和许多文学作品中，曾多次见过面。如今，她亲眼看到这一切，却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动情。

一天下午，沐浴着灿烂的阳光，黄宗英在法国朋友的陪同下，参观巴尔扎克故居。这座古老、普通的房子，已经是一个买门票的博物馆了。馆内的陈列物并不多，馆员们穿着十九世纪中叶的服装，倒令人感到新奇、别有风味。似乎走进这座房屋，就走进了巴尔扎克生活的那个时代。

从一八四一年起，巴尔扎克在这儿住了七年，他的伟大的作品《人间喜剧》就是在这座房子里诞生的。据说，那时他负了一身债，为了还债，只好日以继夜地喝着咖啡写小说。有时债主来了，贫穷的巴尔扎克便急匆匆走出后门，绕过那棵野生的大栗树，逃走……

一百多年以后，这儿却作为巴尔扎克的故居，成了博物馆，供世界各地的来访者参观。

黄宗英看着这一间间房子，想着巴尔扎克的作品：《贝姨》、《邦斯舅舅》、《农民》、《幻灭》……

当黄宗英参观巴黎圣母院时，被这座雄伟、壮丽的建筑吸引了。那三座高大的门，那数不清的浮雕，那凝着历史风云的窗口……都会使人立刻陷入沉思。

望着高高的钟楼，黄宗英仿佛听到了洪亮、悠远的钟声，想起了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加西莫多。登上钟楼，俯看格雷弗广场，阳光下，黄宗英看到远处走来一个美丽、纯洁的少女。她吃惊地发现，那位少女竟是雨果小说中的埃斯梅拉达……

七月十日，我告别了巴黎，乘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返回北京。

飞机在蔚蓝、辽阔的天空飞翔，机翼下，偶尔有白云掠过。突然，我看到一团淘气的白云，像我来时一样，总跟着我的视线奔驰。

啊，那不是白云，那是快乐的阿丹，他陪我一起来法国参加艺术节，又伴着我回国。

阿丹，在我们告别巴黎的时候，再为人民的友谊朗诵一首诗吧。怎么？你还没有写完？那就再唱一曲“郎里格郎”吧……

一月的东京，还被皑皑白雪轻轻覆盖着，它显得更美、更沉静、更多情了。一群群高楼大厦，闪烁着金灿灿的阳光，不断的车流，神奇而又有秩序地在不同层次的视野里飞奔。迎面吹来的风，是冷的，却令人感到清新、惬意，没有丝毫的凛冽感。马路边和街心花园的树木，已在枝头悄悄地孕育叶芽了。

黄宗英随中国电影代表团来到了东京。她是作为中日合拍的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的主要演员，来东京参加开拍仪式的。

这部影片，在开拍前中日两国的电影艺术家，已经筹划了两年多了。那时赵丹还没有病逝，他应邀在影片中饰演江南棋王——况易山。为了给赵丹配戏，黄宗英答应饰演况易山的妻子——婉怡。

不幸的是原日方导演中村登先生、原日方制片主任金原文雄先生和赵丹，相继病故了。这是摄制组极大的损失，也是中日两国电影艺术界的极大损失。

后来，日方导演由佐藤纯弥先生担任，中方导演仍是段吉顺同志。江南棋王由我国著名电影演员孙道临饰演。

两年多来，历尽曲折甘苦，充满诚挚深情的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终于开拍了！中日两国的电影艺术家，通过摄制这部影片，不仅忠实地反映过去，而且将促使人们坚定地把握未来。

在东京的开拍仪式上，黄宗英穿了一件中国汉族传统节日的盛装。她告诉记者，这件金光闪闪的衣服是阿丹生前送给她的。阿丹一生不修边幅，也难得记着给妻子买什么礼物。为什么在他们决定参加《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的演出时，阿丹要为黄宗英买这件衣服呢？

黄宗英还清楚地记得阿丹的话：

“中日合拍的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就要开拍了。到了那一天，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东京，举行开拍典礼的时候，你就穿上它。让日本朋友看看我的夫人怎样支持我的艺术事业，赞助中日两国人民悠久的深厚的友

情！”……

如今，黄宗英来到东京参加影片的开拍仪式了，心里真是有千句话，万缕情……

记得我从小就听说，日本民间有个风俗——用松枝打结来表示美好的祝愿。虽然我至今不知道这个松枝结是怎么个打法。但是，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祝愿，早已像万年常青的松枝一样结在我的心上了。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要下下去。离世的没下完，在世的再下，子子孙孙下下去！

我相信，在中日两国人民的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深厚友谊的基础上，在两国艺术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是会把艺术珍品创造出来的！

黄宗英饰演江南棋王的妻子——婉怡，也曾有过演与不演的多次反复。

赵丹在病中，约黄宗英演婉怡，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了给赵丹配戏，黄宗英答应了。赵丹病故后，再约黄宗英演婉怡，她犹豫了。

一九八一年秋，日方导演佐藤纯弥先生和中方导演段吉顺先生到黄宗英家中，又一次热情、诚恳地邀请她演婉怡时，她被两位导演的深情感动了，于是决定参加这部影片的演出。

我已经有二十二年没在银幕上露面了。

我很喜欢我的作家职业，所以连做梦也很少梦见电影。可是，今天为了中日友好的愿望和纪念在这部电影开拍前后离世的艺术家们，我心一横，又答应下来演戏了……

在东京新大沽饭店六楼的客房间里，接待中国电影代表团的东光德间影业公司的秘书长——日籍华裔森繁先生，亲切、热情地问黄宗英：

“您除了随团活动外，还有什么个人打算？我当尽力安排。”

黄宗英回答说：“我想采访一位日本排球教练，或一位排球评论权威……”

这是森繁先生没有想到的，他睁大了惊奇的眼睛笑着问道：“黄宗英女士，您为什么要采访一位日本排球教练或一位排球评论权威？如果不是秘密，能告诉我吗？”

黄宗英笑了：“没有秘密，绝对没有秘密。不知为什么，我昨晚失眠了，想起了我国的男排……我想听听日本排球教练对我国男排在此届国际比赛中的看法和展望。”

森繁先生忙说：“可以，可以。”

可是，在东京的日子里，总是听到日本朋友很重感情地一次次提到“赵丹君”，使她的这个打算被她不听话的眼泪给抹了。

在三百多人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位日本记者向中国电影代表团提出问题：“黄宗英君为什么激动、流泪？”

黄宗英回答：“我是个普通的妻子。”

听了她的回答，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是的，黄宗英是千百万中国妇女中的一个，她有着普普通通的喜怒哀乐。但是，她既然是中国的演员、作家，那么，在任何情况下，不论是春光明媚；还是风雪漫天，她依然能专注于不普通的事情……

啊，作家、艺术家的天职是崇高的！作家、艺术家的感情又是质朴的！

凌晨，我就醒来了。

房间里静静的，暖暖的，使我忘记了这是冬日。空气里有一阵阵花香，

是梅花的香？还是水仙的香？我一时分辨不出。这种花香，让我感到欣喜、舒畅。

在这种幽静的环境里，我又想起了男排的小伙子们，于是，我起身在灯下给他们写了封信。这封信，我写得很长，因为我有许多话要对他们讲。

信的最后一段，我是这样写的：

小伙子们，你们此刻在哪里？我从日本回国后，争取来看看你们，欢迎吗？咱们是国际较量线上肩并肩的战友啊！我真想好好为你们写上一篇。写你们处逆境时的复杂心情，写你们是怎么缓过心劲来，怎么在练球场上以经验和教训为下一个战役做准备。写……写……，反正我知道有得可写！值得写！

在当前，为振兴祖国的各条战线、各类工作者们的面前，哪儿有那么多顺手得心的事情呢！这一世纪我们中国人生存的意义，也正在于我们必须克服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我们的祖国必将奋飞，我们的人民的脊梁骨是硬的，我们不能再输下去，我们输不起了。

小伙子们，咱们不但要赢小球、赢大球，而且在这个浑圆的地球之上，咱们在经济、科学、文化……各方面都不能是“战败国”！为了祖国的荣誉，为了十亿人民，我们必须赢得胜利！……

当我写完这封信的时候，金色的晨光已洒满了窗口，东京又一个美丽的早晨降临了……

在一次鸡尾酒会上，有人指着一个穿白色衣裳的倩秀的背影问黄宗英：“你认识大野靖子女士吗？我为你介绍。”

还用介绍吗？！黄宗英很早就知道大野靖子。这不仅仅因为大野靖子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的五位编剧之一，在几年前黄宗江访问日本回国后，就曾问过黄宗英：“小妹，你认识大野靖子吗？是日本最受欢迎的女作家之一……”

“啊……”黄宗英一边想，一边抢着说：“是一位长得很美的女作家吗？仿佛玉兰花开的时候……”

“很美，我很少见过那么美的女作家。”说着他诡谲地一笑：“比你美多了，我当面对靖子也是这么说的！”

后来，赵丹访问日本回到家中，也对黄宗英说：“靖子问候你。她真热情。那么温柔，艺术上有见解，长得又那么美，心也美！”

这次黄宗英又听到导演说，大野靖子写的那一稿颇有特色。不仅使剧本增添了女性的细致、含蓄的艺术魅力，更开掘了主题的深度，点染了浓烈的、自然的生活气息。黄宗英虽然没见过大野靖子，但已经很熟悉大野靖子了，应该说，她们是没见过面的老朋友了。

黄宗英悄悄走到大野靖子的背后，用手蒙住了她的眼睛。大野靖子没有拉开黄宗英的手，轻声地、很动情地说：“一定是黄宗英女士，阿丹夫人你好！”

她们亲热地拥抱着。

她们含着泪花相对凝视着。

仿佛有两朵玉兰花，在春天里开放了，而且开得那么秀丽，那么纯洁，那么令人难忘……

有天夜晚，大野靖子到旅馆来看我，她依然穿着那件素洁高雅的白色衣裳。灯下，她谈及关于她写《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时感情的激荡，谈及她对

未来影片的想象，谈及她对中日人民友好的期望……

临别时，我请她再呆一会儿，我为她带来一点纪念品。我对靖子说：“用钱买的东西，我不送给你，因为珍贵的友情是无价的。”

我取出阿丹写的两本书《银幕形象创造》和《地狱之门》，说：“这是阿丹嘱咐我留给你的。”

她默然收下，轻轻地抚摸着书……

我又取出一双镶珠的拖鞋，说：“这是我的女儿给我的，现在我要送给你，这是女儿的一片心……”

靖子把这双拖鞋揽在怀里……

“这里还有朋友从我国福建漳州送我的两棵水仙，听说日本的水仙和中国也有缘。愿我们的友情似这馨香的水仙。”

她接过水仙，高兴地像个娃娃……

最后，我把这些纪念品装在麻线编织的、缀有相思红豆般钮扣的袋袋里，对靖子说：“只有这只袋袋是我用一元人民币在上海买的，请你以兑换率付日币，迟了我要算利息的！”

靖子立刻睁圆了美丽的眼睛：“啊哟，我可太害怕利息了！也决不分期付款。”她赶快从手提包里数出几枚铜币：“我马上付，马上……”

我俩和在座的朋友，都笑弯了腰。

她拎着袋袋站了起来。我们手挽手往门口走，走着，走着，她站住了，凝视着我。

我们什么也不说，我们又何必说呢？微笑和泪水替我们说了，说了……

半晌，靖子从自己的胸前把两串长长的、亮晶晶的项链取了下来，默默地、默默地套在了我的胸前。这项链带着她的体温，把两颗心连在了一起。

啊，这项链，多美呀！最精明的珠宝商也估不出它的价格，因为它也是无价的！

来到日本，黄宗英常常想起聂耳，想起他的那些歌。赵丹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我似梦似真地等待着，聂子有一天会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黄宗英也有这样的心情，总觉得聂子没有离开我们，也许，他的生命活在他的歌里。

有一天，藤泽市市长叶山峻先生，热情地邀请黄宗英去藤泽谒聂耳墓。

黄宗英多么想去啊！可是代表团的的活动安排得满满的，她无法前往。只好遗憾地对叶山峻市长说：“谢谢您！我非常想去看看聂耳，没来日本以前，我就想过。可是，我抽不开身，没有时间去……”

叶山峻先生微笑着说：“如果您有时间去，该多好啊！我们全体市民都会极其高兴地欢迎您！”

“谢谢！谢谢！”黄宗英连忙道谢。

“藤泽是一个很美的地方，您下次再来日本的时候，一定去看看吧！”叶山峻市长说得十分动情。

黄宗英点了点头说：“有机会，我一定去！”停了一会儿，黄宗英诚挚地问道：“市长先生，我要托您一事儿，可以吗？”

“什么事儿？请说吧。”

“我想请您给聂子带一封信和一份祭品。”

“可以，当然可以。”

黄宗英便拿出了一封信，一包绿茶，一瓶茅台酒……

黄宗英的信，写得很深情，又很幽默，聂子看了也会高兴地跳起来……

聂子，大孩子，神气活现的摩斯塔法！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普通一作家，常常写稿去登报。吃得饱，睡不好，想着你们哭又笑……

你和阿丹又碰头了！想着你们在一起又揍又乐又神聊；海阔天空地谈人生，论艺术；神而往之地展望明天，探索真理。我……真有点嫉妒哩！

你的阿丹欺负我，留下一盘难下的棋，轮上我接着替他下，我实在……反正你得先替我捶他三拳！

还有一件事，阿丹没和我好好商量商量，就永生永世陪着你。这，还得容我想想吧。好在“天上方一日，世上已千年”，过“一日”也不晚。

好聂子，我来得匆忙，带上一包我的故乡浙江的上品绿茶；本还想带些橘子，好在日本的橘子也与我温州蜜橘有缘，作为道具一个样，也别有意义。茅台嘛，够你们哥俩喝上一回的了。忘带杯子了，就在“石榴饭店”赠我的木杯中共饮吧。你喜欢花，这盆花是三个日本姑娘合送我的——纯洁、艳丽、饱含友谊的深情。阿丹的几张近照怎么样？是他的苏格兰好友白霞抢拍的。瞧，还那么没正形！

说到我，为了“这盘棋”没能去看你，你不会怨我吧！

为了中日友好，为了人类未来，为了祖国父老兄弟姐妹们，咱们都摩拳擦掌的，要干出一番样儿来。你哥俩，尽可以放心。

阿丹妻宗英

黄宗英一月十六日从东京飞回北京。

为了演好婉怡这个角色，她暂时压下了许多要写的文章和来自四面八方的约稿，开始做演员应该做的准备了。在影片中，婉怡是江南棋王——况易山的妻子，是一个贤淑的普通中国妇女形象。黄宗英为了赋予婉怡以乐天知命的中国贤妻良母的典型色彩，不仅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还要去水乡体验生活。于是，她到无锡，跟着著名的艺人学捏泥人；她到乌篷船上跟着质朴的大嫂学摇橹。甚至还踏着夕阳的余辉，和姑娘们一起在河边洗菜、洗衣服……

三月二十日，北京又举行了《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在中国的开拍仪式，中日两国的电影艺术家，又在北京欢乐地相逢了。

在开拍仪式上，黄宗英致词时说：

在银幕上，下下停停好几年了，终于走顺了。在历史中进进退退好几个世纪，已经发展了。

我们这一代——两国的人民，两国的艺术家，有责任摆出一副绝妙的格局，下好这盘棋。它的大大的意义，全世界知道，我的小小的心事，知我者也明白。

不说了，下棋！

黄宗英的话，溅起一片暴风雨般的掌声，有不少艺术家的眼中亮着晶莹的泪花。

在北影厂的招待宴会上，我送给日本艺术家两坛绍兴酒。启箱时，日本艺术家被大酒坛上老寿星的商标所震动，他们舍不得开坛了，决定带回日本去。为了纪念这个开拍的日子，我写在宣纸上的一首小诗，也被日本艺术家索走了……

不久，《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在无锡太湖边开拍了。两国的艺术家不分

日夜在艰苦地工作着。艺术上的合作，友谊上的心愿，冲破了语言上的障碍，他们的感情融在一起了，他们的爱和恨融在一起了，他们剧跳的心也溶在一起了。

几个月之后，在苏州的上新桥，这部影片拍完了最后一个镜头。

……城关密密地拦着铁丝网，城头冷冷地插着日本旗。孙道临、黄宗英、沈丹萍扮演的一家三口，逃难归故里了。他们走过已成废墟的镇街，烧毁的房屋还冒着烟。孀妇的哀泣、孤儿的哭号，侵略军过处引起的惊恐和愤懑……一一在横拉镜头面前展现。

“ヨイテス！”导演佐藤纯弥满意地、痛快喊了一声，摄影车在铝轨上停了下来。在硝烟未尽的外景地上，立刻响起了鞭炮声和欢呼声。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最后一个镜头拍摄完成了。记者们蜂拥而上，把两国的艺术家团团围住了。

有位记者问黄宗英：“这部影片什么时候开始筹备的？”

黄宗英笑了笑说：“近说，也有半个世纪了。”

记者一听，惊愕了。

黄宗英平静地接着说：“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烽火四起，山河呜咽，与敌国合拍这样的影片，谈也不要谈起！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世界风云变幻，两国情况大改。一九七二年中日两国缔结了友好条约，两国艺术家才有可能合拍这样的影片……不过，影片可以倒着拍，历史可不能倒着走了！”

突然，有个女记者发现黄宗英走路有点跛，便问：“黄宗英同志，您的右腿怎么啦？”

黄宗英微微一笑，说：“没什么。是前几天我在乌篷船上被侵略军打‘死’的时候，摔伤了。唉，年纪大了，不经摔，像你们这样年纪，再摔十跤也没事儿。”说完她开朗地笑了。

“您还有什么话要对观众和读者说吗？”

黄宗英想了想答道：“我要告诉观众和读者的是：‘愿世代友好’——这是印在胶片上、刻在两国人民心上的誓盟！我相信两国人民，会以今日的足迹，踏平昔日的足迹，踏出一条更宽广的友谊之路来！”……

当《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在东京举行首映式时，我又应邀去日本了。

我是为友谊而去的，我是为未来而去的！

鲜花，鲜花，迎接我们的都是美丽的鲜花。

欢笑，欢笑，迎接我们的都是朋友的欢笑。

在鲜花和欢笑中，我们畅谈友谊与未来！

在鲜花和欢笑中，我们畅谈中日两国文化艺术的交流。

黄宗英拍完《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之后，又带着自己的笔，到祖国各地去采访、写作了。

后来，她去了深圳。在蛇口工业区创办了都乐文化娱乐公司。

一九八五年六月，她又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联邦德国和法国。

在国外的座谈会和记者招待会上，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几乎都是“创作自由”的主题。但对黄宗英个人来说，不少记者希望她谈谈中国特区的现状以及特区的前途……因为他们不仅知道她是一位作家，还知道她是蛇口工业区科技文化协会会长，也知道她办了一个都乐公司。

黄宗英回国以后，不知为什么极度的消瘦，这种消瘦引起了医生的注意和不安。黄宗英本想在家休息几天就赶回蛇口去，可是上海华东医院的医生，却要扣留她住院检查。

黄宗英虽惦记着蛇口公司的业务，也只好服从医生的决定，住进了医院。

啊，又是炎热的七月，又是阿丹住过的医院，那病房，那梧桐树，那草坪，那永不变调的蝉鸣……使她想起了多少不愿再想的情景啊！

在人的记忆里，该忘记的事情，永远忘记了该多好啊！可是有些痛苦、伤心的事儿，却偏偏忘记不了，这是人性的优点还是人性的缺点呢？

记忆，可怕而又可亲的记忆啊！

记忆，似梦而又非梦的记忆啊！

困惑

“黄宗英自杀了！”……

这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地传遍了四面八方。一位著名的演员，一位受读者喜爱的作家，为什么要自杀呢？难道就没有一点活路了吗？

“听说她的都乐公司破产了。”

“不，是她公司的外汇被骗了，骗去了好几十万美金。”

“何止好几十万，据说是上百万。”

“唉哟！这么多钱……”

“赵丹死了不久，她又自杀了，真够惨的！”

“唉，那么有才华的人，怎么走了这条道儿？真是想不到的事儿……”

人们在惊讶，人们在惋惜，人们在议论。

她的家中，每天都有许多询问的电话和来信。

她的单位上海文艺出版社，每天也接到询问的电话和来信。祖国各地的亲朋好友都在关心她，千千万万的观众和读者都在关心她！

黄宗英的好友、著名作家张光年同志，是在昆明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的，他坐在北归的列车上，心情十分沉重，抑制不住心中的悲伤。他在责备自己：半个月以前，我要是去杭州看看宗英，也许不会有这事儿……她叫我去，我怎么就没去呢？唉，那时她一定很苦恼……

上海市出版局的领导，也被这传闻弄糊涂了，他们关心地问有关同志：黄宗英自杀是真是假？前一段时间，她不是在筹划拍摄电视报告文学《地球，你好！》吗？怎么又……

冬雨，在淅淅沥沥地下着。

黄宗英自杀的传闻，就像冬雨一样，把人们的心头浇得冷冷的，湿湿的，甚至都开始结冰了。

一个人，不会永远地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会死的，我也想到过死……但是，我不会自杀。

我为什么要自杀呢？

还有许许多多的事儿，等着我做哪！还有许许多多的文章，等着我写哪！

我公司的外汇，是被人拐走了，投资拍摄的影片又没有批准发行，经济上已陷入极大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我这个总经理的沉着和智慧，而不是惊慌、绝望，更不是自杀……

是的，黄宗英是不会自杀的。

真正了解她的朋友和亲属，都相信这一点。在社会上风传她自杀的时候，黄宗英确实住进了北京医院，不过，她是因为胆石症急性发作而住院的。经过医生的检查，决定为黄宗英做胆囊摘除手术。

早晨。冬日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病床上。经过几天的治疗，黄宗英右上腹部的疼痛，已经明显减轻了。护士通知她，明天上午就要给她做手术了。可是黄宗英还像没事儿一样，平静地坐在病床上。

她真的那么平静吗？

不，平静也许是她不平静的反映，这种手术毕竟不像割阑尾那么容易。她想得很多，又想得很简单，于是，黄宗英悄悄地写了一个《委托书》：

我动手术，万一有意外，或从此失去主持工作的能力，谨委托我的女儿赵橘与各有关方面磋商，安排香港天下影视公司及蛇口都乐文化娱乐有限公

司诸般事宜。

赵橘热爱祖国，也熟悉外国，她会承担得起重任的。

黄宗英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留字

写完了《委托书》，黄宗英又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不知为什么，她突然想起了电影厂的一位老同事，他不是编剧，不是导演，也不是摄影师、化妆师、演员……而是一位普普通通长着阿胡子的老场工。

黄宗英清清楚楚地记得这个在摄影场上什么都干的“阿胡子”，却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因为大家从来不叫他的姓名，只是亲昵地叫他“阿胡子”。

黄宗英不仅仅只是想起了“阿胡子”，还想起了关于他的许许多多的细节：他怎样在拍摄场上造“雨”、造“雾”；他怎样在外景地铺设推拉镜头的小轨道；他怎样在收机时头上暴着青筋“骂”当导演的赵丹；他怎样上山挖笋、采蘑菇给摄制组改善生活……

想起了“阿胡子”，我突然感到有件心事未了，应该给“阿胡子”写篇文章。“阿胡子”虽然不在人间了，可我总觉得他还活着，像他那样的人，在我的心里是不会死的。

于是，就在我将从内科病房转到外科病房开刀的时候，竟憋不住，坐在病床上写起“阿胡子”来了。

想依，特别想依，阿胡子，好阿胡子！

魂兮归来吧，好阿胡子！

今天，新的电影事业需要你，需要一切懂得专业的、热爱专业的一帅一将、一兵一卒、千里之驹、无名之勇！

当我一口气写完了这篇文章，已是静静的深夜了。

明天上午就要进手术室开刀，看来，我应该强迫自己睡觉了。

黄宗英，吃两片安眠药，快睡吧！黄宗英睡了。

她睡在病床上，竟又做起了梦……

仿佛是在蛇口的海滨，又好像是在上海的虹桥机场，在一片不知是雾中还是雨中，突然走来一个人，黄宗英一看，是X（他是香港天下影视公司的董事，又是都乐文化娱乐公司的副董事长）。

黄宗英急切地、大声地叫着他的名字。

X听到黄宗英的叫声，转身就想逃走，可是四周一眨眼竟变得都是悬崖绝壁，他无路可逃。

黄宗英愤怒了：“站住！这几个月你到哪里去了？公司的美金呢？你弄到哪儿去了？”

X站在那儿，一句话也不回答，好像是个没有灵魂的木偶。

“为什么不回答？你变成哑巴了吗？”黄宗英气得有些心悸了。

X还是不回话，直愣愣地站在那儿。

这时，飞来一片浓浓的雾，把X完全吞没了。

黄宗英急忙闯进雾中，视野里一片白茫茫，X已无影无踪了。黄宗英又气又急，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追去。在一片荒芜的灌木丛中，她突然发现了一个人影，当她奔过去的时候，一下子惊呆了——站在她面前的不是别人，而是她自己……黄宗英一惊，醒来了。

窗外，夜色蒙蒙，光秃秃的树枝间，有几颗寒星在闪烁。蓦地，有一种低低的、沉重的声音在鸣响，是什么声音呢？噢，起风了……

这个梦太离奇了，使我想了很久，很久。

在梦中，我追X的时候，为什么他失踪了，竟追到了我自己？公司的三十七万三千八百美元，难道就这样被他拐走了吗？他这样做，是我想不到的。唉，我同X相识已经十几年了，他竟然这样坑害我的公司。在生活里要真正看清一个人，是多么不容易啊！

也许，我太天真，太善良。直到现在，我还总希望X不要那么坏……

公司的这笔美金，已经丢失了四个多月了。想起这件事，黄宗英是十分伤心的。

一九八五年九月，黄宗英的都乐文化娱乐公司，在经济上出现了极大的困境。主要原因是公司投资拍摄的电影《深圳风情录》、《大明星》、《无情的情人》和电视报告文学片《朝霞与晚霞的对话》等，未能批准发行。一部电影投资几十万，一部电视剧投资也要几万，这样多的资金收不回来，结果是债台高筑。再加上公司内部管理不善，造成了失误，使公司陷入严重的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为公司经济担保的蛇口工业区房地产公司提出要退保。这样，都乐公司进口录音、录像设备所用的三十七万三千八百元美金贷款，就必须重新找保人。

于是，黄宗英立刻飞往北京，经过一番奔波，在中国租赁公司得到了援助。不久，本该汇到蛇口都乐公司的三十七万三千八百元美金，竟汇到了香港天下影视公司。黄宗英便委托副董事长X去香港具体承办这笔贷款的事。

X九月底从深圳回香港了。

十月初，他来电话说，他在香港定居的手续出了点问题，要晚几天才能回蛇口。

可是，到了十月中旬，他也没有回来。没有电话，也没有来信，就这样失踪了。

黄宗英十分焦急。

蛇口工业区的有关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并与黄宗英商讨，想办法尽快找到X。

X到哪里去了呢？

为什么没有一点音讯？难道他真的见到这笔巨款就起了坏心？太可怕了！实在是太可怕了！

有人说，几十万美金丢了，我不着急……真是让我哭笑不得！这么多美金丢了，我怎么能不着急呢？

再着急，我也不能像农村的老太太，坐在蛇口的大街上哭。不过，如果能将三十七万三千八百元美金哭回来，我也愿意哭，不停地哭……

日子一天天在焦急、苦恼中度过……

X仍然没有消息。他在上海的爱人和孩子，也在他失踪后不久移居香港了。

黄宗英在蛇口焦灼地等待X的消息。她希望能收到X的一个电话或一封信……

可是她的希望，只是希望。

黄宗英很苦闷，也很伤心！她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人变得很憔悴。她走在路上，昏昏沉沉的，总觉得远处的云天在倾斜。阳光淡淡的，似乎失去了热力，照在脸上也冷冰冰的。她感到很累，仿佛走了很长的路，这路又在

她面前无限地延伸、延伸……

我太动感情了。为什么要这样苦闷、这样伤心？X，X……真想不到你会干出这种卑鄙的事来！

电闪雷鸣，风风雨雨，也许更能锻炼人的意志和承受力。我从十六岁走上舞台，到今天当总经理，无论干什么事儿，都没有后悔过。我相信，今后我也不会后悔！

也许别人不理解我，一个人要干自己的事业，为什么一定要叫别人理解呢？

我是个弱者，有时软弱得自己都不能谅解自己。可我愿干干净净、辛辛苦苦干自己愿意干而别人又不能代替的事儿，决不迟疑，更不后退……

为了筹划电视系列片《中国一绝》的拍摄，黄宗英在蛇口重新剪辑了电影《深圳风情录》之后，去了山东。她拟在山东拍摄国际风筝节和肥城水蜜桃……

当黄宗英回到北京的时候，胆石症急性发作，迫使她住进了医院。北京医院的医学专家精心为黄宗英做了手术，二十几天后，她基本恢复了健康。这时，春节即将来临，她要求出院，飞回了上海。

黄宗英腊月二十九回到家中。因为头晕、乏力，她只好躺在床上，小外孙女简妮好久没见到姥姥了，高兴地一直在她的床边转来转去。有时天真地问她：“姥姥，你开刀了，还疼吗？”

黄宗英笑了：“不疼了。”

“那你带我上街去好吗？简妮要买个大气球，这么大的大气球。要红的……”小简妮一边说，一边用小手比划着。

黄宗英拉过简妮的小手说：“姥姥头昏，还不能上街，等我头不昏了，就带你去买大气球，买很多大气球，好吗？”

“好。”小简妮高兴地跳跃着。

望着可爱的外孙女，黄宗英舒心地笑着。几个月不见，这孩子长高了，长美了，头发也多了。

黄宗英在家里休养的时候，杭州的友人来信、来电话，热情地邀请她去杭州疗养。

这时，黄宗英心里正惦记着电视片《地球，你好》的筹备，想到杭州浙江地质局了解一下情况，研究一些资料。还想到杭州第二中药厂去采访有关青春宝的研制情况。这是她很早就想写的一篇报告文学……

于是，三月初，刚刚能下床活动，她就乘火车到了杭州。

杭州的友人，把她接到了望湖宾馆。当她见到了浙江地质局的领导，开完了座谈会以后，就搬到花家山宾馆去了。

这时，香港的一些报刊，争着刊登有关黄宗英的消息。香港《镜报》上，有一篇《“女强人”失意蛇口》的文章，说：深圳初建，蛇口乍开，吸引男女前往大展宏图，一显身手，这现象应该说是好的。曾几何时，报刊醒目的“女强人”突然销声匿迹，甚至传言她自杀，就令人莫解了。……

香港《新报》在四月二日的头版上，刊登着：与好友合组公司弄至债缠身，大陆女影星黄宗英惨被港人滚去巨款。一度传出自杀，证实乃属谣言。……

内地的一些报纸也刊登各种消息：黄宗英经营公司不利，经济亏损有破产的危机；黄宗英的都乐公司所拍摄的电影《大明星》、《深圳风情录》、《无情的情人》等，未批准发行而欠债累累；黄宗英轻信港商，被骗去巨额

美金等……有的小报，还转载几个月前香港报纸上有关黄宗英的报道。

黄宗英一时又成了新闻人物。她的每个行踪，都能引起记者们的兴趣，有些电视台还要对她进行电视采访，黄宗英都一一谢绝了。

我又成新闻人物了。

当演员，当作家，当经理……竟然都能成为记者关注的人，这也是职业和命运决定的。

前一段时期，到处风传我自杀了，现在我又活了，而且活得很忙，很乐观……

有的记者问我虎年有什么打算？

虎年、虎势、虎劲、虎威、虎虎生气！如果是只老虎，老虎要出山了！……

可现在我要沉默，沉默。

沉默对我来说，不仅必要，而且可贵！

住在杭州花家山宾馆的黄宗英，突然接到北京中国租赁公司的电话，说X一九八六年一月就来了信，愿按期归还三十七万三千八百元美金贷款。最近他从香港来到北京，要求租赁公司帮助他与黄宗英见面。

原来，X一月份在香港分别给中国租赁公司、蛇口工业区和黄宗英写了信。信中说他做生意动用了公司的贷款三十七万三千八百元美金，又凑了几万美金，一共用了四十五万美金，托一位朋友去美国买五百箱录像带，没想到他的朋友携款逃跑了。当他发现被骗以后，曾设法追寻过，可是两个多月过去了，并没有找到一点影子……

黄宗英没有收到过X的信，直到接了中国租赁公司的电话，才知道他出现了，而且要见她。

黄宗英不愿见X，她委托中国租赁公司处理这件事。

X到了北京，出示了他所有被骗的证据，表示一定偿还这笔美金贷款。

黄宗英不愿见X，而X再三要求见黄宗英。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租赁公司派了两位职员，来杭州给黄宗英做工作，动员她还是见见X。

人情难却，黄宗英还是答应了。

一九八六年四月八日，黄宗英在花家山宾馆的住处，见到了X。他是由中国租赁公司的两位职员陪来的，没有他们陪来，黄宗英是绝对不见X的。

X一进门，看到黄宗英坐在沙发上，用一种鄙视的目光望着他，心里立刻感到一阵紧张。他慢慢停下脚步，想使自己镇静下来，但是由于激动和惭愧，他又镇静不下来。他想叫一声黄老师，却抖动着嘴唇叫不出声来，也许他根本不敢叫。只用乞求的眼光，表达着内心的复杂感情。

沉默，难耐的沉默……

这种沉默，迫使X低下了头。

两位中国租赁公司的职员，也不知说什么好了。

突然，黄宗英打破了沉寂，冷冷地叫了一声：“X先生！听到黄宗英叫他，X仍没有抬头，竟低声地哭了起来。

黄宗英异常平静地说：“我本想在法庭上，或是在监狱里见你。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了你……你哭什么？该哭的不是你！”

“黄老师……”X泣不成声地叫了一声，就哭诉他怎样被骗，丢失了四十五万美金的经过。并拿出了一些单据、合同之类的东西，要请黄宗英过目。

黄宗英苦笑了一下，说：“你拿出这几张破纸有什么用？我现在要知道

你什么时候还钱？用什么条件来保证你能够还钱？因为我们不能再次受骗。”……

黄宗英越说越生气，脸色更加苍白了。

X 像一个受审的罪犯，回答着一个个问题。并说明他将怎样筹划这笔巨款，按期还清债务。他显得那么卑怯，那么可怜。

黄宗英身体虚弱，不愿再听 X 的表白了。她觉得头又昏又痛，房子也开始旋转了……

X 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仍叫我和阿丹为老师的人（另一个叫我们老师的人是牛犇，在那苦难深重的日子里，他给了我们许多友情和帮助）。前几年，X 流落在香港，是我把他弄到天下公司和都乐公司来的。没想到，他竟干出这种卑鄙的事来！……

这次见到 X，我感到那么陌生，陌生得我自己都十分吃惊。他好像是从一个出卖灵魂、出卖友情的阴暗角落里来的，而且可以随时变幻着骗人的外形。实在让人讨厌、让人鄙弃！

他在我的心目中，抹掉了，永远抹掉了……

当然，要在心目中抹掉一个人，那是痛苦的，甚至是悲哀的。

世界上，善良的人，为什么常常要被欺骗呢？难道善良的人，就应该被欺骗吗？！

善良的人，要警惕啊！……

四月，江南迷人的季节。

花家山宾馆像一个大花园。一树树洁白的玉兰花和一丛丛艳红的杜鹃花，掩映在绿茫茫的柳浪中。成串的紫丁香悄悄地吐着清香，满树的樱花默默地露着微笑，它们把春天的喜悦，送给了人间。

黄宗英是很爱花的，在她的家中一年四季总是鲜花不断。可是此刻，她没有心思赏花，一心想着地质部委托要拍的电视报告文学《地球，你好》。

这部片子，去年十月在深圳已经拍了一些海上勘探的镜头。开春后，摄制组本应该去新疆拍摄。由于都乐公司经济上的困境，要黄宗英处理和奔波，接下来她又生病在北京住院开刀，《地球，你好》的拍摄时间就拖下来了。对此，黄宗英非常着急，不仅是没有按期执行拍摄合同，而且也对不起广大的地质队员。

地质部宣传部的有关领导，看到黄宗英的身体比较虚弱，为了照顾她的身体，保证电视片的艺术质量，决定再延迟一下摄制组进新疆拍摄的时间。

于是，黄宗英叫两个采编——作家奚青和我，第二次进疆，她立刻找导演、摄影师、录音师……拉出摄制组，随时准备进疆，争取在十月地质队收队之前完成新疆的主要拍摄。时间紧迫，转眼已是七月初了。摄制组必须在七月二十日左右进疆，否则，北疆阿勒泰、伊犁的地质队收队以后，就无法拍摄了。

不巧的是黄宗英因严重腹泻，于七月十五日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

她躺在病床上，十分焦急，希望医生能尽快地治好她的病，争取早日出院。

真是越忙越生病，摄制组就要进疆了，我又住进了医院，真是不争气……

愿上帝保佑吧！让我的病快些好。此时此刻，我实在是没有心思住院。

啊，可恶的病魔，能发一发善心吗？

咱们可以谈判嘛，等我空下来的时候，可以让我多生几天病，加倍也可

以……行吗？！

该死的病魔，我诅咒你！

住了两天医院，黄宗英的腹泻刚刚止住，她就要求出院了。七月十八日，她便从上海乘夜班飞机赶到了北京。

摄制组的导演、制片主任、摄影师、录音师……，正在焦急地等她哪！此时，看到黄宗英都非常高兴。进疆的准备工作都已完成，摄制组拟定七月二十日飞往乌鲁木齐。

就在这时，黄宗英接到地质部宣传部的通知，他们经过研究，决定《地球，你好》不拍了。

这样一个决定，是黄宗英没想到的。

摄制组人员到齐了，请来的导演、摄影师都是影视界有成绩的青年艺术家。他们为了黄宗英监制的《地球，你好》，推掉了其他电影、电视片的任务。

怎么办呢？

有人说，既然《地球，你好》不拍了，摄制组只好解散。可是黄宗英舍不得解散这个摄制组，因为将这些有才华、有追求、又有实干精神的青年艺术家集结在一个摄制组里，是很不容易的。新疆又是艺术家向往的地方，应该给他们艺术实践的机会。

经过慎重考虑，黄宗英决定摄制组不解散，立刻同有关部门联系，并求得支持和帮助，按原计划时间进疆，另拍摄一部有关新疆风光、风情的电视报告文学片。

在摄制组飞往乌鲁木齐的前夕，地质部的一位领导同志来摄制组看望黄宗英。

黄宗英表示：既然地质部已决定不拍《地球，你好》了，我也不可能改变地质部的决定。现在摄制组还是要进疆，拍摄另一部片子。我曾在文章中写过，要为广大的地质队员拍摄《地球，你好》，并发表了这部电视片的总体构思。可是，现在……电视片拍不成了，但我对地质队员的感情丝毫没有减少，反而更加深厚、更加炽热了。为此，我感到非常遗憾。这种遗憾，也许只有我自己才能感受到它全部的内涵……

夜深了，黄宗英却没有一点睡意，她在灯下一边思考，一边在写着什么。一部有关新疆风光和风情的电视报告文学片，在她苦苦的构思中已有了雏型……

困惑，生活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困惑？

是自己的失误还是命运的安排？

不过，如果生活里只有成功、欢乐，而没有失败、困惑……也许就不是真实的生活了。

是的，谁都会羡慕好的运气，可是一个人在追求事业的道路上，能征服逆境、走出困惑，充满信心地迎接希望，更是令人敬佩的！

谁能在人生中，否认逆境和困惑对人的考验与锻炼的价值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要像珍惜希望和机遇那样，去珍惜逆境和困惑……

黄宗英是从一次次风雨中走过来的人，在又一次智慧与命运交战的时刻，她能走出逆境、走出困惑吗？

飞往新疆

七月，是草莓成熟的时候，北京的街头巷尾，到处都有推着车子卖草莓的个体户。那红红的草莓，水灵灵的，老远就闻到了它那特有的清香和甘甜。

黄宗英买了一大包草莓，洗了又洗，拌上糖，请摄制组的同志们吃。

大家一边吃，一边说笑着。

年纪最小的摄影的小伙子说：“上海草莓少，北京多得很，每年一到这个时候，您就随便买吧。外地人，眼热着哪！”

黄宗英笑着说：“西柏林也多，那儿的草莓也使人难忘。看到草莓，我就想起一个友人，他是我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的秘书，叫孙书柱。他不仅写散文、写诗，还翻译德文作品。我总觉得他在遥远的莱茵河畔，为我们采来了许多红红的草莓……”

“黄老师，那我们吃的就是孙书柱的散文和诗了！”采编这么一说，惹起一阵爽朗的笑声。

黄宗英突然想到：呵，我介绍书柱作品的文章有题目了，就叫《又红了，草莓》……

明天，摄制组就要飞往新疆了。此刻，他们在北京吃着草莓，愉快地谈笑着。难道他们的心中就那么平静吗？

不，新疆是遥远的，在茫茫的大戈壁上奔波是艰苦的。短短的两个半月内，要跑遍南疆和东疆……工作是很繁重的。可是这群年轻的艺术家的，也受了黄宗英的感染，都变得开朗、乐观、不知愁了。

夜里，黄宗英又失眠了。她已经吃了两次安眠药，仍没有睡意。

窗外，海棠树上的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似乎像一支乐曲，回荡着什么旋律……

树叶沙沙在响……

今夜，阿丹，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呢？

告诉你，我就要到你年轻时去过的地方，你在那里奋斗、开辟新生活、又坐了五年监牢的地方，你一生喜爱、迷恋的地方——新疆！

记得，每当你说起新疆，都那样欣喜、痴情，仿佛你不是曾在那里被关了五年黑牢，而是在那里拾到过奇彩的瑰宝。

当年，我们初次合作拍电影《幸福狂想曲》时，我曾傻乎乎地问过你：“你们到新疆去吃了那么多苦，是为为什么呀？”

那时，我太年轻，刚踏上艺术事业的道路，我怎么能理解一个艺术家对艺术事业的狂热，对理想的执著，可以过滤人生的种种辛酸苦涩呢？

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你对我说：“我带你去新疆！新疆人可好客、可热情啦！只是那个地方太荒凉，太远了，能通飞机就好了。咱们搞出一个好剧本，带摄制组去……”

这不也是“幸福狂想曲”吗？那还是一九四七年啊！阿丹这个人，常常自编、自导、自演一些大大小小的“幸福狂想曲”。好容易死里逃生，才脱离新疆土皇帝的黑牢两三年工夫，居然想带个摄制组乘飞机到新疆去拍片，想得是不是太狂了？而且还要带上我……仿佛他那时已经有权作主带我去任何地方，去天之涯、海之角。

也许是他对天山的那一片痴情，对建立一个中华民族演剧体系的梦，吸引了我，打动了我的心，我竟然也就此被他的梦带了大半生，直到如今。

现在，我真的要带一个摄制组，乘飞机去新疆了。在阿丹给我讲新疆的梦之后近四十年，我终于追随他的脚印，要漫游天山南北了。

阿丹，多静谧的夏夜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呢？

趁着蒙蒙的夜色，能走进我的梦中来吗？给我们摄制组的编导出出主意，给我们的电视报告文学片增添些艺术魅力。不然，再讲一个新的“幸福狂想曲”也行。

啊，“幸福狂想曲”永远是那么迷人……

飞机起飞了。

从舷窗望下去，美丽的北京已变成了一幅油画，镶嵌在逶迤的崇山峻岭中。

蓬松的白云，轻轻地从机翼下掠过。前方是望不到边的蔚蓝，镀着阳光的蔚蓝……

飞机起飞了。

黄宗英默默地在想：莫道不并蒂，偏偕我双游。

一起去。去新疆。飞去。……

阿丹，你再去看看，那里什么变了，什么没变，什么正在变。再去找寻那里的老朋友、新朋友，维吾尔族的、哈萨克族的、柯尔克孜族的、汉族的，还有其他兄弟民族的。再去看看那里的湖水、草场、戈壁、沙漠，还有白杨林、果子沟，马群和羊群……

咱们再带支歌回来，比你上次带回的‘沙里洪巴哀’更深情、更动人的……

飞机起飞了。

四个小时以后，黄宗英就到乌鲁木齐了。在那片遥远而又神奇的土地上，等待她的是什么呢？

是天山的雪峰？是牧场的马群？是赛里木湖的云影？是吐鲁番的葡萄？……

是古尔邦节的肃穆？是故城夕照的雄奇？是戈壁滩的荒寂？是大沙漠的神秘？……

是的，这一切都在等待她，这一切又都不在等待她。因为对艺术家来说，等待她的不仅仅是大自然的馈赠，更多的是超越大自然的馈赠！

也许，艺术家有共同的天赋——喜欢“狂想曲”，也许黄宗英被赵舟潜移默化了，在她的生活里，总是有一个又一个的“狂想曲”在诱惑她。

为此，她在思考，她在追求，她在奔忙……

可是等待她的，往往不是欢乐和微笑，而是烦恼和困惑，有时甚至是心灵的创伤……

尽管这样，黄宗英从不后悔！从不胆怯！

一支新的“狂想曲”开始鸣响了，一次新的艺术实践开始起步了。

乌鲁木齐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宽阔的马路边，雪山水在哗哗地奔流。高大的白杨树林，紫红的玫瑰花和那些富有维吾尔族民间风格的建筑物，把我们的视野全部占领了。

一到宾馆，我叫摄制组的小伙子们好好休息，可他们个个都很兴奋，忙着整理器材、清点物品，作拍摄的准备工作的。

晚饭后，导演竟要带着全部人马，去拍摄乌鲁木齐的夜巴札。

我被青年人的工作热情感动了，尽管我有些疲劳，头也隐隐作痛，我还是跟着他们上了面包车。

我们这部报告文学片，就从拍摄乌鲁木齐的夜巴札开始了。

灯火，一片明亮的灯火。淡淡的轻烟，像雾似地在缭绕。人影闪动，闹声喧嚷……

夜巴札，一个民族特有的风情，映着璀璨的灯火进入了我们的镜头……

乌鲁木齐，传说中美丽的牧场！

我第一次来到你的身边，就深深地爱上你了！

我愿做你的女儿，快给我一顶维吾尔族的小花帽吧，像牧草一样翠绿的小花帽……

绿茸茸的牧场，一望无际。

金黄色的小花，一朵朵，一片片，像遗落的星星在牧场上闪烁。远处，山坡上长满了挺拔的云杉。每一棵云杉，都是一簇碧绿的浪涛，汹涌成一片海的气势、海的诱惑。再远处，便是天山白皑皑的雪峰，在蓝得透明的天空映衬下，更显得神秘莫测，凝集着一片童话色彩。

这是梦境吗？

不，这是乌鲁木齐附近的风景区——南山菊花台的景色。在这里，目光掠过之处，都是色彩鲜丽的油画。摄制组在总监制黄宗英的带领下，正在这儿紧张地拍摄。

牧场上的马群，

哈萨克的毡房，

赶巴札的维吾尔族少女，

骑马护林的蒙族小伙子……

都在摄制组的等待中，走进了镜头。

陪同拍摄的除了乌鲁木齐军区文化部的同志外，还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音乐家——王洛宾，他在乌鲁木齐军区歌舞团工作。

虽然与他初次见面，可他的歌《达坂城》、《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玛依拉》……我们早就熟悉了。这些歌几十年来，早已唱遍了全国。有不少外国艺术家来中国演出时，也演唱这些歌。

在牧场上，黄宗英和王洛宾亲切地交谈着。两位艺术家，像分别多年的老友，在这如诗如画的菊花台相逢了。

“您的《达坂城》这支歌，是阿丹当年从新疆出狱后，带到内地去的。解放前，我就爱唱。多美的歌儿啊，我现在还记得。”黄宗英说着，仰起头唱了起来：

达坂城的石路硬又平，

西瓜呀大又甜，

那里住的姑娘辫子长啊，

两个眼睛真漂亮。……

说实在的，黄宗英的歌唱得并不好，可是很投入、很动情，使老音乐家沉进了回忆。

“啊，那是四十八年前改编的吐鲁番民歌……岁月如流，往事如梦，那个时候，我还是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哪！”王洛宾说着，微微眯起了眼睛，遥望着天边，仿佛回到了抗日烽火遍地燃烧的年代……

“听说您那时是要到新疆来？”

“是的，我和肖军、塞克、朱星南受组织委托，要来新疆工作，因盛世才的反动面目已暴露，我们便流落在兰州了……”

“您要是到了新疆，也许会和阿丹一起坐牢了。”黄宗英的嘴角掠过一丝苦笑。

“没有在新疆坐牢，可我在兰州坐了牢，囚徒的生活我是很熟的……”王洛宾开朗地笑了起来。

黄宗英也咯咯地笑了，说：“干嘛我们总说坐牢？我们的亲朋好友坐牢坐得还少吗？不说了，不说了！菊花台这么美的景色，这么多的花，我们应该唱歌……”

“对，唱一支我刚写完的新歌。”老音乐家扶了一下眼镜，兴致勃勃地唱了起来：

今晚没有月亮，
悄悄走来不要歌唱，
葡萄架下有只小羊，
羊儿就拴在我的窗棂上……

“您的歌太美了！在生活中，风风雨雨几十年，您吃了那么多的苦，可您的歌总是那么深情，那么甜美！”黄宗英感动地赞叹着。

“在牢房里受难，在戈壁滩流浪……无论生活多么苦，我心里的歌从来不苦。不然，我也活不到今天了！”

是的，黄宗英理解老音乐家的风雨生涯，也理解他在风雨生涯中从心底飞出的那些歌。

那是他的爱，他的希望！
那是他心灵中永不褪色的朝霞！
那是他不会衰老的艺术青春！

吐鲁番真热，远处的火焰山仿佛真的燃烧着不熄的火焰。戈壁的风有些灼脸，坎儿井的水却是透心的凉。

吐鲁番的街上，没有树木，没有花草，只见一簇簇葡萄藤长满了茂密的绿叶，绿叶间掩映着一串串比翡翠还要晶莹的葡萄……

葡萄为这个民族风情浓浓的小城，增添了多少迷人的魅力啊！

晚上，月亮悄悄地升起来了，朦胧的月光洒满了大地，空气里饱含着葡萄的香甜。

在葡萄园里，我们吃着维吾尔族少女刚刚采摘下来的葡萄，听着歌手们唱的一支支美丽、动听的民歌，承受着一个兄弟民族给予的友爱和深情！

手鼓响起来了。
冬不拉弹起来了。
少女的歌声更加迷人了。

人们欢乐地跳起了舞，舞姿那么优美，舞步那么轻捷，好像一朵朵云在音乐的旋律中飞飘。

这时，一个维吾尔族的小伙子，踏着舞步来邀我跳舞，我抚了抚头上的小花帽，便跟着他跳了起来。我的手臂在挥舞，我的脚步在跳动，我的身体在旋转……

我虽然从来没跳过维吾尔族舞，可我跳了。尽管我的舞蹈动作还不理想，可我觉得我已经会跳维吾尔族舞了，因为我们的都在一个共同的旋律中跳荡……

啊，摄制组的小伙子们，今晚在葡萄园你们拍下了多少好镜头啊？看，那个穿红裙子的维吾尔族少女和打手鼓的小伙子跳得多美呀！像一朵白云乘

着牧场上的春风在追逐一朵红云……

快，快拍呀！

也许在葡萄园里又跳又唱，玩得太高兴了；也许无核白葡萄吃多了，吐鲁番红葡萄酒喝过量了，回到宾馆仍不想睡觉。耳边总回响着一些优美、亲切的旋律。

半个月亮爬上来，

依拉拉爬上来。

照在我的姑娘梳妆台，

依拉拉梳妆台。

请你把那纱窗快打开，

依拉拉快打开。

再把你的葡萄摘一朵，

轻轻地扔下来。……

这是老音乐家王洛宾记谱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半个月亮爬上来》。

多美的歌，多美的情啊！

夜深了，这半个月亮的光辉，洒满了我的心底，我沉浸在一种纯洁、美好的感情里……

早晨，摄制组来到了天池。

天池，像一颗巨大的蓝宝石，镶嵌在洁白、晶莹的雪峰——博格达峰脚下。浩渺的湖水，蓝得出奇，是翠蓝？绿蓝？孔雀蓝？……都是，又都不是。反正蓝得那么美，蓝得那么神秘，令人产生蓝色的遐想。

虽是炎热的七月，天池边却凉气袭人，人们穿着羊毛衫、茄克衫，仍不敢久留。有几个小伙子却脱了鞋袜，坐在池边洗脚，他们一边洗，一边嬉闹。

黄宗英好奇地问他们：“这么凉的雪山水，怎么能洗脚呢？”

“王母娘娘能洗，我们也能洗。”话还没落，小伙子们又朗声大笑了起来。啊，原来传说这天池是王母娘娘洗脚的地方。

天他的南岸，有一个秀丽的山谷，山坡上绿茫茫的云杉林，环抱着一片嫩绿的草地，一座白色的毡房，似一朵雪莲静静地开着，一缕炊烟在轻轻飘曳……

据说，那儿是举行篝火晚会的地方。

“如果能拍到天池的篝火晚会该多好啊！”年轻的摄影师叨咕着，“黄老师，请旅游局组织一个篝火晚会吧。”

黄宗英也动心了：“那要请制片主任去联系一下，不知人家有没有困难……”

摄制组的要求，得到了旅游局的支持。

黄昏，游艇把摄制组和一批旅游者，送到了天池南岸的山谷中。几个维吾尔族的小伙子，从云杉林里拾来了两大堆干柴，高高地堆在草地上。（那么高的山，那么密的林，这干柴是怎么拾来的呢？难道他们有一双无形的翅膀吗？难道他们能腾云驾雾飞翔吗？）

参加篝火晚会的人们坐在草地上，远天是一抹玛瑙色的晚霞。黄宗英用英语和一些外国朋友交谈着，他们中间有美国的登山队员，有澳大利亚的科学家，有法国的企业家，还有日本、瑞士和加拿大的旅游者。

“第一次来中国吗？”

“不，第一次来天池。”

“天池美吗？”“美得像画，不，美得像梦……”

“那你就把这梦带走了？”

“不，这梦是带不走的，所以，我还要来，还要来……”篝火点燃了！

草地上一片橙红的火光，远远近近的云杉林，都镀上了一层耀眼的光辉。随着维吾尔族的民间乐曲和激越的手鼓声，人们围着篝火跳起了欢乐的舞蹈。

黄宗英一会儿在哈萨克姑娘中间旋转，一会儿在外国友人中间拍手，一会儿又在维吾尔族小伙子中间舞臂……她显得那样年轻，那样活泼，这天池的篝火，以它特有的魔力，奉还了艺术家已逝的青春！

篝火在燃烧……

人们在狂欢……

摄像机在抢拍……

摄制组去库尔勒了。

据说，从库尔勒沿着开都河和孔雀河东去，可以到达楼兰古城，可以走近罗布泊。不过，摄制组能不能拍到楼兰古城的风貌，能不能拍到罗布泊的沙海，谁也说不准。导演曾与有关单位联系过，他们答应用直升飞机协助我们航拍。我想罗布泊再神秘、再遥远、再可怕，总要收进我们的镜头。

罗布洼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丝绸之路”的通道，当时西出阳关，沿着疏勒河的古道前行，就能去中亚、去欧洲……

蒲海晓霜凝马尾，

葱山夜雪扑旌竿

我想起岑参的诗句，我想起古代罗布泊那一派雄丽的边塞风光。

可是，现在罗布泊已没有湖水的影子，是茫茫的沙漠，是无边的沼泽……

我希望摄制组能按计划的时间返回库尔勒，然后去喀什，拍摄古尔邦节艾提尔大清真寺的节日盛况。从喀什再去和田。

我本想从乌鲁木齐直飞喀什，在喀什等候摄制组。可是有许多事儿使我离不开乌鲁木齐，只好不安心地宾馆里留守。

有一天下午，我空下来了，便想采访有关科学方面的题材。人家说，你去找阿巴斯。

我不认识阿巴斯，可我拨通了阿巴斯的电话。阿巴斯说：“好，我就来看你。”

“不，我来看你。宾馆全中国几乎都一样，可维吾尔族的家庭，家家的挂毯都不一样……”

“那太欢迎了！我的家离你住的宾馆没几步，只要往右一拐，进一个胡同，迎面一幢住宅楼，上楼第一个门口就是。要我来接你吗？”

“不用，不用。我就来。”

“那我叫我女儿阿依古丽给你做拉条子，就在我们家吃晚饭吧。”

我很自信地走出宾馆，踏上楼梯。糟啦，迎面有两个门口！是我没听真？还是阿巴斯的汉话没说清？我迟疑了半晌，决定拣离我最近的一座门按门铃。主人来开门了：“啊，您好啊！快进来，快进来吧！”我受到了热诚的欢迎。又是奶茶，又是酪干，又是糖果，又是馓子……汉语加维腔，谈得热热闹闹，非常愉快。傍晚时分，有人按门铃。主人去开门，旋又回头问我：“您是黄宗英同志吗？”

我答：“我当然是啊！阿巴斯同志，你和我说了半天话，不知道我是谁

吗？”

“您……您是我的客人啊！我不是阿巴斯，阿巴斯同志到处在找你呀！”

“怎么，你不是阿巴斯？”我很惊讶。

“阿巴斯为什么不进来？”主人向门外招呼。

一位真的阿巴斯进来了。

“啊，你是阿巴斯！嗯，你不是阿巴斯！”我站在两位维族兄弟之间笑弯了腰。

我又问不是阿巴斯的阿巴斯：“那我进门的时候，你怎么不问我找谁呢？”

“为什么要问你找谁？”他幽默地问。

“……”我糊涂了，“按常规是要问的呀。”

主人得意地说：“我们没有这句话。”

“没有……这句话？维吾尔族语里没有这句话吗？”我认真地问热情的主人。

“没有，是没有。”主人答道，“我们的祖先在游牧的帐篷里就是这个样子。只要来了人，先给奶茶、馕、羊肉干。他们远道而来，渴了，饿了，累了，应该好好接待。直到现在，我们维族人不兴问来人是找谁的。进门来的就是客！”

这是多好的民风啊！在游牧帐篷里的民风，如今在楼群中依然飘散着余馨……

摄制组从南疆回到乌鲁木齐了。

大家看了拍摄的素材和资料，都很高兴。有许多镜头拍得很美，有许多情节拍得很生动，令人感动。黄宗英赞赏着导演和摄影的艺术才华与创造精神。是啊，在广阔的艺术天地里，只要给艺术家提供发挥才能的条件，他们就会创作出高质量的艺术作品。

两个多月的时间，摄制组是在紧张、忙碌中度过。遗憾的是这次不能去北疆拍摄了，因为时间和条件都有困难，导演还有其他的拍片任务。

导演、摄影师、录音师回北京了。

黄宗英、制片主任、采编回上海了。

什么时候再去新疆拍摄？黄宗英也说不准，她只是想只要条件允许，应该尽快去、尽快去……

在新疆拍片用费是很大的，这部电视片的后期制作，也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黄宗英为了筹集资金，回到上海顾不上休息，又忙着到处奔波。一会儿去北京，一会儿去江苏，来去匆匆，行踪难觅。

有天上午，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她说刚从北京回来，头痛病又犯了，我急忙去她家中看望。

她拧着眉头、闭着眼睛，躺在床上。我以为她睡着了，便轻轻地坐在书桌旁的小沙发上。

“小姜，你来了。”

“我以为你睡着了呢……”

“睡不着，头疼得厉害，止痛片也不管用了。”

“我看你是太累了。老黄，要不要陪你到医院去看一下？”

“不，我现在哪儿也不想去，不想去……”

“我们在新疆已经够累了，回来你又不好好休息一下，这样怎么行呢？”

“这部电视片我们还没拍完，哪有心思休息啊，再说还要筹划资金，筹划后期制作……”

“老黄，听我一次话，好好养养身体，等明年春天我再陪你一起进疆。”

“明年春天？不，不能等到明年春天……”

“现在已经十一月初了，新疆可能下雪了，冰天雪地，你能去北疆拍摄吗？”

“我没说要去北疆。乌鲁木齐也还有许多可拍的题材，只要去，决不会空手回来。”

她说得那么自信，目光也变得清澈、明亮。要不是她躺在床上，谁能相信此刻她在生病呢？

吃了几天药，她的头不疼了。于是，又带着一个小型摄制组，飞到了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已经下过雪了。

这座美丽的城市，被白雪装点得更迷人了。它似乎变得更加纯洁、更加亮丽、更加富有大自然的气息。

昨天，我去看了当年阿丹演戏的剧场，如今那儿是一个商场，进进出出的顾客那么多，我几乎找不到剧场的影子。站在商场门口，我在想：阿丹，你知道吗？此刻我就站在你和朱今明、王为一、徐韬等朋友演出抗日话剧《战斗》的地方。望着马路上的行人和车辆，我仿佛看到了当年你们演出的盛况……

那一段生活，对阿丹来说是难忘的，那是一场人生悲剧的开始，也是一场恶梦的开始！

为了追寻阿丹的足迹，今天一大早我又来到他当年坐牢的地方。踏着积雪，穿过几棵光秃秃的小树，面前出现了拉着铁丝网的高墙。它是那样阴森，那样恐怖，阻隔着天空和阳光。这儿的风特别大，特别冷，我感到一阵奇寒，心有些颤抖。

望着可怕的高墙，我迟疑了一下，没想到一抬腿竟然摔倒在雪地上。躺在白皑皑的积雪里，我产生了一种幻觉，似乎我不是躺在雪地里，而是躺在冰冷的监狱里，耳边不仅有阿丹受刑后的呻吟声，还有恐怖的枪声……

一抹朝霞，将一片雪地映得红红的，仿佛洒满了鲜血。啊，四十多年了，这鲜血还是那么红、那么令人惊心动魄，它不仅浸透了这片土地，也浸透了那段悲愤的历史。阿丹，你当年在狱中不是要创作一部戏《天山泪》吗？要用戏作武器，揭露盛世才在新疆的罪恶统治。我面前的这片雪地以及雪地上的血影，就是你当年狱中生活景象的再现吗？就是你当年构思的《天山泪》舞台景象的再现吗？

阿丹，当年你曾说过，要带着我一起去新疆拍片，那时对我来说还是一种诱惑，一个梦。如今，我来新疆拍片了，可是你没来……你没来……

新疆，是一片浩瀚广袤的土地！有四十七个民族的一千三百万人民在这里生活、工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我想拍这里的大自然风光，我想拍这里多采的风土人情，我想拍这里的油田、金矿，我想拍这里农场、果园，我想拍这里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友谊，我想拍这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景象……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热爱新疆！让世界上所有的朋友了解新疆、向往新疆！

我知道，拍好一部有关新疆的电视片，还有许多困难。我的工作才刚刚

开始，我面临的困难也才刚刚开始。我想干的事，就要干到底。什么困难我都不怕，困难会给我信心和勇气。

啊，新疆，美丽的新疆！

我愿把我对你的爱，融进每一个画面，每一个镜头……

黄宗英从乌鲁木齐飞回上海了。

她本想在家休息几天，可是为了筹划这部电视片的后期制作，立刻又飞到北京去了。

天这么冷，她年纪也大了，飞来飞去，不停地奔波，真怕她再次病倒。可她这个属“云”的人，真的要像云一样不知疲倦地漂泊吗？

我在电话中问她：“老黄，身体好吗？”

“还好……”

“又失眠了？”

“有点。”

“又头疼了？”

老毛病，挺得住。

“看来，又遇到了困难……老黄，不行就先放一放，这部电视片急也急不出来，等筹划到资金，有了条件，再从从容容地进行后期制作。”

“唉，我知道。别替我愁……”

“你什么时候回上海？”

“我也不知道……”

黄宗英尽管做了许多努力，这部反映新疆风貌的电视报告文学片的后期制作，仍未能完成。对黄宗英来说，这是又一个艺术创作的遗憾，又一个未圆的梦。

后来，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人，一旦停止了迸发自我潜力的追求，生命原地踏步，青春悄悄陨落，遗下的只是机械的生理重复。当一个梦圆了的时候，我们又开始追求另一个梦，渴望去做另一件力所难及的事。梦的回声唤起新的梦，循环不已，生命不息。

且喜梦多梦酣，

何计梦破梦圆。

她说得多好啊！我希望她所追求的一个个梦，都能如愿地圆了，快快乐乐地圆了。可是，这是不可能的，生活毕竟是生活，总有梦破梦圆……

啊，黄宗英，梦的呼声又唤起你一个什么新的梦呢？

初冬。

寒冷的北风呼啸着，我走在马路的人行道上，有几片落叶在身边飞掠。阳光像金色的雨，从天空洒下来，也被北风吹得失去了暖意。花店里菊花很多，有白色的、黄色的、紫红色的，仿佛还在渲染秋色的明丽。我没有买菊花，而是买了一束白色的玫瑰花，匆匆向黄宗英家走去。

昨晚，黄宗英在电话中告诉我，她从北京回到上海，是准备参加一部电影的拍摄，希望我尽快到她家去一下，好几个月没见面了，有些事儿要谈谈。

当我走进她的家门，就听到有人在弹钢琴，那曲子很简单，像是短短的练习曲。我想，也许是黄宗英的外孙女小简妮在练琴。推开会客厅的门，我发现小简妮坐在地毯上在玩一个比她还高的大丑娃娃。

“简妮，不是你弹琴？”

她摇了摇头说：“是外婆在弹琴。”

“你外婆在弹琴？”

她点了点头。

这时，琴声停止了，黄宗英从卧室里走了出来。

“老黄，你在弹琴？……”

她笑了笑答道：“我在练琴。”

“练琴？”

“我这次回上海，是应邀参加中法合拍的一部故事影片《花轿泪》的拍摄。我在影片中饰女钢琴家珠蒂·王，虽然只有四场戏，可我要做许多准备，首先要练练琴。我十七岁以前，断断续续学过三年钢琴，几十年过去了，学过的也都忘了，只好请简妮的钢琴老师教我，我学得苦，老师也教得累……”

她说完轻轻叹了口气。

壁炉里烧着木柴，火焰的光辉闪耀着，会客厅里暖烘烘的。我把白色的玫瑰花插在花瓶里，花瓶旁是阿丹的一张彩色照片，他正眨着眼朝我微笑。

“这玫瑰花多美！”黄宗英说，“阿丹最喜欢玫瑰花，他在画里也画过玫瑰花……”

“老黄，这束花我是送给你的。”“我知道，我也喜欢玫瑰花。”

“这白玫瑰白得那么纯洁，那么素雅，会使人联想到生命本色和母爱的圣洁。”

“是的，我十六岁就离开了母亲，现在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想起母亲，就会感到母爱的温暖……”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好像有泪花在闪。

“想妈妈了？”我问她。

“是的。想妈妈……唉，当个妈妈实在是不容易……”“老黄，你……”

“小姜，我有件事儿要告诉你。”

“什么事儿？”

“我可能要卷进一场官司，有人告我，已向法院起诉了。”“谁告你？”

“周伟。”

“为什么？”

“要我归还周璇的遗产。”

“周璇的遗产？”

“是的。”

“如果周璇有遗产，他想要，可以向你提出来，为什么去法院告你？”我疑惑不解地问她。

她长长地叹了口气，沉默着没有回答。

“老黄，这场官司很麻烦吗？”

“我也说不清楚。真的，说不清楚……”

三十多年前，周璇患了精神病，无法照顾她的儿子周民，是我把一岁的周民抱回家抚养。那时，我自己还没有孩子。二十多年前，周伟又达到我家抚养，当时他叫毕富伟，因为一家姓毕的领养过他。周伟到毕家之前是被孤儿院收养的，叫唐启伟。周伟到我家之后，我和阿丹商量给他改名字，开始想给他改名叫赵伟，一想，不对，他不能姓赵，应该跟妈妈姓，便改名叫周伟。我没想到几十年后，周伟会到法院告我，使我卷入周璇遗产纠纷的官司……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八日，上海《新民晚报》首先刊登了一条引人瞩目的新闻《周伟要求黄宗英归还周璇遗产》。这篇新闻写道：“金嗓子”周璇在北京工作的次子周伟，上月中旬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要求黄宗英归还保管他母亲周璇的遗产。周伟认为，他母亲一九五七年病逝后，留下了一笔遗产，当时他们兄弟俩均年幼，由母亲的生前好友、著名电影演员黄宗英保管。但他在诉讼状中没有提到这笔遗产究竟有多大数目和什么东西。在此之前，周伟曾向市电影局等单位反映过此事。担任一审任务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受理此案后，正着手进行司法调查，诉状副本已送黄宗英。

十一月九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也刊登了有关新闻。《解放日报》在《周伟要求黄宗英归还周璇遗产》的新闻中写道：今年上半年，周伟多次给上海市电影局写信，询问他母亲遗产的情况。市电影局收到周伟一系列来信后，十分重视，曾派人去北京，会同周伟所在单位领导向周伟了解情况并交换意见。同时，一直设法与黄宗英联系。上月中旬，周伟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正式受理了这个遗产纠纷案。

于是，全国各地的报纸和香港的报纸都纷纷刊登这条新闻和有关的文章。这场官司引起了海内外读者的关心，病逝了二十九年的影星周璇又成了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

十一月二十日，香港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文章《生母遗产引起纠纷周璇亲子详说因由》。编者按说：此文由著名影星周璇的亲生儿子周民寄来本报，内容包括许多关于周璇遗产纠纷的第一手资料。

周民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我从来认为对周璇这样的女演员完全不必太认真。她既不是英雄，也不是罪人，文学家们实在没有必要为她而浪费自己的才华。但现在事情既已闹上了法庭，那还是由我来道个明白，一来可让那不幸的母亲，能够安息；二来也令我可从作为周璇的儿子而带来的烦恼阴影中摆脱出来。关于周伟的来历大致有两种说法：其一，完全是假的，即他不是周璇的儿子，当然也不是我的弟弟。理由是没有任何原始的文字（除了他自己写的）、图片能证明他是周璇的儿子，也没有可靠的证人。何况就是周伟自己写的出生年月也比我早，更令人疑窦丛生。一九五七年初，周璇病情一度好转，两度到黄宗英家来看我，并把我接到疗养院去玩。这期间我不知有周伟这么个人，我也没看到过什么弟弟。其二，有这种说法，一九五二年周璇病情很重，她的一个女佣人的丈夫叫做唐棣的借故常来，与周璇生下个儿

子（此事是真是假仍搞不清，因当时周璇头脑已不清醒了）。总之，有这么个小孩取名叫唐启伟，一落地就由唐棣抱着东家走、西家串，说是周璇的孩子，要钱要东西。这种行为被文艺界中周璇的朋友告到法院，加上唐棣历史问题，人民政府将唐棣捕去判刑十四年，刑满后在劳改农场就业。唐棣被抓走了，唐启伟被送进了孤儿院。以后，被一对无子女的夫妇领养，过了一年，这对夫妇又不想养了，孤儿院又退不回去，大概是想到黄宗英那里已有一个我，就将唐启伟送到了黄宗英那里，她也就收下，这才易名周伟，其时一九五九年。

周民在这篇文章中还写道：如今，上海中级人民法院民庭已受理周伟诉黄宗英关于周璇遗产一案。我认为首先总得验明正身，先得搞清周伟这么个人的来龙去脉；不能因为他说是周璇的儿子，写了《我的母亲周璇》的文章，专吃周璇的饭，而就认为他是周璇的儿子……

这家报纸，在刊登周民文章的同时，还刊登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周璇在影片《马路天使》中的剧照。一张是一九五七年在周璇追悼会上，黄宗英戴着黑纱，周民倚在她的身上。

十一月二十一日，《新民晚报》登了一条新闻《应诉家庭官司感到难过 黄宗英委托律师全权代表》。这篇新闻写道：前天，黄宗英正式委托第一律师事务所王珉律师为返还财产案诉讼代理人的全权代表，她本人不准备出席法庭的开庭，她说：作为一个母亲，在法庭上是很难控制自己感情的……

我接到周伟的起诉书副本后，我委托王珉律师为我的全权代表。我对王珉律师说过：“我作为母亲，应诉子女的官司，心里感到很难过。这种问题，原来可以在家庭内处理的，没想到闹到法院，既然如此，还是让法律来作出公正的裁决。”

我曾对我的法律顾问说过：一个由我抚养长大的孩子，离开了他的母亲，这种感受只有一个做过母亲的人、懂得母亲感情的人，才能真正理解……

周璇遗产纠纷案引起了社会上许多人的关注，对于周璇的遗产，周民持什么态度？人们是非常想了解的。《周璇遗产案的历史渊源》的作者常恺曾同周民作过长谈，他在文章中写道：

周民说：“这次周伟突然向法院起诉，我事先并不知道，只是报上发了消息才知道的。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第一，我对这笔遗产不感兴趣。第二，就我个人而言，我不会向黄宗英去要钱，更不会同她打官司。如果我母亲确有这笔遗产，黄宗英完全有资格全权处理。第三，基于周伟已向法院起诉，如果法院判给我遗产，我将全部上交国家。我说这话绝不是感情用事，我有我自己的行动准则。我从一九八四年起就独立门户，我不依靠任何人。我只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和做人的道德说话行事。”……

那么，周伟是怎么想的呢？他为什么要为周璇遗产向法院起诉呢？他为什么要告小时候的监护人黄宗英呢？难道他忘却了黄宗英像母亲一样地爱过他吗？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九日，《上海法制报》发表了记者采访周伟的文章。

周伟说：第一，我打这场官司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我是懂得“点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打了这场官司，这中间不是没有道理的。况且情与法也是两回事。《继承法》也告诉我，要运用法律手段保护我的合法权益。第二，我之所以要打这一场官司，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为母亲正名。过去的说法一直认为她是在香港因贫困潦倒、分文皆无才回到内地

的。但事实上母亲是基于爱国和追求光明才回到了新中国的。建国初期，她还几次捐款，支援新中国的建设。说明她是爱国的。她在香港留下了一笔财产，可以证明她并非贫困潦倒。第三，通过法律来解决纠纷，这也是精神文明的表现。我希望双方当事人在互相尊重人格的前提下打这场官司，以免产生另外的不应发生的后果。……

周璇遗产案中的有关当事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在众多的新闻报道中，已清楚地表达了他们各自的态度。这起遗产诉讼案，牵涉的时间跨度很大，从一九五七年九月周璇病故算起，已长达二十九年，而且其中有些情况比较复杂，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查证、核实。据有关报道透露，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周璇遗产数额的查证工作，于一九八七年底已经结束，一九八八年初就可开庭审理。可是，由于黄宗英忙于她的事业，天南地北地奔波，很难找到她的踪影，法官们为此也很着急。黄宗英的去向，家中的保姆不知道，她的诉讼代理人王珉律师也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法庭只好继续设法与黄宗英联系，联系不上只能等待。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到了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法庭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于是，向黄宗英发出传票，通知她十一月二十八日到法庭参加诉讼。不久，黄宗英因病回到上海，住进了华东医院。法官们便到医院看望了黄宗英，并且同意了她的因病延期开庭的要求。法院将庭期改为十二月十五日。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上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起周璇遗产纠纷案。黄宗英没有出庭，她写了两份书面材料《我抚养周璇遗孤的前前后后》、《我的态度》，由委托代理人王珉律师在法庭上宣读的。

法庭调查证实：周璇遗产共有七万余元，利息五万余元，共计本息十二万余元。这笔钱一直由黄宗英作为周璇遗孤监护人的身份保管和使用。法庭上围绕黄宗英使用这笔钱是否构成侵权行为和如何处置遗产，当事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当年，我收养了周民，后来又受组织委托收养周伟，并保管周璇遗款，用以抚养周璇遗孤。在抚养周民和周伟期间，基本上没有动用此款。在他们成年后，因周民一直不承认周伟是周璇之子，故无法处理周璇遗款。后为妥善保管才将该款转移至一个安全的地方，主观上没有侵吞的故意，周伟也没有受损害的事实，所以不构成侵权。现周伟要求归还此款，应首先确认周伟确是周璇之子，才能将钱款分割归还，但应扣除其领养期间所支出的教养费用及利息。如果周伟不能出示他确是周璇遗孤之法律证明，也许到某一天，忽然又冒出另一个周璇遗孤来，我将何以作答？……

周民是周璇的儿子，不仅有文字记载、有照片，还有许多人证。那么，周伟是不是周璇的儿子？却成了法庭上令人关心的问题。如果周伟不是周璇的儿子，他就没有资格要求继承周璇的遗产。

在法庭调查中，审判长王本俊宣读了北京市公证处（85）京证字第1734号公证书，认为周伟符合原告资格。如果被告和被告委托代理人对周伟的身分和北京市公证有疑义，可以在法庭调查和辩论阶段，提出有关的事实、证据和理由。

原来，周民和周伟是同母异父。

三十年代周璇已是我国著名的歌星和影星。她曾主演过电影《马路天使》、《喜临门》、《渔家女》、《三笑》、《孟姜女》、《夜深沉》、《花街》等。还灌了许多唱片，她唱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在全国流行，

得到人们的喜爱。一九三八年周璇与演员严华结婚，三年后离异。一九四五年曾与石挥交友，但未结合。后来由秘书介绍，认识了洋场小开朱怀德。一九四九年四月，周璇去香港，朱怀德也随后去了香港，两人同居。一九五一年七月，周璇回到上海，两个月后生下了周民。这时，早已回到上海的朱怀德不仅不照料周璇母子，反而与一个舞女寻欢作乐。他还不承认周民是他的儿子，逼周璇送孩子去验血。周璇实在无法忍受了，登报声明同朱怀德“脱离同居关系”。

一九五一年周璇在拍摄电影《和平鸽》时，认识了摄制组帮助搞美工的唐棣。唐棣解放前曾是国民党励志社美术股干事，上校军衔。解放后由人民政府分配工作，在常熟中学任美术教师。在摄制组里，他以给周璇画油画的机会，主动与周璇接近。到了一九五一年五月，唐棣已成了周璇住所——枕流公寓的常客，不到半年，周璇就怀了孕。此时，周璇的身体不好，精神不振。于是，周璇的养母叶凤妹到法院告了唐棣。罪名是：“诱奸精神病妇女和诈骗钱财罪”。唐棣被判刑，周璇也于八月被送进了医院。

一九五二年八月三十日，周伟出生在枕流公寓。根据父亲的姓取名唐启伟，一年后唐棣出狱，他要求住进枕流公寓，遭到拒绝。于是，唐棣把唐启伟接走了……

一位为周璇治过病的医生苏复，写过一篇文章，谈到了周璇的病情：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三年，周璇日日夜夜呆坐着。她不敢接触任何人，很少和人讲话，有时做一些下意识的动作，有时伸出手来好像在弹钢琴，有时唱了半句歌就停住了。她把自己心爱的东西乱扔，半夜走到养母面前，含糊不清地喊亲娘，亲娘……

上海市电影局和上海电影制片厂，对周璇精神病的治疗十分重视，他们说，倘能把周璇的病治愈，让她再拍一部电影，哪怕是一部短片也好。可是，苏复医生认为：周璇的病情已久，有将近二十年的病史，缓慢起病，经各种治疗无效，已处在精神分裂症的慢性阶段，能否治愈，治愈到什么程度，谁都没有把握……

经过医生的药物治疗和医院内外各方面配合的心理治疗，周璇的病情竟奇迹般地好转了。到了一九五七年六月，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特为周璇拍摄了住院疗养生活的纪录片。周璇想重上银幕，关心周璇的朋友和广大观众也希望周璇能重上银幕，多拍几部好电影，多唱几首新歌。可是，意料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周璇得了中暑性脑炎，于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不幸病逝了……

如果周璇没有病故，能幸福地话到今天，就不会有这场遗产纠纷案。周伟也不会向法院起诉，黄宗英也不会成为被告。

法院已经查明，周璇遗产有四部分：第一部分，由上海电影局保管的金银首饰、红木家具、钢琴、衣服及寓所内其他物品。第二部分，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调回的周璇在香港上海银行的港币。第三部分，周璇在香港汇丰银行保管箱内的财产，有美元、港币、银元硬币、金元硬币。第四部分，周璇依合约享有的香港百代唱片公司所支版税款。周璇的这些遗产兑成人民币十二万五千八百四十一元二角九分，存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周璇户和黄宗英户上。黄宗英作为周璇儿子的监护人负责保管。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周伟是周璇之子，有事实依据和公证证明，应予确认。周璇死亡后，所遗财产已归其法定继承人周民和周伟所有，

故周民和周伟是系争财产的共有人。系争财产为由黄宗英保管的变卖周璇遗产的余款、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存款和孳息，其中一半应归周伟所有。周璇死亡后，周民和周伟未成年期间，黄宗英为他们的监护人。作为监护人，黄宗英保管周民和周伟所有的财产，并可以为教养他们而处分保管的财产。监护人的这些权利和义务在一九六三年上海电影局致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函中已予明确。在周民和周伟未成年时，黄宗英尽了监护责任。周民和周伟成年时，设立监护的原因消灭，黄宗英对周民和周伟的监护自行解除，则应将所保管的被监护人所有的财产予以返还。黄宗英既未将财产返还，也未将财产情况告知原告或有关组织，没有履行因监护关系所产生的该时财产保管人应尽的义务。在周伟向黄宗英询问财产情况时，黄宗英仍未告知，而且提取了全部钱款，至今不提供财产去向。黄宗英的行为侵犯了周伟的财产所有权，应负民事责任。据此，黄宗英除应返还周伟所有财产外，还应赔偿由此造成的周伟所有存款的利息损失。周民主张系争财产的权利，但不主张由黄宗英返还，是对自己这部分民事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准许。周民否认周伟是周璇之子，否定周伟对系争财产的权利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黄宗英在周民、周伟未成年时所提取的钱款视为已用于被监护人；所垫付的用于周伟的必要开支加利息后，可在返还款中扣除；用于周伟的必要开支以黄宗英提出帐目为准；周伟成年后给付周伟的钱款，以周伟认可的为准；支付给保姆洪雪珍的费用，部分作为周伟的生活开支计算。据此，本院确认黄宗英用于周伟的费用和给付周伟的钱款总计本息为人民币一万零三百一十八元六角一分。另黄宗英和洪雪珍分得系争财产没有法律依据。

一九八九年九月五日下午二时，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黄宗英返还原告周伟钱款人民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元一角六分。

二、被告黄宗英赔偿原告周伟利息损失款人民币三万一千四百五十九元二角。

三、以上二项总计人民币八万五千三百七十九元三角六分在本判决生效时给付。一九八九年五月起至本判决执行时的利息损失以五万三千九百二十元一角六分为本金，按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原周璇户同种类存款利息计算累加，由黄宗英赔偿给周伟。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七百三十二元二角八分由黄宗英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在接到本判决书的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法庭宣判之后，记者们曾走访了本案的审判长王本俊，请审判长回答了人们关心的一些问题。如确认周伟是周璇之子的依据何在？为什么说黄宗英侵犯了周伟的权利？周民是周璇之子，为何没有分得遗产？

当记者问道：黄宗英和保姆洪雪珍在抚养周璇遗孤中尽了职责，为何得不到任何遗产？

审判长的答复是：首先言明，黄宗英确实在抚养周璇遗孤中付出了心血，这是值得赞颂的，但情是情，法是法，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我们对黄宗英在抚养周伟时所支付的费用已全部从周璇遗产中扣除（包括利息）。根据“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分得被继承人的遗产，黄宗英对周璇不存在这种关系，所以没有法律依据可以分得周璇遗产。保姆洪雪珍与黄宗英是劳务关系，要分得周璇遗产也无法法律依据。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时，黄宗英没有到庭，她因病在广州住院。

广州的九月，天气仍很炎热，黄宗英从病房的窗口望出去，蓝天被一层薄薄的云雾笼罩着，使人感到有些沉闷，似乎有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

黄宗英很焦急，她在等待法院宣判的结果。两年多来，她作为被告深深地陷进了这场官司，她的苦恼，她的遗憾，她的伤心，是可以理解的。是的，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被告的母亲，对法院的判决，她希望早些知道。

当她接到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时，会怎样呢？是接受判决条件？还是上诉？

起风了。一阵阵风带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忧烦，吹向黄宗英的心底，她感到很不安，很疲惫……

一九八九年夏天，我为蛇口都乐公司宣告破产事，急匆匆飞往南方，想再挺一挺……可是怎么挺也挺不住，更没想到焦虑和劳碌把我扳倒了，我病在广州东山宾馆。

我的两条腿突然像丢掉了似的不存在了，不能走了，从客房到同楼层的餐厅我都走不过去，只好把饭叫到房里来。花城出版社李士非等同志赶忙帮我办好一切手续，把我送到长堤边的孙逸仙纪念医院，我住在十六层的外宾和高干病房。郑主任等众医生为我细心诊治。邻房的归侨“姑婆”——梳着长辫出国去帮佣，一生不嫁，稀疏苍白了辫子归来过老——给病在异乡的我送汤来喝。广东人是最讲究汤补的。我说：“姑婆你自己多补补吧，你一个人……”我也没想到医院电脑室里冒出我的亲堂侄女，她也要用电瓦甑炖汤给我喝，我对她说：“想得出！大夏天的给我弄荤的带药的汤，我喝不下，我又没入广东籍，喝热汤我情愿喝中药。”如此，她每天换着样儿地给我送水果，让我食尽南国佳果。

我站在高楼窗口，对面是《林则徐》影片选景的英国领事馆。不知是真还是假？一切都不知是真还是假？是梦境是现实？我查看这十六楼从哪边跳下去不太悲惨……

活下来还是要走路的，我开始扶着墙走出屋，过些天又试着走楼梯，又过些天我乘自动电梯下到我认为可以走上来的楼层，一天一天更往下移，艰难地一楼一楼往上爬，爬得一身汗……于是上上下下病房里传开了：外宾病房里有个好靓的“鬼婆”——一定是我太不像高干了，我一头银发当是外国老太婆——腿肿着，走不好也不肯喝汤。于是面孔熟一些的病人看见我就嘱咐：“你要想办法喝汤啊。”珠影著名老导演、赵丹的同监难友王为一，特别大老远地给我送大锅的美味冬菇鸡汤。

一日，我的忘年新交小张跑来探病（由于我的疾病、我的灾难，隔三岔五地常有不相识的年轻人来看我，带来他们自己喜欢看的书给我看）。小张说：“广州画院院长陈永锵让我跟你说，他想把你接到他家去养病。”

“陈永锵？”

“就是赫赫有名的画家‘鳗鱼锵’，他喜欢帮助人。”

“他是赵丹的朋友吧？……”

“不知道，他听说你不顺心，病在这里，又没汤喝……”

我笑了起来，由于我不喝那放了各种名贵药材的汤，竟需要“救援”了。

隔日，陈永锵来医院接我了。他是个平平实实的汉子，又见面熟，他跟我说：“家里人都商量了，接你回家住。医院的大伙食就那么回事，不像家里可以天天换着样儿给你煨点汤。”

我忍住笑，只说：“太谢谢你们全家关心我。”

“五六个住处随你任意挑，我母亲自己住，我两个妹妹住一处，她们争着要你去。我乡下老家有一幢房子，你若喜欢田野生活，写写农村，我就让亲戚给你收拾了照顾你，我自己家我太太也欢迎你，就是人来得多些，电话吵些……”

他心诚意切地为我向医生请了假把我接到他母亲家。那是一幢新建的七层居民楼，他母亲家在七楼。陈永锵说：“知道你能爬楼了，才敢让你上这儿来。”

陈婆婆（也许比我小吧）见我来了，忙去炒鸡块，做西洋菜汤，老陈带着我参观这三房一厅。实际上有一间大屋是陈永锵的画室，一张未完成的下抵地板上顶天花板的大画倚壁而立，墨蓝色的底色浮游着金闪闪银花花红艳艳的欢跃的鲤鱼们，映着透过窗隙的阳光，一条条仿佛活了起来，仿佛会说话……

“你可以住这间。”他说。

我一时不知怎么决定，也不知说什么。上苍啊，冰淬火燎曝寒曝暖叫我孑然一身怎么消受得了。

告别了陈婆婆，陈永锵送我下楼，我右手扶着楼梯栏杆、左手抵住他的肩膀，一步一步……

我没有留在广州。南方的事业已经不在，留不住我了。我回到上海，回到寥落的家，有四张空着的书桌等着我。迎着雷击，迎着阳光，我活着。微笑面对人生，因为我有义士陈永锵似的朋友们，我永远不是孤单单的。

回到上海之后，我看到了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经过认真的思考，我决定提出上诉，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九一年八月三十日上午九时，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周璇遗产纠纷案。

法院查明：一九五二年八月三十日周璇生周伟时，黄宗英在场。周伟生下后由奶妈喂养。一九五三年九月四日至一九五八年六月二日由生父抚养。一九五七年，黄宗英书面向上海市公证处申请公证称：“被继承人周贞（即周璇）是继承人周民、周伟的母亲，生前曾向香港汇丰银行租用B字第6950号保管箱一只存放财物，现因周贞已于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死亡，为此，上述保管箱内的存物应由周贞的仅有合法继承人周民、周伟继承。又因继承人周民、周伟尚未成年，现由我抚养。因此，由我作为监护人代为保管遗产。”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上海市公证处出具公证证明，确认周民、周伟是周璇的儿子和合法继承人，黄宗英为周民、周伟的监护人和财产执管人。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再次公证确认，周璇遗产由其两个儿子周民、周伟继承，但周民、周伟尚未成年，由黄宗英作为周民、周伟的合法监护人及全部财产执管人，处理周璇在香港的一切遗产事宜，直至继承人合法年龄时为止。

法院认为：原审法院确认周伟是周璇所生之子，有事实依据和合法有效的证明文书佐证；原审法院确认黄宗英的行为侵犯了周伟的财产所有权，应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民事责任是正确的。黄宗英要求扣除在周璇生前抚养周民而垫付的生活费作为债权可予支持，应在周璇遗产中偿还。关于黄宗英和洪雪珍以对周璇尽了义务为由，要求分得周璇遗产，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法院判决如下：

一、变更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86)沪中民字第37号民事判决书主文第一、二、三项。

二、准予黄宗英从保管财产中扣除垫付周民六年生活费人民币一万四千零八十三元九角九分。

三、黄宗英返还周伟钱款人民币四万五千七百三十九元八角五分，赔偿周伟利息损失款人民币二万六千六百八十六元四角五分，两项共计人民币七万二千四百二十六元三角，在判决后三十天内给付。

四、黄宗英、周民其他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二审受理费人民币七百三十二元二角八分，黄宗英、周民共同承担六百三十二元二角八分，周伟承担一百元。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从一九八九年九月立案后，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对上诉人的要求和一些有争议的事实作了认真细致的调查，开庭审理了周璇遗产纠纷案，并作出了终审判决。这起历时四年之久的为海内外广为关注的案件有了结果。

黄宗英本来就在病中，当她接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书时，情绪非常低落，不断地叹着气。她躺在床上轻轻地闭着眼睛，脸色显得更加苍白，仿佛她对周围的一切都淡漠了，淡漠了；她感到很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也许，睡一觉会好些，如果真的能沉沉地睡去，什么时候能醒来呢？

啊，醒来也好，睡去也好，希望她能摆脱那些恶梦；该忘却的就忘却吧，可是忘却也是不容易的……

我没想到我会搅入这场官司，搅入了这种混乱的局面中。周璇很不幸，我不愿损害她的隐私权，也不愿母子对簿公堂，这种场面叫任何一个母亲都承受不了。纵然我赔上十万百万，也抵不上我抚养周璇遗孤的心血和精力。

我去了蛇口六年，又不停地奔波于西藏、新疆等地，搞了几部电视剧，原想在艺术上有所追求，不料所有的片子票房价值都不高，钱都扔到了水里，亏本且不说，人也累倒了。事业垮了，官司也输了，但愿身体能慢慢好起来，再多活几年……

唉，我也弄不明白，年复一年，尽轮到碰上些小说里、戏剧里、电影里都没有的悲剧情节。在风风雨雨的生活里，我实在不愿意承担那些连做梦也想不到的悲剧角色。可是，不愿意承担也承担了，难怪人家都说我命苦……

人生的路是漫长而又艰辛的。有时是迎着阳光，走向开满山花的峰巅；有时是迎着风雪，走进阴暗寒冷的谷底。这一切是偶然，也是必然。正因为有了这种“偶然”和“必然”，人和人生才真实、可信。

黄宗英不是弱者，但有时却陷入迷惘！

黄宗英不是强者，但从从不向命运低头！

望长城

“喂，小姜吗？我要到内蒙古去……”

“什么？到内蒙古去？你不是在生病吗？躺在床上起不来，止头痛药片快要当饭吃了……怎么去？”“小姜，听我说……”

“你去内蒙古干什么？”我打断了黄宗英的话。“你听我说……”她在电话里的声音有些急了，“是中央电视台《望长城》摄制组A组执行编导魏斌，给我打来长途电话，邀我做节目主持人。”

“你，还起不了床的病人去做节目主持人？去望长城？你怎么个望法？老黄，你答应了？”

“我……”黄宗英迟疑着说，“我……我生病，我开始没答应，后来……”

“后来那编导一说，你就答应了，对吧？”

“不是……”

“你要好好想一想，你现在的身体状况能沿着长城去跑、去望吗？弄不好，你自己的身体垮了还不算，也给人家摄制组添麻烦、误事儿。我看你还是推辞掉吧。”

“我没办法推辞，真的，没办法推辞。编导魏斌说得那么诚恳，那么热情……”

“这么说，行期已定了？说吧，让我干什么？”

“小姜，明天上午陪我去华东医院看病，拿点药，咱们和医生商量商量，多拿点。下午帮我整理一下行装，七月的草原，早晚比较冷，总要带点衣服……”

“还干什么？”

她格格地笑了。我好久没听到她的笑声了，从她的笑声里，我感到她的身体情况好些了。也许是《望长城》摄制组编导魏斌的一番邀请，使她体内的健康因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战胜了病痛；也许是雄伟的古长城，激发了她的创作欲望和创作激情。作为一个艺术家、作家，中华民族的万里长城，永远对她充满了无尽的吸引力。

啊，长城！当年黄宗英离开北京追随大哥黄宗江去上海演戏时，曾深情地向你告别。那时她还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生活的路仿佛开满了鲜花，她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会遇到一次又一次的暴风雨。如今她已是一头银发的老人，却要以《望长城》摄制组的主持人的身份，在草原上，在沙漠中，在朝霞里，在月光下……去重新认识你、理解你、考察你、追逐你！

难道这是人生的缘分吗？！

难道这是生活的机遇吗？！

我们《望长城》摄制组这支队伍，内部分A、B两个组，是由刘效礼总编导率领的。有四十名年轻的、壮实的、有探索精神的小伙子和一名姑娘——录音师张文华、再加上我这个老太太组成。除我以外，是清一色的黑头发。

我是中途带戏上场的。本来三、四集的节目主持人是上海电视台的青年节目主持人李培红。没想到她进组后，在巴旦吉林沙漠骑了七天骆驼，途遇狂风，眼角膜急性发炎。休整时，李培红赶回上海就医，验出视力急剧下降，有失明危险。摄制组为等她停工五十多天，当听到医嘱，李培红绝对不能再进沙漠时，摄制组委托A组执行编导魏斌给我打来长途电话，邀我做节目主持人。

当时，我病在床上只能马上回绝：“天啊，我在生病，我怎么能到草原上去主持节目？再说，我也不知道在长城面前说些什么？”长城，对我是那么亲切、熟悉，又是那么遥远、陌生。天晓得长城学是怎么一门深奥而又神秘的学问！接着魏斌就给我讲了李培红的“沙漠遇险记”，并说：“《望长城》摄制组总部和电视台领导最近又调看了您的《小木屋》。您既然肯去大雪山、大森林，一定也愿意去大沙漠吧……”

这没见过面的编导真会走棋“将军”。

我说：“《小木屋》是五年前拍的，那时身体也好。老来一年是一年，现在我已是一头白发了。”

“一头白发更好啊！我们就是要找一位有沧桑感、历史感的节目主持人。这样的主持人站在长城前边，才不致于被长城吃掉。”

长城是怪震人的。哪儿最荒凉，哪儿才有最值得拍下来的常人见不到的长城遗迹。

“主持人一直跟拍摄现场吗？”我问。

“……太荒凉、太危险的地方，您可以不去。而且我们会……”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打断了魏斌的话，“只要下了决心，我从来是敢上、敢拚的！可是我毕竟上了年纪，近几年好几次住进了医院……”

“领导考虑过了，摄制组给您配备医生。”

“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我担心的是不让我去现场，只让我露个面就在画面外解说。而动我心的正在于勘察万里长城之风险。

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探险史。

探险，赋予艺术无与伦比的魅力，对艺术家有强烈的吸引力。我觉得一个人在追求事业的时候，不但要知道怎么活，更要紧的是要知道怎么死。是的，我的心头又涌起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我不愿死在床上，像一支烛慢慢地燃烧……我愿在战马的嘶鸣中倒下……

我心里还有一百个问号。不知为什么全被魏斌的话驱赶得无影无踪了。

三天后，我飞到了北京首都机场。

一九九一年七月十四日，黄宗英从上海飞抵北京。

当她走出首都机场出口时，有一位戎装赫赫的军人迎上来，与她亲切地握手。

“你是……”

“黄老师，我是刘效礼。”

“你就是总编导刘效礼？”

“是的。黄老师，我代表摄制组全体人马欢迎您！”

“我不也是摄制组的成员吗？”

黄宗英笑了，刘效礼也会心地笑了。

这时，黄宗英发现摄像机一直在跟踪拍摄，那是《望长城》摄制组的摄像章跃中校把镜头紧紧对着她。

晚上，摄制组为黄宗英“接风”，大家欢欢乐乐地进餐，显得格外高兴。

坐在这群年轻的艺术家中，一头银发的黄宗英似乎变得年轻了。她的头不疼了，也不昏了，身体也感到轻松，几个月来都没感到有这样轻松。

昨天，是她的六十六岁生日，俗话说：“六十六，不死掉块肉”，女儿赵橘特切了六十六块小肉丁，让阿姨做了一碗寿面给她吃。其实，并不是循旧俗，而是女儿要表示一下对母亲的心意。

黄宗英吃着有六十六块小肉丁的寿面在想：女儿让我吃了这碗寿面上路，真有意思！上路了，明天就上路了……看来，这次上路肉和命都押给长城了……

今天，她坐在摄制组的餐桌上，望着就要和她一起上路的青年艺术家，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苦也好，累也好，风险也好，欢乐也好……反正她和这群青年艺术家拴在一起了。此番“望长城”，还不知要“望”多久呢？但愿她的身体能好些，病魔不再困扰她。当然，沿着长城去寻觅、去探索，掉几斤肉是不足为奇的。

读文学剧本、看画册、看参考录像片……黄宗英觉得安排得很紧张，有什么办法呢？出发的日期已定，出发前该做的事儿总要完成，不然心里更没底了。

摄制组催黄宗英签合同：日劳务费八元。日稿酬八元。黄宗英拿起笔就签了。

摄制组还要为她办“人身意外保险”。她心里一阵热乎，忙问：“大家都办了？”

“每个人都办了。”

她又问：“死活不论了？”

“死活不论了！”

黄宗英真想欢呼：“太好了！”能置生死于度外去从事艺术创作，对她来说是个极大的享受。在这样的年纪还能和年轻人并肩去迎艰斗险，她觉得真是晚年有幸老来添福了。

好久没过摄制组的生活了，这种生活既紧张又亲切，有时甚至很危险，很意外，会产生一些传奇色彩。黄宗英尽管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可她很适应这种生活，很迷恋这种生活。也许，她的艺术才华能在这种生活中获得最充分的发挥。

夜里，她在灯下看着有关长城的资料，随手记着笔记，她熟悉的长城，似乎又变得陌生了。当她一步步走进长城历史深处的时候，穿过一层层古战场的烽火，长城却又变得熟悉了……

我跟着《望长城》A组“出征”了。

一个摄制组停机待命，等主持人等了五十多天，是一个严酷的现实。“抢场代戏”，是演员的戏德之一，我怎能忍心坐视。设想到半个世纪以前我以代戏上场，半个世纪以后，我将又以代戏退场，也是命也运也。仿佛我白了几年头发，是专门等着为李培红代戏上长城哩！如此年龄之差，以演员本色更替角色，银坛屏幕似无前例。

我很骄傲能跟着一批舍生忘死的年轻的伙伴们一起去拍摄。每当看到年轻人快快活活去迎艰涉险，好一副随时准备英勇赴义的精神，我心里都酸酸地感到欣慰。想到有这样一个战斗的创作集体，我往往高兴得把牙刷塞到铅笔盒里，把圆珠笔插到“多功能”大口搪瓷杯里。

在这样一个摄制组里工作，精神永远是振奋的，心情永远是舒畅的，我不仅年轻了几岁、几十岁，而且没有时间生病了。

没想到，我们到张家口市的第二天早晨，我在宾馆下楼梯时，突然滑跌，我的右脚崴了。唉呀！好疼，好疼……我的右脚踝部曾两度骨折过，刚上阵，还没正式参加战斗呢，千万别再……

编导魏斌急忙把我搀回房间去了。他焦急地说：“老太太，这是怎么说

的……”摄制组的年轻人叫了我两天黄老师，又都叫我老太太了。

摄像师潭湘江连架带背，把我弄到了小车上，司机小塔连忙开车送我去铁路医院。我的右脚肿得很厉害，经X光检查未发现骨折，于是，医生决定用经络诊疗器治疗。

唉，这无妄之灾，折腾了本来就拍摄不顺的摄制组，心里真不是滋味。

从此，我一看到宾馆的楼梯上没压好的凸凹不平的地毯就发怵，很怕再滑跌，让摄制组的伙伴们担惊受怕……

七月的锡林浩特草原，是最美、最迷人的风景画卷。绿茫茫的牧场无边无际，一片片野花争芳吐艳，好像是从蓝天上飘落的彩云。近处的羊群，远处的马群，在绿色的草浪上飘移，展示着草原的空旷、浩瀚和原始的生机。

摄制组住进了白马宾馆的蒙古包。明天那达慕大会开幕，采景、看点、寻找拍摄对象……要做许多具体的准备工作。忙了一个下午，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才凑到一起吃晚饭。可是编导魏斌还没有回来，他仍在为办理进入那达慕大会的记者证在奔波。没有记者证进不了会场，进不了会场怎么拍摄呢？

大家在默默地等待，等待编导魏斌早些归来。

第二天早晨，摄制组去大会秘书处拿记者证时，竟出了意外：记者证已被冒领了。真是难以想象，真有人敢冒充中央电视台《望长城》摄制组。

摄制组全体人马，被拒于那达慕会场之外四十多分钟后，才允许进去。

黄宗英应盟长的邀请，胸前戴着红色的“特邀来宾”证，上了主席台东看台。她崴了的右脚仍然在疼，走路一瘸一拐的引人注目。有的人望着她便想：这个一头白发的老太太是谁呢？脚伤了也不歇着，还硬挺着上看台，也真够意思了……黄宗英在看台上刚刚站定，突然听到有人叫“大姐”，声音是那样熟悉，那样亲切。她敏感地想：是叫我吗？在遥远的锡林浩特草原上有谁叫我呢？

她回身在寻望。

可是视野里大都是穿蒙古族民族服装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姑娘，穿着粉红色、翠绿色、橙黄色、淡蓝色等各色蒙古袍，在草原的映衬下格外鲜丽、格外耀眼。

“大姐！大姐！……”

黄宗英已经明确地意识到，有人在叫她。

我正在寻找喊“大姐”的人，只见一位女同志扑过来，紧紧抱住了我。

我一看是燕子——久别了的邢燕子。

我真没想到在内蒙古的锡林浩特草原会碰到邢燕子。燕子搀扶我坐下来，她坐在我旁边。我们款款叙旧谈心。我得知燕子现在天津市北郊区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天津北郊区与锡林浩特市是姊妹城市，她是代表北郊区来祝贺的，并还有些合作项目要洽谈。

我问及侯隽，燕子说她还在宝坻县，当副县长，挺好的。这两个姑娘一眨眼人到中年了。我爱她们，我心疼她们，我一直惦记着她们。燕子邀请我去天津、去北郊、去宝坻。我答：“我想去，我真的想去呀！我的铺盖还在窦家桥的张大娘家哩！”

那是在“文革”中的哪一年呢？记不清了。反正是鬼也不敢登我家门的年月。邢燕子专程到上海来看我，还请我重返宝坻——这意味着使我重新获得人身自由。

谁知道，我去宝坻住了没多少日子，麦秋刚过还顾不上喘口气，我就被

江青下令驱逐出境。驱逐令下达到在宝坻县委的邢燕子、侯隽手上，她姐俩先是哭了一通，过后和面点火起油锅炸大馃子、包肉饺子给我饯行。夜里姐俩又哭了一宿，第二天找来县里的摄影师给姐儿几个大拍其照。再又给我派车，姐俩护送我到天津，护送我上了南下的列车，挥泪而别。

“大姐千万保重啊！”

“大姐我们还要接你来，你等着，只要我们……”

“大姐，无论碰到什么事儿都别当回事儿啊！”

“大姐！……”

我带着铺盖来的，却没带铺盖走。因为我临走那天，房东张大娘扑在我的铺盖上掉眼泪。说：“这是冲着谁来的啊！不看僧面还看佛面哩！她大姐，我们宝坻人可没赶你走。这铺盖你撂这儿，我们还盼着你再来哩。”

我听说宝坻的乡亲后来还在我的铺盖里添换了当地产的新棉花……

回首往事不免感伤，回首往事却也凭添一股英武之气：“燕子，你扶我下这主席台的高台阶，我们摄制组队伍在对面，我得归队。”

“大姐，你的脚不行。”

“不行也得行。我老坐在主席台上算哪出戏？我是记者，又是电视片的主持人，摔交要开始了，我在长途汽车上认识了年轻的摔交手巴格那，他要交手了，我应该在场，怎么能不在场呢？”

燕子笑着摇摇头：“大姐还那脾气！”

“你不也没改脾气吗！”我扶着燕子的肩头，使劲站起来，走下台阶。

我一瘸一瘸走过运动场中轴线，归队了。

电视屏幕上留下主席台上我和燕子欣欣叙谈的镜头，虽然观众也许不会留意，但这个镜头的后面是写得出二十集连续剧的。

电视屏幕上也留下了摔交场上我扶着蒙族兄弟巴格那肩头的镜头。那是在巴格那获胜领奖的时候，我高兴地看着他，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他高大、壮实、善良……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我又何尝不是貌似笔挺却也是一瘸一瘸地走过来的呀？我更数不清曾扶过多少有形、无形的肩头。

我还在走着，走着。

艰难地走着，快乐地走着……

黄宗英和她的伙伴们，拍摄完了锡林浩特草原上的那达慕大会之后，又追着古长城的遗迹，驱车去了呼伦贝尔草原。在那里，他们拍到了包尔呼一家的故事。包尔呼原本是汉族人，六七岁时因六十年代初的那场“三年灾害”，家里没吃的，被常出口外为蒙族打工的父亲带到了呼伦贝尔草原，过继给一家蒙族牧民。他在蒙族母亲的身边渐渐长大了，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蒙族牧手。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汉话也差不多忘光了，直到北京的知识青年下到草原来“大有作为”，牧民们才想起让包尔呼试着用汉语和知识青年沟通。那年月，他倒成了连结汉蒙民族之间感情的桥梁。如今，包尔呼已是一个中年汉子了，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看过《望长城》的人们，就不会忘记他们一家人乘火车的情景。包尔呼的孩子从来没离开过呼伦贝尔草原，当他们看到车窗外的大地上，长着一棵棵树时，不知道那是什么，那惊愕的目光、惊愕的叫喊，让人陷入可理解又不可理解的深思。

当摄制组完成了呼伦贝尔草原的拍摄之后，便回到了北京。总编导要安排黄宗英去民族饭店休息，可是黄宗英怕摄制组多花钱，便住进了国家科委

招待所。在队伍准备“转场”期间，她隔天去西苑中医院针灸科治疗受伤的腰和右脚，想力破民谚中的“伤筋动骨一百天”的常规。是啊，摄制组紧张地休整几天后，就要挺进渺无人烟的罗布泊了，哪还有更多的时间治病啊！

总制片郭宝祥对黄宗英说：“我和于台长研究过了，为关心你的身体，又是这样年纪了，是否考虑你不去罗布泊。将来航拍时，可以在飞机上出现主持人的形象……”

“让我去吧。”黄宗英动情地答道，“我想，对一个知识分子最大的关心是全其志。我想去罗布泊。前几年，我在新疆拍电视片时，曾想进罗布泊，可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我没敢带着摄制组去冒险。自从一九八一年科学家彭加木在那儿失踪后，有关部门就立下了单车不能进罗布泊的规矩。我得带几辆车？多少人马呢？坦率地说，我没有那么强的带领‘野战部队’的指挥能力，再说摄制组里都是一些有才华的青年艺术家，如果进了罗布泊也失踪了怎么办？……我没敢去，我想去，那一片荒漠在勾我的魂！”

“这么说，您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

“您一点儿也不考虑我们的意见？”

“不考虑。”黄宗英执拗地笑了。

郭宝祥被黄宗英的精神感动了，他望着这位一头白发的老太太，胸中立刻涌起一股热流。

九月中旬，摄制组集合于敦煌。经过几天的准备，他们在十七名解放军官兵的协助下，向既吓人又诱人的罗布泊挺进。

罗布泊，曾是古丝绸之路的中道，汉长城烽火台保护着丝绸之路的通畅。烽火台傍水建在高台上，也起驿站作用，来往客商们可在此歇脚、喝水、吃饭、饮牲口。张骞出使西域时，这一带有三十六国……

两千多年如一瞬。

今天，《望长城》摄制组要登上昔日丝绸之路的旅程，等待他们的却是荒凉、恐怖的大沙漠。

我们长途跋涉在茫茫无际的沙漠中。大家苦乐生死与共，将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古丝绸之路的长城。

我们摄制组还邀请了长城学者、沙漠专家吴 弼穰、夏其训、扬连福和测绘队刘队长……彭加木烈士的夫人夏淑芳也闻讯赶来。她要到彭加木烈士的纪念碑前祭扫，还幻想也许能找到彭加木的遗骸。这是可以理解却难以实现的痴情的梦！自从一八七六年发现地理禁区罗布泊以来，有多少人在这片荒漠中献出了青春和生命。应该承认，我们此行也是探险之壮举。

长城烽火台依傍着丝绸之路穿越了罗布泊，我们《望长城》摄制组就要在这片荒漠中，出生入死地寻寻觅觅、觅觅寻寻……

没有路。没有车辙。没有黄羊粪。没有骆驼蹄印……只有烈日和冷月提醒我们方向。我闯荡了一生，倒是第一次踏上完全没有路的路，完全没有人的路。

我们在宿营地遇到过狂风，我们在沙漠上迷失过方向，我们和先导车失去过联系……

我们看到了令人震惊的雅丹地貌，我们追赶过一头野骆驼，我们发现了一棵干枯的幼树……

十八个日日夜夜，太阳和月亮把汉代的烽火台映照变形，使我们看到：

罗布泊本身是一座生态危机鸣警的大烽火台，它点燃着大自然向人类征伐告急的烽火狼烟！

《望长城》是分两个组拍摄的。一、二集由崔屹平导演，锡伯族青年演员焦建成担任节目主持人。内部简称B组。A组与B组选材角度、内容都有所不同，可在一条漫长的长城线上，两组时而会有交会，像两艘巡逻快艇，搜寻在长城流域的河面。

《望长城》三、四集中，A组用了三次热气球，一次在河北山海关，一次在山西大同，一次在新疆库车。

热气球飘飞是有危险的。因为放飞员只能控制上升和下降，不能控制方向。万一球体碰到障碍物，球顶那块塑料布立即自动脱落，球体马上瘪了，筐篮立即“自由落体”掉下来，摔个筐毁人伤亡。

黄宗英要上热气球，导演魏斌不同意。

魏斌说：“老太太，上热气球实在是太危险，我们得对你负责。”

“我知道，我知道。”黄宗英说，“我是节目主持人，我应该有权利上热气球主持。摄像师谭湘江能上，我也能上，难道你还有偏心……”

“唉呀，老太太，你这是咋说的。我能有偏心吗？”

“没偏心就好。那你就不会阻止我上热气球了。”

长城那么长，从祖国大地的东北，绵延至西北，摄制组考虑到气候条件，决定先拍摄西北线，出阳关，从甘肃马圈湾穿越罗布泊荒漠，进入新疆在汉长城最后的行政区划署库车，拍摄克孜尔烽火台。然后再赶冬令有雪时，走东北一线，拍摄长城在祖国大地的最东端鸭绿江。

在克孜尔烽火台，热气球要从深深的沟壑底放飞，让它慢慢飘过风蚀台地的侧面，飘过烽火台，升向蔚蓝蔚蓝的天空……

当黄宗英跟着放飞员和摄影师谭湘江爬进柳条编织的筐篮时，导演魏斌嘱咐道：“老太太，下降的时候你千万要屈膝，保护大脑。千万！屈膝！屈膝！腿要弯着，半蹲式！……”

导演的话还没说完，热气球已经升空了。这时，黄宗英忽然想起刚刚在汽车里准备好的台词，于是她迎着漠风，望着克孜尔烽火台，开始说向汉长城的告别辞。

她一口气说完了告别辞，感到一阵轻松。人在筐篮里跟着热气球飘飞，真有飘飘欲仙的感觉。当她低头往下一看，不得了！只见摄制组的小伙子们像一群发了疯的野马在疾奔，他们越过沟壑、沙梁，穿过河床故道，冲向我们热气球的垂直点。这时，放飞员在寻找层次风稳定带，操纵着热气球缓缓下降。黄宗英渐渐看清了奔跑的人谁是谁了，突然想起“腿要弯曲”，这屈膝的动作该怎么做还没想清楚呢，“咚”一声，筐篮落地了。小伙子们围扑过来压筐篮，筐篮却猛烈地反弹，扑压下去，又反弹上来，再扑压，再反弹……终于扑压住了被热气球拴得紧紧的柳条筐篮。小伙子们连拖带抬，将黄宗英弄出了筐篮，她两脚一着地，却失去了感觉。这时，越野车开过来了，她勉强走近了车门，却上不了车了。小伙子们急忙把她驾上了车，扶到了座位上。

“老太太，腿怎么了？”

“是麻？还是疼？”

“老太太，快动一动！”

“老太太……”

黄宗英笑了笑说：“没事儿……别那么紧张，一会儿就好了。”

小伙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会意地交换着眼色，不敢再问了。

晚上，库车的宾馆里供热水，我舒舒坦坦地躺在齐胸的热水里。当我从浴缸里爬出来穿好内衣裤正往身上擦红花油时，我的同屋录音师张文华闯进来了。

我说：“耽误你洗澡了，我多泡了一会儿……”

“我还以为您晕过去了呢。”她放心了，可又忽然大叫起来：“老太太，您身上怎么了？”

“没事儿，降落时筐子磕的。”我的两个膝盖上各有一个紫黑的肿块，身上隆起的地方，大都出现了青斑。

“我叫他们去请医生。”

我拽住了张文华：“不疼，真的不疼。我没那么娇。”

压筐的同志一定也是一身伤，卸车时我听见他们在找医疗箱……”

我的话还没说完，张文华捂着嘴哭泣起来。这闺女，真是的！我忙对她说：“别傻哭了，你奔上奔下地忙了一天，够累的了。快洗洗澡，早点睡吧！”

我睡下了。由于白日过度兴奋，我吞服了双倍安眠药，熟睡过去。

我又飞上天了，有长长的长城，有古代守城、攻城的官兵，旗幡、奔马，有现代的旅游者，各种肤色衣饰的。有绿色的云，有银色的不明飞行物，有排色的星星，还有泰戈尔的弯弯的月亮……幸福的船，在长城流域的河面……

《望长城》摄制组A组，在总编导刘效礼和制片主任宫军的率领下，在罗布泊历尽千辛万苦，几陷绝境，只为求证：汉长城是伴古丝绸之路而行！

他们完成了拍摄任务，走出了荒凉、恐怖的罗布泊，还找到了打鱼为生的罗布人的后代。当他们眼前出现了波斯腾湖浩渺的碧波和飞翔在湖面的白天鹅时，竟像看到了海市蜃楼，怀疑自己的视觉……

罗布泊与波斯腾湖是黄与绿之交替。

古楼兰与今库车是古与今的配色。

黄宗英的这种感受和想象，是多么生动，多么鲜明，多么令人难忘啊！

A组在《望长城》三、四集中，要力求形象地去表现长城的历史沿革、地理变迁、生态转化、民族民俗……于是，他们走出罗布泊之后，又赶到东北一线拍摄。从山海关到呼和浩特、到赫首阿拉、到鸭绿江边……都是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中拍摄的。当我们看到电视片中农村的乡亲们在一九九九年春节夜吃年夜饭或正月十五闹元宵时，有谁知道摄制组却是饿着肚子拍摄的。

为追寻、考察北国大地上的长城、烽火台，他们从落雪一直拍到融雪，从初冬一直拍到初春。五月，群山刚刚泛出绿意、山梨花悄悄开放的时候，摄制组又来到了山海关，他们要在老龙头海面飘飞热气球。

第一次飘飞失败了，热气球的筐篮落在了斜坡的树杈上，摄像师章跃差点从筐篮里倒出来。

第二次飘飞也失败了，要不是砍断了船缆，放飞时用的船也要被热气球拖翻了。

第三次飘飞，由于风向骤变，热气球不是向老龙头海面飘来，而是向大海深处飘去；要不是放飞员沉着、机智、冷静地寻找层次风，在燃气将尽的关头，使热气球飘向岸边，不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黄宗英感叹地说：“我真是服了黑头发们的执著——真是‘九死而不悔’。历险锻炼人的意志和勇气，能使一个人的生命充实、饱满。历险谙今古之真

谛，付艺术以华采。”

是的，她这位白发苍苍的作家和艺术家，也是第一次看到《望长城》摄制组的这些黑头发们舍生忘死的工作精神。这是一个具有战斗作风的摄制组，这是一个凝聚力极强的摄制组，经过艰苦的工作磨练，白头发的焕发了青春的活力，变得年轻了；黑头发的犹如猛虎添翼，变得更加成熟了。他们在长城脚下苦熬了三个春夏秋冬，终于完成了拍摄任务，完成了《望长城》的使命。

摄制组回到北京之后，就忙于《望长城》电视纪录片的后期制作，这是又一个庞大的“战役”，同样需要英勇顽强的拚搏。

昨天午夜刚为《望长城》录完音，今天（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日）我就逃到大哥宗江家里来了。

能住在大哥家，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鲜事儿。

从一九四一年我兄妹曾睡帆布床、睡地铺，挤住在一个小小的亭子间以来，凡五十年，宗江家里搁不下我一榻之地、一铺之角，他那书房兼卧室窄得我转不开身，常常不小心衣角捋下了桌上的茶杯，碎了。

“小妹，我现在有地方给你住了。”在电话里大哥约小姑奶奶我来歇几天。

有屋、有床、还有书桌。大嫂阮若珊，正以顽强的毅力强化烹饪学习。三顿饭按时供应，只不许去厨房看她，一看，就什么也不会烧了。

我带足了安眠药。

我害怕。我十分害怕由我主持的《望长城》第三集、第四集的播出。

观众是多情的，半个世纪了，没有观众也就没有我。

观众是严格的，甚至苛刻的。随着画面的运行观众自有自觉的要求。

半个世纪以前，大哥带我走上演员的道路。

半个世纪以后，在大哥家，我向演员生活告别吧！也许是工作过度紧张与劳累，黄宗英的失眠症越来越严重，越是睡不着，想的事儿越多。有时心里一阵阵发慌，说不出的焦灼与烦躁。

黄宗英病了。

她的眼前不知为什么会出现许多飞闪的红灯，那闪动的节奏和亮度形成一种可怕的刺激，令她感到惊恐、不安。有时她竟出现思绪混乱、幻听幻觉，神志朦胧……

鸟鸣，清亮的鸟鸣……

黄宗英听到了这一阵阵鸟声，她睁开眼一看，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窗外是槐树的枝叶，有一群小鸟急速地飞过。

黄宗英回忆不起是怎样生病的，也回忆不起是哪些人将她送到医院来的。她好像睡了一觉，睡得很深，很沉，现在醒来了，感到很轻松。

“宗英同志，头痛吗？”医生关切地问她。

“不，只感到有点胀。”

“想吃东西吗？”

“想吃。好像是饿了……”黄宗英微笑着答道。

“那好。一会儿让他们送点吃的来。”

“医生，我睡了很久吗？”

“是的，因为你太累了。”

“不，也许是我老了。人一老，什么病都会找上门来，而且还不大容易

赶走……”

医生会意地笑了。

窗外，又传来了动听的鸟鸣，好像是一支亲切、欢快的乐曲，在赞美清新的早晨。啊，不仅是赞美清新的早晨，还在祝愿黄宗英早日恢复健康。

此刻，黄宗英躺在病床上，望着窗上洒下的阳光，她又想起了在长城脚下下一个又一个早晨；那是草原闪着露珠的早晨，那是雪野映着朝霞的早晨，那是丝绸之路上故城的早晨，那是罗布泊克孜尔烽火台的早晨……

那是她和黑头发的伙伴们，一生都忘不了的望长城的早晨！

归隐书林

黄宗英在北京住院一个多月了，身体康复得很快，她自己都觉得是医生创造了一次“奇迹”，因为她是从可怕的昏睡中醒来的。

住在病房里，黄宗英总是喜欢读书或偷偷地写东西，医生一次次警告她，不许她多看书、不许她写东西，怕她用脑过度再发病。

她却微笑着说：“我知道，我知道……可有时我管不住自己，真是的，让你们操心！”

“你要正视你的健康现状，听我们的话。”医生真挚地说，“最好能够心情舒畅地休养几个月，使身体的机能有一个调节的时间。”

“北京已经冷了，可是江南还暖暖和和的哪；我想出院回上海去治疗，不知你们的意见如何？我是病人，病人总是要听医生的话……”

“是的，你上海有家，医疗条件也好，出院可以；只是希望你能安安静静地休养几个月，真是怕你东忙西忙到处漂泊再病倒。”

“医生，我会当心的！”黄宗英激动地答道，“人老了，身体实在是不争气……”

黄宗英出院了。

出院后，她谢绝了北京亲友的挽留，很快便回到了上海家中。一见面，她就对我说：“小姜，真不可理解，北京以前的事儿，我仿佛什么都不记得了，好像已经喝了忘川的水。我也不想搞清楚我是怎么住进了那家听来都可怕的医院，人活着，并不一定要把什么事都弄得清清楚楚，尤其是关于自己的事儿。那样，会太痛苦……”

“你要遵守医嘱，少看书，不写东西，好好休养几个月。同你的医生朋友约好，哪天去医院看病预先告诉我，我陪你去。”

“我的记忆能恢复吗？”

“当然能。你应该有信心……”

“小姜，要是我变成痴呆了……真不敢想，人家都说痴人往往活得很长……”

“老黄，你瞎想些什么！”

“我在华东医院住院时，看到过植物人，人到了那种情况真是可怜。任何知觉、任何反应都没有……”

“老黄，我们换个话题吧。杭州的朋友不是请你去疗养吗？在西湖边上住一段时间，那儿的空气比上海好，树多花也多，有利于身体的康复。”

“不，我不想去。”

“去美国呢？到孩子们的身边去……”

“我可以考虑。可是现在还不想去，我的体力不行，不能长途旅行。”

春天过去了，夏天也过去了，阳台上的几盆菊花已经含苞欲放。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和休养，黄宗英的身体康复得很好，并能在自己安排的时间里画画、练字、写文章了。

她决定去美国看望儿女，特意起了个大早，四点半就在老保姆的陪同下，去美国领事馆排队，办签证手续。排了一个上午的队，快十一点了她才得到签证。当黄宗英走出美领馆时，感到非常疲劳，仿佛走了很长很长的路，望着那些仍在排队等候办签证的人，她轻轻叹了口气。

不久，黄宗英的亲友 W 回国探亲，在她返回美国的时候，约黄宗英同行。

于是，黄宗英便从上海飞到了洛杉矶，来到了儿女身边，开始了她的寄旅生涯。

十一月二十一日，我收到了她的一封来信。

凌晨起床（仅仅是难以改变的习惯），发现你十一月七日的来信已从门缝塞进我和小简妮住的房间。今天是十一月十三日“黑色星期五”；在美国人认为晦气的日子我得到亲近友情的福气。我来不及问儿子和媳妇这信是什么时候到的，他们总是忙忙匆匆，匆匆忙忙。我真不该到这里来眼见他们具体的辛苦操劳。我想起我母亲。在珍珠港事变日军占领天津一年多之后，母亲偕我二哥与小弟避难回温州瑞安故里，途经上海，住在宗江和我与李德伦等合租的和平村一号亭子间里。当母亲亲眼目睹我们是怎样干演员这一行时，眸子里平添了从此消失不了的担忧。老人家难以接受我们要用小竹筹子去老虎灶打开水；犹如我在此时此地竟找不到一个暖水瓶。虽然我在八十年代赴美国考察时，就学会或旋、或拉、或揪、或踩龙头往肚子里灌冰凉的自来水。但是身为中国人和中国人的后裔，居家过日子，有全空调、有热水洗衣机、热水洗碗机，却冷落了一个小小的烧开水的叫壶堆放在橱角，无声地陈述着生活方式、生活节奏乃至生活哲学的内在衍变。

我本来决定十二月回上海，完成你帮我编的这册书稿，可儿女在留我至少过了冬天。这里的人们难以理解我为什么急着要回去，是的，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如此魂牵梦萦沪上寓所小楼上我那并不经常伏案的书桌，那老也存不够用不完的绿方格稿纸。也许只有在绿色的小方格里，才蕴储着我自己亦懵懂的热能，蕴储着我的不自知的年、月、日、时、分的未来。

我扯到哪儿去了？回过来说编书。

咱们还是按原来的编辑意图，把这本已粗编的书编完它：突出演员出身的我本身的特点，以“真情”为线，以随笔散文为主，还想选几封可能已无处可选的书信、小诗、照片，乃至书画。咱们像“过家家玩”似地把这“小家伙”好好打扮打扮，随着自己的意儿，任着自己的性儿……

我是坐在饶有情趣的、毗邻图书馆的“老人中心”的小花园的白色户外椅上给你写信的。刚上完课，别问我学什么，反正想着学什么就糊里糊涂学什么。时已十时五十五分了，遮阳伞下也很热了。我回家吧，今天没来得及预约在这儿吃午饭，回去做什么吃呢？唉，无论什么年纪的人要想出国，要紧的是得学会麻麻利利地做一顿可口饭菜！

宗英于美国洛杉矶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黄宗英在美国洛杉矶小儿子赵劲的家中，生活得很快乐。她常常到图书馆去看书、看杂志，还学习翻译文学作品。在美国，她看望了许多老朋友，也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亲切而又炽热的友情时刻温暖着她的心。

她在给二哥——冯亦代的信中诉说了她在异国的心境：

二哥，我来洛杉矶已经一个多月了，住在南巴沙迪纳，十分安静的，花树馨香的区域，住宅靠近图书馆、小公园，离书店和小影院也不远。

我的三个儿女都到中国工作去了，两个儿媳在这里，蛮孝顺。小外孙女简妮（女儿赵楠的孩子）从中国小学四年级到这里来上五年级，什么也听不懂，亏她还愉愉快快去学校，回来她舅妈帮她讲家庭作业，倒基本也做出来了……

我和小儿子阿劲、阿劲媳妇、小简妮一起过日子。阿劲今天去中国，参

加一个与中国合拍的影视片，临走扔给我三个图书馆卡。二哥，我现在胡看书、瞎看电视，乱看报纸……我的英文程度和宗江没法比。但是，我此刻渴望翻译英文作品，短的、长的。这两年我不怎么写东西，因真也不知写什么，我也不愿越写越远越无聊。朋友总鼓励我写阿丹，但写阿丹，可能再次把我写进疯人院；所以我想搞翻译，不然，不知晚年将做什么好。这理由近于酸楚，想不会使你翻译家生气，你是二哥！在图书馆浩如烟海的书架上，我不知看哪些书？哪些报？哪些杂志？你能给我些建议吗？……

图书馆旁边就是“老人中心”，可以去学英文（我估计是会话），可以去吃一块半美金一顿的中饭，挺丰富的。“老人中心”活动很多，我还没有下决心正式参加老人行列。我感到在图书馆我的心是立着的！往旁边走两步进了“老人中心”，就躺下了。既然命运使我们失去了伴侣，既然还看上去健康地活着，还是得立着。我可以在美国跟着儿子过活，但还是准备一九九三年二月中旬回上海。从十六岁就独立生活，如今也不想依附儿女，随便他们待我怎么好！……

从黄宗英给冯亦代先生的这封信中，我们可以了解黄宗英在美国的一些生活情况，她当时的思绪和心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几十年来，在风风雨雨的生活里，黄宗英总是“立着的”。尽管有时她病倒了，或是被困惑压倒了，她的心仍然是“立着的”。因为她一直在和命运搏斗，而且总是那么充满了自信和希望！

春风又吹绿了江南的土地。

当油菜开花的时候，黄宗英从美国回到了上海。由于旅途的疲劳，她的偏头痛又发作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头痛有明显的好转，可是失眠却严重了。有时整夜没有睡意，思绪纷乱，处于异常兴奋状态。她只好去医院，向一位又一位的专家朋友求援。

专家们安慰黄宗英不要紧张，并采取了一些综合性的治疗措施，不久她的病情开始减轻了。

五月初的一天中午，她打电话给我，叫我到她家去有点事要商量。

我走进黄宗英家的会客厅时，见她正伏在写字台上写着什么。看到我来了，她便停下笔笑着说：“你来得真快，是骑自行车来的吗？”

“不是。我坐公共汽车来的。”

“小姜，你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不知道。”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要告诉你……”

“什么事？”

“你猜猜看。”她的话使我感到有些神秘。

“对你来说很重要吗，老黄？”

“是的。很重要……”

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我们二十多年的友情使我敏感到的，于是我果断地说：“老黄，你谈恋爱了！”

她笑了，闪动着明亮的目光笑了。

“小姜，我的手提包里有三封信，你看吧！”

我急忙拿出这三封信，一口气看完了。这是充满了深情的三封信，这是燃烧着爱情之火的三封信，这是洋溢着青春活力的三封信……署名是二哥。

“老黄，二哥是谁？”

“冯亦代。”

“冯亦代？”

“冯亦代……小姜，作为知心的朋友，你有什么意见？”

“我？”

“你……”

“老黄，只要你觉得合适，会使你的晚年生活幸福，我就支持！支持！”

黄宗英点了点头说：“我很高兴！……”

从那时起，黄宗英和冯亦代每天都有书信来往于上海和北京之间。书信好像是洁白的鸽子，带着人世间最纯洁、最美好的感情，从她的心中飞到他的心中，又从他的心中飞到她的心中。

他们在人生的雪线上，摆脱了孤独，摆脱了寂寞，又有了思念的人，又有了说悄悄话的人……

啊，黄昏之恋是美丽的！幸福鸟披着晚霞的光辉在他们心中筑巢了！

二哥在信中说，他有了说悄悄话的人，而我同他一样，也有了说悄悄话的人。

二哥来信说道：《读书》编辑部的老少友人们，送了本三联书店新出版的《黄昏之恋》（德国格林著）给他，并郑重地一一签名，是贺我和二哥黄昏恋的。友情之浓，使二哥心醉，为了纪念我们的晚晴幸福，他还写了一篇文章。

我最近读了美国作家艾温·威·蒂尔著的《春满北国》、《夏游记趣》、《秋野拾零》、《冬日漫游》，我爱上了作者蒂尔和他的妻子乃丽。他们一生有个共同的宏愿：自己驾车分别追随季节的脚步，去记述美国不同地方的、整整的一个春季、一个夏季、一个秋季、一个冬季。这对夫妻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跨度，在双鬓染霜的暮年，终于圆了他们的四季旅游之梦……

人生在世，还有什么更大的幸事是自己的工作，恰恰是自己所向往的，也是自己的兴趣，自己的娱乐；又更何况身边有一个人和你做着同样的梦，时时处处与你分担共享呢！

我钦羨蒂尔们并也自忖着：工作在不同领域的我的、我们的待圆的四季之梦！

夏日的一个上午，大约十点半钟。黄宗英的女儿赵橘突然来到我的办公室，她笑着说：“老太太让我来叫你，快，她在楼下等你……”

“在楼下？”

“不是，在门口车子里等你。”

“干什么去？”

“到车子上你就知道了。”

当我跟着赵橘上了面包车时，见黄宗英、保姆张阿姨、赵橘的女儿小简妮已坐在车子上。靠近车门还有一只大花篮，开满了紫红色的玫瑰花。红色的缎带上写着：祝小妹生日快乐！署名是二哥。

啊，今天是七月十三日，黄宗英的六十八岁生日。

我说：“老黄，我忘了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也忘了，是赵橘要给我过生日。”黄宗英说。

小简妮笑了：“一大早，北京的老爷爷就托人送来了花篮，多好看。”

我问赵橘：“我们到哪里去？”

“银河宾馆。”

“我还没带礼物哪！只好明天补……”

黄宗英说：“你来了，我就很高兴了，还要什么礼物。”

面包车在飞驰，很快来到了银河宾馆。在一间宽敞、豪华的包房里，我们为老太太举行生日宴会。

敬酒、祝辞……

老太太吹蜡烛、切蛋糕……

唱生日歌、在花篮旁照像……

当我们欢欢乐乐地离开银河宾馆，回到黄宗英的家中时，冯亦代先生给小妹的生日贺电和来信也到了。

我和赵橘将大花篮抬到了会客厅里，空气中立刻弥漫着玫瑰花的芳香。望着一朵朵紫红色的玫瑰花，每一朵仿佛都在含笑，都在说着祝福的话……

我一数，不多不少，正好是六十八朵！

啊，六十八朵玫瑰花，谱出了一支多么深情、多么美丽的祝贺生日的乐曲啊！

第二天早晨，我买了一篮又大又红的寿桃，送到了黄宗英的家中……

我过了一个快乐的生日！

多少年了，我总是记着为孩子们过生日，却很少想到自己的生日。一九九三年的生日，正逢女儿在上海，她要为我举办生日宴会，我欣慰地接受了，因为这是女儿对母亲的一片孝心。

在过生日的时候，又收到了二哥的花篮、礼仪电报和信，我是多么高兴啊！我要将我感受到的快乐和幸福告诉二哥，将我的思念和感激也告诉二哥……

紫红色的玫瑰花好像在微笑，那是二哥的微笑吗？

那是人生的雪线上复活青春的微笑吗？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原野上的庄稼该收获了，果园里的苹果该收获了，一切成熟的东西都该收获了。

冯亦代在盼望黄宗英能早日来北京。

他在一篇文章中曾表露了期待的心情：小妹来信夸耀她屋子里的丛丛鲜花，还说她不喜欢绢花、塑料花一类，因为这些花是假的。在人生旅途中她从来也不喜欢“假”，她爱的只是“真”。人又生活在迟到的盎然春意之中，我只有翘首等待小妹早日来到七重天，因为她答应我要用鲜花和温馨来装饰这座楼居。我的老年生活终将由平淡而得到绚丽。

是的，我相信，当黄宗英来到七重天二哥的住处时，他们的生活将翻开新的一页！黄宗英不仅要用鲜花和温馨装饰楼居，她还要用鲜花和温馨装饰相依相伴、归隐书林的生活。因为黄宗英的心中，有一片广袤的土地，无论是杨柳依依的春天，还是白雪飘飘的冬日，都有美丽的鲜花盛开，而且花期很长，很长。

于是，我想起了英国白朗宁夫人的诗句：

亲爱的，你从一整个夏天到冬天，

都是从园子里采集了那么多花

送给我；而在这幽闭的小室里，它们

继续生长，仿佛并不缺少阳光和雨水的滋养。

那么同样地凭着

这爱的名义——那爱是属于我俩的，
也请收下了我的回敬；那在热天，
在冷天，发自我心田的情思的花朵。

……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六日，黄宗英从上海飞往北京了。这条航线她飞过多少次？那是无法记算的。有时是开会，有时是采访，有时是拍电影、电视，有时是写作……可是，今天她是带着深情的思念和深情的憧憬，飞向二哥的身边！

这是她生活中一次从秋天走向春天的旅程，也是一次洒满阳光、开满鲜花的旅程。

冯亦代欢乐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他在文章中这样记述着：星期六，小妹要从上海飞来，便要了辆小面包上飞机场。一上新开通的高速公路，还要一刻多钟可以到达，心里是喜洋洋的，已经四年不见，以前随随便便，现在恩恩爱爱，忽然两人的关系改变了，不知该怎么说见面后的第一句话。想不到这时汽车忽然行步蹒跚起来，司机摆弄得满头大汗，车子还是抛锚了。我瞄了一眼手表，时间还早，即使眼看一辆汽车飞驰而过，心里还是泰然。车子重新上路，走了一会儿，又步履维艰了，于是又修又等，再重新上路。女儿说这一次大概可以熬到机场了，我说一二不过三，到机场大门前还得停一次。果不其然，一步之遥，即是机场入口，而车子又停了下来。

进得机场，好容易捱到报告上海的班机到达，行李房逐渐有了人影。突然在人群中看到那顶熟悉的白绒帽，我的心怦怦然。于是看她急冲冲跑向我来。不容我想，我说：小妹你终于来了。女儿献上了一束红色的月季花。我们相对呆望着，不知怎么冒出一句：“我今天早上还写了一篇文章。”……

这是多么生动、多么具体的描述啊，两个快乐、激动的老人，在久久地思念和渴望中见面了，却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

黄宗英写信告诉我，冯亦代到机场接她回家，亲切地叫了声小妹，就说：“我今天早上还写了一篇文章……”。第二天早上他说：“我要誊抄文章了……”。第三天黄宗英和阿姨去买菜回来时，他又说：“你们都出去了，我好舒服……”黄宗英听了开心地大笑。

冯亦代还摸不到头脑地问：“小妹，你笑什么？”

“二哥……”

“怎么了？”

“……”黄宗英又是一阵快乐的笑声。

我在想：冯亦代先生文章写得那么好，又善于交谈、善于表达内心的感情，怎么净说这些无趣的话，难道他是故意说这些无趣的话，来表达他内心的快乐和幸福吗？

黄宗英听了冯亦代那些无趣的话，笑得那么开心，因为她知道这些无趣的话是最有趣、最深情的。

为了祝贺他们相依相伴，归隐书林，有了这种晚霞中的缘分，我给他们写了一封信。我说：当早晨你们推开窗户，会看到朝霞里有一只小鸟向你们飞来，那小鸟就是我寄给你们的祝福……

小姜，谢谢你诗意的祝福！

你对我们的祝福可以延伸成一首诗，一首挺好的抒情诗。最近，我正在读《英国诗史》，这是一本很好看的书，你应该找来看看。

这几天，我和二哥在花丛中、音乐声中“排队”写稿，写得很有劲儿，写得很快乐。二哥写得快，他写稿仿佛冲个淋浴似的，新新鲜鲜就出来了。似乎用不着我牵挂他写得累不累，倒是不写会累着的……

小小的新居中，我的书桌是一个小小活动架上搁一块面板，铺上美丽的花布，真是与众不同，太妙了。桌上、架上是我顺手东抽一本，西捡一本还抢一本倒也都看了半半路路的书、杂志，还有笔记本、文摘卡、字典和身边的活字典。

我读着、我写着、我学着、过着神仙般的生活，不知什么时候能种出仙桃来？

归隐书林是我的梦。

归隐书林是我们的梦。二哥说得好：自此可以息影九重天上，以读书撰文自娱，伴山伴水伴书窗……

但愿我们的梦能圆！

早晨。

冯亦代拉开窗帘一看，外边是一片白皑皑的雪景。他高兴地对躺在床上的黄宗英说：“小妹，下雪了！”

“下雪了？！”黄宗英激动地像个孩子，急忙跳下了床。他们坐在窗前，看漫天的雪花飞舞。

下雪了，视野里呈现出一片白色，仿佛突然将一个白色的童话世界送到了人们的生活中。

雪花飘落在屋顶上、花园里、马路上……

雪花飘落在近处的楼群里、远处的立交桥上……

大地变得洁白了，生活似乎也变得洁白了。

“外边一定很冷……”冯亦代像是对自己说，又像是对黄宗英说。

“可我们屋子里很暖和，像春天。”黄宗英说，“雪花覆盖不了的春天！”

两位老人望着飘飘洒洒的雪花，尽情地欣赏着雪天的风景，感受着雪天的幽静和情思。也许，此刻他们已经回到了童年，正在雪地里欢乐地追逐……

吃过午饭，黄宗英说要去香山北京植物园访问余树勋教授。

“小妹，雪下得这么大，改天再去吧。”

“我想今天去……”

“下雪天路难走。”

“我知道。”

“你一定要去？”

“要去。”

“那……那就早去早回吧。”

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着，冯亦代立在窗前，目送着楼下黄宗英渐渐远去的身影。

冯亦代回到书桌前坐下，想看书；他拿起黑马写的《混在北京》，一页一页看下去。过了一会儿，突然又想起了小妹：她是乘出租车还是坐公共汽车？现在该走到哪里了？如果是坐公共汽车，到了香山她能找到植物园吗？……

冯亦代越想越不安，不时地看着壁上的时钟。

两个小时过去了，冯亦代在想：小妹该见到余树勋教授了。余教授已经和花卉打了半个世纪的交道，他是与花同命运的人。花盛时，他心为繁锦，

花落时，他又为培养新一代而忙碌……他眼前只容得下如花的人世的美，他眼里却留不下一丝的尘世污浊。这样一个纯情的人，是怎样度过了那举世萧杀与喧嚣的十年的？因为他所追求的事业，是无助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

雪还在下着，不停地下着。黄宗英怎么还没回来呢？天渐渐地黑下来了，冯亦代开始焦急了：是赶不上公共汽车了？是迷路了？还是车子在雪地里抛锚了？

他焦急地等啊，等啊……

他走到窗前，想从雪地里早点发现黄宗英的身影，可是夜色蒙蒙，雪花飘飘，他什么也看不见。

突然门铃响了。

“我回来了。”黄宗英还没进门，声音先进门了。“黑灯瞎火，就是找不到家，在马路上来回走了几次。”

“唉，小妹……”冯亦代一腔“等待”的烦忧，已化为满心快慰。不过，他看着肩上还有一片片雪花的黄宗英，暗暗地在心里说：哪天也得叫小妹享受一次“等待”的滋味……

我是冒雪出城的，公共汽车啃着盖脚面的大雪蠕动着，走走停停拱了个把钟头，不是路遇素不相识的四十五中学的郑老师，她自告奋勇在大雪飘天中把我送到余家门口，我会迷失在香山山麓的植物园里。我只不过想看看花卉专家——北京植物园的园林老将余树勋在大雪天干什么。

看着书桌上满满腾腾参差烂漫的笔记、稿纸、图片、文摘卡，我直觉得自己太莽撞了。

他笑着向我说：Goodmorning（早安）。

已经是下午三点二十八分了，怎么还早安？

他风趣地说，他一天有三个早晨，现在刚好是睡午觉后的第二个早晨。

屋外头的杭白菊冻蔫了。余树勋的眼睛没离开冒雪抢进屋来的，插在茶几上小圆锥体玻璃瓶里的一小束杭白菊。“今年有了，明年才能有。”这是他的原话，小杭白菊们依偎着，羞涩地倾听余教授的禅语偈言。

惆怅凝溢在斗室书壁之间。我实在不忍心以世俗的所谓采访去切断这超越时空的惆怅。我真希望自己像雪人向阳般融化，悄悄然。

正是我打乱了他正在书写的有关花卉的辞条，两天后他将去苏州参加全国花卉会议。他不是整天匍伏书斋的人，整个植物园是他的试验室，并不是一切植物都在冬眠。他的课堂远涉欧美东瀛，北京郊区的花农也每周接他去讲课……

余树勋没工夫跟我说他一九四八年怎样去的北欧。

余树勋没工夫跟我说他一九七九年又去北欧。

余树勋也没工夫跟我说他一九八一年去美国在明尼苏达植物园考察了两年，以提高栽培种类的识别。

他更没工夫说一九九一年他挨家挨户地拍摄花卉的幻灯片。

余树勋当然也没工夫说百花摧残的“文革”中，他受不住迫害找人借了一百块钱，逃离牵肺牵肠的科学院植物园，横下一条心去流浪，流浪……

像一株蔫了的杭白菊，流年回转，他又挺起来了。

早上起床。Goodmorning 进入工作。

中午一点——两点午休，打盹醒来 Goodmorning 进入工作。

晚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后，上床睡至九点起床。Goodmorning，是最佳伏案时间，一口气工作到凌晨一时。

我明白了。明白了为什么一见面余教授就跟我说 Goodmorning。

下雪天黑得早，窗外暗了下来，当我向余教授告别时，他横竖留我吃云南圆子，让搞蚕桑专业的云南籍的余师母像喂蚕似地喂细圆子。我急急忙忙吞下八个还是十个滚烫的圆子，立即勒马回程，踩着“没工夫”的韵律我上路了。

我觉得我也没工夫了。

是没工夫了。

好个没工夫。

真是没想到，下了公共汽车在雪地里转来转去竟找不到家了。要不是遇到一个好心人为我指路，还不知要转悠到什么时候呢。

进了家门，二哥放心地笑了。但是他的目光里还有等待时的焦急和不安。我仿佛听到他在心里说：“哪天也得叫小妹享受一次‘等待’的滋味……”

二哥，你要报复我吗？你可是从来不会报复人的啊！再说，我也不是故意在雪地里瞎转悠……

雅鲁藏布江情结

江南三月，正是樱花玉兰争艳、春水碧于天的时节。为了向黄宗英、冯亦代组稿，我来到北京小西天他们的家中。上海文艺出版社拟出版黄宗英和冯亦代的散文近作。

他们这两朵“美丽的晚霞”，刚刚结为伉俪不久，家中仍然洋溢着浓浓的喜庆的气氛。我第一次见到冯亦代先生，他是一位亲切、热情的老人，像他的文章一样质朴、深沉，随时都会使你感受到他内心蕴藏的激情和暖流。

“冯老，认识您是从读您的文章开始的，可是熟悉您、喜欢您是从您给老黄的信中开始的……”

“你看了我的信？”冯亦代开朗地笑着，目光都闪烁着欣喜。

“我……是看了，不过……不可能全看……是老太太让我看的……”我一时不知怎样回话了。

黄宗英哈哈大笑起来。

看着这一对幸福、快乐的老人，我也笑了。

由于我和黄宗英有着二十多年的友情，因此，对冯亦代先生一点也不觉得陌生，难道这就是缘分？这就是岁月和年龄都无法阻隔的缘分？

在小西天他们温馨的家中，我们亲切地交谈着，谈得那么愉快，那么知心。

我仿佛回到了家中，回到了亲人的身边……

屋小好聊天。

夜里小姜就住在大楼底下防空洞改装的招待所里，时间也为我们延缓了他的脚步。我们掀天揭地述过去、现在、未来、先前、身后……谈了几天几晚。

谈到既执笔为文称为作家，其作品是真金？九成金？

K 金？镀金？还是含镍的于人体有害的假首饰或废铅块？谈到平凡与不平凡的临界点、历史正角与反角的分水岭、“小人物”“大人物”和真的人的检测剂……敞开心扉无所不谈。

我们能这样敞开心扉是说明，每个作家（只要不是乘政治之风暴发又倏然而逝的冒牌作家）身边都少不了有他（她）能通心默契的编辑。文坛兴衰、作品优劣、作品是否是作者内心的真实写照，编辑至要也。

谈啊谈，小屋的四面墙不存在了，“乌篷船”驶向广阔而涟漪的水面，一本冯黄散文合集的构架竟然谈出来了，而且还给“肚里儿”起名，难为了“爷娘、娘舅”……

在一次知友的宴会上，朋友们一定要冯亦代和黄宗英说说恋爱的经过。

冯亦代想：恋爱的事情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怎么说呢？我们是经过了青春再现的黄昏恋，自与青年人的崎岖曲折的初恋不同……

黄宗英想：恋爱的事情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你们都是有实践经验的人了，还非要我们说？不过我们的黄昏恋却也值得谈谈……

“你们谁先说悄悄话儿的？”

“谁先打的第一枪？”

“听说你们写了一百多封情书？”

“不，他们写了两百多封情书……”

“快坦白交代！”

“争取宽大处理！”

朋友们围着黄宗英、冯亦代欢乐地追问着。

黄宗英突然机智地说道：“明年我们决定给你们看一个胖娃娃！”

“什么？一个胖娃娃？”

“是的。”黄宗英面不改色款款道来，“我们的胖娃娃，就是我和二哥的散文合集《归隐书林》，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看胖娃娃是明年的事儿。现在是要你们交代谁先打的第一枪？”

“我只记得，在一封信中二哥说：我有了说悄悄话的人……”黄宗英认真地回忆着，“那封信写得很长……”

“小妹，”冯亦代抢着说道，“我是那样说的吗？好像是你在信中……”

“有一封信我读了之后，觉得那么熟，好像在哪儿见过；后来终于找到了出处，是贝多芬致一位少女的信……”

黄宗英话还没落音，冯亦代立刻声明：“我真的没有读过贝多芬的那封致少女的信，也许，我向小妹要说的话，要表达的感情，与当时贝多芬很相似……”

知友们一阵欢乐的大笑，客厅里充满了生活的阳光。黄宗英和冯亦代在生命的雪线上，途中相遇、相依相伴，归隐书林，他们自己高兴，朋友们也为他们高兴！他们去世的亲人赵丹和安娜更为他们高兴！

啊，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永远让人们热爱而又迷恋的生活。当然，有时洒满了冰雪，有时吹拂着春风……

国内的亲人、朋友向他们祝贺！

海外的朋友董鼎山、郁风、苗子、於黎华、木令耆、李黎等也来信、来电话祝贺！

许多朋友还写了贺诗、贺词。作家朔望挥笔写道：

江湖寥落

晚景尚晴

秋阳慷慨

许我同行

明灭斜晖

千帆阅尽

天钟斯文

木屋霜清

万家笑语

白首双星

翻译家、诗人杨宪益的诗句亲切而又深情，让人久久难忘，感受一种神圣的情思：

天若有情天不老，

月如无恨月当圆。

红颜白发春犹驻，

绵瑟端须续断弦。

……

望着黄宗英和冯亦代幸福的微笑，我们会深刻地感到朝霞中的爱情是绚丽的，晚霞中的爱情也是绚丽的！他们珍惜晚来的缘分！

我们祝福他们晚来的缘分！

这些日子，报上对我们的事儿频频曝光，曝得我直发毛。可是，每天还有人要来采访，我们已经被“炒”得够吓人了，险些使“小乌篷船”翻舟（我和二哥因感染病毒型流行性感冒，发高烧，住进了积水潭医院）。

我们都是离了笔和稿纸就不知怎么过日子的人，出了医院，回到家就想着那些还没写出的小文，时间总是不够用。

时间越是不够用，事儿越是特别多，我已经答应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为一部关于海南岛的纪录片出主意。

因此，我要去海南走走看看，三月七日飞海南，三月三十一日返北京，四月初我要再次去西藏，林业家徐凤翔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考察基地等我哪。北京电视台还要派摄制组去拍摄纪录片。

时间这么紧，我在海南只有二十几天，不可能留下什么可供拍摄的本子。我决不会放弃大好的接触生活的机会，而去忙着伏案做瞎诌初稿的蠢事。让感觉的灵敏度活跃起来，才是能出主意的前提。

我要给阮若琳同志写封信，将我的想法告诉她，请她给我一颗“定心丸”……

黄宗英和冯亦代去海南岛的那天上午，是我送他们去机场的，这次远行带着“出主意”的任务并不轻松，可是他们很快乐。

黄宗英想：也许是为了弥补二哥十几年没出远门的我的这点私心，我才答应为海南飞天电视中心的专题纪录片出主意的。此类纪录片被视为“切勿触电”之“高压电”，“触”之不堪设想。可是，既然答应“触”，我就不怕“高压电”了。因为策划影视片还是我艺术生涯中的主要部分——含金量高的部分……

是的，黄宗英从上飞机的那一刻起，已经全身心的投入“角色”了。他和冯亦代在海南不接受采访，不接受录像，不接受与工作无关的邀请，从早到晚都在为专题纪录片奔忙。

一眨眼，十八天过去了。北京电视台催黄宗英回北京，准备去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拍摄徐凤翔的科学考察。

黄宗英好像欠了海南一大笔债似的，心里很不安，她把一个专题片切入点初探——《鹿为什么回头》，留给了海南飞天电视中心，当作“赎身”之物。

临走时，副省长王越峰亲热地说：“黄大姐，就这样匆匆忙忙地走了？”

“不，我还要回来，还要请你这位黎族的头头带我去五指山密林深处的黎寨，到时候咱们扛上铺盖、背上米……”

“一言为定。”王副省长笑着说，“我等着你，不过看在你快七十岁的份上，米就不要你背了。”

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

黄宗英离开了海南，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海南。

黄宗英，你写了专题片切入点初探——《鹿为什么回头》，难道你也是一头频频回头的鹿吗？你对海南的爱将怎样在作品中展示呢？

四月一日下午三时，北京电视台为我们专题纪录片组聚会、壮行、饯别。台里的领导和上级领导都隆重出席。除去我和我们将要拍摄的六十八岁的女生态学家徐凤翔之外，摄制组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九岁半，他们曾拍摄过《黄河飘流》、《北极村》等众多探险片。小伙子们一个个壮实洒脱，腰板硬朗像扎了靠的武生。只有二十六岁的编导张亮像编辑部里文弱的实习生。但你

只要跟他说上三句话，就会敏感到这后生不弱，有他自己的艺术主张。

昨天，在摄制组临时集合地永安公寓见到他们时，屋里还满地器材、设备、铝箱、纸箱、半盒快餐冷饭……而今天已全部装车完毕。又全部换上了利利落落崭新闪亮银灰色的“登月服”——我们戏称这新置的越野服为“登月服”。准备到宇宙星系地球之第一高原峡谷与徐凤翔主持的藏东南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区环境与生物多样性研究考察组对接。说是还有我一套“登月服”哩！也不拿给我让我照着镜子穿穿看。野外风大，我的白发直立，肯定像美国风行的丑玩具人，外星飞来的怪物……

徐凤翔能去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去考察，北京电视台能派摄制组跟踪实地拍摄专题纪录片（这部电视片播映时定名为《魂系高原》），是很不容易的，如果黄宗英和他的小弟黄宗汉（北京著名企业家、当年电视专题片《小木屋》策划人之一）筹划不到考察资金，徐凤翔的专业水平再高、决心再大，也是无法去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考察的。

在一九八六年前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徐凤翔以巨大的毅力和她的助手们一起，考察了西藏的十八个主要林区，三进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全中国至今唯一不通公路的墨脱县，六渡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困难，获得了大量珍贵的资料，开创了西藏高原生态研究的新领域。

为了反映徐凤翔教授考察西藏原始森林的工作情况和生活片断，黄宗英跟踪采访，写出了报告文学《小木屋》。一九八六年中央电视台制作中心派出摄制组赴西藏，拍出了当时风靡全国、并在国际上获奖的专题纪录片《小木屋》。

考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徐凤翔教授多年的夙愿，也是她的高原生态学理论完善与发展的重要环节，然而因为科研经费不足竟中断了近十年。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健康状况的下降，这成了徐凤翔的心病，也成了黄宗英的心病。

作为两次相伴进藏，结下生死之谊的知心朋友，黄宗英明白时间对于她们已经越来越吝啬了，为了圆徐凤翔日思夜想的“梦”，支持这项具有国际水平的科研项目，黄宗英拉着她的小弟黄宗汉“肝脑涂地”地到处奔忙。

黄宗英和黄宗汉对朋友的一片诚心，感动了香港的陈树锴老先生，他慷慨地捐赠了考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所需的全部科研经费。

黄宗英含着激动的泪水，给陈树锴老先生写了一封信，感谢他的捐赠，感谢他对科学家的理解……

尊敬的陈树锴老先生：

舍弟黄宗汉的六十九岁的小姐姐宗英，在这里向您鞠躬致谢！您热心捐赠徐凤翔教授，助她完成“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环境和生物多样性考察”的人民币二十万元经费，将由宗汉分批一文不差地拨给徐教授。徐教授即将飞返西藏，组成考察队向“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天险挺进。

凤翔翔兮。

您一生勤俭，却长期支持祖国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义举，天地与九州共证。

我与徐教授相识十五载，她考察难以为继，我束手无策，唯愿舍身相陪。如今，徐教授得到您的资助始再踏征程；也于是，北京电视台组建摄制组，《北京日报》派随行记者，在花开时节，将偕我奔赴“大拐弯”与徐教授会合。

没有您对徐教授考察计划的支持，我们的摄制组是无由诞生的。

您五月来京时，宗汉会请您看看八年前我去西藏伴徐凤翔考察时拍摄的电视片《小木屋》。您的仗义及提倡祖国科学文化事业的精神，鼓舞着我们续摄佳作，以谢知音。

敬祝

身体健康、诸事顺遂、阖家欢乐！

晚黄宗英叩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七日于北京

当徐凤翔得知考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科研经费已有着落之后，高兴得像个孩子，她一边擦着泪水一边说：“宗英姐，我明天就回南京去……”

“明天？”黄宗英疑惑地问她，“宗汉要先给你几万块钱才行，不然你回到南京怎么办？”

“我要回南京做进藏的准备工作的，时间紧，我不能在北京久等。”

“不会让你久等……”

“不，我明天一定要回南京。”

第二天晚上，徐凤翔飞往南京了。黄宗英还有许多话要对她说，只好给她写了一封快件信。

黄宗英在信中说：……出于我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我的朋友们几乎都反对我再次入藏，可是我怎么不能不去呢？你进了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会遇到许多困难，会历经许多险境，我怎么能放心呢？倒是二哥从头到现在一直支持我。我们谈到必须有最彻底的思想准备，方能坦然地接受相思、等待、绝望和狂喜。二哥和老范（徐凤翔的爱人）毕竟不一样，他没有经受过老范那样的十六七年的淬炼，何况我原是为了他身边已经不能没有一个伴儿才刚刚踏进他家……

今晚你飞了，我将自斟一杯甜酒，向支持咱们的老伴儿慰问，也为你壮行。

西藏雅鲁藏布江畔再见！

……

过去黄宗英曾说自己是属云的，这朵云没有停歇的时候，现在又要向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漂泊了。

她在整理自己的行装，准备轻装上阵。是的，万里征途，艰险重重，不轻装怎么行呢？

“二哥，我上路的那天早上，咱们给阿丹和安娜各上一炷香吧。”

“我早准备好了。”冯亦代说，“你这趟出门，千万时时刻刻记住自己是快七十岁的老人了，不是才十七岁的小姑娘。”

“二哥，我知道。看你说了多少遍了……”

“我不过是提醒你这回要自备‘稳压器’。”

“放心吧！我自己心里有数儿。”

“前几天扭伤的右脚还没全好哪，你到了大峡谷可要加倍地当心，那儿可没有‘神灯’给你照。”

“我知道。”

“到了西藏波密就老老实实地躺两天，不然，要是发生了高原反应可就麻烦了……”

“我知道。”

“知道，知道……小妹，你总是我知道……”冯亦代说着，回身拿出一叠贴好邮票的信封，递给了黄宗英，“拿好，别丢了。每到一个地方就发封信回来。”

黄宗英心里很清楚，她此行去的地方常常是无法通邮的。因此，她不敢允诺，只能深情地对冯亦代说：“不是安慰，也不是推托，我想这回真应了‘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这句话了！”

冯亦代无奈地笑了。

“出发前我要留下遗嘱，二哥，把你托付给谁呢？”

“哦，你是准备要托孤。”冯亦代又笑了。

“托孤？……我会完完整整地回来，二哥，你放心！”黄宗英心里想：我不仅会完完整整地回来，还要带回别人看着有趣、我自己也说不明白的、色彩不一般的、平淡的、奇异的、有些可能我也无福亲身经历的画面回来。

她想用徐凤翔考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专题片告诉人们：科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一个科学家，往往就意味着一个课题，而一个课题的生命，就连着一个科学家的生命……

多么令人崇敬的生命啊！

四月二十七日，我从北京飞抵拉萨。下了飞机又乘了十几个小时的汽车赶到林芝，与北京电视台的摄制组会合。作为专题片《魂系高原》的主持人，我就这样匆匆忙忙、疲劳不堪地闯入镜头了。

还是那条枝枝相交、叶叶相依的林间小路，当然已不是十年前的枝叶。还是山涧欢腾圆木搭桥的俏丽景象，当然也不是十年前的水和圆木了。一切依旧，一切也都不依旧了。

前几天还在一一五医院的病床上，翻个身都要哼哼吁吁好一会儿，昨晚竟安安稳稳地睡在西藏波密岗乡自然保护区的林中帐篷里了。山泉哗哗流淌，小雨点儿淅淅沥沥敲打着帐篷顶为我们催眠。我一夜无梦，醒来时见帐篷里除我之外的四个女同胞已各有动静，我也就伸个大懒腰舒舒坦坦地开始起“床”的动作，在滑动的橡皮气垫上。

真有意思，高原反应就像中了邪，折腾了几天几夜，说好一日里就好了，只不过虚弱些，也是上了年纪吧。

下午哥们儿把我托上马背，护林员阿地（藏语谐音）为我牵马，走山间小路往密林深处，一见陡坡我就嚷嚷下马，好容易到了达卡湖边。

达卡湖，还认识我吗？别看我已是满头白发，可我的心还和十年前一样炽热、一样纯洁！

徐凤翔和考察队员们在考察达卡湖的水域、森林、草地……我折我的纸船，像十年前一样任两只小船载着我们的梦，从达卡湖流向泊龙藏布江……

徐凤翔仍然坚持她数十年如一日的理想：

一息尚存，不落征帆。

而我确实想“收篷”了，但不掺乎半点儿消沉，只为了“不扰民”，为了更有效地使用有限的生命。

明天，一部分人骑马去塔罗，一部分人留在易贡茶场附近，让我去塔罗吧。

山路险有什么关系？摄制已近尾声，累垮摔伤都也无大碍了。一件事既然已经在做，就要尽心尽力而为。

唉呀！我怎么喘不过气来了？胸闷得很，并一阵阵隐痛。我该吸点氧气

了……

汽车沿着陡险的公路急驰，翻过一座山，又翻过一座山。由于缺氧，所有的人都感到气急、胸闷、头晕。坐在汽车里，好像坐在云朵上，似乎随时都会飞起来。

黄宗英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又病了。

看到黄宗英吃不下饭，摄制组的小伙子们急坏了，一到宿营地就围在她的身边关心地问着：

“老太太，想吃点什么？”

“头疼得厉害吗？”

“不吃东西怎么行呢？”

“老太太，你……”

黄宗英望着这群可爱的青年朋友，轻松地说：“没事儿，睡一觉就会好的。”可是她已经意识到了，随着海拔的增高，她的高原反应越来越严重了。她时时刻刻都在嘱咐自己：坚持！坚持！要用最大的毅力坚持！

在雄鹰飞翔的远方，就是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科学考察基地了，暖暖的风送来了阵阵涛声。

汽车刚刚停下，黄宗英便挣扎着下了车，她两只脚已经不听指挥了，踉踉跄跄地向前挪动着。她看到徐凤翔张着手臂向她跑来。

“宗英姐！宗英姐！……”

“凤翔！……”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

这时，一只雄鹰从她们身边飞起，在碧蓝辽阔的天空飞得那么矫健、那么自豪！金色的阳光带着西藏高原母性的爱洒在她们的身上，在雪山、峡谷、树林、江水……衬托下，她们的身影倔强而又坚定。

徐凤翔把黄宗英搀扶到自己的帐篷里，黄宗英瘫软地躺下了，大口地喘着粗气，脸色更加苍白了。徐凤翔握着黄宗英出现紫癜的手，心疼地直掉泪。

“宗英姐，你……你不该来，为了我……”

“你在说什么呀？我为你，你为谁？也许我真的老了，身体不争气。我想，没那么严重……”

黄宗英一躺下竟起不来了。颜面麻痹，进食困难，腿脚肿胀，全身关节疼痛，靠吸氧和输液维持生命。解放军一一五医院的医生们日夜忙着为她治疗，可是病情不见好转，第二天黄宗英开始昏迷了。

昏迷中她还断断续续地在说：“南迦巴瓦峰山谷……南迦巴瓦峰……我去不了啦……凤翔……凤翔……你去吧，去吧……我……我等你……等你……”

黄宗英的病情这么严重，徐凤翔已没有心思进行科学考察了，她守在黄宗英的病床边，盼望黄宗英能尽快从昏迷中醒来。

时间在人们的焦急中流逝。

黄宗英昏迷了两天两夜，突然醒来了。大家惊喜地叫着她：

“宗英姐！宗英姐！”徐凤翔擦着眼泪。

“老太太，您醒了……”摄制组的小伙子们仿佛在叫着远行归来的母亲。

“黄大姐，能看清我们的脸吗？……”医生们欣慰地问。

黄宗英默默地望着病床边的人们，微微地点了点头，轻声地说：“我睡了多久？睡得都不想醒了……”

第二天，医生见她病情稳定，立刻决定送她去拉萨，再乘飞机回北京治疗。黄宗英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徐凤翔，离开了摄制组的年轻的伙伴们，她眼里含着泪花深情地说：

“唉，我的身体这么不争气，看来是老了……我会日夜想着你们的……再见！……”

“再见！”

“再见！”

啊，黄宗英，你知道吗？徐凤翔追着远去的汽车在送你！摄制组的小伙子们跑到山头上挥着手在送你！雅鲁藏布江奔腾着深情的浪花在送你！

祝你一路平安！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我自四月二十七日从北京飞拉萨，一路走一路病倒一路拍摄电视专题片，直到五月三十一日被送到拉萨飞返北京，直接住进了首都友谊医院。

经医生检查，对我的诊断是：

高原病。

甲状腺肿。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

医生说我的四肢的末梢微血管已经百分之百的变形，难以恢复治愈了。刹那间，我的反应是：趁我还能走，我还要走一走非高原地区。四肢的麻痹和疼痛症状已时时刻刻警告我，我得快点儿深入地多走走，在瘫痪到来之前。可是，现在我躺在病床上，连一步也不会走，什么时候能下床？什么时候能走呢？我不知道……

“怎么不管住小妹，还让她往那么危险的地方去！”朋友谴责冯亦代。

他说：“那是她的事业，我只能支持。不能拖后腿，病了我服侍她。”

天啊！倒过来了，本来我应该服侍这个八十老人的。

“忘了自己什么年纪，还往西藏跑……”

“不照镜子我想不起自己的年纪，”我答。“反正我不后悔。”

真的，幸亏在我病倒之前又去了这对我十分宝贵的第三番入藏，并品尝了濒死的味道，也不那么可怕；拍出来的垂危形象也不算太难看。

可惜，此番去西藏一个多月，笔记本上只记了三张半纸。我时时追忆我在阴阳缥缈之际，都迷迷糊糊想过什么，见到些什么。不能走动时的想往，是很醉人的。

从此不能再去的地方，是特别诱人的！

黄宗英躺在首都友谊医院的病床上，她微闭着眼睛，仿佛静静地睡着了。温暖的阳光从窗口洒进来，将床头柜上深红色的玫瑰花映照得更加艳丽。

冯亦代坐在病床边，默默地守护着。输液瓶里的药水刚刚换过，正一滴一滴地流进黄宗英的体内。冯亦代轻轻抚着黄宗英手上的紫癜，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二哥，你……你怎么又叹气啦？”

“我没叹气。”

“我听到了，你叹气啦……”

“是吗？”冯亦代会心地笑了。

“二哥，让我去西藏你后悔了吗？”

“不，不后悔。如果我的年龄从八十一岁倒写为一十八岁，我会和你一起去西藏。”

“真没想到，这回病得这么重，也许是老了……”

“小妹，无论你的病情怎样，我都要从医院里把你救出来！”“我相信……相信！你会像诗人勃朗宁那样，把自己的夫人从病榻上扶起来！”

“这也许会使我们老来的生活更为旖旎，虽然这里面会有甜、酸、苦、辣……”

“二哥，我要郑重地立个遗嘱，万一有一天我再去冒什么险，真成了植物人，就一定让我安乐死……”

“小妹，你在说什么？”

“我是认真的！”

“你即便成了植物人，我也终身服侍你！不过，你不会成为植物人，不会……”

黄宗英望着冯亦代欣慰地笑了。

这时，窗上映着一片橙红色的光芒，天边的晚霞像春天盛开的杜鹃花那样红艳，那样迷人。啊，晚霞那么美丽，和朝霞一样美丽！

我珍惜生命，因为我还有许多未圆的艺术之梦。我不惜生命，一旦艺术要求我为之献身。当人生中碰到悲苦、挫折、危难，我思忖：直面人生的苦难是艺术家可遇而不可求的“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吃得饱饱的”可以强化认识社会的广度、深度和力度。而人生中的喜悦、爱情、友谊、亲心是艺术的营养钵。在时间的溪流狂涛中，艺术家恰似载卵的鱼儿迎浪弋行……

我骄傲并珍惜我的读者和观众把我当成他们的女儿、姐妹、长辈，他们接受我的文笔和角色像接受自己的亲人，决不止于接受艺术作品本身。

人无志则笔失魂。

只要我不成为植物人，我就会时时刻刻开笔招魂！

劳劳尘世，如今倒数秒不知从哪个寿数往回磨蹭，于是给自己订下了个天晓得守不守得住的守则：

只做别人无法代替你做的事。

少做或不做人人都能做的事。

春风，轻轻地吹拂，吹拂……

黄宗英躺在病床上，闻到了窗外海棠花的幽香，她微微闭着眼睛对冯亦代说：“二哥，你闻到海棠花香了吗？”“闻到了。”

“在江南，该是油菜开花的季节了，我多想在开遍油菜花的原野上奔跑……”

“小妹，别着急，你很快就会好起来。”

黄宗英微微地笑了，笑得很自信。突然，她觉得自己开始在蓝天上飞翔。飞呀，飞呀，飞到了雄伟峻峭的高山顶，飞到了白皑皑的雪线上。她看到冯亦代正在向她招手，她激动地呼喊着，奔跑着……

黄宗英面前，出现了一片又一片的花海，有雪莲花，有格桑花，有杜鹃花，还有叫不出名字的“生命之花”……

这是黄宗英的梦境吗？

是梦境，又不是梦境。因为梦境也会令人意外地变为现实！

一九八五年十月——一九九五年五月写于上海

